

目 录

经济运行辑

社会主义经济运行中的一个本质特征.....	(3)
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是“紧运行”.....	(15)
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运行若干问题的思考.....	(37)
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制研究的思考.....	(121)
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特征和改革问题.....	(139)
紧运行：我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运行的基本 特征.....	(154)

金融改革辑

金融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作用.....	(191)
建立金融市场，深化金融改革.....	(202)

首都发展战略辑

关于计划体制改革的几点想法.....	(209)
关于发展北京市第三产业的问题.....	(213)
从实际出发研究首都发展战略.....	(222)
首都发展战略研究中现代决策方法探索.....	(226)

关于首都发展战略研究的几个问题.....	(235)
首都发展战略研究报告	(248)

经济运行辑



社会主义经济运行中的一个本质特征^①

在我们面前，社会主义的经济运行现象同资本主义的经济运行现象表现出明显的对偶状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是普遍存在的需求不足，供给过剩，劳动力过剩、资金过剩、商品过剩、生产力也过剩；在社会主义则是需求膨胀，供给不足，几乎所有生产条件和资源，相当多的生产资料都短缺。在资本主义，整个经济是预算约束型的，在社会主义则是资源约束型的。在资本主义是企业的预算约束硬化，在社会主义则是企业的约束软化。在资本主义是买方市场，在社会主义是卖方市场，如此等等。

资本主义的微观约束硬化是私有制决定的。社会主义的微观约束软化则是现时存在的公有制决定的，是由需求膨胀条件下经济的结构化造成的。

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中的资源闲置及浪费，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对立，经济危机等问题和企业竞争性强，管理水平高，技术进步动力较大等特点，都同出于私有制造成的预算约束硬化。这

① 本文写于1986年6月，发表在《学习与研究》1987年第一期。

种硬化同时表现为宏观的生产力过剩和社会需求不足。经济危机即资本主义的经济震荡则是经济发展过程中自发地强行调节过剩状态的表现。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破坏作用在 1929 年达到巅峰之后。因为政府的干预政策、科技进步和政治、军事等原因，周期震荡大大缓和了，范围和强度都减少了。在今天，只在鲜活商品上还表现出较大的周期性破坏作用。但是各种过剩的经济表现仍然普遍存在，如：资金、劳动力、资源等都存在着过剩状态。过剩是形成买方市场的条件。在社会上资源和生产力过剩的情况下，企业才可能随时迅速地购买到一切生产条件，实现资本的转移和增殖，也才可以通过加强管理极大地减少内部物资准备。在资本主义方式下，企业的准备资金主要地不是表现为物质资源而是表现为货币，有货币——一般等价物，就能够调动资源和生产力。准备资金从实物资本形式转变到货币形式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结果。因此，资本主义依赖财政和金融就可以实现产业利润率的调整，就可以调整社会经济结构，就可以引导整个经济状态。列宁在分析帝国主义特征时曾经深刻揭示了金融资本的这个作用。企业的准备资金以货币形式存在，是以社会上大量的物资和生产力闲置为条件的，没有这种外部条件，一般等价物向生产条件的转化是不可能随时、迅速实现的。

“过剩”的海洋造成了金融资本及其垄断形成的基本条件，以金融为船舵的资本主义经济转向快，就是以“过剩”为前提的。

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下，一切都反过来了。废除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建立了公有制之后，解除了资本主义存在的对经济发展的社会约束——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的约束，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奇怪现象：人们的贫困和商品过剩同时存在的现象消失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是建立在对社会生产力和生产资源充

分利用的基础上的（当然，这种实现资源充分利用的方式，是行政的，还是经济的，是用于体现技术进步要求的结构还是单纯的数量扩张都需要研究）。实现充分利用是依靠统筹规划和计划，在全社会进行调度、平衡、安排来实现的。它的基础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因此社会主义的社会需求摆脱了社会性约束，出现了人们的需求大于供给，从而形成源源不断的生产发展动力这一社会经济发展的更为合理的状况。需求过强以至膨胀是现实存在的所有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现存的社会主义经济运行中的优点和缺点也都同出于这个特征。这种摆脱了社会约束的需求膨胀，只有在资源约束面前才会“俯首贴耳”。社会主义的需求膨胀只受到资源约束。这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机制”，但却是物质的而不是社会的“机制”。一旦人为地放松了各种经济宏观管理工作的主动约束性，社会需求就会自发地过份膨胀，每逢这时，资源约束就从“隐型在后台”走上“显型的前台”，整个经济发展和需求增长就不得不在“物质”面前“止步”。“过剩”的海洋消失了，社会经济结构直接面对资源了。

因此，社会主义经济是资源约束型经济。这是对于社会约束型（包括预算约束型）经济的否定和伟大进步。它第一次使经济发展建立在资源充分配置上成为可能，而不是追随在市场供需关系的人为的社会约束的后面。在这种状态下，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的不是货币而是资源。各种形式的准备资金都主要地表现为物资形式。物资短缺和卖方市场长期地、强度不同地存在着。

需求膨胀在不同的社会主义国家有不同的表现，在苏联，即传统社会主义经济模式中，计划管到生产，是严格的、周密的行政化计划体制，其需求膨胀的主要表现方式是投资需求膨胀，物资短缺、消费膨胀由投资膨胀所引导。

在匈牙利，行政的计划管到价格、金融、工资和税收等“经济杠杆”，通过“经济杠杆”调节经济运行。在调节经济运行的层次上，是非行政化的，但它仍然企业约束软化。其基本建设投资、信贷、消费基金等都表现出周期性膨胀。消费基金的膨胀越来越成为社会需求膨胀的主导。

在南斯拉夫，行政计划只管金融，“经济杠杆”的调节几乎包容了经济发展的所有方面。在那里，是消费基金不可逆转的增长，生产投资不足，信贷约束严重软化，企业分光吃净倾向严重。

无论哪种模式，需求膨胀这一经济现象是共同的。但膨胀的方式和方面不同，而导致资源约束的需求膨胀是由公有制下的社会因素决定的。

当然，社会主义条件下也会出现局部的过剩现象。这种过剩不是需求膨胀的消失，而是更严重的结构性需求膨胀造成的短缺的另一种表现。当局部过剩现象出现时，总伴随着结构性及总量的短缺存在，而且后者的强度总大于前者。这种“过剩”是需求提前质变或生产力长期单纯数量型扩大再生产或经济发展中结构性“偏向”的结果。

三十年来，一些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了多种经济体制改革，试图通过强化预算约束的办法来制止需求膨胀。但目前看来，预算约束的硬化程度是有限的，无论需求的结构怎么变化，总强度并没有减少。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下，抑制需求膨胀的问题必须寻找多样化的出路。

综上所述，可以说，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是日益膨胀的社会需求同有限资源约束之间的矛盾。这里所说的资源，即指自然资源，也有做为生产基础和前提条件的，由劳动积累形成的资源，如：生产资料、劳动力、基础设施等等。我们平时所说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只是这种

基本矛盾的更原则、更笼统的说法。由这个基础矛盾出发，社会主义宏观经济领导的主要任务是自觉地调节这两者之间关系，防止“激化”。这个基本矛盾表明，社会主义的经济机制必然是多方面的，如：物价、财政、税收、工资、金融、投资等等。因此，用这些机制来调节经济不是一项简单的事情，同时也说明，社会主义要将控制需求增长放在首位考虑。因为需求是社会主义最活跃的经济因素。

从这样一个基本矛盾出发，经济体制改革就要首先紧紧围绕解决这个基本矛盾来进行，改革的目标、方针、政策都应针对短缺经济运行状况。旧经济体制中的种种弊端是短缺经济中的问题，简单地用“过剩”经济的办法来纠正是很难有助于解决宏观经济问题的。

二

在我国社会主义短缺经济状态下，也出现了周期性经济震荡——资源耗尽型经济震荡。其基本特征是：投资和消费的需求膨胀——制造业的生产膨胀——消费和投资需求的再膨胀；为适应消费膨胀或经济发展高速度，投资结构畸变，资源开发性投资比例下降——资源极度短缺（如：重要的生产原材料、能源、交通、粮食、外汇、资金等）形成的停滞和调整。这种经济震荡反映出在短缺经济中经济规律对需求过度膨胀，极度短缺状态的“自然”调整过程。这是一种事后的，被迫的调节过程。出现经济震荡不是不可避免的，而是完全有可能避免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为消除这种震荡奠定了最重要的条件。但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和对客观规律的认识水平低，我们历史上只有几次摆脱了“盲目”，抓住“自觉”前进的线索。

没有社会约束(非私有制的)的需求膨胀是社会主义经济不稳定和震荡的基本原因。经济体制改革的第一个任务应该是解决震荡问题。出现震荡是经济体制不成熟的、典型的、集中的和全局性的表现。依靠震荡的“自然”调整解决经济平衡发展问题是代价沉重的，这已为我国 36 年的建设历史所证明。除此之外，经济体制改革还有许多其它的任务，如：调动职工和企业生产积极性，贯彻按劳分配原则，解决企业经济效益问题等等，但首要的应是解决经济震荡，保持合理的经济结构，避免“经济折腾”，这是宏观最大经济效益所在，也是经济指导和经济发展的首要问题。

社会主义解决经济震荡问题同资本主义解决经济危机问题是根本不同的。社会主义是在充分利用资源，充分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克服需求过度膨胀以解决经济结构合理的问题；资本主义则是在市场的“自发”性产生的资源普遍闲置和过剩的条件下，为缓和社会矛盾，促进资本增殖实行需求刺激措施。

消除经济震荡只是消除了“短缺”最恶劣的形式——有限资源对需求过度膨胀的约束惩罚，但并不会消除短缺。短缺作为相对的稳定状态，还会长期存在。按照非均衡论的观点，社会经济状态中，供需不多不少地完全平衡是不存在的，仅仅是理论上的设想，而不平衡才是现实的。社会主义宏观经济指导和控制的作用是使经济摆脱耗尽型经济震荡，减弱短缺强度，趋于供需平衡。它是人类依靠自觉的行动，也就是“看得见的手”驾驭经济的平衡发展。

从更一般的角度看，社会主义短缺经济是对资本主义过剩经济的否定和进步。尽管这看上去是原始的，粗糙的，但却是现实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人类经济出现了一种反态：生产力的发展好象超过了人们的需要。一方面企业为资本拼命在品种、质

量、技术等方面竞争，另一方面大量社会生产力闲置。社会主义在社会化大生产中表现出人们发展生产的原动力，一切生产都为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需求而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展现给人们的，一开始并不是光彩夺目的“无限”的优越性，而是一种粗糙、简陋，然而却是朴素的现实的生产不断发展的原动力。

三

“计划”就其本身的含义而言，是反映社会生产力发展内在要求，使社会经济按比例、平衡稳步发展。当然，现实离这种“最优化”的计划还很遥远。现在的计划与其说是主动的，不如说是被动的。“需求膨胀”的产生，严重阻滞了“计划”原有功能的成长。需求膨胀不仅表现为企业行为，也常常表现为政府行为。当这种有计划的“无计划需求膨胀”形成时，“计划”便走向它最恶劣的形式——“救火式”计划。社会主义经济的矛盾也走向它最恶劣的形式，即需求膨胀的无政府状态和有限资源的矛盾。计划被迫以行政性办法被动地跟在需求膨胀之后，分配资源和发展短线、约束长线。以分配有限的资源和投资规模适应需求膨胀。这时，一切其它的社会经济机制都变得黯然失色。其他经济机制“退化”的条件下，行政性计划成为反映资源约束、控制需求膨胀发展的最有力的方式，这是一种必然的结果。

但是，这种行政化而非科学化、社会化的计划方式在约束需求膨胀同时，也制造着需求膨胀。这已为我们三十多年的历史所证明。

在短缺情况下的行政性计划，实际上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社会生产力还不够发达、社会生产的社会化程度还不够高，短缺程度又较大时的一种十分自然的发展结果，而不会以个人的主观

意志为转移。在我国建国初期，为调整经济秩序，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这种行政化的计划体制曾发挥了重大的作用，成为国家改造和干预经济的主要形式。在此之后，行政化的计划体制应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生产力社会化程度的提高而不断“隐退”。但各项需求极度膨胀导致的经济震荡，在它的膨胀、调整的每个阶段上，都不断强化了行政手段的作用。因为别的办法比行政的办法要求较为宽松——供需较为平衡的条件。短缺加强了管理及计划的行政化，而这些方面的行政化又阻碍了社会经济社会化的进程。

以计划的形式，按照全局经济发展要求，按照充分利用资源的要求来指导社会经济发展和企业发展，实质上是社会化生产的内在要求，而不是行政化经济体制的结果。随着经济的发展，经济结构化特征日益明显。经济结构化要求按比例，比例是结构的数量表现。结构是现代生产力的立体描述、是现代经济的最基本特征之一。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结构是以金融的结构化为前提的，而金融就其作为货币——一般等价物的运动，本质上是非结构性的。因此，金融的结构化是经济结构化的货币表现而已，是曲折的“映射”。在“过剩”的环境中，结构是“淹没”和掩盖在金融中的。在社会主义“短缺”状态下，“水落石出”，金融对经济的指导作用让位给资源，经济结构性突出地、直接地显现出来。这是一种短缺条件下的，资源约束下的结构化，是不断地再生出“短线”的结构化。经济结构性的最概括表现形式之一是投入产出表。计划是经济结构化所产生出来的经济功能。生产力越发展，社会化分工和联系越复杂，经济结构化（或说系统化）程度越高，经济发展的计划特征也就越突出，要求也就越高。无论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还是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不论是稳定在短线还是稳定在过剩状态下的经济，只要是社会化大生产，

就都表现出了这种特征。

在社会主义社会，社会经济的发展，既要充分利用资源解决结构问题，又要减少经济震荡。以“看得见的手”代替“看不见的手”来自觉地组织和领导社会生产，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进步，是历史赋予社会主义社会的使命。

完成这样的历史转变，需要长期的过程。现实的社会主义，还只是人们自觉地引导经济发展的胚胎期、“原始积累”期。在这个历史时期中，经济运行还摆脱不了需求膨胀和短缺的现实基础，无论从认识上还是从客观条件上、手段上，人们利用计划指导经济发展，即以“看得见的手”来推动经济发展的能力还是有限的，相当多的时候是不自觉的、被动的。离不开行政方式，也还离不开市场，离不开“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在一些经济领域中，还要以市场调节为主。这是一个行政性计划和市场调节兼容的生产力发展的必经时期。也可以说，在整体上这是一种以计划形式出现的、以短缺的卖方市场机制运行的商品经济。在这种市场中，计划只不过是卖方市场运行机制的一种条件和表现而已。在这个历史时期，不管是计划，还是市场，都离不开需求膨胀和短缺的现实基础，我们的改革正是要改进和提高这个市场的社会化程度。当达到以自觉的社会化机制来发展经济时，经济的发展逐步自觉地缓和了需求膨胀，摆脱了盲目被动的短缺的资源约束，便达到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成熟期。这个时期，体制是什么样目前尚看不清，但应具有这样的特征：经济运行中的行政方法失去了计划的主要载体的地位，退居有限作用。行政化计划和盲目市场调节这两种初级形式共同消亡，取而代之的是以信息化为基础的自觉的社会化运行和调节机制，是原有的计划和市场功能的有机的融合。“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融为一体，协调一致，在宏观和微观上同时解决着资

源“最优”配制、结构、科技进步、效益和动力问题。“看不见的手”为“看得见的手”服务，自发性为自觉性服务。计划功能也从行政的方式转变为社会化机制的方式。

计划功能行政化的缺陷是难以完全反映社会生产力内部各方面、各经济单元之间的立体的有机联系和瞬时变化的动态过程，也难以解决效益和动力问题。经济体制改革增加“市场”机制的功能，正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这个“市场”机制实际已隐含在现有的经济运行机制中。这不是资本主义传统的过剩市场机制，而是社会主义现实的短缺的市场机制，改革就是要把这种机制更充分地发挥出来，使社会主义商品生产有个大发展。

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本质特征首先是在需求迅速增长造成的短缺条件下，尽可能地利用短缺市场的机制，发展商品生产，最大限度地解决资源的配置和经济结构问题，效益、动力问题。各种要素的商品化和市场性流动，都是在需求膨胀的资源约束的条件下形成和发展的，这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普照的光”。在这种商品生产中，不能幻想“过剩”的市场会自然而然地出现，“过剩”的市场机制会自发地起作用。这是一种以短缺条件下的“看不见的手”直接为全社会的共同目标服务的商品生产。

实践证明，单纯依靠传统“市场”机制不能消除社会主义经济由于需求膨胀造成的震荡，因为在短缺的环境下，难以形成“过剩”的市场，而需求膨胀的形成，是超越市场机制的。这种膨胀持续的再生，不断地限制着传统市场的作用。在目前社会不能自觉约束需求膨胀的阶段上，行政性计划存在的主要任务就是约束需求膨胀，调整经济结构，避免经济震荡。

四

解决宏观需求膨胀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解决经济结构问题，同时也是解决微观企业约束硬化，使企业有效益压力，有生产动力的过程。也就是给企业以真正的活力，搞活企业的过程。

解决这些问题不能单纯依靠预算约束硬化，因为完全的预算约束硬化是以“过剩”为条件，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企业预算约束硬化程度不高，一方面是短缺的表现，另一方面，是社会经济高度结构化的表现。而同时社会主义企业社会约束硬化程度很高，也就是社会公平的原则硬化程度很高。资本主义“机制”的对象是金融，社会主义“机制”的对象是结构、是资源。因此，社会主义形成以“看不见的手”为主体和基本特征的经济机制是困难的，相反运用政策和行政办法反而容易。

企业的活力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大问题。需求膨胀造成了越来越强的短缺，直接制约着企业的活力。高度的需求膨胀，在传统体制下，往往把企业变成了行政的附属物，变成了被动执行上级指示的“机械零件”。而在改革后，需求膨胀逐步从外部转移到企业内部，又会使企业陷于消费膨胀、预算约束继续软化的种种困境之中，从而使企业活力得而复失。因此，企业的活力只有在消除需求的过度膨胀后才能有保证。社会主义企业从无活力的“机械零件”转变为活跃的有生机的经济细胞，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大历史性进步。事实证明，在短缺的状态下企业仍然有广阔的活动舞台。搞活企业，大有作为，可以发展各种横向联合，技术的、资金的、原料的以及各种生产要素的联合。企业之间的竞争也能广泛开展。我们应该使企业的活力，在短缺条件下，有个最大限度的发展，造成最大限度的生产社会化和企业约

束硬化，造成企业活跃发展的局面。同时，我们也不能跳出短缺的现实环境，幻想出现一个总量过剩的社会环境，使企业有过剩条件下的“活力”。企业是不可能在短缺条件下，自发地遵循“过剩”市场机制的。

社会主义必须采取多种方式实现企业约束硬化。首先是把宏观的资源约束用各种社会化的方法分解和“映射”到所有的企业中去，来提高企业约束硬化程度，将宏观资源约束同企业约束有机地联系起来。其次是通过法制化的领导者责任制和合理的经营自主权提高对企业领导的约束硬化程度，比如：资金（资产）经营责任制、经理（厂长）任期目标责任制、厂长（经理）负责制等等。第三是通过对企业经营行为、投资行为、分配行为的社会监督和综合考核，通过各种经济杠杆对企业行为的调节，提高对企业行为的约束，克服企业行为的短期化和非正常化，使企业追求经济效益，追求技术进步，追求产品质量和企业信誉的长期战略目标。

在社会主义社会，微观企业的约束硬化同宏观经济发展的约束硬化是一致的、同步的。（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两者之间是矛盾的、对抗的。）从本质上说，它是以公有制为基础，以符合国民经济发展整体需要为原则的，社会自觉的行为。企业的约束硬化程度的提高有待于整个社会化机制的发展。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历史悠久，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社会生产力还不发达，生产社会化水平低，经济发展很不平衡以及行政及经济管理层次较多的社会主义大国，是一个要经过很长历史阶段的努力才能达到的目标。

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是“紧运行”^①

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不仅提出了对经济体制深入分析和认识的任务，而且也提出了对社会主义经济基本理论深入认识的任务。如果说，几年的经济改革实践，使我们对经济体制和改革方案、措施有了深一步认识的话，那么可以说，对于社会主义运行的认识显得还不深刻、不全面，还较薄弱。社会主义经济半个多世纪的发展，特别是近二十年的改革实践，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天地，使人们可以进一步进行理论的思考和探索。这是一个新的基础，它已远不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和社会主义初创的尝试，而是有丰富的内容和坚实基础的持续不断地发展和改革的实践。因此，不能简单地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直接结论，更不能由于社会主义还处于初级阶段就转而全盘使用西方经济学的工具来分析和认识它，而是应该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出发，吸收所有当代的科学成果，从对现实的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描述和实证性研究开始，形成对社会主义经济的系统地、客观地、历史地认识。因此，我们不仅要对近年来改革的实践进行反思，同时还需要对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特点、特征、矛盾和规律的认识进行反思。这是更为基础、更

① 原载1987年2月2日《北京日报》。

为迫切的任务，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有更深远的影响。

—

当我们用考察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目光，从社会主义建设的时间性事件和时期性政策所带来的变化和生机中延伸过去，将社会主义经济运行作为一种社会经济发展方式的、新的、整体性历史来把握时，就会发现，社会主义的经济运行具有鲜明的特征。这种特征在不同时期发生着时期性的变化，但它始终是社会主义经济运行与其它经济运行的显著区别，这就是“紧运行”特征。

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是“紧运行”。“紧运行”是指在社会经济资源供给相对紧张条件下的经济运行。这里所说的资源，既指自然资源，如：耕地、水源、矿藏，也指做为生产基础和前提条件的，由劳动积累形成的资源，如：生产资料、劳动力、基础设施等等。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状态是稳定在这种资源紧张状态下的，这是当前的现实。

紧运行的形成不完全取决于人们的主观愿望。紧运行不是那个人设计出来的，也不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描述过的。社会主义经济的目标不是紧运行，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指导方针和政策也不要求紧运行。但是，无论主观愿望怎样美好，无论政策和宏观经济调控方针如何变化，实际经济总是形成紧运行。我国三十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的历史都证明了这一点。每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方针和政策都力求最大限度地发展生产力，用先进的技术和社会化的组织方式来增加供给，实现国民经济稳定平衡的高速增长。但是，

尽管经济体制、发展战略和政策各不相同，但紧运行的特征都是相同的，只是程度不同而已。资源紧张已经是人们比较“东方”和“西方”经济的最生动、最直觉、最主要的现象。

紧运行有程度的区别，有资源供给紧张程度比较缓解的“宽松”的紧运行。这时，国民经济的重大比例结构比较平衡，在一些产业、产品类上甚至出现局部的、暂时性长线，而这些长线是直接由其他短线支撑的。也有资源供给出现结构性较严重短缺的紧运行。这时，国民经济发展中存在着比较严重的短线，以致有些产品或资源成为相对长线。能源的短线可以使生产能力成为长线，建筑材料的短线可以使建筑能力成为长线；饲料不足，猪、禽的饲养能力便“多余”起来。短线的出现也会由于需求弹性和需求替代作用而传递到其它长线。这时，如果总量上的紧张程度得不到控制和缓解，短线就会增加，原有短线还没能迅速增加供给，新的替代品便又被强大的需求拉成短线，短线的规模、范围迅速蔓延。还有资源供给全面极度紧张的紧运行。这时，需求全面膨胀，计划和生产发展再也赶不上急剧增加的短线，本身也受到约束。短线迅速蔓延到一切主要资源，正常生产受到影响，建设项目停工待料，而为了维持生产和建设，企业被迫囤积大量短线资源，同时社会的短缺资源被膨胀的需求（消费、建设和简单再生产）撕得支离破碎，以致谁都不能够得到满足而正常运行下去。这时，资源耗尽型的经济震荡便来临了。显然这种“过度”短缺的紧运行，是社会主义经济的灾难。客观经济运行虽然不能完全以这样三种程度简单划分，但这三种不同程度的紧运行，我们都曾经体验过。无论经济运行处于何种程度，都具有“资源紧张”的特征。社会主义经济运行，还没有出现过稳定于“非紧运行”状态的时期。但我们可以选择一种利大于弊的状态而避免最恶劣的灾难性的状态。

从经济发展方式上看，紧运行是一种“短线主导型”的经济运行。在这种方式下，经济发展总是受到最短线资源的制约。是整个经济发展平衡、稳定的中心。短线成为一种调节阀，可以是主动的，也可以是被动的。对短线生产的投入增加，短线的供给增长，会带动整个经济的增长，而短线的增长停滞以至范围的蔓延，会使整个经济发展缓慢和停滞，短线成为整个经济调节的基本杠杆。而在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中，制约整个经济发展的是需求。只有需求的增长，才使充满长线的过剩状态略有松动，才使整个经济有所发展。而同时，更多的长线迅速出现和蔓延，造成新水平过剩的长线主导状态，这样，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是“长线主导型”经济，一切矛盾都集中在长线上。

在过剩市场中，生产要素供给充裕，能够在市场价格和市场摩擦引导下，较顺利流动。生产要素在流动中实现配置。在紧运行中，短缺使社会生产要素相对稳定的分配格局如同过剩条件下生产厂家有相对稳定的需求客户一样，使生产企业获得稳定资源渠道，建立与供给厂家的伙伴关系，使企业能有更长远的打算。相对稳定的生产要素分配格局能够减少要素流动中的摩擦损失，供求的结构构成更为清晰。目前迅速发展企业跨区域间的横向经济联合很多属于这一类。但是，这种要素配置方式无形中强化了要素分配结构，导致现有产业结构的硬化。短缺越严重，要素分配的结构化倾向越明显，流动越困难。

形成紧运行不是由于供给增长过慢，而是由于需求增长过快。在这种运行中，任何供给的增长都同时创造着比供给增长量更大的需求。需求成为最活跃、最具有主动性的增长因素。需求总规模的增长拉动了供给总规模的增长，成为巨大的经济发展动力，需求的结构变化也强有力地拉动着供给结构的变化，造成短线的不断再生。经济的发展在供给短线的不断被缓和，

又不断再生中实现。在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中，我们经常看到的则是相反的形式。在那里，最活跃、最具有主动性的因素是资本过剩的供给在时刻捕捉着由需求的总量和结构变化而产生的新的获取最大利润的机会。

在社会主义经济运行中，需求的产生往往并不取决于供给，供给始终只是需求增长和实现的约束和条件。在这种条件下，如何依赖需求增长，这一微观的本质性生产动力促进生产发展，同时又能够有效地把握住亿万种分散的，又是巨大的需求，使之与供给相适应便是一个重大的问题。

社会主义经济运行呈现紧运行的特征取决于很多原因，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历史时期，原因也有所不同，其中有主观原因，如：决策失误，方针、政策上的失误；也有社会主义初创和探索过程中，体制上不可避免的不成熟、不完善的原因；也有由于没能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社会化水平的提高而及时地相应改革体制的原因；也有宏观经济管理的摸索、尝试中难免的“代价”；还有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变化影响，和社会主义国家由于处于发展中阶段，必须努力赶超、尽快实现经济技术现代化和领先地位的历史要求等原因。透过所有这些原因，我们可以看到生产资料公有制这样一种先进的生产关系所带来的产生需求膨胀倾向（膨胀在这里仅作为一种描述）的必然性是一种更基本的原因。

公有制的建立废除了几千年私有制形成的对社会财富分配使用的所有制约束，社会利益主体在社会财富分配和使用上的对立和对抗亦随之消失，经济发展目标和利益主体之间的对抗消失了，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私有制障碍被彻底拆除。公有制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整个社会主义社会制度是使经济运行转变为紧运行的关键。

在公有制条件下，各社会利益主体不再以自己对财富拥有的有限所有权（象私有制那样）来参与社会资源的分配，参与生产和消费，而是以自己社会利益主体的平等地位，以自己所负有的社会责任（发展生产，加强建设，改善生活，实现现代化的责任）和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贡献来参与分配，换句话说，这近似一种无限的所有权。于是，社会成员参与社会分配的权利超越了实际的在现实基础上的所有权和各自贡献的限制。任何企业为上新项目要求更多的投资都是合理的，任何地方要求早日脱贫致富，振兴赶超而要求得到更多的资源也都是合理的，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攀比（投资攀比、生产条件攀比、工资福利攀比等等）也是合理的。因此，社会主义经济运行中，利益主体的分配权力突破了物质的约束，这不仅成为生产与消费直接联系，产品得到充分分配和使用的保证，而且也是形成需求膨胀的主要原因。分配要求由高尚而又宏伟的目标产生，而一旦分配要求实现，目标的膨胀就变成需求的膨胀。需求膨胀被释放出来，整个经济便在不断迅速增长的需求牵引下运转起来。

紧运行的另一种理论描述，是最大限度地利用有限资源以满足已经日益增长了的社会需要。也就是说，是一种需求超前增长（需求拉动，需求膨胀）并且受到资源约束的经济运行。换句话说，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基本矛盾是日益膨胀的社会需求与有限资源约束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经济正是依靠这种紧运行而达到了资源的最大限度的利用和平衡。可以有实现不了的需求，但不能有没被分配和利用的资源，是这种运行的原则。尽管还存在着微观上的浪费，但至少从宏观经济管理角度看，是这样的。这种保证资源得到最大利用的资源平衡方式与以资本取得最大利益为原则的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方式是截然不同的。各社会主义国家都具有紧运行的特征，这不是社会主义对经济运

行状态和资源平衡方式的共同选择，即政策层次原因的结果，而是由于公有制，这个更深层次的原因所决定的。公有制可以在任何经济发展阶段的社会中建立，但落后的社会释放的需求膨胀的盲目性更大，更超出经济的实际负担能力，公有制形式的变化，不同一经济发展水平上调整、完善，可以改善紧运行的强度，缓和短缺，但没能完全消除紧运行状态。公有制的最终完善，显然依赖于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社会化的高度发展。这样，社会主义经济的紧运行状态便成为与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相区别的鲜明特征。有时候，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也出现相对“短缺”及由此而来的通货膨胀。这种需求增长是偏离它稳定状态的暂时现象。这是政府在有效需求不足的长期趋势中，采取创造和刺激社会需求的政策及对企业投资需求的振兴政策的短期效应和现象。而在社会主义经济运行中，任何需求都是无须刺激的，它自然生长，到处蔓延，无处不在。社会主义经济稳定的紧运行状态，确是由于各种深刻的政治经济原因决定而存在的，它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结果。

紧运行状态是经济运行的一种方式。紧运行状态一方面表现出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经济关系对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极大的解放作用。在紧运行状态中，社会生产的原动力——社会需求得到了自然的充分体现。但同时另一方面，需求增长会超出资源约束的可能性也转变为现实性，在这一点上，合理性转化为不合理。这就表现出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仍然不存在自然的平衡，即可以简单地按主观愿望实现的平衡，失衡，甚至经济震荡也能发生。这是一种年轻的、不成熟的处于发展初期阶段的，又是具有旺盛生命力的经济。

紧运行是商品生产的一种全新的年青的形态和阶段，它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建立而诞生，与资本主义的“过剩”经济

状态相比，晚了 300 多年。因此，人们对它的认识和研究还刚刚开始。

二

紧运行作为商品生产的形态之一，具有鲜明的特点。与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中供给（资本）成为最活跃、最积极的因素，并且日益受到需求不足的挤压相反，在紧运行中，需求成为最活跃、最积极的因素，是需求拉动供给高速增长。但是，人们往往忽视了它的特点和特征，而又误把“过剩”状态的特点和特征作为商品生产一般，这也许是一个历史的误会。

紧运行对商品生产有较大的特殊影响。在紧运行下，市场呈现短缺状态，这和天文现象一样，过强的需求形成了“需求黑洞”，使企业处在“需求黑洞”引力中，这是一种强大的需求引力场，产品一旦进入流通就迅速地被巨大的需求引力所吸纳，很少有提高产品质量和改进性能、更新品种和款式的反馈信息。这样就造成企业数量增长的积极性很高，数量发展的环境良好。大量产品长期适销，生产以适销产品的数量增长方式增长，系列化、多样化的进程很慢。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内部技术进步，产品更新、质量提高的意识较弱，而扩大规模、增加产量的意识很强，新增投资往往是重复的数量增长式投入。“需求黑洞”的存在是企业经营各种风险的最可靠担保。依靠“需求黑洞”企业敢于为投资冒各种风险。几乎是无止境的过强市场需求刺激了企业的同样几乎是无止境的投资欲望，投资饥渴普遍存在。一切投入都可以从“需求黑洞”中得到报偿，使这种饥渴不断地再生。而这种长期的受到“需求”吸纳的扩大规模的投资造成了投资决策的盲目乐观。由于市场需求压力过大，为满足市场，企业的产

品产量指标，尤其是短线产品的产量指标得到强化，成为企业第一位的目标，效益指标被弱化了。这时，生产企业对市场供给的责任也日益单一化、物化、固化；任一企业，尤其是资源性生产企业的产品更换和产量变化，都会影响到其它企业甚至整个生产秩序，企业的产品和社会中的社会分工被这种紧张的供给关系硬化了。由于资源短缺，企业不得不将生产经营的主要精力集中在取得资源上。企业十分注意资源供给的信息，根据资源供给情况安排生产计划。

由于整个经济运行处于紧运行状态中，整个经济结构也都被紧运行“异化”了。紧运行下的经济结构化，使有限资源只能在已形成的既定结构中流动和分配，而在不同结构部分之间的结合部，边缘部分形成大片结构和资源的空白。紧运行造成资源只能在既定结构中勉强平衡，使资源只能维持、服从现有结构，是紧运行下高度结构化的主要特点和内容。而结构的变化，往往来自于外部的干预。正是这种结构化，使有限的资源得以最大限度地维护已有生产秩序，使整个经济沿着已有结构较快发展，同时，也为经济结构调整带来了困难。社会上没有有力地促使各产业之间相互联系，推动科技进步和结构及时调整的“多余”资源，甚至大部分增量都被填入到为满足需求膨胀的现有产业结构中去。任何企业想要改变自己的工艺、更新产品或者使自己转到另一产业上，首先遇到的困难是难以在流通中找到足够的资源。紧运行仿佛是一个将整个物质空间已经撑得满满的结构经济，任何产业的调动和置换都极为困难。社会经济发展中，随着科技进步和需求质量内容的变化，社会经济的各个产业部门，各企业在产品、规模、工艺、设备和组织上都应不断地进行相应的变化和调整，以适应科技进步和需求变化。但在紧运行状态中，由于各种资源“绷”得很紧，总量调整极为困难，调整只

好以增量的步伐缓慢完成。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能摸索出一套及时有效地进行总量调整的社会化方法。除了资源紧张的原因之外，在紧运行下，产品市场需求过大，长期适销，也是结构调整困难的原因之一。在紧运行下，资源供给紧张，商品交换以期货为主，且供货期长，供应量和供货期不稳定，导致企业的囤积倾向。资源供给越紧张，供应量和供货期越不稳定，企业的囤积倾向越严重。而企业的囤积倾向又反过来加剧了供给的紧张程度。往往资源分配不得不依靠行政调度来保证既定结构中的骨干企业和支柱产业，结构便被进一步硬化，结构调整更加困难。紧运行下这种结构化特征是科技进步慢、产品质量差、企业效益低的一个重要原因。

紧运行也是一种市场，是公有制下的市场。当然，这种市场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市场”，而是卖方市场。在这种市场中，许多资本主义经济过剩市场中的市场机制都发生了变形。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企业仍然是为交换而生产的，或者说，企业的经济成果（效益）必须通过交换才能实现。不过在需求引力下，企业为交换生产的观念重心，由售出转到生产要素和原料的购入。这种交换既不是为使用价值的简单实物交换，又不是为最大利润的一般交换，而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资源以满足需求增长的交换。就交换双方的市场而言，是在“需求黑洞”引力场“普照的光”之下的交换。交换的双方都有各自明确的经济利益，但这不够，在这两者之上双方还在充分利用资源以满足社会需求的原则下进行交换，并通过交换实现各自的经济利益，同时也实现着社会的利益。可见，社会主义经济运行中的交换关系已经超越了自然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而有了自己主导方面的新内容。在双轨制下，存在着两种交换，即计划指导下的交换和按照利润原则的交换。

显然，在现实中，前一种交换集中在短线资源上，后一种交换中的长线产品多些，而且往往不少长线产品是直接依赖短线资源供给的。资本主义的资本增殖再生产是通过有限需求市场这个“瓶颈”中的竞争、挤压而实现的，在竞争和挤压中，交换的价格趋近于商品价值。而紧运行下的社会再生产是通过“需求黑洞”引力场的吸纳、加速而实现的，因此交换的价格被需求推动，往往大大偏离商品的价值。交换中卖方很容易通过价格和价格以外的方法获得超额利润，这些收益迅速被原有产业结构和消费所吸纳，而难以形成结构调整的机制和能力。

紧运行同资本主义市场相比，交换手段有不同的表现。资本主义市场中，价值是由统一的尺度表现的，而且有集中化、抽象化的趋势，从稀缺物品到贵金属，又发展到纸币、票据、有价证券、信用卡等信用货币，现在甚至抽象为计算机信号。而在紧运行中，却出现了相反的倾向。最基础同时又最短缺的生产资源有了一般等价物的功能，出现了物资串换，有一般等价物功能向最短线资源集中的分散化和具体化的现象。谁更多地掌握短线资源，谁就能交换到其它生产资源，就能掌握经济运行，如同掌握货币一样。短线资源与货币在交换过程中形成一对互相依存、在流通中互补的共同起作用的对立而又是统一体的“偶极子”，同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相比，货币不再是完整意义上的一般等价物，它需要短线的补充。于是囤积短线资源的倾向产生了。货币在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中灵活调动资源的功能大大减弱了。

紧运行下有特殊的价格形成。资本主义市场有过剩供给和有限需求约束，这种约束是价格制约的自发机制，生产价格反映了过剩的供给和有限需求的共同作用，这样平均利润率就发挥作用，使价格趋向于价值，这反映了以利润为原则的所有权互相完全独立的、私有企业的利益。社会主义的价格却从一开始就

陷于需求膨胀的矛盾，就反映资源不足、短缺，为需求膨胀所左右。无论是稳定价格还是价格上浮，都是围绕短线进行的，都不过是隐蔽的或公开的需求膨胀的标志，而且更多的是反映紧运行下资源分配特殊方式的需求，很难反映企业的利益，对企业来说，价值反映投入的诸要素，因此，最终反映了有限的社会资源，而价格是完全反映需求的。在需求膨胀的总环境下，除非控制价格，否则价格将大大偏离价值，成为需求膨胀的指示器，不再有一种自动趋近价值的机制，平均利润率的调节作用很难形成。所以在现实中，价格不论是控制还是放开，总是大大偏离价值。价格的这种状态可以称之为“价格陷阱”，即在经济运行中，由于较严重的供不应求倾向的长期存在，价格在抑制需求、刺激供给方面的调节作用常常远远小于由它的波动给社会生产带来严重影响。价格问题所处的这种矛盾状态，实际反映了需求膨胀的整体矛盾。价格的调节功能不得不受到整个经济运行特征约束。实际上，在社会主义经济运行中，供给的增加和需求的抑制都很难由价格调节独立地完成。各种短线资源形成了巨大的短线网络，吸纳、分散以致切割了价格信号作为供求关系信号的传导机能，一部分功能转移到短线资源上，这就抑制了价格的调节作用。运行中很难有“有余资源”迅速响应价格信号，集中于增加供给。因此，在紧运行中，价格对供需关系、资源分配、产业结构调节的作用被短线网络极大地分割、削弱了。越是在短线被有效地消除或减少短线制约的生产领域特别是加工工业，价格的调节作用就越是明显，相反，越是对于基础资源、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部门短线网络的分割和衰减作用极为显著，价格信号的传导线路越长，信号传递越慢，信号误差越大，价格的调节作用也就越弱。

在紧运行中，也存在竞争和淘汰机制，但是这种竞争和淘汰

机制是与过剩市场下的竞争和淘汰机制很不相同的。在紧运行中，长线产品的企业经营不好，有可能被市场淘汰、破产，可以被“关、停、并、转”，短线产品的企业即使经营不好，产品未能更新，成本较高，仍然不会破产、淘汰，甚至还可以得到较快的发展。竞争在“过剩”市场中，集中于产品销售，集中在从商品资本到货币资本的“惊险一跃”。在那里，竞争意味着以高质、优价、新功能的产品在有限市场中多占份额，市场份额关系着企业的生死存亡。但在紧运行的市场上，由于市场过大，几乎任何企业都很容易找到一种产品，不怎么费劲就可以在市场上得到企业生产能力所能达到的最大订单。竞争只意味着赢利多少，而不会危及企业的生死存亡。巨大需求市场上的有限份额，不仅没有形成企业竞争的压力和投资风险，反而形成了企业扩张的要求。在紧运行中，对企业发展最有约束力的因素是资源，是第一次投资。一旦从可投入增量中得到投资，企业就会很容易占有市场，象滚雪球一样发展起来。因此，紧运行条件下，竞争首先集中在增量资源分配市场上，企业争夺的不是需求市场而是有限资源供给。于是，竞争的焦点便集中于建设计划和贷款计划。企业处在平等地位一齐扩张需求，使大量需求变成“空中楼阁”。当无限需求从空中落到人间，就变成现实的权力竞争。企业在列入计划(立项)过程中的竞争是最为激烈的，要过几十个“关卡”，费尽百般周折，这个过程始终是企业整个经营活动中最为惊心动魄的过程，大量的企业(项目)在这个过程中被淘汰。

其次，企业竞争的焦点在于存量资源分配。企业生产正常进行，生产计划顺利完成的主要风险在于原材料的正常供给。企业只要能够获得供给稳定、按期、规格对路的原材料，完成各项经济指标都是不困难的。这种竞争集中于负有物资分配职能的部门和原材料生产厂家，这是买方之间的竞争。能够较多地

得到充分的评价生产要素和对整个经济有重要影响的企业（如部分材料、基础产业）和能够更多地以其他条件（价格及价格以外的）满足卖方企业要求的买方在这种竞争中就有优势。在资源较为紧张的时期，大批的企业在这种购买资源的竞争中失利，被迫停工待料，甚至“关、停、并、转”，被淘汰。这种竞争和淘汰机制是经济运行从资源分配出发，根据资源状况调整产业结构的机制，它与“过剩”市场中，从市场分配出发，以平均利润率为原则调整产业结构的机制是完全不同的。在紧运行中，同资源分配受行政结构分割和影响一样，这种企业的竞争和淘汰机制，往往也是受到行政结构的分割和影响。在这种分割的影响下，相对不足的资源难于集中，而分散的资源配置又加剧了资源配置过程中的短缺和竞争。总起来讲，在紧运行中竞争和淘汰机制由于长线产品和短线产品各自具有显著不同的市场环境而分成两种不同的方式。对于短线产品的生产企业竞争和淘汰机制，主要作用和表现是争取投资，获取资源，加速扩大生产能力，表现为扩大再生产方面的竞争。对于长线产品的生产企业，竞争和淘汰机制则主要表现为销售市场竞争，是简单再生产方面的竞争。但是，长线产品的生产企业的身旁总是存在着巨大的短线产品的市场空白，长线产品市场又不断地受到需求增长的直接压力和由短线市场转移过来的需求压力，使得市场竞争不时地得以松弛。长线产品的生产又往往是短线生产能力聚焦的结果。这种聚焦现在往往是由于企业利润导致的。因此，这种销售市场上长线产品之间的竞争往往是对于短线资源竞争的延伸。长线产品间竞争的持续和发展取决于短线资源或短线产品聚焦的持续。换句话说，这种长线产品的简单再生产之间的竞争，总能转移或转化为短线产品之间扩大再生产之间的竞争，成为推动短线产品的扩大再生产增长的动力。一旦长线产品对于

资源的吸纳能力衰减，短线资源的焦点移向新的产品，长线产品生产企业在销售市场上的竞争就急剧转变为在资源市场上的竞争。因此，紧运行中，竞争机制作用集中地表现在资源分配市场上，企业在销售市场上的竞争是以资源竞争为前提的，并随之而转移的。

紧运行下的投资机制也有很大不同，资本主义过剩市场条件下，企业从社会上筹集投资并不困难，为实现投资所需要的资源也不成问题。在那里，困难在于获得能够得到较大利润的投资机会。投资取决于企业在有限市场中能否保持并提高地位，保持和争夺更大的市场份额，从而获得可能的最大利润，全部困难在于投资之后走过有限需求不足的市场这座“独木桥”。对投资的主要约束是市场需求，一旦需求增长，市场扩大，投资高涨也就随之而来，资本主义经济中国家通过增加财政支出以创造需求，或调整税率和再贴现率以形成更多的较大利润投资机会，都是为了刺激投资，并希图以投资形成的需求刺激新的投资。在紧运行下，企业投资的困难不是在“黑洞市场”中争取到多少份额。巨大需求市场的存在为企业创造了几乎是无限的良好投资机会，这是根本无须刺激的。企业最为困难的，是如何获得投资和如何获得保证实现投资的资源。任何企业都能够获得良好的投资机会，因而任何企业获得资金（无论是企业留利或是其它途径得到的资金）的最大兴趣是直接投入于扩大再生产，而不是用于融资。始终存在着无法满足的企业投资要求。因此，对投资行为的束缚转变为另一种约束，这就是按投资项目缓和紧运行状态的作用，获得资金的可能性和完成投资的资源保证的约束。投资机制完全倒过来了。经济运行越紧张，需求膨胀越快，完成投资的困难也越大，建设周期也越长。对企业来说，最困难的是获得初始投入，一旦有了投资，后面的一切都是“阳关大

道”，市场是不成问题的。

在紧运行中，金融机制的特征也发生了变化。在资本主义过剩市场中，货币资本过剩是市场过剩状态的集中反映，资本输出是货币资本摆脱过剩的困境的表现。资本主义的金融以灵活的融资方式，迅速满足各种投资需求，从而激励了投资活动。在紧运行中，资金短缺是资源短缺的典型反映。一切膨胀的对资源的需求都首先表现为对资金的需求。金融承受着投资需求的巨大压力，在这种压力下，信用膨胀随时可能产生。而一旦形成信用膨胀金融便成为需求膨胀、加剧资源短缺的工具。过剩市场中，信用担保是对企业运用资金获得利润风险的约束。信用担保约束了企业的投资需求，反映了金融对企业运用资金走过“市场需求独木桥”的能力要求。在紧运行中，市场黑洞的存在胜于其它各种信用担保，是最大的担保，能够消除一切风险。在过剩市场中，利率是调整资金资源和实物资源的有力杠杆，也是刺激或抑制社会需求和企业投资需求的有力杠杆。在紧运行中，存在着普遍的投资饥渴，利率的调节作用是很有限的。争取资金是企业获得资源，从而实现经营和发展目标的先决条件。只要资源短缺，需求继续膨胀，企业为获得资源、甚至为囤积资源便不惜成本争取资金，对利率的变化并不敏感。为缓和短缺，增加供给，企业高利率取得资金从而导致的收益减少，往往可以从其它途径，如：税前还贷，财政贴欠、拖长还贷期、减免税收等等来求得解脱。在过剩市场中，金融的结构化是产业结构化的集中表现。金融在调整资源配置、调整产业利润率进而调整经济结构方面发挥着主导作用。在紧运行中，是金融的结构化依附于资源配置的结构和现存产业结构。是资源配置结构的变化调整金融的结构。不是金融调动资源，而是资源调动金融。短线—金融的二极、双重金融结构。在紧运行中，金融与资源有特

殊的关系，要求货币和短线资源共同成为卖方市场上交换的媒介。两者是调控手段的两个极端。在一端，当买方掌握有一种或几种短线资源时，就可以买到同样平价（优价）的其他短线资源；在另一端，当买方能够付出足够的货币时，也可以获得所希望的资源。而更多的，是在其中存在着各种资源——货币组合方式的交换。目前，大量的横向联合都是以获得优价资源为目的，资金融通、投资在大跨度的地域空间上调动的情况，是这种资源调动资金的现实表现。紧运行下的这种交换不是原始的物交换，而是由于极端短缺的资源具有一般等价物的特征，使得交换过程更为复杂，交换媒介是有了双重结构特征的缘故。

尽管在紧运行中，金融机制的内容和作用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它仍然在调控经济运行的总量关系和结构关系方面发挥着重大作用，与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相比较，金融机制的这种作用和金融业的这种责任更为复杂，更为重大。金融是调节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紧张程度的第一杠杆。充分认识金融的这种宏观经济责任，充分发挥它的作用，是需要认真研究解决的重大问题。

资本主义财政的主要经济作用是进行调控，克服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中需求不足的自发倾向。它可以采取完全逆向的调节方式，通过扩大财政支出，甚至赤字财政支出创造需求。社会主义的财政则始终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主体，同时也是经济运行的调控中心。社会主义财政的双重职能使它的经济意义大大提高了。各种财政都负有充分利用资源最大限度地满足需求的任务，负有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任务。同时，财政措施又是抑制由于非预算原因日益增长的需求的有效手段。这种双重作用表明社会主义财政在经济运行中不能完全发挥逆向的调节作用。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财政的建设作用相应地减轻，更多的建设功能轻移给了企业；同时，财政的逆向调节作用的责任

加强了。但是，在关系国计民生，奠定现代化基础的重大基础性行业的项目中，财政仍然保存着决定性的作用。因为社会主义财政能采取最简洁的方式，迅速地集中短缺的资源，用于对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长远的、重大的、基础性作用的方向上。单纯依靠平均利润率的指导是做不到这一点的。生产力的社会化程度越低，就越缺乏经济运行中自发的经济机制来接受和传递宏观经济调控的信号，财政的这种建设作用也就越重要。

但是来自各行各业要求改善现状和来自千家万户要求“脱贫致富”、提高生活水平的要求，往往将财政挤压得不断减少建设功能，趋近于“吃饭财政”。在紧运行中，财政的这种双重作用是经济运行中的主要调控杠杆之一。这种双重作用，即控制需求、逆向调节的作用和集中资源、重点建设的作用，应该是整个经济发展的两个有力的轮子，一方面通过预算控制需求和消费，保证经济总量平衡，另一方面，落实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优化产业结构，保证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和先导产业领先发展，保证经济结构合理。但是，如果运用不当，财政会起着完全相反的作用，推动和加速需求膨胀，将大量的观念需求变化为货币需求。我国经济发展中几次大的需求膨胀都与财政这种“功能失调”有关。

紧运行下的效率问题是为人们所关心的。但人们往往孤立地把效率问题完全归结于管理的微观层次的原因，而忽视基本的宏观前提和环境。紧运行下不断再生的资源短线导致了企业越来越强的囤积倾向和生产投入的强制替代。短缺大大增强了生产过程中的不可预见的干扰，使生产节奏和工艺的一致性被打乱，如停电、待料等。而生产过程一个环节的混乱会蔓延到整个生产过程，甚至整个行业、地区，如推迟交货，这样就从根本上破坏了效率和质量保证的前提条件。短线越多、越严重，混乱的

程度也越强，蔓延的速度就越快，低效和低质量就越严重。在这种环境下，企业倾向于搞万事不求人的大而全、小而全以及降低管理和产品质量水平。高水平的管理无从建立，就生长出一大片混乱的、小生产式的水平低下的管理方式及小而全的企业结构，落后的管理和企业结构又强化了低效和低质量的程度。当然，主观的努力可以改善管理水平，提高效率，但短线制约越严重，紧运行下的效率问题这个薄弱点也就越突出。

紧运行下，科技进步除了在扩大再生产的领域中集中于产业结构的前沿外，在简单再生产中就集中在资源节约和资源替代上，集中于在不稳定的资源供给环境里，努力保证生产比较稳定的运行上。当社会需求提前质变时，改进产品品种和功能，提高产品质量的任务也严峻地向企业提出。但在紧运行下，企业如果不能在科技进步上有效地解决前类问题，在需求压力下，后类问题往往是无力解决的。企业任何改进产品的决策遇到的首要障碍，要改变社会对企业的资源分配格局，得到新产品研制和生产所必须的资源。

在紧运行中，存在着一种自发的经济机制，也是最基本的经济机制，即需求膨胀倾向，这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在经济运行中的反映。而不同的生产力水平上的社会主义经济的差别，特别表现在对它的约束程度上。由于它的存在决定了上述各种经济机制的特征和作用，决定了紧运行的全部面貌。而资本主义经济的自发机制，形成有限市场和需求不足，这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在社会化大生产中的反映，而紧运行和资本主义的“过剩”运行都针对自己的基本矛盾采取行政措施来干预经济、调节经济，以保持稳定发展。在资本主义，行政办法主要用于扩大需求，如：增加财政支出以增加社会需求的财政办法，降低中央银行再贴现率以刺激企业需求的金融办法，扩大和保护出口和资本输出以

扩大市场的贸易政策等等。在紧运行条件下，行政办法主要用约束需求，指导资源分配，使有限资源得到充分利用，如：控制投资规模、控制消费基金增长，优先保证重点工程的办法等等。两种经济制度都要“行政干预”，但对象、内容和形式截然相反。资本主义干预市场分配，社会主义干预资源分配。

社会主义经济运行中，需求膨胀倾向这种自发的基本机制的存在，证明宏观经济管理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稳定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成熟和完善，我们终究能在经济运行中建设更为科学、完善的宏观经济调控体系，有效地抑制需求膨胀倾向的发展，使社会经济处于有效率的紧平衡状态。

三

以上分析不过是对紧运行主要特征的初步描述。这种描述不是对社会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的简单排比，而是对两种经济运行的现实比较的结果。紧运行状态已经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客观存在，我们首先应该全面地、正确地认识它、分析它，把握它的特征和变化规律，对它的评价应是在此之后的事情。

紧运行状态尽管还很不完善，还有很多缺陷，需要通过不断地建设和改革来改进它、完善它，但是，在它几十年的生命中，已经显示出了公有制优越性，尽管这种优越性还是粗糙的、原始的、和弊病生长在一起的。紧运行首次解决了需求不足，为生产发展提供了宽广的前景。它在宏观上实现了资源的最大利用，避免了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中由于“生产过剩”而产生的经济波动和经济发展约束，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进步，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制度建设应在这样的基础上发展。

紧运行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基础条件。紧运行特征揭示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内在矛盾，提出了宏观经济管理和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社会主义经济紧运行特征应是我们经济体制改革的政策依据之一，对紧运行状态的理论研究的改革政策的理论基础之一。应该在认清社会主义经济基本矛盾和运行特征的基础上，发展经济，深化改革。

从紧运行的特征出发，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必须考虑资源短缺这样一种客观条件。改革只能在紧运行下进行，并且通过改革缓解紧运行，把握紧运行的方向。不考虑紧运行这样的基础条件，或企业通过改革完全消除紧运行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紧运行是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基本状态，用紧运行这样一种尺度来判断经济发展状态，是重要的宏观经济依据。改革必须保证和促进经济发展处于最有效益的适度的紧运行状态，而只有经济发展处于这样的一种状态，改革才是有利的，才能够成功。改革需要宽松的环境，改革也要能创造出宽松的环境。

对紧运行状态的分析表明，“过剩”状态只是商品经济的一种状态。商品经济还有另一种状态，即紧运行状态。人们往往把商品经济等同于“过剩”经济运行，认为一旦使产品经济转变为商品经济，指令性调节就转变为市场调节，物资充裕、品种繁多、价格低廉、服务周到的买方市场状态就会出现。显然，这种认识没能把握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基本特征。近几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商品在越来越大的比例上，由市场进行调节，越来越多的自然经济产品变成了商品，流通空前活跃。然而，人们期待的过剩状态并没有出现，许多放开的重要商品，都仍然是短线，如，肉、蛋、菜、水产等等。换句话说，通过改革形成的是紧运行的实物形态向商品经济状态的过渡而不是过剩的商品经济状态。企图通过改革，使过剩的市场

经济的经济机制在紧运行中再现，并且发挥宏观经济调探的主导作用的想法，只是一种“市场乌托邦”。

从紧运行的特征出发，经济体制改革必须首先解决有效地抑制需求膨胀，自觉运用资源约束，缓解经济运行中资源紧张程度的问题。经济体制改革还必须解决紧运行下，如果实现产业结构灵活有效调整的问题，使新兴产业得到较快发展，使基础设施、原材料生产部门有合理的发展。经济体制改革在搞活企业、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同时，必须建立起能使生产力有效地合理集中，使有限资源有效集中，避免重复建设，保持规模经济效益，使骨干行业和骨干项目能够较快建设发展的方式。

紧运行形成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特殊环境，这种环境比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经济环境具有明显的优越性，社会主义源源不断的强大需求，和由此促发起来的生产力高度开动、资源尽用的状态，是令它们羡慕不已的。当然，紧运行这种经济建设环境又存在着明显的缺陷。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项历史性任务，就是通过改革，使这种经济运行方式能够自觉地克服需求膨胀的自发性，具有保持总量协调、结构调整及时，有力地促进科技进步和企业间、行业间融合的机制，具有保持旺盛的生产发展动力和高工作效率的机制。

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 运行若干问题的思考^①

一、紧运行是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基本特征

1. 要接清楚社会主义需求的再生产过程 社会主义需求的再生产过程是经济运行机制研究的理论重点和难点。既然造成紧运行状态的主要原因是需求增长大于供给增长，那末，就首先要搞清楚需求的再生产过程。科尔内是分别从企业行为、消费者行为、预算约束软化的角度进行分析，回答了社会主义国家的短缺是怎样不断再生的问题。仅有这些是不够的。作为理论难点，我们要研究和解释的是：为什么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一个再生产过程循环下来，需求总是小于供给；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一个再生产过程循环下来，需求总是变得更强了。如果只是象科尔内说的那样，从微观到宏观，从企业行为导致企业之间的交换行为，又导致宏观行为和消费行为这样一个分析过程，看来不太困难。我们要做的是对从运行层次到基础结构这样一种循环的分析研究，是从“表皮”到“肌肉”、到“骨骼”、再到最基本的结构，看它每个“细胞”是如何进行再生产的。

凯恩斯分析了边际消费倾向、边际投资效益递减和灵活偏

① 这是陈元同志（1987年）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研究》课题组其它同志的谈话。

好，他的目的是给出这样一个循环过程，即每次循环下来需求都有所减少。凯恩斯的需求再生产是讲资本主义的有效需求不足。我们则是要从需求再生产中讲清怎样产生短缺，搞清楚为什么每个循环下来，需求都有所膨胀。当然，说清楚这个过程，不等于发现了一个原理，而只是一种描述。我们要做的是从逻辑上把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需求再生产串起来，讲清这个过程。对需求再生产的分析，可能是个核心的问题。

2. 供给增长与需求增长表现出明显不对称 经济运行和发展中的总量需求始终大于总量供给，是紧运行的一个基本特征。在传统体制下的消费品生产中，计划目标往往跟不上需求的变化。现在多数企业已经不按计划生产了，而是按市场信号进行生产。但供给仍然明显不于需求的增长，多数企业仍处在恶性循环中。例如钢材，从前年到今年三年中钢材的增长幅度大大超过其它行业的增长幅度，市场信号对它非常明显。钢材的价格最高已涨到 2000 多元一吨，市场信号非常强，足以刺激企业拼命增产。但是钢材的投入是有限的，受整个短缺资源的约束，因而仍没有赶上需求的可能。供给增长一分，刺激需求增长十分。武钢投产了一米七轧机，全国各地都认为我国的冷轧薄板供应从此解决了。于是各地都上汽车工业、上家用电器，一下子使薄板变成短线中的最短线，结果是现在进口用汇最大的就是薄板。另一个例子是北京的交通。修了二环路之后，引起了全市围绕二环路搞基本建设的不可遏制的需求。大家把基建点都布满了，马上就出现了电、水、气、暖的短缺问题。一项供给缓和往往带来若干项需求的增长，这些需求的分布领域又是多种多样的，其增长不但使这一项供给没有得到平衡，反而使供需之间的差距更加严重了，这种需求激活效应是到处可见、非常明显的。

1979年之后，改革的目标是搞活经济，最先活跃起来的是投资机制，其次是向消费机制扩展，这带来了生产和供给的增加。但是供给的增加远远赶不上被激活的需求的增加，这是“搞活”以后的一个扩展。另外一个扩展是中央采取了扩大地方自主权的方针。地方被激活了，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经济增长和消费增长的要求。以国家为主体的投资机制扩展到地方，再扩展到企业，这是一个垂直传导的扩展过程。激活以后，现在搞活经济的主体、需求增长的主体和经济增长的主体主要地都在地方政府一级，企业一级受到地方政府一定程度的约束。谁都不愿花钱去干的事情都留给中央政府了。所以，中央只有紧紧抓住京、津、沪三大市，抓住六大公司保证中央财政的来源。即使这样，中央财政收入也已下降得很低了，仍然扭转不了需求增长超过供给增长的局面。同时，资源约束作用在结构上多层次化了，在覆盖面上也广泛化了。

3. 需求膨胀造成市场不透明 凡是在搞投资时，投资的可行性报告都认为投资完全能够收回，可实际上大部分企业的投资都收不回。无论如何集资，它都是以巨大的市场作为抵押的，认为建厂后肯定能在这个市场中得到全部的补偿。但由于各方面的需求都在膨胀，就好象肥皂泡擦肥皂泡一样，市场就变得不透明了。企业在市场不透明时，看不到真实情况，它的还款能力是建筑在别人需求膨胀的基础上的。企业每次要求贷款时都说得头头是道，而银行也确实无法在这个不透明的市场上弄清事实。购物单位一旦发现买进的产品可能销不出去时就会毫不犹豫地退货，这样社会资源约束就会使经济增长出现停滞。能还贷款的，是生产那些市场透明度很好的产品、最基础的产品的企业，如化纤、冷轧薄板等，生产这些产品的企业有绝对把握收回投资。这就是全国烟草、石化、有色金属、船舶、汽车等六大公司

上缴利税占总财政 65% 的原因。

除需求膨胀造成市场不透明外，还有短缺制约一切生产环节，造成需求拉不动供给这一原因。企业即使有了资金，也不一定得到物资，得到资源的投入，所以不仅是需求信号强弱的问题。市场的不透明度最终的约束是资源约束。但这两者之间的联系我们还没有找出来。具体讲如何从全社会资源约束的最短线，通过资源约束的连锁作用，制约全社会各行业的合理限度，这点在实践中和理论上都还没有找出来。

4. 需求膨胀以至形成紧运行的过程 我们可以很容易地从现实的经济运行中抽象出需求膨胀并形成紧运行的过程。在启始阶段，出现了需求增长，短线增多，供给缺口扩大的趋势，这些缺口便成为诱导投资的动因。这时，潜在需求或由于增长要求和发展目标，或由于缺口的扩大及市场吸引，或由于地区、企业以及个人之间在经济发展和生活改善方面的攀比、竞赛，而不断增加，并且开始转化为非货币需求，即实物形态的目标。如短线产品的数量及大型项目，人均消费实物量等等。源源不断的、巨大的潜在需求转化为非货币需求，便形成了经济高涨；经济高涨的热烈发展气氛反过来又加速生产着潜在需求，加速着潜在需求向非货币需求的转化。在这个时期，基本物资条件还能够保证满足实际投资的需要，尤其是低价的短线产品的供给仍能够维持，使得人们产生出一种类似“货币幻觉”的“投资幻觉”人们都把眼光集中在市场需求增长和经济增长的趋势上，都将建设的可能性建立在实际是勉强维持的短线供应上。对新项目建设和市场需求充满信心的人们便千方百计地立项、投资，以迎接经济发展新高潮的到来。投资扩张迅速蔓延，摊子一片一片地铺下来了。其实这时形成的总需求规模已经偏大了，已经超出了短线资源所能承担的程度。在第二个阶段，也就是国民经济

过热运转的阶段。这时，一方面非货币需求仍然在潜在需求的推动下继续不断产生，投资仍在增加。另一方面，前期非货币需求开始不断地、越来越大地转化为有支付能力的货币需求，摊子铺开后需要实际投资，需要购买原材料进行建设；招收大量职工后，需要发工资，需要给予规定的福利；大量的产品订单促使企业大量借贷，扩大原材料、再制品的规模、生产周转金大量增加，于是形成了投资市场（生产资料市场）和消费品市场的空前活跃。需求，尤其是货币需求迅速膨胀。部分非货币需求直接推动着经济运行，如：短线物资分配、物资串换、重点项目通过行政方式形成供给聚焦等。更多的非货币需求则转化为货币需求（非货币需求直接实现后，在其第二个循环中仍会转变为货币需求），使整个社会经济象一辆开足马力的车全力追趕已经形成并超前的需求。这种情况在某个时点也许可以实现平衡，但这种状态是不能持久的。非货币需求一旦转化为货币需求，货币需求便会在膨胀系数的作用下，随着每一次供需满足而不断放大。同时，得到满足的货币需求在这个时期又会以比其它时期更快的速度转变成新的非货币需求。一方面是货币需求的满足——非货币需求的产生——货币需求增长的一次次循环和膨胀；另一方面是整个经济不断地改变比例关系，将生产能力聚集到几种最短线产品上，以维持这种不断高涨的经济秩序，整个经济结构不断变形和扭曲。这种“过热”终于有一天走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生产无论如何再也跟不上需求增长了，这时候，第三个时期到来了。这个时期就是膨胀后的收缩和调整时期。在这个时期，整个经济结构已经扭曲得连最基本的资源也再不能做最微小的聚焦了。象经过一场搏斗而倒下的勇士，精疲力尽、伤痕累累。经济结构所固有的比例仿佛是物质内原有的应力又突然回来了一样，生产又恢复到原有的结构关系中，过去所有产生供给

的环节瞬时都转变成需求，聚焦的弥散，结构扭曲的复原，使产业结构与需求结构，供给与需求之间巨大的差距，全面地展现出来了。但这时，不仅非货币需求已经膨胀得太大了，而且大部分需求都已经货币化了。由于失去短线聚焦的支持，人们这时才冷静地将目光从需求市场转移到资源供给上，非货币需求被迫地回到潜在需求的位置（通过行政控制和压缩），而货币化需求则仍是强大的，因此只好一方面采取非常措施维持这种供需高差的状态并保证经济能够运转，如：定量供给，物资分配，指令性计划；另一方面，只要可能便尽量回收货币，如：议价、涨价；再一方面是将这些需求推迟到下一个循环中去实现，如：刺激存款、发行债券。整个经济就在这种供需高差的紧张情况下缓慢运行，对经济结构的调整和补偿，只好随着生产积累一点一点完成。当结构的调整和补偿完成之后，当货币化需求或消化或延续之后，经济发展便又进入到一个新的循环过程的起点了。

5. 关于需求的合理性 需求最终都是合理的，问题是站在哪个角度讲“合理”。修地铁和修住宅合不合理？都合理，人均住宅 20 平方米也合理。这当然是指最终需求的合理。资源配置则是指生产结构的合理化。

这些不同的需求，哪种应优先得到实现，最终取决于它们在经济结构中的地位。这才是我们观察合理与否应有的角度。在结构上显得重要的，往往是初级产品和科研开发，而实际上，它们的短缺程度却更强一些。

仅以总量来衡量需求合理不合理，很难说明白。如果这样，就等于在需求增长当中，只要把资源供应引入，需求就是合理的。这恐怕不行。理由很简单，大家都找上级要求投资，都说自己是合理的，都说把别人的改了，把自己的留下，在总量很难说你合理，他不合理。但从结构上就可以说清谁合理。生产钢材

合理，生产电力合理，建设铁路合理，办教育也合理。这些都要放在结构中去衡量，只在总量上是很难说清的。

当然，超分配显然是不合理的。总量不平衡肯定是在结构上有的部门增长得不合理。这几年，年年超分配，包括财政发行国库券，然后又打在财政支出里，显然有不合理需求。但在结构上，不合理的需求没压下来，总量上超出的部分又填了合理需求的空白。国家发行国库券，是为了改善教育，改善基础设施，怎么能说不合理呢？企业都要追求经济效益，都不说自己的投入不合理、是长线，那些没有企业直接经济效益的基础部门怎么办？只好国家投资。国家没那么多钱，只好搞点国库券。钱都垫在这里面了，都给了能源、交通、教育、科研，你能说它不合理吗？没有比它更合理的了！所以很难直接用总量来判断这个超支部分是否用得合理。

加工工业和消费的不合理增长，对能源、交通等造成过强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下，采用挖东墙补西墙的办法、采用财政赤字的办法建设这些基础设施，最终仍然会陷在一个不合理的增长当中。所以，应当说总量上超分配是不合理的。超支的部分，尽管把它拨到了动力、能源等领域，尽管单量是合理的，但从总量来说，却是不合理的。

由于总量中的最大问题仍是结构问题，我们在考虑对策和出路时，应该把总量和结构结合起来。当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都开始做到这一点了，他们可以做到把多余生产能力引向科研开发，这就既解决了总量问题，又解决了结构问题。而我们还没做到这一点。

6. 资源和结构是经济运行中两个最主要的约束 总量关系的度量尺度是价值。价格是价值的货币表现，公有制经济的总量关系，在价值量上是有表现的，而且是清楚的。我们说总需

求大于总供给，在价值上可以用数字说清楚。

对中国社会主义紧运行来说，最主要的问题是约束需求。在约束需求中，一个是要约束总量，另一个是要控制结构。从价值形式的作用来说，我们可以通过控制货币和金融来约束总量，但很难控制结构。所谓结构不合理，从根本上讲，不是需要不需要，而是可能不可能。需求膨胀是趋于无限的，甚至会超出整个资源和结构的限度。对需求的约束不仅表现为基本生产要素的投入，自然资源本身就是最后不可逾越的约束。科尔内的《短缺经济学》只是就企业来讲的，涉及的是投入要素，而对整个经济运行来说，资源就变成最主要的东西了。对经济总量分析来说，有很多受结构约束。例如现在需要电视机，电视散件就成为资源。所以结构和资源制约是我国经济运行的两个最主要的约束。

在分析经济问题时，应从中国的特点出发。中国不是在原有较好的基础上进行建设的。匈牙利还可以象科尔内说的那样，通过“搜寻、排队、替代”解决问题。而我们连现代化大生产最基础的东西都很薄弱，我们缺的东西不是靠“搜寻、等待”就能得到的。科尔内说的是一种较高水平上的短缺。而我们是在自然经济的基础上建立现代化的经济结构。这种跨越，导致新的经济结构上出现了大的结构性不平衡。

7. 结构性倾斜具有必然性 我们现在的经济结构在运行中是非均衡的。经济结构的倾斜点，在运行中表现为短缺的聚焦，是短缺的最强点。随着经济发展，经济结构的倾斜也随之变化。建国初期，最紧张的是粮食。经济结构中最倾斜的点是在粮食上，棉花也紧，两者有互相替代的关系。1958年以后所以被迫调整，关键问题是由于粮食严重短缺，只好裁减2000万人回农村。现阶段倾斜点开始变了，粮食仍然是基本制约，瓶颈虽没有消失，但改革后已开始缓解。农副产品市场也开始缓解，这

个方面的制约不是那么严重了，最厉害的制约是工业基础设施、钢材等。现在的倾斜推移到了基础工业，将来还会前推。现在钢材薄板的需求上升很快，如果宝钢、首钢、鞍钢都上了薄板轧机，薄板的供求紧张关系可能缓解，这个倾斜点可以消除，但倾斜点会前移到其它方面。苏联、东欧现已转向高技术产业，但由于经济增长缓慢、高技术就不能发展，这是他们的“瓶颈”。倾斜点再往前就会象南斯拉夫，匈牙利，遇到外汇的“瓶颈”。这个“瓶颈”制约着它的开放度，制约着其经济的国际化。如果再克服了这个“瓶颈”，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时代就会到来了。所以，我们认为在现阶段这个“瓶颈”只会发生变化，但很难消除。当然，可以通过砍需求来实现宽松，但这种强制压缩需求只能是非常时期的做法。设想能够通过体制转换而在一夜之间达到理想彼岸是不可能的。如要做到全面宽松，必须达到最后一个层次，就是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站住脚跟，如果我们能有这个条件，就能够将我国经济的需求、结构问题统统嫁接到世界市场上，就不是借外债还得起还不起的问题了，而是在世界经济的格局中占有相当的地位和实力，能够在相当程度上控制世界经济。这一点苏联现在也还做不到。我们这样的大国要走到这一步，恐怕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因此，在这个阶段到来之前，我们认为结构性倾斜必然存在，是不可避免的。

8.“瓶颈乘数”和“瓶颈陷阱” “瓶颈乘数”和“瓶颈陷阱”这两种现象反映了短缺在社会主义经济运行中的作用。用投入产出表表示生产社会化的链条，则从左到右表现为产业运行之间的传递效益，一个环节的投资会在一连串的产业当中产生出效益。这是所谓乘数。反过来，由于短线制约，也会传递短缺效应，这就是“瓶颈乘数”。这反映了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最基本的特征，应作为分析的重点。

同时，在宏观流程中应着重分析“瓶颈”的再生产过程。瓶颈的再生产过程正好对应着凯恩斯的有效需求不足的再生产。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瓶颈”的制约、短线的制约是决定全局的东西。这种状况下，任何一个短线的拉长，对其它需求都有激活的作用，一下子把隐藏的需求变成显现的，使它们一下子都出来了。

9. 关于生产要素滞存问题 生产要素的滞存同短缺有关。短缺下的滞存除了由短线制约引起了长线以外，很重要的是短缺程度越高，对最短缺的资源储存的要求就越高。它是作为一种货币来储存的。在短缺市场上，最短线的资源具有货币的功能，能够串换到所需要的东西。固定资产的流动性差也是这点引起的。在一个需求很强的市场上，尽管目前不开工，也不会有哪家企业买设备。人们在等待市场发生迅速变化以后，使投入重新找到偿还的机会。这是一种短缺下的储存功能，在短缺市场上人们认为手里的东西绝不会贬值，所以也不愿流动。这是经济利益决定的，并且被经济利益派生出的行政性机制加以固化。企业大了，官就大，行政级别就高，这就和中国传统的東西结合起来。

二、紧运行的动态机理

10. 短线制导是紧运行横断面的出发点 我们知道，在我国国民经济中，总是存在着一些短线。这些短线既可以是产品，如粮食、石油；也可以是部门，如交通。在完全的市场经济中，这些产品或劳务就会涨价，直到供求平衡为止。而在我们这里，有多种原因使得难以单靠涨价来大幅度地抑制对一些最基础的短线的需求。这其中涉及到许多重要的考虑，如基本原材料、设施

及消费品的价格的稳定，企业素质、工业体系的从无到有，等等。

近年来，短线产品与价格运动有了更密切的联系，双轨制的价格对短线起了调节作用，特别是对企业和地方更为明显。但总的来说，这种作用并不对称。货币和价格的需求约束作用虽然大大增加了，但和它作为需求表现的作用相比，在方向和程度上都显得力量不足，难以形成同步增长的有效供给。短线制导仍保持着其隐蔽的、强有力的、核心的支撑作用。

这种明显的不对称性，最关键的原因在于劳动力并不是人格化的商品，利益主体带有不可侵犯性和稳固性，这制约了价格的有效性。即便是在微观层次，价格对短线存量的调节也远不够充分。既然短线产品难以依靠涨价来解决，那么求大于供这种压力就会始终存在。

11. 基础设施和科研开发是最大的短线 整个产业结构中最大的短线是两头，一头是基础设施（能源、交通）和原材料，一头是科研开发。这两条短线制约着整个经济，这就是我国的现状。能源、交通设施的短缺是现在经济增长的最大制约。还有原材料、粮食的制约，也十分突出。人才的制约使得我们的经济建设缺乏大量的管理人才，缺乏大量的科研开发产品。

我们是在一个非常原始的基础上，建立起一个现代化的经济结构。这个结构的建立，只能是一个项目一个项目地铺摊子，一步一步地、一个部门一个部门地建设和积累。这种建设方式逐渐暴露出它的缺陷，就是对整个经济结构的覆盖能力不够。这首先反映在计划部门的复盖能力不够上：一是由于极度的资源约束，使计划部门没能力去覆盖；二是由于财力高度分散，虽然想覆盖那两条短线，却没有足够的资金。在全国每年固定资产投资大约 3000 个亿左右，而国家预算用于重点建设（主要是用于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的投资只有 300 多亿，大约是需

要的 1/10。国家现在的财政收入中，能够用于基本建设的资金全部投在那些看得见的短线上了，还是不够。那些看不见的短线，如科研和人才开发等，根本无力顾及。

凡是长期的、社会性强的结构性问题，在中国就更为突出。因为我们原来搞建设，铺摊子，是从工业生产的角度入手。各个部门、各个地方的着眼点都在工业。越是往下层，越是着眼加工业。我们对两头的问题始终认识不足。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社会化联系的增加，两头的问题就非常突出了。

12. 短缺在经济运行中的信号作用 在现实的经济运行中，短缺成为一种信号。短缺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拉动价格，而在日益商品化的经济中，短缺信号越来越多地采取了价格和货币的形式。另外，短缺还对技术创新具有导向作用。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创新的动力主要来自微观层次；而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微观层次的创新机能还不健全，宏观创新的动力，往往大于微观层次。往往是由于短缺压力过大，迫使人们去创新，重视技术进步。最后，短缺还是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落脚点。在定经济计划的盘子时，以什么为基准呢？财政、信贷、外汇、物资平衡在什么地方呢？当然是短线和由短线引起的一组短缺现象。因为它们约束着经济的总规模，约束着长线的发展，价值平衡是在这个基础上建立的。而它们本身的弹性，在一定时点上是较小的。

13. 短缺的缓解，主要是靠各个利益主体的吸纳 所谓吸纳，就是需求的直接扩张，既不仅通过市场价格机制，而且使用非市场的办法来增大投入，从而增加供给。而供给的增加，却依资源的有效配置度不同而不同，并不和吸纳程度成比例。

在经济运行中，每一个利益主体都有其吸纳的特定方式。除直接的财力吸纳外，一种是政治性动员，使各种要素自愿地投

入到短线中来，一种是实物形式为主的财政投资，使要素直接流入到短线中去；一种是降低或压住短线产品所需的要素投入的价格，人为地不使短线产品的价格上升。通过这样一些方式，中央可以使短缺得到一定的缓解，从而使短缺的制约有所松动。但中央一级的吸纳是有限度的。超过限度，它就要将短缺传导给地方，也就是要块块去背负一定的短缺压力。

块块也有其吸纳的形式。它尽可能地从中央和企业吸纳财力和短线资源，以扩大自己的财力。它还可以用行政的办法，将生产要素很快地组合起来，可以用涨价及行政办法压住过大的需求，用货币及非货币的办法增大供给，对市场作出反应。

企业的吸纳，也尽可能地以货币形式吸纳资源（投资、贷款）和所需要的短线物资。除此之外，企业主要靠向职工提供稳定的就业及各种福利等调动职工的积极性，增加产出。另外，企业在短缺面前，还会采取各种形式的产品、技术的替代，来缓解短缺造成的影响。企业所做的所有努力，有些并不一定能构成社会性的充分的有效供给，但它作出的吸纳努力，却对社会总需求的增长起到了更大的影响。

通过吸纳，短缺从结构到总量都会有所缓解，从而使受短线制约的经济得到发展。

14. 短缺在各利益主体之间的传导和摩擦系数的均衡 吸纳一旦超出各个利益主体的区间和界定，就会引起强烈的社会摩擦，从而导致社会问题。因而在每个利益主体的吸纳达到一定限度时，便将短缺的压力传导给其它的利益主体。所谓传导，就是需求的转移。例如，中央由于直接背负着自然资源的约束，财政上的困难，生活物资的匮乏，这些压力中央要传导到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一方面吸纳，缓解一部分压力，同时还要将短缺的压力继续传导。这种传导分为两个方向：一是横向，向其它块块

攀比，将吸纳造成的摩擦系数拉平，一是纵向，用行政的办法将短缺的压力层层传递，最终将短缺传导给企业和家庭。

企业的短缺传递也是双方向的。一是向家庭，也就是向消费者，其通常的形式是涨价及产品脱销、品种不全，质量不高等等。另一方面是企业之间，通常形式是卖方市场，价外加价，囤积倾向，产品强制替代等等。

短缺经过复杂的传导，整个经济趋于一种特殊的均衡，即各经济单元的吸纳摩擦系数的均衡。摩擦系数的均衡过程，实际上是利益与资源的双重配置过程。这即是稳态意义上的紧平衡。从更根本的角度来看，是各种利益主体在物质生产中资源配置的均衡。如果不均衡，就说明该主体在物质生产中得到的资源，已使其再生产的过程发生困难。这与资本主义的利润的均衡化是相对应的。

改革以来，这种吸纳、传导及均衡化的过程进一步货币化了。各利益主体的相互关系中，加进了更多的价值因素。但由于这种价值因素远不能反映和调节它们之间的根本利益关系，因而这些价值因素也要转化为摩擦系数来发挥资源配置作用。例如信贷本来是一种价值运动，但决定信贷运动格局的，首先不是利率，而是信贷分配额度。由于货币化的吸纳、传导、均衡过程都是不对称的，是被需求扩张带动的，而同时形成的有效供给则明显不足，所以短缺的平衡并不是短线彻底、完全的消失，而是短缺常态的恢复，新一轮短线制导又开始了。价值和货币化并没有改变紧运行状态本身，而只是改变了它的形式。

15. 短缺在紧运行中的产业传导 紧运行的再生产过程不是简单的重复，而存在短缺的产业传导。资本主义过剩有一个产业自上而下的扩散过程；从消费市场到耐用的消费品、机械产品、大型设备、到基础设施，其传导的中介是价格和金融。而我

们的短缺也有一个产业升级的传导过程，但这一过程与资本主义正好是相反的，是自下而上的，是以短线资源及其货币形式为主的。短缺现象是从基础设施、到原材料、到制成品，以及科技及人才等等。这种传导也成为短线带动的价值和金融形式的产业间的定向传导。并且随着短缺的升级，滞存与短缺同时存在于同部门、甚至同类产品的现象普遍起来。当前的企业间的资金拖欠，就是滞存和短缺的金融表现的新形式。

三、紧运行中的价格问题

16. 紧运行状态下的价格与供求关系：价格是反映供求双方关系的，它是使用价值、交换价值的表现。价格的波动受供求关系的调节，这是传统的商品交换的一个特征。在所有的商品供求大体平衡或供略大于求时，它们的价格和价值可以统一起来，而完全不必加以任何人为的干预。在最简单的微观经济学的曲线上可以看出，随着商品总量的增加，价格呈下降的趋势；这是在一定环境下形成的曲线，这个环境就是供求接近的状态。

在紧运行的环境下，长线产品的价格，会符合基本的供求规律；但在短线产品的价格上，价格对供求关系的反映有着特殊的表现形式。在总需求略大于总供给，短缺强度还能维持得住的时候，价格显然是按微观经济学的价格与供给数量关系的曲线上升；而一旦出现总供给与总需求的极度不平衡，短缺强度一高，价格就掉下来了，当然不一定会掉到最低点，而是掉到一个能起相应作用的点上。这可能是相当数量的补贴的作用。这时的价格曲线成了水平直线，或略有起伏的水平线，这取决于现有补贴能力的大小，也可能财政完全没有能力补贴，国家干脆就调拨了。在极度短缺时，价格信号就不起作用了。如果这时仍然

放开价格，价格增长的曲线显然是趋于无穷大的；而趋于无穷大的价格对于任何经济来说，都将使其无法运转下去。

为了使在高度紧运行下的经济还能运转下去，就要加入一个非价格因素，即超交换关系，超双方交换的利益分配。这种分配是一种出于社会目标的分配。现在的粮食价格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我们现在人均只有 700 多斤粮食，因此非常严格地限制平价粮的销售。这种销售价格显然并不反映供求关系，但这种价格却是整个国民经济稳定的基础。

在短缺程度较强时，价格虽然不能灵敏地反映供求，但多少还能反映供求方面的一些情况；在极度短缺时，价格信号失去作用，这也是供求的一个结果。

17. 社会主义经济中价格的特点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社会价值平衡和全社会的实物平衡大体是一致的；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一开始就不太一致，剪力差就是一个例子。当然资本主义的剪力差也很明显，但那是作为自发过程的后果，而不是社会计划的产物。我们的价格平衡，不是各产业、各部门价格水平的变化趋势都反映整个社会平衡的状况。这显然是与结构失衡、总供给总需求结构化的状况有很大关系。这种情况下的价格，很难以单一的市场来实现最终的、规范化的调节方式。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有的调节功能集于价格一身；而在紧运行下，这些功能是分散的。原来是把结构的功能交给计划，把资源配置的功能交给物资，价格只是核算的工具。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价格的功能是否能象资本主义制度下那么完整？或者说，这些功能是否能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通过价格来实现？这都是需要加以考虑的问题。当需求使短缺到了相当的强度时，价格会持续上升，这就要求政府进行干预，或者要求有一个分配资源的独立机构。如果说现在的计划不够合理，但总要有一个机

制把基本的资源分配到最需要的部门。在这个基本机制起作用的时候，价格显然只是反映成本的，而不反映供求关系。所谓价格变成一个核算工具，意味着它是整个社会综合平衡的一个手段，但不是一个直接的调节手段。

18. 价格在紧运行中的作用 在紧运行的环境下，资源越短缺，价格越动不了，价格处于逆向的作用，短线资源和产品的供求价格关系是逆向的。

价格，首先是具有从结构性短缺到全面短缺的“加速器”作用，即由于价格固定，价格对短缺强度大的需求的约束力很小，使得结构性需求膨胀继续发展，并通过短缺替代，将原结构内的短缺转移到其它方面，短缺便开始蔓延，从结构性短缺逐渐蔓延成全面短缺。

商品市场结构越完善，价格信号作用就越大。苏联提出在更大范围内利用价格的作用，这比我们意义更大，因为他们的商品市场结构更完整。现在难以形成全社会的均衡价格，但价格又在起作用。在大量短缺中，没被切断的商品市场还能循环，价格也起传导作用；当短缺种类太多时，循环受阻，价格传导也不起作用了。凯恩斯是用赤字财政解决资本主义的过剩问题，我们用什么办法解决短缺问题？转化中的价格结构虽然对短线有所拉长，但仍然赶不上需求的增长。煤现在是结构性短缺，炼焦煤、优质煤等都是短缺的，民用煤、小窑煤是长线，而能够用来炼铁、炼钢的还是短线。

在紧运行状况下，价格能够对改善供给、抑制需求起多大作用？在这点上，单从科尔内讲的来看好象还不够。在一定条件下，提高供应是比较对的，但提高供应的周期较长。由于产业部门之间社会化分工很细，影响到信号的传导，有的地方价格信号过不去。影响信号传导的原因就是资源与结构的约束。结构制

约在中国是比较明显的。

19. 要对价格和实物的结合点加以研究 货币投放到底是反映供给还是反映需求？有人认为需求膨胀的原因一是工资总量增加，二是农产品收购价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提高实际是由需求拉动的，价格上涨反映需求增长，不反映供给增长，这种价格会高于价值。短线产品价格带动整个价格水平变动，货币投放也变成了需求增长的反映。为什么货币发放压不下来？因为一直是被需求拉动的。

在价格和实物结合点上（市场上的均衡价格），资本主义市场价格反映供给的增长，总有一部分商品价值在竞争中实现不了；在经济危机中，则集中表现为大部分商品过剩，根本卖不出去。不能实现的商品价值，也就是被浪费的劳动和资源，这是由资本主义经济的矛盾造成的。在社会主义的紧运行中，价格被需求增长拉着跑，其常态也是背离价值。在传统体制下，计划价格低于商品价值，结果是过度短缺，货币的功能也严重衰退。价格放开后，又大大超过商品价值，出现了价格陷阱。这和资本主义不同，不是产品变不成货币，实现不了价值，而是货币买不到产品，实现不了实物。商品价值取决于生产要素的投入，高价格形式投入，又把需求膨胀变成投入，一部分不能实现为实物的价格又转移到成本中。成本由企业消化，这是成本推动型。在价格扭曲情况下，企业超额利润实现不了实物，又返回成本。一部分工资等收入，没有彩电等商品去实现，也变成投入。在每一轮投入中，都含有实现不了的一部分，每一轮都加上一部分需求膨胀，最后都集中到最终产品市场上，消费品的缺口非常大。价格偏离价值成为一种常态，如果只用货币发放和利率来解释，还不足以说明这种常态为什么会不断形成。看来价格和实物的结合点是一个要研究的问题。

价值和价格怎么一致？凯恩斯是用赤字财政解决资本主义的过剩问题，我们用什么办法能解决短缺问题？现在价格上去了，实际上是有一部分货币实现不了实物。在市场上搜寻实现的对象，搜到一个消灭一个。通货膨胀本身就有价格到价值的变化，从主观到客观，一轮一轮的水涨船高，从结构失衡到总量失衡。有人说结构失衡不能加总，其实马上就可传导成总量的失衡。当然，利率也是失衡能量的释放点，但更大的释放口还是价格水平的上涨。

20. 价格信号的传导及作用范围 以利润为导向，以市场价格为传导机制的资源配置，在什么环境下是最有效的？在加工链条上离制成品距离最短的环节上最有效。而对最长距离的环节就很难有效。产业加工的链条距离越长，利润导向的作用削减越大。由于传导环节有时间差，导致了供给的增长远远小于需求膨胀的程度。此外还有一层意思，就是传导不过去。比如江苏那里集资办企业，需要用大量的煤炭，可是江苏是不出煤的地方，这就需要把山西的煤炭运到江苏。而能不能把足够的煤从山西运到那里，就牵扯到能不能对铁路投资、对煤矿投资的问题。这对大量乡镇企业来说，传导已经很弱了，它们往山西的煤矿投资的可能性很小。这几年煤炭市场能够相对缓和，从根本上说是因为山西大煤矿的数量增加了，国家对晋煤外运的铁路投资增加了，使基本资源和基础设施的紧缺状况得到了改善。如果等着这个信号从市场上传导过去，非常困难。南方沿海用电量每年几乎以 20% 的速度增长，整个江南地区的能源需求，最终要依靠三峡建设或其它能源的形成才能全部满足。但象三峡这样重大的产业结构调整，等价格信号传导过去就非常弱了。对众多的乡镇企业来说，现在发行建设债券，要等到孙子辈才能用上三峡的电。他们未必会把钱投向这样长期的项目。

可见，越是环节短的，越是靠近加工工业末端的，利润导向、价格传导配置资源的作用越明显；越是处在前端的，如农业、交通、能源、基础设施，信号就越难传过去。信号衰减是因为在每个环节上都有资源约束，使信号减弱或传不过去。这种资源的约束导致传递不灵、信号衰减，这是很重要的。价格信号只能在现有结构中起调整作用。

这个局面和资本主义市场很不同。资本主义市场的每一环节，产品都是相对过剩的。有的属于相对过剩，也有的是绝对过剩。所以它的价格信号每一级都能往前一级推，一级一级能传过去。如果说整个社会资源是 100% 的话，它实际运用的是 80%，剩下的 20% 是传导的通道。所以它能传导过去。而我们是在 100% 封顶的状态下，还想有一个 120% 的运转。100% 已经到了资源约束的边上了，101% 就已经超过了资源约束，120% 的状态产业结构根本无法将信号传导过去。那些不可能在国内实现的，就挤在外汇上了。但外汇本身又是一个国内资源约束的表现，最后仍然是信号传导不过去。

膨胀的、以利润为导向的投资需求往回传递。能不能增加供给呢？在一定环境下是可以的，就是在不受资源约束的环境下可以增加供给。一旦受到资源约束，它就增加不了供给。供给不能增加，整个传导链条也就不能运转。为什么市场价格机制很难对资源配置起作用？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21. 完全依靠市场价格的思路，没有超出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理论 把价格作为整个改革的出发点和最终解决一切问题的办法，这个思路还没有超过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理论。因为到凯恩斯就不是只讲这些了。资本主义在许多物资和结构上也是直接调节的，而且不是出了问题才调节，是一开始就直接调节。这是资本主义在战后的普遍趋势。

把价格导致的平均利润率和总量的平衡、资源的最优配置、结构的合理化、科技进步之间都划上等号，这是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基本观点。到凯恩斯就已认识到平均利润率解决不了资本过剩的问题。我看提出完全依靠市场价格的办法，是沿着亚当·斯密的思路走过来的；然后，又想到了公有制下不是以利润最大化为原则，还需要“二次调节”，这实际上又是凯恩斯的思路，他先提出的是利润最大化，后来又提出了用干预手段来改变利润最大化导致的后果。所以，前面提到的完全依靠市场价格的办法最终就变成了短缺环境下的凯恩斯方法了。这种分析不是一种客观的逻辑的分析，是悬在空中的“理论”。凯恩斯的分析是针对过剩环境的，与我们所面临和要解决的问题不同。我们不能按西方的经济状况来谈中国改革的思路，更不能按西方一百年前的经济状况来谈。我们只能从我国紧运行状态的实际出发，从对现实的实证描述中，去寻找一条可行的路子，找出一个在我们这个环境中现实的运转办法。资金和劳动如果能够进入市场充分流动，供给就能拉动了？这里恐怕至少要打三个问号。

22. 短缺不可能靠放开价格来消除 现在不少人提出先创造一个总供给略大于总需求的环境状态，然后再用多出来的供给刺激需求。这个圈子绕得实在没有什么实际内容。

如果选择市场，价格放开，就能够消除结构性、经常性短缺吗？实际上，需求膨胀往往超过价格变动对供给的刺激作用；即使是正相关，也不等于供给能满足需求。我们举个最现实的例子：粮食如果彻底放开价格，我们能承受得了吗？我们想在人均七八百斤的水平上实现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放开粮价之后，价格肯定会上升到人们只能吃粮食；而肉、禽、蛋基本不吃，即恢复到 60 年代的消费水平。现在不仅可以吃粮食，还可以吃肉、禽、蛋，因为大多数地区是依靠平价

粮。蛇口粮食价格虽然全放开了，但那里职工只有7000人，工资水平最低是250至300元。在蛇口实际上是农产品比价回归，粮食在总消费中的比重恢复到了原来的水平上，所以人们能接受。而全国如果都这样搞，就不行了。

粮食现在和价格的关系是正相关，但并不等于满足了需要。需要是在不断增长的。粮食在沿海省份已由调出变为调入。今年再给农民一点好处，订购减少到1000亿斤，订购以外的办法是再加价收购。但是给这点好处，对农民种粮的刺激作用能有多大？今年我们进口粮食300亿斤，而且这300亿斤缺口都是硬碰硬的城市用粮、饲料用粮。在整个农村经济全面发展的时候，利润导向必然要促使农民选择利润最高的方面。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把农村劳力和有限的资金都吸引到那个方面去了。而粮食在经济结构中的地位并没有改变，对粮食的需求仍然增长着。现在是把这个缺口留给财政和外汇，靠进口粮食维持。所以，虽然粮食与价格正相关，对农业生产有刺激作用，但这个刺激作用能否解决问题？这又成了新的问题。

23. 价格双轨制具有必然性 实践已经证明，价格双轨制不能过渡到单轨制。在累运行条件下，总有一部分商品的价格要保证整个结构能够运转下去。而这部分就是存在于行业之间的剪刀差价格。国家必须靠计划价格来保证一些行业的发展。比如大(同)秦(皇岛)线的晋煤外运，对缓和全国煤炭价格起了很大作用。大秦线的钢轨如果都采用计划外价格——市场价格形式的话，国家投资就会不可思议地大幅度增加，大秦铁路就不能从大同修到秦皇岛了，修到北京就过不去了。大秦线之所以能修到秦皇岛，就说明双轨制还有作用，说明计划价格还有作用。

现在蔬菜和粮食的价格都是双轨的。实行双轨的主要是初

级产品，还有各类服务业、交通中的货运部分以及邮电业等等。实行统一价格的主要是基本生活消费品，外贸上也有，如稀有矿产。中药材的价格放开了，而西药大部分是统一价格，因为这涉及到公费医疗问题。

把双轨制变成单轨制这种想法，实质上是相信完全的市场价格可以实现资源配置。但是资源配置遇到需求的无底洞，使资源没有办法配置，配多少就掉进去多少。

有人说匈牙利等东欧国家是单轨制价格，其实他们也是双轨，他们的那一轨在苏联。能源（电力、天然气）、铁路、钢材等都在苏联，他们这边当然可以放开市场价格。如果苏联那边对他们实行议价供应，他吃得消吗？他们的外汇收入对他们是决定生死的。有了外贸出口，他们才能在经互会得到必需的燃料，在西方市场得到需要的原料。他们为了保外贸出口，会采取最强制的手段。他们是单轨制吗？根本不是单轨制。匈牙利的指令性电话比中国的指令性计划还厉害。他们的副总理可以直接给大企业打电话调拨产品。一年开两次一百个大企业的计划会，实际上就是调度会。

公有制与双轨制不一定充满矛盾。有些行业的价格放开以后，政府确实不用管了。如手表、缝纫机、洗衣机、收录机等，已经全放开了，大家也觉得挺好。在现有结构中的最后制成品环节，我们实行彻底的生产价格，好象是非常顺理成章的事情。通过在计划这一轨采取的比较强制的分配，使几个基本的短线能够维持住，在总供给与总需求能过得去的状况下，我们可以在这棵大树下对一系列产品实行放开的办法，因为对这些末端产品的需求有限。同时又要看到，我们之所以能够对这些产品实行彻底放开的办法，又是依赖于对整个社会资源中几个最基本资源实行了严格的计划。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在一些领域中实行

充分的市场调节。

价格的双轨中有一轨是乡镇企业、地方企业。由于减少了对地方的价格管制，这些企业更具有活跃市场的性质。人们都希望这一轨将来与另一轨合二而一，或者说用市场这一轨取代另一轨。我看这是很困难的。前一段人们对双轨制的批评很多，什么怪胎、相斥、不能持久等等。但现在看来它是很现实的，至少目前还不可能取消或改变。

地方以利润为导向的企业的活力，依赖于国家在另一轨上给它保证了一定的条件。有人说这是无偿占用，不合理，但现在很难看出这部分会收缩。地方政府愿意把自己有限的财力投入像三峡这样的基础工程吗？肯定不愿意。只有靠国家来投资。也可以说，双轨制在过去一直存在。现在与过去的区别，只不过是多和少、公开和隐蔽的问题。

四、紧运行中的金融问题

24. 公有制条件下金融运行的特点 货币运行和商品运行的关系可以作为研究金融运行的起点，但主要的是要对资本主义条件下和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金融运行加以对照和分析。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货币发展成信用货币，这种信用货币的支撑点，是经营在不同的所有者之间进行。一个人能够取得多少信贷货币，取决于他拥有的资产、在产业中的地位和产业活动的范围。如果他有 100 万元，就能贷到 300 万元；如果他只有 5 万元，那就不可能贷到 300 万元。另一方面，企业要贷多少，要视在已经过剩的市场上能够获取多少收益而定，市场约束和私有利益约束使货币需求受到约束。银行创造信用的功能也受到类似的信用约束和需求约束。

作为资本之间的一种信用关系，金融有导向作用，但只有在过剩的环境中才能起作用。在公有制条件下，财产所有权的边界变了，一旦利益边界模糊，企业贷款的风险就变成了发展的可能，企业货币需求便在巨大的市场需求推动下膨胀起来。同时也造成信用边界的扩张和模糊。不同的国营企业之间，生产规模和生产能力可能差很多，但能得到同样数量的贷款。这取决于政府制定的行业贷款指标。对企业来说，这个界限是软的可移动的。八年改革，这个界限硬了些，银行发放贷款也要看还贷能力了。但在很多情况下，企业仍旧是没有营利也能得到贷款。首先因为有政府做担保，政府可以对银行下“戴帽”信贷指标。所以，没边界本身也是一种边界，政府的边界是无限的。公有制导致信用关系发生了变化。

同时，市场也发生了变化。卖方市场可对金融造成很大的需求。我们相当多的部门是以卖方市场为信用抵押。由于全部产品都能很快销出去，贷款可能一年就赚回来。表面上看起来，企业的信用程度很高。这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就很难办到，因为产品卖不出去。因此，我们研究货币、信用时，一开始就要从所有制的特点入手，所有制决定着整个经济运行各个方面的特征。

在紧运行过程中，信贷在相当程度上成为需求增长的表现。投资实现不了物资，会变成储蓄、国库券、债券等多种形式。如果仅在持有者之间进行交换，不会出问题，还可以收回一些手续费。但如果这些资金又用来投资，流通的货币就会增多。在改革中，货币在金融运行中的不对称作用仍很明显。一方面对需求的约束稍有硬化；另一方面由于市场很大，金融运动会很快传导到市场中刺激起需求。现在多数银行放款多，存款少，只有少数银行有存款差额。这就说明投资还在膨胀，信贷软化还没有消除。1986年的行政性贷款，就是典型的、纯粹的信贷软化。

这种信贷很快传导到市场上，成为超分配的需求。加上投资实现不了物资，不断地形成投资饥渴，又造成市场需求进一步的扩张冲动。

总的来看，金融可能是更大的不对称。称尔内只说了货币起消极作用，这不准确。货币也是积极的，一是起引导作用；二是各级利益主体都盯着货币，又为得到货币而盯着市场。在我们这里，总需求在一定时点上只表现为货币需求。

25. 金融运行中的利益主体和利益均衡 对传统体制下的金融运行，不必过多地描述，重点要放在改革八年以来金融运行的新特点上。最重要的是要分析几种利益关系在金融中的运动形式，研究地方政府等利益主体在金融上的表现和关系等问题。

金融运动也在利益主体之间采取摩擦系数均衡化的方式，例如信贷额度的均衡。地方、企业面临的是市场，不完全是财政指标。但它们要从财政上争取最大的利益。现在指令性计划很少了，例如电冰箱、洗衣机、收录机等产品，没有指标了。这是改革后很大的特点。企业面对商品市场，也面对金融市场，但它们不是直接去银行拆借，而是向上级要信贷指标。匈牙利经济学家把这描述为行政市场，即平等地向上级争取有限的信贷额度，在行政摩擦中竞争。各利益主体都是在原有环境中参加竞争，不可能站在同一起跑线上。譬如肉联公司，它的生产状况与社会生活的稳定有很大关系，因而即使没有利润，也可以贷款。有的行业则要靠利润高去争贷款，如汽车行业。总之，在信贷配置上有社会、政治、经济等各种各样的理由，但经济方面的比重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企业，要凭盈利向政府争贷款额度。

现在金融运动并不是最终形成稳定的收入率，不是以平均利润率的结果，而是达到一种利益摩擦的均衡。在这种摩擦中，利益主体的金融行为是不对称的。一方面是企业在还贷上的拖

欠，不是欠银行的，就是欠财政的；另一方面是企业之间的拖欠。企业间的拖欠又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短线产品支配者可以欠款，短线产品对金融有吸引、制导作用。我的产品销路好，就可以占用你的贷款额度。还有一种是产品卖不出去的，赖帐。两种关系在资金运动上都有表现，在企业之间的横向关系中，短线通过金融在更大范围内起作用。

在金融运行中，宏观上是紧配置，信贷是紧的，对信贷要控制。但在微观上，资金紧张和资金滞存同时都有。这种利益配置的格局，不断导致资源配置的不合理，导致资金配置的不合理。这是我们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特点。

金融运行过程中的利益主体行为表现，利益均衡方式，短线制导的作用等，应作为研究金融问题的主要内容。这些方面说清楚了，复杂的东西也就不复杂了。

26. 我国金融系统作用弱化的主要原因 现在大家都认识到了资金融通的积极作用。过去我们的金融系统虽然一直都在运转着，但作用却发挥得很不够。现在我们又重新考虑发挥金融的作用，也就是要增强资金融通的功能。

很多同志觉得过去我们的金融系统之所以没有发挥作用，是由于受到一种观念模式的影响，即金融只是起出纳的作用。我认为，就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来说，这种观念模式反映了我们国家过去比较落后、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这种现实状况。除了历史的原因之外，金融机构之所以没有发挥强有力的作用，还有更基本的一些原因。解放以后，经济的迅速发展，市场的迅速扩大，经济规模的增长，造成了一个巨大的市场。这个市场的最大特点，是在多数情况下大于我们总供给的限度。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市场就变成相对短缺的市场，而不是一个过剩的市场。在过剩的市场上，金融的作用就象神经和大脑的作用，可以指挥一

切，调动一切；而在短缺的市场上，有限的资源要办足够多的事情，那么金融的作用就无形中被弱化了。我们现在的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是在过强的市场需求情况下形成的一种结构化，即短缺下的结构化。短缺的结构化减弱了金融的作用，这同时又反过来加剧了短缺。因为越是行政化管理，企业对于国家的关系就越简单，有困难就伸手要。这种严重的预算约束软化和信贷约束软化，使得我们的金融业发挥不出作用。

列宁很重视金融的作用。他曾把金融比作是资本主义经济中最精巧的机器，并认为金融能对社会主义经济发挥巨大的作用。可惜这个机器在很多情况下被我们打碎了。也不是有意去打碎，而是逐渐撤掉了机器运转的内在动力。这样，这架机器就慢慢不起作用了。前面已经谈到，这里面有其内在的原因。当然也有在这种客观现实下形成的一些主观的观念的原因，如认为社会主义经济不需要商品，金融只要当出纳，不需要发挥更多的作用，等等。

27. 金融在社会主义经济中有着不可取代的全局性作用
事实上，金融历来对经济都有很大的作用。不管是实行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国家，还是实行私有制的资本主义国家，金融作为商品生产的必然产物，都有着不可取代的全局性的巨大作用。

首先，金融是社会总量和结构的一个综合反映。不同产业的关系，在金融上有着鲜明的表现；国民生产和再生产的关系，也是通过金融来表现的。如果我们仅仅按照斯大林过去讲的那样，把价值、货币、金融只作为一种结算工具，显然是远远不够的，因为金融反映了整个经济中的一些根本性问题。

其次，到目前为止，我们衡量社会财富，还是采用马克思当初分析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方法，即用时间来度量价值，度量劳动量。社会生产的运转，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所共有的，是社

会化生产的共同特征。银行的很多业务实际上是清算业务，这些业务不管在什么制度的国家都一样需要。只要你有足够的生产规模，有足够的社会化程度，就必然有大量的信息量要流动，有众多的经济利益关系要表现。但长期以来，在我们的经济生活当中，金融即便只是作为社会核算的手段、工具这一功能也在很大程度上被减弱了，我们没有一个集中统一的、社会化的、面向全社会的、运转灵活的清算中心，没有让这些业务发展起来。从更高一个层次说，金融对于整个社会的调节作用是非常薄弱的。

所以，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过去由于种种的历史原因，造成了我们的金融业过份的不发达，或者说作用被过份地压制了。这种局面远远不能适应我们当前经济发展的新形势和发展规模的要求。如果我们在体制上不能适应发展的需要，金融的作用不能发挥出来，那么促进生产的社会化也就变成了一句空话。因为单纯依靠行政系统，只是上个世纪或者更早一点的社会中可以实行。这样的东西本质上不是内在的社会化，而是一种外在的社会化。我们长时间以来是把公有制形式单一化称为社会化，这已经脱离了马克思的本意。马克思的本意是指生产内在的那种关系。我们金融的不发达，已构成当前经济发展的严重障碍，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在金融体制的改革上，应有更大的突破，使金融在经济生活中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28. 金融的发展要与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发展相结合 我们现在的经济变化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只是限于增量的调整。而在产业内部，由于一个巨大的短缺市场的存在，多数企业总是处在过强的市场引力当中，使得企业对科技进步非常不敏感，对市场的需求变化也很不敏感。在我们经济的运行和发展过程中，还缺少一种内在的、灵活的机制，来不断调整各产业部门之间的

比例关系，使之顺应科技进步和需求变化的方向，使整个宏观经济结构合理化。

因此，在对待总量调节和增量调节的关系上，应该大胆进行研究和探索，通过金融体制等方面的改革来促进企业和产业之间的重新组合，促使总量调节的进行。应该说，这种总量调节在原则上并没有什么根本性的困难。现在我们要建立的金融市场、股票市场、科技市场等一系列市场，都有助于产业要素、生产要素的合理重组。如果能够更好地打破现有企业之间的行政关系，更多地把他们之间的关系变成一种金融关系、经济关系，而且使这种经济关系的约束不断硬化的话，那么，产业结构的调整、科技进步的发展，将会处在一个良好的环境之中。金融就能够发挥出更大的作用。我认为，利用金融调节产业结构，通过金融市场疏导和融通社会资源的作用更好地组合资源，有助于解决经济生活中在总量上是短缺、在局部又是浪费的、低效的，亦即微观上的低效和总量上的短缺同时存在的问题，有助于微观效率的提高和产业结构的进一步调整。

从金融本身的发展来看，金融部门在过去很大程度上不是一个产业部门，现在也没有做到完全产业化。过去金融机构对经济的管理，往往是从总量上考虑的多，从产业结构上考虑的较少。这主要是由于金融应该发挥的作用从来没有实现过。我们是在一个经济落后的社会里建立现代化经济的。这样就出现一个矛盾：产业本身要求高度的结构化，以适应日新月异的变化；而金融的管理却是单一的层次。这也是多年来金融发挥不出作用的重要原因之一。金融机构的功能过于简化，缺少一个能按照产业发展的方向灵活有效运转的、分层次的、结构化的金融体系。另一方面，一些重大的产业部门也缺乏相应的银行机构为其服务。

把金融的发达程度与金融的功能单纯归结为帝国主义的特征，而不看其中是否有合理的成份的观点，是片面的。在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中，金融的垄断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和产业结构融为一体，特别是在不同的产业发展过程中，在看准的目标上它们善于投资。比如，日本的银行界在 50 年代曾把机电工业作为投资方向，现在又把信息产业和高技术作为投资方向，这里包含着金融与产业结构的高度一致。对这一点，社会主义是不是也需要呢？我看非常需要。因为在新兴的领域里，产业往往面临自己的资金调动不那么灵活有效的问题。即使国家投资给它，它也只能用来解决建立新产业的骨架，至于相当大量的协作配套以及与其它产业部门、工业部门之间的联系的建立，则没有渠道来解决。如果围绕这个产业建立起金融市场来为这个产业服务，同时也为其它产业由于技术进步而出现的一些新的企业服务，那就可以支持它们的发展。

通过金融业的进一步发展及其与产业结构的进一步结合，我们就能够在建立起使生产要素重新组合的灵活有效机制这个问题上，开辟出一条新路。

建立金融市场，进行金融改革，完善金融机制，应该有助于对需求的社会约束和对需求的导向。但还没有看到社会主义金融在这方面的有效作用：南斯拉夫信贷约束严重软化是它需求膨胀的金融表现，迄今为止，我们还没能在这方面找到好办法，这是一个基本问题。但是如果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的话，金融要搞活，要发挥灵活的调控作用是很困难的，因为在需求过强的情况下，资源的短线太多，金融的作用就被限制住了。建立金融市场，尤其是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其作用是属于总量调节的。也许在这方面我们能够摸索出一条有助于总量控制的方法来。现在金融的控制办法过于行政化、过于笼统，没有分清轻重缓急的

结构，在这方面，可以借鉴西方货币学派的观点和政策。

五、紧运行中的财政问题

29. 财政在社会主义经济运行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在现阶段社会主义经济运行中，财政占有突出的地位，是社会主义经济运行主体的一个主要部分。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财政在社会主义经济运行中都有着一种不可替代的决定性的作用。政府对经济的直接关系，现在仍然主要是通过财政表现出来；通过金融领域的虽然也在逐渐扩大，但还远未达到可以取代财政的程度。而且可以预见，将来也很难有根本性的变化。因此，财政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作用是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

国家主要是通过财政，对经济进行干预和管理；各种利益主体也把财政作为在市场以外实现自己利益的重要渠道，财政构成了紧运行的中心环节。对于紧运行问题，财政在总量和结构这两个方面都有着重要的责任。财政怎样在总量和结构上都发挥调节作用，这是完善财政体制的主题。高度集中发挥了稳定经济的作用，分权起到了活跃经济的作用。应当通过描述，说明集中和分权的合理限度，并在实证性描述的基础上，做出趋势性的推测。各个利益主体是否对财政直接有压力，取决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取决于经济利益商品化、货币化的程度。现在形成的货币化经济的直接后果，是把各种利益矛盾更多地集中到财政上。各种利益主体原来追求的是短线资源和产品，现在追求的是货币，这种新的追求，直接对财政形成巨大的压力。改革以来的这种新变化，是人们最感兴趣的，也是我们研究的一个重点。

30. 财政与紧运行中的供求总量和结构的关系 总的来说，财政是被经济带动，但财政绝不单纯是被动的。财政是各种

利益关系进行摩擦、实现均衡最主要的舞台。需求在这里是怎样增长的？又是怎样无力形成有效供给的？是怎样相应于公有制下利益的再生产过程的？要研究、描述出财政和供求不平衡的关系。

财政、信贷的平衡包含了所有商品化的平衡，是宏观经济平衡的最终表现。财政失衡则是总供求失衡的最终表现。这种失衡每次都有这么个循环过程：开始是多种原因引起的“过热”，紧跟着是短线制约、外汇用光、结构规模收缩、长线产品积压、票子涌到市场上。财政承担后果，这是最终表现。当然财政不是唯一承担者，短线生产的损失，投资效益的损失，消费者的损失，都在分担着失衡的后果。但财政是主要承担者。1984年对信贷的主动松口，导致现在相当一部分转化为票子。责任虽然在银行，但收拾后果的主要还是财政。

在结构问题上，要研究倾斜结构和紧运行的关系。紧运行有主动的和被动的。如果在结构上超出能力，经济就被动，财政就会成为救火式的，被需求拉着跑。被动的紧运行，又可分为崩溃型和非崩溃型的。稳定的紧运行不是崩溃型的，而是无力实现倾斜政策，国家无力支持基础结构。靠发展轻工业积累资金，资金可掌握在国家手里，这是发展中国家的办法。但财政上可能搞超分配，否则集中资金搞建设的办法就失去意义。

31. 描述清楚各种利益主体的财政行为，是研究财政问题的中心环节 为什么财政体制收收放放？背后的利益关系是什么？回答这些问题，都需要着眼于财政运行中的利益主体的行为。通过描述利益主体行为的再生产，说明如何再生产出新的财政利益，说明在财政运行中，各利益主体怎样再生出求大于供。

中国社会主义财政体制有中央、地方几级财政，这是最基本

的特征之一，是经济利益的表现，有其内在的、深远的原因。财政体制的变迁，实质上是利益调整的过程。因此，需要具体分析省、地、县等地方政府的吸纳、传导过程和利益摩擦、利益均衡等行为。这些都主要表现在财政上。所谓利益均衡，大体上是财政上的均衡，这对货币运动有很强的指导作用。当然，也不能完全用货币、财政来描述紧运行，因为还有短线资源和产品，它们构成紧运行的物质基础。但财政范围比短线大，短线只是几个点，财政则覆盖了经济运行的整个领域。经济运行的各个领域，都对财政支出有吸纳作用。

行政上的讨价还价，是政府行为，不是商品运动。这一点和金融不一样。问题是利益均衡点怎么量化。比如财政算帐时有底数，最基本的是人头费，然后是与经济发展相关的重要建设项目。此后，再由财政部门砍几刀，经过反复讨价还价，达到某种均衡。问题在于能否使这种均衡得到一个量化的表现。对此要做深入的研究和分析。

当前，分权使利益主体向多元化发展，使货币在利益主体的活动中越来越多地起主导作用。但金融只是利益主体活动的工具，它们感兴趣的重要目标是财政。很多地方政府的领导并不完全追求实物平衡，对什么是短线也不一定清楚，但对财政的感觉很清楚。我们研究的是财政、生产，描述的对象则是利益主体。

财政与其它综合部门的关系，也需要加以研究，如和计委、银行的关系。银行可以通过浮动利率把企业的钱拿来一部分，但基本上要交给财政。银行留利是靠和财政讨价还价。

32. 东西方财政体制的不同特点 资本主义制度下存在着过剩的生产结构，是逆向调节的根本原因。由于私有制所导致的需求不足和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最后导致了社会产品、产能

力及生产要素的普遍过剩。凯恩斯首先从财政方面提出了调节这个问题的一系列思路，提出了资本主义制度下建立财政基本运转机制的指导思想。资本主义财政实际上是对每年增量的逆向调节，它的第一位的目的是稳定经济。当然，还有更深一层的含义，那就是通过政府干预，调节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财政只是其中的一个手段。这是资本主义财政的一个基本特点。

社会主义财政在“紧”这一点上与资本主义财政有相似之处。资本主义是尽可能地把多余的东西拿来纳入财政调节的范围，在这个意义上，它也是“紧”的。因为它要在符合整个资本主义、符合资本家的基本利益的前提下，与资本家争夺一定的资源分配权。而社会主义财政的“紧”就完全不同了。财政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在社会再生产中，有着重要的、决定性的主体作用。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是独立于财政之外的，其内在的东西与政府财政基本上是脱钩的，财政是作为政府对经济的宏观干预而出现的。这决定了资本主义财政可以对经济进行逆向调节。而社会主义经济则恰恰相反，供求双方在财政上都有极鲜明的表现，需求一方是从财政得到基本资源，供给一方要把每年的新增国民收入的大部分纳入财政范围之内。不论中央、地方，财政决定着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在对国民经济进行调节的过程中，财政承担着控制过度的需求增长和最大限度地增加供给的双重任务。

社会主义财政和资本主义财政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资本主义财政的运转背景是整个社会产品和所有生产要素都过剩，财政调节可以作用到经济领域的一切要素。而社会主义经济领域中的结构化程度是非常高的，结构化被短缺强化了，被紧运行强化了，所以通过财政反映出来的往往是结构化中最尖锐的矛盾。社会主义财政只能在紧运行下，在结构化被紧运行强化的

状态下发挥其调节作用。这个特征是过去、现在、而且将来的财政都具有的，我们的财政对有些方面的调节作用很有限，而对有些方面又是很灵的，这是由整个社会经济处于一种紧张的状态所造成的。顺着这个结构就很灵敏，不符合这个结构就怎么也调不动。所以应该看到，财政的调节作用，离不开现实的物质基础，离不开现实的运行状态。

33. 赤字预算在理论上没有意义 财政预算时，我们在某一点上可以多打一点。比如 1958 年对金门岛打炮时，军费开支超出预算，也没有什么关系。但并不能说明赤字在理论上有什么意义，不能说我们实际存在的赤字没有产生严重的后果。从经济学说史看，在财政政策上对赤字问题持基本肯定看法的是凯恩斯，但他提出的是针对需求不足的措施，这在逻辑上是很清楚的。而在我们这儿肯定赤字，逻辑上是不清楚的。如果只是举出一个个别的例子，这在理论上有什么意义？即使存在这样的个别例子，在理论上也未必能肯定这个例子。列宁曾经说过，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例子，可以用来说明各种各样的事实，但这事实在理论上可能是毫无意义的。一个问题小到没有全局意义的时候，就失去了它的理论意义。跨年度使用跨年度的收益，都是局部性的，没有全局性的，所以没有理论意义。对财政平衡，主要是改善的问题，而不是根本否定。打个比方说，人需要经常保持 37℃ 体温，不能今天是 37℃，明天就变成 0℃ 或几十度。现实中的全部赤字预算都是消极的。我们所谓最终能跨年度平衡下来，都不是从赤字预算的观点出发得出的结果。人要保持 37℃ 体温，如果 39℃ 烧久了，就回到 0℃ 去了，不会再有 37℃。所以，从理论上肯定财政赤字，有点基本界限不清了。

有人过分地追求对现有财政概念的“破”，这种单纯的“破”是没有理论意义的。实际我们应更多追求的，是完善和建设一

个内容更加丰富、更加科学的财政平衡概念，而不应简单的为了破一个东西，就引进西方的东西。

34、财政应在对总量和结构的调节上发挥作用 我们在过去的30多年中，已出现过几次财政管理体制的下放。过去的下放和现在的下放，应该说在基本的方面和做法上是一致的，没有本质的区别。历年来财政体制的变迁，无非是在中央、省、地、县这几层利益之间进行再分配和调节。

以往的分析，一向对分权和集中各自存在的合理程度和历史必然性描述得很不够。一是历史阶段的划分不清楚，二是对各历史阶段中央、地方的财政行为变化的脉络描述得不清楚。如果说1980年以来的财政是经营型的，当然不是商品生产下的经营行为。现在无非是财政的口子开得更多了，用于补贴和用于吃饭的比重更大了，而用于生产能力的更小了。过去下放后出现的重复建设的盲目性现在又重新出现了。而这种吃饭性财政比重的逐渐上升，财政从建设性财政被迫拉向吃饭性财政的情形，无非是消费超前增长的表现而已，与中央、地方在财政上分权无关。导致消费增长的原因不在财政之内，不分权也会导致消费增加，财政只不过是它的表现。如果说1980年以来在经济发展中财政的作用增强了，主要是指它在集中地方的财力、发展地方经济中所发挥的作用增强了，这个作用是相当明显的。广大地、县主要依靠自己财力，建立了大量加工工业，活力是很旺盛的。但是这种地方政府行为是以利润为目标，以利润为导向的。在中国这个国土广阔、有着巨大市场的条件下，就产生了同资本主义类似的重复建设的盲目性。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不足，导致大量结构性的短缺。“十二大”提出要加强两个基础，但现在还没有什么根本的好转。国民经济的结构问题至今没有变化，甚至有恶化的趋势。财政本身也有预算赤字增长的趋势。

超分配的状况逐年加重，把债券算到收入里，这是当前财政的一个大问题。现在，我们是处在既有相当的活力，同时又潜伏着相当大的危险和盲目性这样一种状况之中。

财政在调整结构上的作用是非常大的。迄今为止，我们是以增量调节为主，现在大家都在考虑总量调节的办法。在总量调整中，对加工工业、基础工业、人才科研等几个大的部类之间的合理分配，财政应有一定的方式。这几年在这一点上已多少有了些尝试，建立了一些结构调整的基金，如科研基金等，使得财政能够多层次化，把“蓄水池”的层次调节作用建立起来。这一方面起了约束总需求逐级膨胀、弱化需求压力的作用，另一方面使整个财政的承受能力和对结构的应变能力有所增强。财政如何在整个经济中、在总量和结构上都能发挥作用，这应作为我们研究财政体制改革的主题。

35、“救火式的财政”是不能持久的 现在整个产业结构和社会发展结构都绷得太紧了，财政只是一种“救火财政”或“救火式的结构调整”。这种办法肯定是不能持久的，而且时间长了，对整个社会经济发展会产生很严重的后果。扭转这种状况，在财政上应考虑采取些什么办法？这要从财政体制的完善上研究。要围绕社会主义经济的薄弱点，来研究财政在解决这些问题中能起些什么作用。现在中央感到地方财政的透明度很差，谁也不愿对你说实话，就象企业财务不愿对人说实话一样。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利益实体的财务是不合理、不透明的，也正是这种不透明，导致资本主义经济产生了固有矛盾。而现在我们财政的种种不透明，是在我们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是一种现实利益关系的表现。对这种现实利益，应从客观角度加以分析。对财政的循环过程给予动态的描述，并对财政不透明问题给予适当的解答。

六、紧运行中的资源配置问题

36. 社会主义经济实现二元配置的可能性 资源配置与社会均衡是同一层次的问题。

社会主义制度下资源配置是怎样实现的？显然这个实现过程可以有很多方式，不仅仅是我们过去考虑的那种计划导向方式。譬如，现在可以设想这样一种方式，既不完全由计划导向，又不是单纯依靠市场的利润导向。那么这是一种什么样的配置呢？简单地说，这是一种二元配置。

37. 紧运行也是一种市场 紧运行是公有制下的市场，属于广义的市场，它不是象普通市场那样运行。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下，企业也为交换而生产，但这种交换既不是为使用价值的简单实物交换，又不是为最大利润的一般交换，而是最大限度利用资源，满足需求增长的交换。所以这种交换关系不但越过了自然经济，而且也越过了资本主义。它加上了日益增长的需要，甚至是需求不可遏制的膨胀的内容。这是非市场运行，还是另一种市场的运行？我倾向于认为紧运行是市场的一种，是与资本主义典型市场本质不同的市场。

拿紧运行和资本主义市场相比，交换尺度有不同的表现。资本主义市场中，价值是统一的尺度，而且有集中化、抽象化的趋势，从稀缺产品到贵金属，又到纸币、票据，有价证券、信用卡，现在抽象为计算机信号。而在紧运行中，却出现了反过来的倾向，出现了物资串换，产销联合等，有一般等价物功能向最短线资源分散化和具体化的现象。资本主义有充分满足市场需求，并且保持过剩的机制，这是看不见的手。实际上紧运行中也有看不见的手。需求的膨胀带动了其他方面，这是最自发、最自动，同时也是最带盲目性的机制。

不同的市场，有不同的价格形成机制。资本主义生产以利润为原则，生产价格反映平均利润率，反映企业的利益，并为过剩的供给和有限的需求所约束。社会主义的价格却从一开始就反映资源不足、短缺，为需求膨胀所左右。留利水平以简单再生产为标准，基本不反映企业的利益。资本主义加强管理和政府干预，是为了减弱价格受需求约束太强的问题。如果社会主义价格只单纯反映企业的利益，由于价格反映需求膨胀，结果必然是价格不断上升。科尔内在这些问题上展开不够，他的价格理论苍白，而且有跳跃。

不同的市场，也有不同的竞争和淘汰机制。在紧运行中，长线的企业经营不好，有可能列入破产、淘汰的范围；短线的企业即使经营不好，也不能列入破产、淘汰的行列。紧运行靠的是增量调节，市场的特点是需求普遍在扩大，科尔内说的普遍短缺，说消费市场短缺是因为生产市场短缺造成的，是生产挤消费，恐怕不一定。紧运行下，个人工资约束是硬的，但工资总量增长的约束并不硬。福利性、非工资性消费也起作用。还有人说，公有制下公平分配，需求同步上升，这些都会引起消费膨胀。消费膨胀有自己的规律，各种需求都膨胀，几乎所有行业都不是长线。竞争意味着在市场中多占份额，而在紧运行市场上由于市场过大，所以企业很容易得到一份，造成企业发展动力不足。另外，在紧运行中的投资，也与在资本主义市场中不同。资本主义企业是担心投资后能否在有限需求的运行中保住市场，而在紧运行下，发愁的是第一次投入不容易找到，一旦从可投入增量中找到了，以后的日子就好过了。资本主义企业争夺的是有限需求，紧运行中企业争夺的是资源，是有限供给。

对市场的自发机制，紧运行和资本主义运行都采取行政措施。资本主义用行政方法扩大需求，紧运行用行政方法约束预

算。在这一点上，只是运行状态的不同，而运行机制本身没有多大区别。

38、生产要素流动的最大阻力是需求膨胀 在经济运行中，生产要素的流动是一个和资源配置相关的问题。要素流动的阻力到底在什么地方？要素流动是不是资金流动的起因？大家都想要薄钢板，资金流动能最后导致宝钢、首钢的薄板生产建设顺利进行吗？要素流动的阻力有直接的原因和次生原因。直接原因生长出来体制、政策、企业僵化等次生原因。

生产要素流动最大的阻力，是过强的需求导致要素只能在原有结构中增长数量，没有多少要素是可以流动。这是要素难以流动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很多长线产品中，要素流动也非常困难，这又是由次生原因造成的。直接原因导致结构的主要方面处在紧张状态，种种次要原因，比如行政化、部门地区的分割，又造成了要素流动的新困难。

39、利润最大化和社会资源最优配置不能划等号 以利润最大化为导向能实现供给和需求的相对平衡，甚至做到供给略大于需求吗？那只是一种理想的状态，实际上在我们这里实现不了。而且即使实现了，即使使平均利润率出现，也并不等于生产结构的最优配置，只不过是利益最充分实现的一种形式。

实际上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条件下，平均利润率既不能达到资源的自由配置，也不能达到结构的最合理。资本主义市场功能实现利润最大化的趋势，并不等于整个社会资源最优配置，也不等于整个产业结构更符合将来的发展趋势。因为平均利润率是一种利益的平衡。在资本主义市场，平均利润率导致分配市场的竞争增加，利益均沾的结果最终导致相对过剩的局面。所以说，它是一个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过程。它的资源配置只能是在更大空间内建立比较小的产品结构，整个经济处于

相对过剩的状态。这种状态显然不能叫资源的合理配置。在相同的情况下，紧运行下的资源配置是比那个范围更大的。

40、利润导向只能在紧运行环境中发挥作用 温州和珠江三角洲到底是什么模式？这显然是全国紧运行中的一种局部现象。从这里我们得到了一个启示，在一定的领域内，我们也可以实现市场传导，从而通过利润导向取得比较好的生产要素组合，说明许多以市场为导向的产业（特别是加工领域的行业），在现在的整个环境下是有广阔的发展余地的。

但温州不可能超出基本环境去发展。温州也是缺电、缺钢材。它加工扣子、加工小商品还可以，要加工机床、加工大型设备能行吗？它现在可以通过议价得到钢材，但如果钢材供应进一步紧张，或者它的加工工业再延伸到工艺更复杂、对资源需求量更大的生产领域，那么短线对它的制约，原材料、能源和交通的制约，马上都会表现出来。珠江三角洲更明显。珠江三角洲经济的特点在于它是外向型的。它把资源约束的缺口，通过外向型经济加以弥补了。这些经济模式有它们各自的特点，但并不是万能的。他们的电怎么来？他们需要铁路怎么办？光靠买行吗？简单的建筑钢材或简单的铸铁，有点能源的地方就能搞一些。但要想大量使用成型钢材，如钢管，特别是薄板，就非常困难了。利润导向恐怕不大可能导致这么大规模的结构变化。譬如电力供应，武汉一米七轧机一开，当地的电网就供不上了。后来葛洲坝发电了，并从西边送来了，华中电网才缓和下来，才解决了一米七轧机用电的问题。这样的结构调整，只靠利润导向、市场传导是不行的。

41、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的关系 基本资源采取计划配置，为广大产品的市场调节提供条件。这是我们所希望实现的。没有哪个人这么笨，总要把经济运转全都管着。大家都希望经济

最好能自动运转。但是在现有公有制下，有一种不断增长的需求拉动，不可能让经济自己去运转，必然给它提供一个基本框架。在这个框架之下，才能生长出一些相对独立的运转部门。

一般地说，社会主义经济在从无到有地建立结构时期，总是先有总体，后有局部利益。中央如果不能建立能源、交通系统，地方的经济发展就没有物质条件，地方工业也无法存在，无法表现出它的利益。这和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建立恰恰相反。

商品交换的原则是实现个别利益的方式。在资源供给比较充分或结构相对宽松的条件下，对相当多的加工工业来说，市场调节是合理的。但是在紧运行下，总有一系列的短缺，它们使价格信号无法传导。这些短线依靠政府干预才能发展，这就是政府在结构上填补空白的作用。

42、计划调节的主要功能是对资源配置的结构调整 在紧运行下有两种配置的概念：一是考虑结构配置；一是考虑在既定结构中运转下去的配置；就是通过多种交换使整个经济能够运转下去，把有限的资源交给最需要的部门，交给整个国民经济的基础部门等，这就是紧运行下市场所起的作用。人们往往把计划的作用归附在这后一点上。其实这一点不能称之为计划的功能，而应该称为市场功能，只不过是与过剩条件下的情况相反而已。

实际上，计划调节功能首先应考虑资源配置的结构调整。在西方或东方，都觉得利用利润和价格来实现结构调整，是比较困难，比较头痛的。特别是在科学技术迅速变化的情况下，谁也拿不准哪个技术会异军突起，成为将来的经济主要支柱。这些都带有很大的风险。比如现在投入十，以后每年取得一。这样，虽然将来可以把投入的都收回来，但眼下九是收不回来的，人们就愿意把它变成见效更快的投资。这是很普遍的现象。这种结

构调整是东西方在各自的所有制条件下都要解决的问题，但又都感到非常难以解决。在这个层次上，我们比他们更困难。因为我们原有的结构就很薄弱，很不完整。

紧运行中微观的增量调整，很难使新的结构或新结构之间的结合部增长。如使用钢材的人，绝没有雄心壮志把投资用于先建产品与他的钢材需求一点关系都没有的出口产业。再有远见的企业家，恐怕也做不到这一点。这就是交换行为与企业行为在宏观和微观上质的差别。现在我们依靠计划，硬是把多出来的部分保下来。如果没有宏观计划，就只能保具体结构配置的实现，这很难与全局的需要相一致。宏观计划这条腿缺了，另一条腿（市场）是不是最优？没有（计划）这条腿，这个“人”就走不了路了。

现实中存在这样一种假象，似乎企业很主动，很能调动社会资源。实际上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当然，这并不等于否认我们将来可能找到一个办法，在紧运行中能够实现这一点。将来在加工工业中，如果提供更多的主动权，相当多的加工工业可以实现完全的市场调节。这可能比较容易做到。比如糕点、食品、服装加工等，已经是彻底的市场调节了。但这毕竟不等于整个经济是市场调节。整个经济结构，基本上还是通过宏观计划的调节而得到改变的。

43、计划调节是紧运行的内在要求 我们对社会主义经济运行实证性描述的结果，同“搅拌机”理论是有区别的。“搅拌机”理论认为，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有自动调节过程，并同意短缺是运行环境，这些和我们一样。但“搅拌机”理论把计划经济的主动权放在经济运行外面，就像人看着“搅拌机”那样，经济运行是“搅拌机”资源配置在搅拌机里进行。这和我们不同。我们认为，自觉调控和自动调节都属于社会主义经济运行。这是和资

本主义不同的十个特点。在资本主义，对资本家来说，国家干预经济的动力是外在的，但在社会主义，这种动力是内在的。我们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利益有几个层次，经济运行内部有多级动力机制，这是由利益的内在一致性和差别性决定的。

此外，“搅拌机”理论认为资源配置可以在搅拌机中自动调节，就像砂糖、咖啡在瓶子里那样，一摇就搅拌匀了。但是，如果瓶子太满了，就摇不动了。紧运行就像一个装得太满的瓶子，仅靠自动调节，是搅拌不动的。

44、靠一个信息中心指挥管理全部经济活动是不可能的
如果说，只靠利润导向和市场价格调节是不行的，那么只依靠计划和信息的高度集中、只靠纵向联系行不行呢？显然也不行。我原来很相信计算机在管理中的科技进步作用，后来却发现管理并不仅在于技术手段。如果整个经济达到的水平较低，信息反馈机制不灵的话，几台计算机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苏联现在大规模地实行经济管理的计算机化，从企业到地区、到部门、到中央，是四层计算机系统。但这套东西的灵活程度远远赶不上市场。

从企业内部的管理看，以丰田汽车生产的组织方式为例，信息的集中化也未必是一条出路。因为丰田在企业内部组织上完全还是依靠行政的办法。而且它也的确消除了交易费用，车间之间不是买卖关系。丰田并未采取信息集中化的方式，而在公司内部采取信息流通和产品流通的制作方式。它把汽车分解为几万个零件，接到订单后，按交货时间排出整个流程，并在零件上附有卡片，看到这张卡片，就可以知道该零件什么时间送到什么工序进行下一道加工和组装。这就是所谓看板管理，采取物流和信息流同时运行的方式。我在德国丁格芬参观了 BNW 年 30 万台生产能力的汽车厂，他们也承认采用的是丰田的那套办

法。这种生产方式已被世界各汽车工业大企业所接受。这点给人以很大的启发，即信息不一定全要集中。把信息都集中于大脑，然后大脑指挥所有的动作。这是做不到的。科尔内也曾讲到在许多经济环节中，可以有类似植物神经的调节作用，既非市场信息，又非计划信息，只是象植物神经一样的一种简单的互相依存的关系。这恐怕和人一样，和有机体的进化或协同学理论一样，从无组织状态到有组织状态是有类似特征的。用一个信息中心指挥一切是不可能的，现在苏联自己也不太相信这一套了。过去人们对计划的看法，是把计划统统集中在社会的一个大脑里，现在看来是不行的。马克思所说的计划无非是自觉一些、盲目性少一些。而斯大林是从处于赶超西方的环境下，不得不采取抉择一切的办法，有历史阶段的局限性，不能作为一种制度固定下来。

45、“二次调节”理论在实践中难以实行 我认为“二次调节”理论与现实接不上。这种理论认为应形成一个完整的二次调节机制。第一次是全面由市场调节，市场涉及不到的再由政府干预。这种二次调节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现在许多部门只有一次调节，有相当多的短线是政府在直接管理，将来这部分也不会实行二次调节。

在一般市场均衡的状态中，原则上说只有所有的产品都不存在短线才可以实现二次调节。而在不断再生出短线的环境中，二次调节就不可能完整实现，只能是对长线实行二次调节，而对短线只有一次调节，就是政府的直接投入。当然，这种投入也有不同情况，若是领导者高明一些，可以发展高技术、改变产业结构；如果领导者近视一点，认为产量多、产值高就行了，他只会在现有结构中扩张，其结果是一次调节的副作用更强了。在大量短线存在的条件下，二次调节是不现实的。任何省、市的计

委每天都在为煤、水、电、气等忙得团团转，这就是现实的一次调节。如果计委不搞一次调节，把企业放入二次调节，那么许多企业马上就会垮下来。当然这并不是我们的理想模式。我们是处在短线不断再生的环境下，这是必须面对的现实。

46、要客观评价政府干预的作用 不能把由于短线导致的政府干预看成是一种优越性。很明显，政府干预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动的、被迫的，其中并不含有什么资源配置最优化的含义。短线制导没有任何高明之处。但在产业结构的问题上，就存在政府干预的合理性问题。存在价格与结构的关系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不能简单地划分出一个逻辑和理性的界限，现实的界限是按不同的利益集团、不同的利益层次划分的，不同的利益层次有着不同的地位和作用。大量加工工业的企业及地方政府基本上是以利润为导向的；而在沿海城市及上海、天津、北京、武汉等大城市，他们已开始考虑到环境，整个产业基础设施以及人才对产业的作用；包括江苏、广东等经济发达的省市也考虑到了这些。但也还只是将很有限的资金投向这些领域。北京总的说把资金投向了基础设施，但随着财政收入的减少，这种能力也在缩小。虽然从绝对程度上基础设施是加长了，但在整个经济中，它们短的程度更强了。这种状况没有改善，很难说在基础设施这块领域能实现宽松的环境。日本半导体芯片每一片有 59% 的补贴，这使得美国无法承受、最后只得对它实行制裁。这种补贴是一种政府干预手段，与结构调整是有关系的。如果最终取得了市场垄断地位，就可以把全部补贴赚回来。

47、承包在现有结构中是有效的 承包的作用无非是企业留利多了，但还不具备领导干部的竞争和领导干部以个人财产同经营状况挂钩的约束硬化的优点。人们都以首钢为例说明承包好，这恐怕是指首钢的技术改造和生产发展比较好，这是一个

成功的例子。凡是搞包干的企业，消费基金失控的情况都不严重，而对抑制投资也有效果，因为企业工资要自己算帐，投资也要自己算帐。这是目前大家提到的两个特点。资产经营责任制同样会收到这种效果。在各种方案中，我比较倾向于资产经营责任制。资产经营责任制最具特色的是资产评估，这是一个核心的环节。承包为什么有效？承包的结果实际上是取代了国家指令性计划中扩大规模、数量增长的作用。过去用指令性计划的办法，显然有重点项目重点浪费等诸多弊病。而承包以后，自己算帐就要精打细算了。本质是一样的，但承包显然比过去的办法好。但它解决不了结构问题，只能解决现有结构下的数量增长。对于短线产品，承包作用还是很明显的。

是向前走，还是向后走？是向更初级的产业走，还是向加工工业走？中央领导同志希望它向前走，向更初级的产业走，而首钢却要向加工工业走。这很明显是企业行为的短期化，是以利润为导向。目前承包的关键问题之一是争基数。一开始企业竞争的环境就不平等，有人把这叫做“早革命不如晚革命”哪个企业挖潜挖得差不多了，承包后反而会吃亏。承包有适用性问题，处在中等水平以下的企业没人愿意包。首钢承包的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是：国家对矿山和煤铁这部分的投资都已投入了，现在只要在钢材上稍加投资就可以获得巨大收益。

七、对经济运行中几个有关问题的思考

(一) 消费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

48、消费对经济运行有较大影响 消费对经济运行的影响和作用，不是比较弱，而是比较大。跟西方一样，消费是整个经

济运行的基本组成部分之一，它对经济机制上是有很深的影响的，对投资，对各方面都有很大影响。

49、国家和企业不是消费主体 基本建设当中有相当一部分资金会转化为消费品，这不是因为国家消费引起的，而是经济活动的结构问题。这是说投资会影响到消费，因为它在结构上是连在一起的。通过不同产业，一环一环连过去，连到最后相当比重的资金用在消费品上面。这个不能作为国家是消费主体立论的依据。消费主体显然是消费者。科尔内也说国家、企业变相消费，实际上是个人消费的变型。这是通过政治结构，通过权力结构导向个人消费。企业应酬、化公为私等，最终还是一种个人消费。只不过这类消费不是完全从消费资金来，不完全从个人收入的消费基金中来。另外，工厂办了许多福利，相当多是从企业留利当中来的，这些往往不直接在个人收入上表现出来。再有就是办公室宽敞些，大家办公条件好一些。公共汽车一挤，各单位都要买车，班车都买到旅游车的规格了。这种福利形式的消费大概是比较普遍的。由于对个人消费有一定的约束，如汽车是个人买不起的，就得通过福利的形式由单位给买来，上下班可以坐班车。虽然形式上有这样的特点，但最后承担消费的主体还是以个人为主，只不过形式有些变化。

50、消费基金的不同部分约束程度是有区别的 如果说工资是硬约束，只是说对于发给个人这个环节来说是硬约束。但还有种种环节，包括工资总额增长，并不是硬约束。企业对职工发工资不是硬约束，它老是想法多发一点，而且整个政策上也没有硬约束。所以科尔内说个人收入是硬约束，但他马上开了个口子，说还有经过别的形式的消费。实际就工资本身来说，只是工资确定之后，属于个人这点儿是硬约束的。工资还没有确定发多少时，这个问题上仍然是软的。这个软约束不仅对中国来

说，我看对匈牙利等国家来说也差不多，也有类似的问题。东欧有的国家不是搞挂钩吗？采取工资和物价指数挂钩的办法。他们搞了挂钩的办法，工资就更不容易硬约束了。

(二)人口问题对经济运行的影响

51、**农村人口是个巨大的后备压力** 农村劳动力蓄水池的作用，是单向的，流出后就很难再流回去。1962年2000万人返回农村，这样的事今后不会再有了。这不是个调节经济的长期办法。现在城里低技能劳动力从生产岗位上裁减下来，还有提供供给和需求不平衡的老、幼、病、残，显然不能再回到农村去。所以说，农村的劳动力对于整个国民经济来说，更像个巨大的后备压力。

52、**过去一些行之有效的办法要充分肯定** 中国人口三十年发展到十亿，很大程度上是靠低成本劳动力，靠历史上农村水利的原始积累。过早地丢掉这些，是一个重大的失策。无偿调拨是有问题，但过早商品化，反而会影响进步，很难集中力量搞大规模农田投入。这在很长时间内实际上是不可取代的。都靠投入钱，会造成很大浪费，短期不能收回，经济也难以承受。在中国现有发展水平上，要充分肯定过去一些行之有效的办法，肯定它们的积极作用。释放需求也拉动了供给，否则还会有多数经济停留在自然经济上。至于供给的增加，实际上是用集中财力，搞重点项目发展起来的。

53、**提高人口素质是解决人口问题的出路** 要把人口问题的出路讲出来。一方面，要抑制低水平需求数量的过度扩张和需求向高层次的超前转化，抑制直接由人口带来的需求膨胀。另一方面，还应从人口的供给角度，增加供给财富的能力。通过

改变人口素质，改变目前高需求、低供给的倾斜结构。

只把矛盾摆出来，人们会觉得没有出路，认为人口压力太大，中国不行了。摆出矛盾，可以使人更冷静，但不改变人口素质，是不能改变人口压力的。改变人的素质很难，社会发展要消除对教育发展的阻碍。毛主席曾说人多热气高，现在要改成高技能的人要多。只有这样，才能缓解人口压力，改变供求不对称的状况，促进人口素质向高水平变化。

54、低成本和高科技相结合是我国人口的目标模式 要强调知识分子的作用和科技进步的作用。当然，高科技由于受资源限制，也不可能发展太快。克服人口对经济发展的制约，将是长期的任务。将来的人口目标模式，应当是保持低成本并和高科技结合，这样才能形成新产业的支撑力量，才能在国际上有竞争力。这个目标模式，不是牺牲公平和一般群众的基本需要，而是要解决广大就业和消费刚性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使广大就业和高消费分开。我国的人均资源低于世界平均数，不可能像西方那样搞高消费。所以应当把低成本和高科技相结合。如果是低供给能力、高消费需求，就会成为恶性循环。在保持多数人民群众温饱、生活稳定的基础上，在某种程度上发挥低成本的优势，建立高科技、高效率的高层次产业，这是中国人口问题的出路。欧洲人口多数已进入高成本层次，低层次的劳动要由外国人干。我们不行，低层次需求不要过早地向高层次转化，但低成本的有益作用要能传到高层次产业中，高层次科技的作用也要传到低层次产业。在我国，产业层次不能统统城市化，也不能统统高科技，这将是一种长期的状况。

55、中国悠久文化和高科技结合能形成很强的力量 中国巨额的人口和悠久的文明结合，同时和现代高科技结合，能在世界上形成很强的力量，形成很强的经济实体。这是可以设想的。

在世界各地有华人，他们很快就成为高层次人口，这主要还是由中国的优秀文化传统和当地落后状况的反差造成的。他们人不是中国籍，但他们认为还是在中国文化圈里。在美国、东南亚，中国人能向科技高层次、经济管理高层次发展，可能是中国文化起了很大作用。

(三) 政治体制对经济运行的影响

56、国家统一是我国经济运行的前提 我们现在的政治体制既要保持全国的政治统一，又要使经济发展有活力，所以对经济运行的影响有统一和经济管理两种职能。政治体制通过控制短线资源加强国家的统一，这和历史上有惊人的相象之处，但在目的和意义上又有本质的不同。几千年来，中国封建统治阶级就是用最短线的资源统治国家；使中国政治统一的演化进度很快。盐铁专卖等就是重要的统一手段。在自然经济基础上人为地使国家统一起来，政治上的成就是很高的。尽管经济上不统一，分散的小农经济象土豆一样，但统一了政治、文化，后来又有了交通干线，土豆就被网兜兜了起来。这同欧洲、印度都不同，有很强的中国特点。现在也必须保持社会主义国家的统一，国家统一还是非常必要的。这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前提。

就政治体制来说，政治统一的要求是基本的方面，政权、军队、政治方向、地方组织和所有制等都与此有关。可以说，全局统一性的要求是更高层次的。当然，这不排除还会出现许多矛盾。通过这种历史遗产，也会派生出其他东西，不一定都是我们需要的。不管什么行业，经济、文化的发展都要以国家的高度统一为前提，但有些派生的东西又是制约经济、文化发展的，就要想办法克服这种影响。所谓政党和政权组织的作用错位，主要

应指政治结构和经济内在结构的摩擦和矛盾，两个既存的结构之间应加以协调。可以说，现在党政分工不明确，就是一种不协调。例如在工厂，厂长、党委书记的作用发生错位，就是一种不协调，就会出现外行领导内行的情况。改革这种错位状况有很大的难度，但我们还是要在摩擦和碰撞中前进，使我国社会主义政治体制逐步完善。

57、政治体制职能的集中表现 政治体制的职能集中表现在决策和调控上。现有体制的决策层次主要是从政治统一的角度考虑的，从经济运行角度考虑的较少。实际上，政府和政治组织干预经济活动的职能在现代社会中是很普遍的。西方国家强化它，是在市场机制上使用它，在普遍自发的市场机制上运用政府的协调机制，以求达到协调状态。资本主义国家的控制职能是围绕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展开的，主要表现是分配有限的市场。不论是国内的权力制衡，还是国际上的政治活动，都是围绕市场分配的利益。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体制要走向成熟，也应围绕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展开。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基本特征是繁运行，在社会主义经济运行中，政府干预经济是为了使经济资源的短缺强度不要太强，既要保持需求拉动的作用，又要尽量降低短缺强度。这样在需求与资源，使用资源与供给资源的管理机构之间也应有互相制约，并且使局部利益代表者和全局利益代表者分开，不要让管理资源的无限使用资源。如果这些机构和利益的代表者行为约束软化，就会把资源吸光、用光。

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第一步要保持经济运行不打摆子，体温保持 37°C ，要有自动制约，有抗衡资源饥饿症的机制，使经济运行走向稳定。其次是对经济结构的调控问题。这对政治体制来说，是更高一层的要求，要有更高级的决策体制和决策程序。

总之，政治体制上的制衡机制对社会化经济都是需要的。无限高度的统一，不可能使社会化经济不断向前发展。这就象人体组织系统和器官要有分工、要分层一样，制衡机制相当于反射式的调节机制，是自动的，而结构调控则要通过大脑，要分层调控。当然，我国的经济运行也发过“高烧”，但还能生存下来，这也有统一机制的作用。所以，改革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应从现实矛盾出发。

58、政治体制和利益主体形成的关系 研究经济运行中的政治体制，要先对政治体制和利益主体形成的关系作些描述，即说明一下政治体制的建立、公有制的建立，以及在两者演变过程中产生的利益主体。地方政府是从过去政治体制即存结构中演变来的。要说明一级政权是怎样形成利益主体的，它追求什么样的利益，政治体制怎样为其提供相应的环境，促使其发育和成长。

在分析收权、放权时，可以把矛盾的焦点放在需求超前增长。需求超前增长，在收权、放权时都有相应的表现，这只能从政治体制和利益主体之间、有各自追求的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加以说明。我国的政治体制，开始时没有达到苏联、东欧那样高度集权的程度。后来对地方放权，对活跃地方经济、促进商品经济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但同时需求又以货币形态超前发展。在紧运行中，有效供给的组合是通过摩擦实现均衡，这种均衡受到资源约束，表现为供给不足。对需求增长的不同形式要作具体分析，在什么情况下，政治体制的干预增强；要素组合和政治体制是什么关系，怎样造成有效组合，怎样造成无效组合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的需求增长，总是以最小的损耗汇集到中央。地方产生的需求增长也是以乡、镇、地、市传到省。要研究它们的需求增长怎么通过政治体制得到加强的。

很多人说紧运行是主观原因造成的，过去是“以粮为纲、以钢为纲”，现在是领导有竖碑思想。主观到底起什么作用？我们在研究政治体制改革时要回答这个问题。主观表现形式对政治体制的变化来说，既是现象，也是原因，两者有双向的作用。我们要说明这里面更深一层的东西，说明主观因素和体制怎样相互作用，互相转化。长期的主观因素，可以转变为体制，和体制有相互固化的作用。为什么有人认为问题都出在长官意志上，认为打倒长官、或决策科学化就好了？因为这些人没认识到主观和利益之间的联系。领导水平高，只会考虑得长远些，但超出一定范围，就会碰钉子。客观约束每日每时都在转化为主观的东西，表现为主观和体制之间的关系。

59、决策分层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 过去的机制不断再生出短线，而且短线的增加速度很快。改革就是要强化约束，要有利于短线的消除。改革的指导方针中要明确这个问题。

决策分层化是个出路。经济社会运行的复杂性要求改革原来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实行决策分层化，使城市建设形成良性循环。资本主义国家上层建筑三权分立，是为了平衡各利益集团的关系，其制衡机制是保证各财团的利益，是使有限市场在争夺条件下得以均衡而不导致震荡和内战的制衡。各财团的利益一旦受到损害，就通过众议院、参议院行使否决权。我国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在政治体制上的反映是缺少一种非私有制的社会约束。其表现是使用资源和管理资源集于一身，谁都有份，谁都想捞一把，无人制衡资源平衡。名义上代表整体利益，实际上代表局部利益。这样，局部利益强于整体利益，最后矛盾集中到少数主管人身上。矛盾要得到解决，一是靠权限约束，二是靠主管人的认识。从长期趋势看，少数主管人的制衡与无制衡机制差

别不大，只是时间的推移，不能真正解决矛盾。无制衡机制导致无限制地争夺有限资源，形成紧运行、超紧运行，甚至造成社会震荡。改革管理体制，建立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上层建筑来缓和矛盾，把资源的使用和管理相分开，这种权限的制衡是资源约束的非私有制的社会表现，即社会约束。这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任务之一。

60、要研究经济运行与政治体制的关系 政治体制对经济的均衡过程起什么作用？经济运行只能在利益摩擦中实现均衡。资本主义政治体制不直接参与微观经济均衡过程，中央政府的调控功能体现在货币、财政、外贸和产业政策等方面。我国的中央政府也有这些宏观调控功能。

我们的地方政府是直接参与微观经济过程的，参与经济运转中投资和消费的分配。许多企业要靠基层地方政府维持，由“小父亲”管，而“大父亲”不管。对乡镇企业，省长一句话就可以“枪毙”。这和匈牙利有很大的不同。我们的地方政府不完全是行政行为，同时还要面对市场。我们的政治体制和经济运行在相当程度上融为一体。地方政府参与经济运行的程度可作历史对比，也可作国内外对比。过去地方政府没多少权，参与程度低，现在权大了，参与程度高；过去对实物形态的利益要求高，现在对货币形态的利益关心程度高。这些演变表明，地方政府对微观经济过程的干预、吸纳和制导，现在是以更高方式进行的。

要把对政治体制的分析紧扣在经济运行的特征上。紧运行是在利益主体的发育中形成的。需求再生产、主观和体制的互相转化，都是体制作用的结果。显然，简单地让各级领导决策科学化，压缩空气，加强增产节约观点，并不能消除紧运行。

权力再分配只在重大变化时才明显，而财力变动是每时每刻进行的。地方政府介入经济运行，有积极创造的作用，同时也

有盲目性。资源配置不合理的消极作用，还有落后的管理办法，这些对生产社会化是障碍，应当消除。政府分配资源以需求为依据，以资源为限度。需求超前增长，会直接受资源约束，但政治体制中也存在着制约需求超前增长的力量。如人代会对国家预算的制约的作用，在宪法上有规定，但这个作用发挥得不够，我们是从经济运行谈政治体制，对政治体制本身的演变不一定是要描述，而要从政治体制对经济运行的关系来描述。

(四)城市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

61、超紧运行是北京城市运行的主要特征 北京和全国其他大城市的经济都处于紧运行状态，但内容有差别。北京的矛盾主要集中在城市基础设施上，这是短线中的短线。北京城市“超紧运行”状态形成的原因有很多，真正体现北京矛盾特点的或者说导致北京城市“超紧运行”的更主要原因，是作为政治文化中心带来的需求膨胀。

在“过剩”经济条件下，城市的吸引作用产生于追求超额利润，表现为“资本的城市化”。在“短缺”经济条件下，城市的吸引作用产生于优厚的福利政策和优越的服务设施。产生于部门、产业在“天生”平等条件下无偿地占有城市基础设施。资本主义国家争夺资源是靠资本调动，在市场上的平等最终表现为不平等，由追求超额利润、追求市场引起城市膨胀。社会主义国家则是按非价格因素争夺资源，表现为部门之间过分追求平等地位下的竞争，要求平等地使用资源等等，而引起城市膨胀。在公有制下，可以有未实现的需求，不可有未利用的资源，这种观念下的竞争使一些需求变成了“空中楼阁”。无限扩张的需求从空中落到人间，变成了权力的竞争。这种竞争在北京表现得更突出。

资本主义国家通过高税收、高物价等手段限制了需求增长。社会主义国家则是对无限扩张的需求缺乏应有的限制机制。福利政策和城市基础设施无偿使用等因素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强有力的竞争力，象海绵吸水那样，把社会主义国家的新增价值吸得干干的。

62、城市运行中最突出的矛盾是基础设施 对整个城市运行来说，构成矛盾最突出的就是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最能打破城市经济循环的也是这些。由于城市有聚集效应，城市土地的级差收益也越来越货币化了，土地价格在增长。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经营在城市中的决定性作用，是研究城市运行的核心问题。

要着重分析基础设施投资分散的问题。投资分散严重地削弱了城市的资源供给能力，并增加了需求。各方面都投资盖楼建宿舍，楼房立起来，要水、要电、要气，但这些分散的投资却不管有没有基础设施，有没有学校、商店等服务设施，使需求达到甚至超出了基础设施的边际效益。城市基础设施有许多是产业发展推出来的，这是我国的一大特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不是靠单一财政渠道所能完全解决的，要与基础设施改造相结合，凡是促进基础设施建设有利的就要鼓励。新兴技术、高产出产业要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连起来，这样可以解决一部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问题。房地产、旅游业、新兴第三产业这些非物质生产领域的收入，应作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来源。

八、运行中的利益主体问题

63、在研究经济运行时需要回答利益主体问题 在当前社会主义制度下，利益主体问题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需要回答清楚的问题。有些人认为，公有制条件下，利益主体是绝对一致的。

我们在进行经济运行机制研究中认识到，社会主义条件下，特别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全社会各方面的利益主体是不一致的。那么，各利益主体之间内在的关系是什么？利益差别是由什么决定的，是怎样的差别？各利益主体逻辑的合理性存在原因是什么？各个利益主体是怎么形成的？历史上是如何演进的？等等，都需要一一给予回答。很显然，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利益主体既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这些问题需要我们进行深入的探讨，取得比较系统、比较完整的认识。清晰地回答这些问题，对于我们课题整体研究任务来说，必定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

单纯用计划和单纯用市场都不能充分说明经济运行为什么会展成为这种状态。研究经济运行机制和运动状态，必须深入到利益主体分析上。利益主体的配置是经济运行得以进行的载体，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决定了资源利用的程度和生产要素配置的状况。

64、社会主义制度下利益主体之间既和谐又冲突 如果把中国社会主义经济运行区别于资本主义的特点概括成“欠抑制型需求膨胀”，就要从利益主体入手说明它。这是因为经济运行是在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状态中进行的，社会主义制度下不但存在着利益上的和谐，而且存在着利益上的冲突和矛盾，这是研究经济运行一般问题的出发点。认识和把握这个基本出发点很重要，人们的经济行为并不是从想象的经济模式出发，而是从现实的实际利益出发。研究经济运行的矛盾结构，只有从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入手，才能抓住主要矛盾。

对新旧体制也不能泛泛地讲经济集中或经济民主。谁集中？谁不集中？谁对谁集中？这些都要做具体的、本质的分析。象宝钢这样的工程，不集中能建得起来吗？另外谁对谁民主？这也要有具体的含义。经济利益的各主体都要求民主，都要求

平等地使用资源，如果这样无限地提要求，资源用完了怎么办？这不是把权交给企业，企业不会使的问题，而是利益不一致导致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但也有矛盾，无论如何达不到让各方面都完全满意的状态，只能尽量找出从整体来说普遍满意的状态，这样才能使各方利益基本统一起来。此外，还有统一不起来的特殊利益，对于这些特殊利益，可以给其自主权，尽量发挥作用，但是不能跳出利益统一的范围。

65、从利益主体的分析出发，说明“紧运行”成因 承认社会主义制度下存在着利益冲突和利益矛盾，是研究经济运行的一个基本观点。在公有制条件下，各利益集团和利益层次之间，不可能全都是和谐的；现在我们还做不到象生物体那样，每个细胞都独立存在，但又具有总体目标，我们只能在不同利益层次和矛盾当中求得发展。看来这些矛盾是由经济利益不同造成的，同时也是由某些非经济利益的格局决定的。

最终要从利益主体出发解释所有的矛盾。现在的经济运行是在不同利益集团的和谐与矛盾之中演进的，从这个角度一下子可以找到所有行为的根源，找到各层次、各部门形成的根源。这是最基础的东西，社会主义基础结构实际上是由基本矛盾构成的，不可能被其它东西取而代之。分析利益矛盾应以利益主体入手，从利益主体的现状和运行的状态入手，再加以展开。《矛盾论》中提出，一个主要矛盾决定其他矛盾，这是一个基本观点。在论述经济问题时，也要求在哲学方法上有一定的逻辑性，不然的话，对问题的认识必然缺乏内在的联系。

66、抓住利益主体，可以透过运行现象看到运行本质 仅从收入流量分析还不行，以利益主体为流量分析的基础，大概更能透彻地说明现状。因为，在西方经济学中，利益主体问题是前提，是经济学以外的、经济学不考虑的问题。从资本主义转变为

社会主义，利益主体有了很大的区别，把这一点区分清楚，就能比较清晰地解释社会主义经济，解释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现状。这是一个核心问题，这个问题能说清楚，整个文章的主线就比较清楚了。

67、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存在着利益多样化 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在大体上有三种说法：第一，初级阶段中的商品生产是不可避免的；第二，在初级阶段不可避免要出现短缺；第三，在初级阶段将会导致利益的多样化。我们认为，在初级阶段，当生产结构还不足以使社会利益统一起来的时候，必然会有利益的多样化；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好象有一个利益半径，在一定的半径内凝聚起来的就是利益主体。我们可以设想，在高度现代化的社会中，在交通、能源、信息、物流和产业结构等方面，都达到了高度均衡，那么，这种利益多样化的层次就会减少，变得更加透明；反之，利益多样化的层次就十分复杂，难以一下子辨认清楚。

68、各层利益主体在工业化过程中逐一生成 经济利益主体逐个阶段地生成或激活，形成了一定经济格局的框架。这个过程是一个滚动的过程。这个过程是有主线的，这个主线和我们当前的现实紧密联系。人们之所以十分怀念五十年代，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那时候没有这么多利益主体，没有这么多层次的经济利益。随着工业化的迅速进展，不同层次的利益主体就逐渐形成了。这个形成过程虽然有反复，但可以抓住两点，一点是中央对地方的关系，政府行为作为利益主体行为是中国特有的一点；另一点是农民的经济利益迅速增长，由原来体现在解放初能分到土地、能吃饱肚子，迅速增长到现在农民要求农村经济全面增长、加强农村地区城市化的进程上。这两点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问题。

69、两种制度下利益主体的差异 社会主义的利益主体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利益主体。资本主义的利益主体是私有制的，彼此关系的界限很清楚，没有直接的统一性。他们在资本主义商品市场上，以各自的经济利益为出发点进行商品交换。在争夺市场赚取利润上，我多一份，你就要少一份，因而相互之间在经济利益上是完全对立的。这种对立，必然要求交换的尺度充分反映自身的经济效益。他们只能通过市场才能实现利益的均衡。

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下，利益主体之间不是资本主义商品市场上的关系，有统一性的一面，这也是社会主义市场具有的特点。公有制下，利益主体之间必须进行交换，不然不能进行再生产。但是，这种交换又不完全以自身利益为支点，交换的尺度也不是单纯反映利益主体的经济利益。这种情况导致公有制下的市场与私有制下的传统市场存在着很大区别。

70、社会主义公有制下的各层利益都有主体的表现 社会主义公有制下的各层利益，显然都是现实的，而且都有主体的表现，不像资本主义制度下，是未表现出来的。

生产的社会化是一种潜在的利益，而这种全社会的共同利益，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是无法通过私有制本身加以表现的。可以说，它没有代表者。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利益主体之间都是这种共同利益明确无误的表现者和代表的一方。当然，资本主义制度下也有很多政府干预、产业政策等等，代表了一些共同利益，但是不能与社会主义制度相比。资本主义的政府干预实质上是缓解矛盾的干预，或者是对现有利益主体、对一个个垄断集团之间进行某种协调，而不是代表社会整体的长远利益。

71、利益均衡在两种制度下参照系明显不同 均衡问题不光是一个总量平衡问题，还有社会均衡问题。社会均衡就是利

益均衡。我们可以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以追求利润最大化导致平均利润率，来使社会最后达到均衡，这种均衡当然是一种过剩的均衡，通常它是以一个参数作为均衡的标志，即，社会集团之间的平均利润率大致相等。

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下，也有一个类似的参数，这个参数可以概括为利益的均衡和摩擦系数最小。这个参数导致的最后结果是一种“紧运行”状态。因为利益的均衡和供求平衡的焦点不一致，不可能重合，这样人们就不可能看到平均利润率最终带来资源的最优配置；反之亦然，摩擦系数最小的利益均衡，也不可能实现社会资源的最优配置和全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基本平衡。而人们往往把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基本平衡，看成是资源竞争的结果，看成是由于价格调节使利润达到均衡，利润均衡又满足资源最优配置，最后使社会总量达到平衡。实际上这种情况是不可能的。凯恩斯在论证资本主义的经济运行时，后期不得不承认资本主义根本就没有实现均衡，他放弃了那种实现均衡的想法，他的一切努力不过是想办法改善一下资本主义社会中长期存在的过度的不均衡。

72、存在着利益主体就要有交换 市场问题跟社会主义公有制下存在利益主体这个现实有直接关系。传统意义上的交换，是以个体利益为支点的利益主体之间的交换；在公有制下，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就某种程度上讲，又不完全象传统市场那样是相互独立的利益关系；换句话说，公有制下利益主体之间有利益一致的一面。

在私有制下，利益主体的界限非常清楚，你的不是我的，我的不是你的，我在市场多占一份，你在市场上就少占一份。这就是利益主体在私有制下的基本特征。

在公有制下，企业的基本利益也要在交换中实现，舍此没有

其它实现的渠道。如果不在这个渠道中实现它的利益，那么企业的一切利益就失去再生产的可能。从这个意义上分析，企业具有被迫交换的因素，这种交换与资本主义的市场交换有类似之点。就是说，你不交换就无法生存，这跟资本主义交换是相同的，是由社会分工决定的，分工以后不得不交换。

73、公有制下利益主体的交换在各层之间传导 在公有制下，利益主体的交换目的有各种层次之间的传导，某一层次的利益主体可以要求下一层的利益成为超主体的。比如，一个县政府，以利润为导向，它为了最大限度地取得利润收入，对所辖企业采取工厂对车间的办法，不考虑企业本身利益的最大好处，只考虑我这个县的财政收入，于是在一个县内采取工厂之间的配套产品交换。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这是一种很典型的交换。就上级利益对下级利益讲，上级的利润导向可以不是下级的利润导向；下级不服从这种交换，工厂的工资就实现不了，整个工厂的再生产过程就无法实现，实现工厂自身利益的基本条件也可能丧失。县里对付下面的主意多着呢，你无论如何跳不出这个“如来佛”的掌心。县里说了，你这个工厂当初还是我给你投的资，我给你贷的款，给你跑的项目，才建起来；你现在想不服从县里的利益，那怎么得了。一句话，企业没有什么可说的了。所以，我说“紧运行”下的这种交换。如果只局限在每个交换的主体，它还具有某种独立意义；如果从交换主体之间交换目的的传导层次看，交换主体不一定能有完全独立的利益。现在人们总是希望企业完全独立，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彻底独立自主地发展。哪有那么回事？大量事实可以证明，没有地方政府，你绝对摆弄不起来；没有各级政府给你创造条件，你绝对转不动。

74、利益主体分层化导致结构性矛盾尖锐 在我国，由于有分层的利益和分层的决策，就使总量短缺状况下的结构性矛盾

尖锐化了。这种矛盾主要出现在具有利润导向的利益主体上。如果利润导向的利益主体是工业企业，就会表现为工业上的重复投资；如果利润导向的利益主体是地方政府，就会表现在地方之间大量的重复建设。这种分层的利益和分层的决策，造成了生产增长的相对无政府状态，使有些产品在市场上出现了过剩。当然这种过剩是相对的，主要是中低档产品；高档产品仍然很短缺。凡是利润导向的效果比较明显，容易实现生产要素重组的产品，很快就成为积压或过剩的产品；反之，却很难消除严重的短缺，这是中国特有的现象。所以有人说，中国的短缺很严重，同时过剩也很严重。这种情况不能用计划人员的技术和管理水平低来解释。如果我们没有回答为什么中国的滞存过剩比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严重，那么就没有讲清中国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特点。在中国，利益主体分层化比任何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都明显。在发达一些的社会主义国家，利益层次少，社会透明度增高；在落后的社会主义小国，也很难形成多层次利益主体。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又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因而利益主体分层化的特点最突出。

75、地方政府的特殊作用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各个利益主体之间仍然存在着非常尖锐的矛盾，这些矛盾是在利益一致的基础上产生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有时矛盾很尖锐，地方政府之间的矛盾有时也很尖锐，地方政府与企业之间的矛盾也很尖锐，中央政府与企业之间的矛盾同样尖锐，还有和消费者的矛盾尖锐等等，各部门之间都有矛盾的一面，同时又都有利益统一的一面。把这些利益的矛盾和利益的统一分析清楚，会对前面所说的基本状况有更好的解释。

我觉得可以结合政府行为、企业行为把利益主体问题很好地分析一下。中央政府承担的责任和它的基本目的，就导致它

的行为。在现在的结构中，双方之间的矛盾和协调，既是利益的协调，又是紧运行的现状。之所以必须有地方政府这一级利益主体，就是因为地方政府承担着中央所不能承担的事情。改善群众生活的最直接要求，不是由中央政府直接承担，而是由地方政府承担。群众这方面的要求，是通过各级地方政府反映到中央政府的。这是利益上统一的一面，统一的一面能反映上去。而矛盾的一面，则导致利益主体的分层，各层主体分别承担不同范围的利益。在这些利益主体之间，又表现出新的矛盾。地方政府行为为什么受利润导向规律支配？因为利润导向最终解决地方福利的最大化。地方经济的最终目的是福利最大化。地方收入的最大化，是为了最快地脱贫致富。现在大家都在喊这个口号，这是不可遏制的潮流。

地方政府是以利润为导向的，它不管你是长线还是短线，也不看整个市场的综合状况，它只看利润。由于地方政府利润导向，导致重复投资。广东省搞洗衣机，营口市也搞洗衣机，甘肃省也搞洗衣机，导致洗衣机的市场饱和，而且过剩很多，这就是地方政府的行为。利润导向是这种资源配置最直接的动机。

在中国，地方政府成为利益主体不是局部的现象，而是在相当大的范围内存在的现状。这是中国经济运行不同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不同于苏联的基本方面。地方政府作为独立的利益主体，有它独立的经济利益。这与中国历史有相联系的一面，但现在主要表现在经济上。

76、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摩擦是必然的 在中国，资源配置，市场配置或计划配置，很难说有一个逻辑的、规范的界限或结合点。在现实工作当中，这个结合点是通过摩擦和不同利益冲突来实现的。中央政府说，没有外汇，没有进口原材料，消费基金失控，等等，你们（指地方政府）是不是少搞一些项目？地方

政府说，我们要有一定的财政收入。如果这也干不了，那也干不了，就会影响中央的税收。双方出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讨价还价，这种摩擦和矛盾是广泛的，无所不在的。所以，在这种状态下的资源配置，出现大面积的重合。

中央政府必须在很广泛的领域里牵制地方政府。它要上洗衣机，你就不让它上，因为上了以后，你就不得不帮助地方解决外汇，解决能源，解决原材料。所以，各层利益之间不是按照一定规范确定相互关系的。冷静、客观地讲，即使到了地方政府的行为相当规范化以后，这种摩擦也是依然存在的。因为利益本身决定，摩擦是必然的，是基本的经济现象。

77、在紧运行状态下实现利益之间的均衡 另外，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推动力，从利益主体讲，对它的必然性、合理性和弊端，也要说一说。这样可以找出一个新的看法，就是资本主义制度下，它由一个一个完全独立的企业利益，在市场上形成平均利润率，实现它的市场欲望。在公有制下，经济运行的过程最终也导致各种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均衡。怎么度量呢？好象摩擦系数最小，可以稳定在一个均衡状态。这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经济运行的一种均衡。但是这种均衡绝不意味着在资源配置上都是合理的。这是一种紧运行状态下形成的利益均衡。

在资本主义运行中也要实现资本的利益均衡，资本主义的利益均衡是通过平均利润率或金融的办法获得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利益均衡不光是价格和利润，还包括其它方面。这种利益均衡导致紧运行状态。运行的平衡和利益的均衡是两个概念。原来人们认为平均利润率能导致市场导向的资源分配，最后导致合理的配置。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这只会出现过剩的局面。

我们这里存在的是公有制下的利益均衡，结果导致的是紧

运行下的均衡。科尔内说短缺、过剩都可以导致均衡，我们则要进一步分析，均衡在什么上。我们和科尔内的区别不仅是在宏观和微观的区别上，而且在两国的起点和现状根本不同上。我们有的问题可以借鉴科尔内的成果，有的则要根据我们自己的状况来分析。从这点出发，还要研究调节利益主体之间存在矛盾的手段是什么？是否能拉动供给或抑制需求等等问题。

78、利益主体和人的问题的关系 在许多问题上都可以找到人的问题的踪迹。在我们的整个课题研究中，这似乎是一个最深层领域的问题。它不完全是经济问题，而是哲学、社会、历史、经济这几个方面结合部上的一个问题。

对人的分析是我们应达到的最深一层的领域。我们研究的层次越深入，客观上达到的覆盖面也就越宽，穿透现实的辐射力也就越强。马克思所说的“全面发展的人”，是在一种充分社会化、现代化的经济中才能实现的人，而不是在一个低层次生产力水平上能够实现的。所以，我们对现在公有制环境下人的异化，也可以作一些分析。

在自然经济中，人的需求的实现是与他的生产的实现紧密相连的；在现代经济社会中，个人的需求则总是与社会需求紧密联系，是整个社会需求中富有个性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个人的供给也成为全社会千万个富有个性的供给中的一部分。在自然经济社会中，个人需求与供给的统一表现为人力与自然力之间的和谐，或者说表现为在个人改造自然能力限制下的统一，两者都源于此。在现代经济社会中，由于分工和协作，需求与供给都成为只有在更大的范围内，才能相互联系和可能协调的因素。个人需求的产生摆脱了个体生产能力的约束，而来源于受整个社会消费活动的启发、示范和刺激。同时，个人的生产并不直接与个人消费结合，而成为社会生产的分子。在资本主义经济中，

个人需求和供给的发生都受到私有制的严格限制。需求的内容和规模只是个人资产规模的消费表现。个人需求与生产的实现，都表现为个人资产的社会实现。社会主义制度是对于人的需求与生产受私有制束缚和决定的解放。个人的需求不再受到私有制的约束，而是同个人的劳动和整个社会的经济建设、经济发展形势相联系。在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中，个人的需求与生产在高度社会化的基础上，实现了内在的统一。所谓内在的统一，就是说，它不是由需求和生产内容之外的因素所决定的统一，而是由需求和生产的内容本身统一的。在那种状态下，人的实现，精神的实现与物质的实现，作为需求行为的实现和作为供给行为的实现，消费的实现与成就的实现都内在地和谐地统一起来。但是，在我们目前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及以后的发展中阶段甚至发达阶段，当生产力水平还未充分发达，社会化水平还不高，物质和精神财富尚未充分丰富的情况下，人的实现，在需求和生产两方面，在精神和物质两方面，在消费和成就两方面都是不平衡的。这种不平衡自发地表现为需求的膨胀和相对于生产的超前增长。这种本源性的不平衡因素，通过多种决策层次、体制和多种利益主体，通过各种责任制和经济运行机制丰富多采地表现出来。这种不平衡即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源源动力，又是经济运行出现波动的因素。社会主义不能通过私有制的约束来消除这种不平衡，而只能是通过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和加强宏观经济管理，控制和协调这种不平衡，并且引导人们的实现向着平衡的、与社会总体利益更为一致的、精神和物质内容更为丰富和高尚的方向发展。

九、紧运行的成因

79、要对紧运行成因作逻辑和历史的分析 紧运行的成因问题是大家都关心的。紧运行是一种现实，以前若明若暗，现在大家都承认它是一种现实。成因到底是什么？应该按不同层次作逻辑和历史的分析。历史原因中往往含有合理的一面，必然性的一面。必然性里面有合理的因素，也有不合理的因素，这都是在必然性展开以后才能出现的。这需要运用一些哲学、逻辑学的分析方法的来展开分析。

紧运行的成因，有一次性的成因（所谓第一推动力下的紧运行），还有它不断再生的内在原因。要把紧运行是怎样不断再生出来的原因说清楚。因为科尔内只谈了预算约束软化，只讲了企业对于外部环境这层关系，用这些来解释整个社会主义经济紧运行不断循环和再生的过程，就显得很单薄，很不够了。

80、公有制在紧运行成因诸要素中占重要位置 社会主义经济运行呈现紧运行的特征取决于很多原因。在不同的国家或不同的历史时期，原因也会有所不同。其中有主观上决策失误，方针、政策上失误的原因；有在社会主义初创和探索过程中，体制上不可避免的不成熟、不完善的原因；有由于没能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社会化水平的提高而及时地相应改革体制的原因；有宏观经济管理在摸索、尝试中难免的“代价”；还有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变化影响的作用等。但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生产资料公有制这样一种先进的生产关系所带来的必然性。

对紧运行的另一种理论表述，就是最大限度地利用有限资源，以满足日益增长的社会需要。也就是说，是一种需求超前增长（需求拉动，需求膨胀）并受到资源约束的经济运行。社会主义经济正是依靠这种紧运行而达到了资源的最大限度的利用和

平衡。可以有实现不了的需求，但不能没有被分配和利用的资源，是这种运行的原则。尽管在微观上存在着浪费，但至少从宏观经济管理角度看是这样的。这种以资源最大限度利用为特征的资源平衡方式，与以资本取得最大利益为原则的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方式是截然不同的。各社会主义国家都具有紧运行的特征，不是因为在政策上有相同或相似的选择，而是由公有制这个更深层次的原因所决定的。公有制具体形式的变化，可以改善紧运行的强度，缓和短缺，但不可能完全消除紧运行状态。社会主义经济的紧运行，是与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源不能充分利用，经济运行受有效需求不足的约束相对应的。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有时也出现相对“短缺”及由此而来的通货膨胀。但这种需求增长是偏离它稳定状态的暂时现象，是他们的政府在有效需求不足的长期趋势中，采取创造和刺激社会需求的政策及对企业投资需求的振兴政策带来的短期效应和现象。

81、从历史发展角度认识制度因素 制度因素和经济发展阶段是相互作用、相互连接的，如果把它展开分析，显然这个制度应包含相应的历史因素。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又是统一的，过去采用的是高度集权的封建制度，对于粮食、造币等最重要的社会产品，都采取高度集中控制的办法，以维持国家的统一。而这种统一又是不断地以各地方诸侯割据为补充的，割据导致统一的颠覆，然后又出现新的集中统一。

这样的历史演变过程，在现实中也有它的影象，那就是各地方经济的发展对全国经济的促进作用。原来政治上的割据完全是负作用，现在变成各地方的经济发展都趋于社会化，最终导致全国经济的统一。但在目前发展水平很低的阶段，又相当程度地再现了那种割据的局面。

82、需要在分析所有制基础上对运行成因做深层解剖 我

们讲的所有制离不开一定的政治制度。对于一个经济还比较落后的国家来说，以所有权来划分运行成因，还难以概括经济活动整体的全部现象。所有制的成熟最终并不导致一种理想意境，所有制的作用最终是有限的。因而不能说，依靠所有制的成熟，就可以实现非常有效的资源配置和运行状态。不能把包治百病的药方都塞在所有制里。只分析所有制因素还不行，还需要在另外的层次上做深入分析。生产力是一个综合的表现，而所有制只是其中的一个框架。它可以导致某种趋势，在这种趋势上，人们可以进一步去完善，但不可能再改变这种趋势。一种趋势是私有制的趋势，它导致了一系列高层次的生产关系对整个运行层次的影响。另一种趋势是公有制的趋势，它也会最终映射到运行层次中，在每个地方都有它的痕迹和影响。所有制是决定趋势的，运行层次是宏观的总状态，总的状态往往也是一种趋势性的表现，如需求膨胀的趋势或需求抑制的趋势。这种趋势的缓解和完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所有制的完善，但是最终要依赖于所有制以外的东西。制度层次在运行成因分析中是个基础，在制度因素影响下，会对运行的一系列链条起作用，使其改变颜色，改变方向，最终形成总的运行状态。

83、要研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紧运行”的关系 再有，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问题。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最近开始活跃起来，报刊上这类问题的文章也开始多起来。这也是当前改革反思提出来的一个问题。看来，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确实具有一系列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特征。初级阶段，替代战略不可避免；初级阶段，商品生产不可避免；初级阶段，“紧运行”和“短缺”不可避免；初级阶段，市场发育不可能那么完善，等等。但是，应该明确，讨论初级阶段不是把所有问题都装在筐里，就算完事了。而是希望大家对初级阶段和“紧运行”内在的关系做出进一

步的分析。因为，对中国来说，是初级阶段问题；对于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转变成社会主义制度的，又是另外一种情况。这两种类型国家作为历史的不同阶段，在现实的空间都同时存在。所以，还可以对这个问题做一些对比分析。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时间很长，区间目前难以判断。但是不是初级阶段过去后，紧运行就消除了？从社会主义的现实来看，民主德国比较发达，但还是紧运行；匈牙利等国家引入了市场经济，也还是紧运行。所以，需要说明社会主义内在的倾向性。过去苏联搞指令性计划时存在短缺，现在大量引入市场机制，但很快就为需求服务。南斯拉夫今年通货膨胀率为100%，去年是80%。计划、市场这两种手段都是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环境条件，不能把科技进步完成归为买方市场。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是靠战争，掠夺殖民地，不是靠市场。两次世界大战，使这条路走不通了。现在西德不追求市场扩大，只要做到市场不减少，就可以达到每年增长6%。美国在二次大战后也有很大变化，随着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地区经济的发展，初级产品充斥市场，美国就转而占领高技术市场；美元成为世界货币，从凯恩斯财政政策，走向高技术，并不是买方市场的结果。买方市场亚当·斯密时就有，科技进步既不能归结为私有制的优越性，也不能归结为买方市场。我们的希望是通过改革最后过渡到比较宽松的环境，市场机制更多地发挥作用，减少政府无效干预；但我们认为全面买方市场离现实较远，所以在紧张中得到更好的发展比较现实，但绝没有越紧越好的意思。至于紧运行什么时候可以消除，现在很难说清楚。就是将来很发达时，也很难达到资本主义国家那样。资本主义是宏观松，微观紧；我们是宏观紧，微观有松有紧，紧的是两头。我们就是想分析描述这种状况。解放初，主要是农产品紧，现在紧在工业资源上。高级阶段情况如何，现

在还很难作出逻辑推论，怎样实现宏观、微观都不浪费资源，现在的研究还不好涉及。全社会如何实现资源的充分利用，是基本的出发点；但怎么实现，中国会有很多阶段性特征，一下子还说不清。到共产主义是不是还早？现在还不好说，但总的应该是资源更合理的利用，显然不会象现在这样紧运行。现在说初级阶段，但终点一端是开区间，没有界定，现在也很难界定，我们讨论中也感到很难。

84、确立经济发展的赶超目标有其必然性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最大的区别在于，地方政府是利润导向，它采取的所有方法也是紧运行下的“条条专政”。所谓市带县也好；其他也好，利润导向的结果，使得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都追求福利的最大化，而中央政府现在显然不是纯利润导向。

从长远来看，中央政府的赶超目标有其必然性。要赶超发达国家，这是所有落后国家都想做的事情，只是有些国家想做，但现在又做不了；也有些国家是在与英、美差距不大情况下赶超的，比如说战后的西德、日本。再有就是两种制度的赶超，如，苏联要求超过资本主义制度，中国要求发展起来，超过资本主义制度。这种制度性赶超的要求是强烈的，在这种情况下往往走过了头。但不能说这种动因是无稽之谈，因为它的基本动因是合理的，只不过合理的东西在实现时有合理的限度，超过这个限度就过份了。

社会主义要超过资本主义，这是基本的出发点，很难说这个基本出发点有什么错误。原来战略指导思想上的错误，只是对实现目标的追求过快了。象过去毛主席讲要打持久战，蒋介石要打速决战，要打这点是好的嘛！但是目标显然不合理，会导致剧烈的震荡，问题是严重的。所以，应该改变过去追求高产值、高速度、低技术水平的发展。

地方政府的赶超目标在于相邻和相近省、市，在于利润，而并不在于技术。对于地方政府，资源和技术的赶超是中央的责任。因此，赶超的任务主要由国家，由中央各部承担。实际上，赶超就是国际上国家经济之间的竞争。目前，在经济发展和经济赶超过程中地方政府有退出第一线的趋势。但这个趋势受紧运行影响，演变的速度不够快。特别在经济发展的新领域里，象乡镇企业、新产业部门、还离不开政府的制约。一种经济从无到有，行政起到很重要的作用。没有市场时，只有依靠非经济因素才能建立起这个结构，这个结构才能运转。它一旦转起来，并到了相当的程度，政府部门就可能退出直接管理的第一线。至于政府能不能退出直接投资的领域，就很难说了，因为这和紧运行的条件有关。

85、赶超战略下的“镶嵌经济” “镶嵌经济”是我国经济状况极突出的特点，这是“赶超经济”的一种形式。在中央集权体制下，只有国家能感到来自国际、国内赶超发达国家的压力，一开始只能集中全国的力量建设工业化的基础。在自然经济基础上建设现代化经济，会遇到天然的资源短缺状态，和与之不相适应的自然经济基础的约束，因此只能采取“镶嵌”的方式，即不是在自然经济上以简单增殖的方式建设新项目，而是在自然经济基础上，以投资为形式，建设形成一个完整的现代经济（独立的物资供给和销售系统，独立的信息和技术交流系统和生产保证体系），所以这样做是不可避免的。从“一五”时期的 156 个项目到现在的三千多大中型企业，这决定了我国的基本经济结构，在高层次上形成了我国的现代化经济结构。当然，中央的这种干预，又是引起中央和地方矛盾的一个重要原因。在紧运行下，中央不得不向地方征收财力，只能保证地方的经济在一个下限下运行。中央拿走的财力，在资源所在地、战略要地上镶嵌了现代

工业。这些都来不及等待当地从自然经济中自发地缓慢地形成现代经济的条件和现代工业的要求后，再自发地形成这些现代工业的骨干。实际上，地方工业的骨干企业也是采取“镶嵌”办法，由地方政府集中资源和财力建立起来的。美国和欧洲的资本主义经济就没有这种发展形式。中央和地方一方面有矛盾，另一方面地方也得到了各种好处。“镶嵌”项目不仅给地方带来了投资和附属设施的建设（如：学校、商店、医院、住宅），为本地项目的发展带来了原材料，环境条件（如：公路、铁路、通信）上的基础条件，而且对于地区技术水平的提高，获得经济发展商业和地区经济的工业化、现代化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因此，中央与地方在这个方面的矛盾集中表现为：地方尽可能地减少中央集中部分，而尽可能多地争取“镶嵌”项目。中央要建设现代化工业，就必须集中使用财力，这又会增强不平衡发展的趋势。在地区经济实力相差悬殊时，只有物资串换能突破区域封锁。如果按市场价格进行交换，落后地区只能吃亏。所以“块块”对企业的作用还是必要的。地方政府拿短线物资去串换，可以缓解地方工业资源和生活消费品短缺的状况。如果地方政府不这样，在紧运行下，地方工业的发展就有困难，中央在地方的企业日子也不好过，尤其在落后地区镶嵌的中央企业，会更困难。可见，商品经济的统一市场决不是简单消除行政办法就能形成的。现在人们给经济改革开了不少药方，有的说“块块”不要管经济，只管基础结构和人民生活。这种意见离中国的实际差十万八千里。总之，各级政府担当的角色不同，行为也不同。

十、这项课题研究的目的、意义和基本方法

86、对社会主义的实践要不断地再认识 马克思主义理论

中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论述，与现实有一定距离。最早理论认为一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列宁走了第一步，斯大林走了第二步，现在我们又在往前走，这就是不断的探索，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贡献。

对于社会主义，人们是在实践中逐步认识的。毛主席搞农村公社化时，是真心地认为，只要一集体化，就能焕发出无穷无尽的创造力。当时不只毛主席相信，其他人也相信，谁都相信。苏联曾提出发达的社会主义，成熟的社会主义，现在叫做发展中的社会主义，也是一步步地认识过来的。战时共产主义取消货币，就含有空想共产主义的因素，真有人相信；连列宁自己都相信已经进入了共产主义。但是，后来列宁很快转过弯来，接着实行了新经济政策。这些情况表明，人们对社会主义实践是不断地再认识，然后对原来理论中过激的预测不断加以修正，不断把它们摆到现实的基础上。

87、研究经济运行需要运用历史的方法 我们要把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理论的形成过程看成是一部历史。布鲁斯也好，奥塔·锡克也好，都包括在这个历史过程中。现在比较起来，布鲁斯，奥塔·锡克，还有波兰的兰格，在这个问题上概念色彩相当浓，现实色彩差。他们从概念出发，象马克思参加过的青年黑格尔派，从宗教改革中汲取力量，理论探索上都玄得很。理论研究还是要有现实的基础，从这个角度看，不能对那种理论探索评价太高，不要过多地从那时候形成的概念出发，要从现在已经形成的现状分析，回过头对历史重新了解，要注意历史的连续性。黑格尔哲学有很强的历史感，我们对社会主义实践，也应有历史的分析，而不应是简单的横断面比较，应从整个社会主义经济建立和发展的实践过程分析。断面分析的方法会被认为没有抓住历史的根源。

88、由于某些主观原因，已有的运行理论落后于发展变化着的实践 对于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制，从马克思主义产生，特别是社会主义建设开始以后，正面地把它作为一个对象进行理论研究的时间还不长。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在很长时间内，大家主要还是从现在称为规范理论的角度上，考虑得较多。这也不奇怪，因为一个新社会制度从无到有建立的时候，主要是通过对旧社会的批判形成的。它的内在的历史逻辑，是在旧社会必然灭亡的逻辑中产生的，它产生之后将逐渐展开自己的运行机制，要在一段时间内才能表现出自己的特点；人们对它的认识要在它表现出来之后，再过一段时间才能有所突破，这也是很自然的。我们这个题目，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理论工作者中，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对它进行研究的时间还比较短。理论上讲，这个领域的成果还是比较单薄的。作为现实的说明，作为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和改革措施，提出的依据都显得很不足。存在这种情况并不奇怪，有历史的原因，也包含了我们主观上的原因。

89、要努力改变经济理论不适应时代要求的现状 我们对历史过程的认识必须不断深化，同时还必须解决一个方法问题，也就是用什么方法研究经济问题。现在我们考虑这个问题时，已经与过去有很大不同，特别是 1978 年以来，更多的是从管理和发展角度，从完善与建设的角度，而不仅仅是从社会主义经济建立和初创的角度来考虑。对于这个问题，已经到了把它作为统治阶级的思想来加以完善的阶段，就是说，到了从破坏旧世界、建立新世界阶段向完善与建设阶段的转变。要尽快完成这一转变，就必须提出区别和超出前人的理论。现在单薄的理论很不适应时代的要求，其中很尖锐的矛盾表现在当前改革提出的很多问题，我们在理论上却难以回答。现在的好处是大家思

想活跃，提出很多新看法，缺点是这些看法缺乏内在的逻辑性和系统性。我们要逐步在这方面加强工作，为改革提供强有力的工具和武器，使我们的工作不断克服盲目性，增强自觉性。现在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理论研究还没有几家，而且也并不系统。为尽快改变这种状况，需要大家的共同努力。

从这个意义上说，虽然这项课题研究偏重于描述和解释中国的经济运行机制，但我相信，研究成果的意义会超出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这就象马克思研究英国的经济，其结论不仅限于英国，研究法国的政治体制，其结论也不仅限于法国一样。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资本主义经济运行发生了 200 多年之后，在经过了几代人的努力之后，终于产生了凯恩斯学说这样讲清了资本主义经济运行客观矛盾和规律的成果。凯恩斯学说的价值不在于它在内容上的“函数推论”，也不在于它所开的药，而是它对运行矛盾，自发性倾向的分析和结论。二战后的资本主义经济运行历史验证了这种理论。社会主义经济运行已 70 年了，从历史条件看，产生成熟的宏观经济运行理论还有困难。但社会主义经济实践提出了产生这种理论的要求。这也是我们经济理论工作者的历史责任。

90、运行研究是一项难度很大、周期性很长的工作 一些同志长期以来感到，凭经验做了不少事情，但是缺少能够说明经验的合适工具。现成的工具中，可用以借鉴的成果又不多，所以，目前的这项研究难度很大，不可能一次取得很大成功。这种在历史和空间上跨度都很大的课题，必须长期坚持下去，做不间断的研究。在现阶段，要从实证的角度，从与现实相结合的角度，深入地做一些理论探索工作，使整个研究过程不因过多的、理论上的跳跃而埋下一些失败的种子。在研究过程中可能会有反复，但只要我们工作扎实，脚踏实地，就有希望取得具有较高质

量的研究成果。当然，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不可能根本舍去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制的分析，不可能离开对现实作实证性描述。

91、充分发挥集体的智慧开展这项研究 这项课题题目大，难度大，现实又很丰富。因此，在研究过程中要注意紧密配合和相互间的协调一致。科学发展到今天，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已经摆脱了个体劳动阶段，也就是说仅仅依靠一、两个人，已不可能作出很全面的、合理的概括。正象现在的经济发展一样，社会科学的研究，也越来越多地体现出它的社会性、整体性和民主性。任何研究成果的科学性，都要通过它的社会性、民主性来体现。只要大家协调一致，组织力量，形成社会化的、协调的、统一的整体，就能把这项研究扎实地推向前进，从而对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特别是对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运行，作出有价值的理论分析，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提供有力的理论工具。

92、理论研究要紧密联系实际变化 在我们的研究中既要解放思想，以理服人，同时又要紧紧扣住现实改革和经济发展的变化，将这些变化及时地反映和吸收进去。对改革中新出现的一些变化，如企业股份制的尝试，有利于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促使管理走向更高水平，逐步摆脱低层次行政化运行等，要将这些变化特点深刻地反映到我们的研究成果中来。也可以使我们的研究工作更多地吸引实际工作者关注和参加，使更多的同志认识到这项研究的重要性。

93、研究成果要真正做到以理服人 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研究，由于大家都处在刚刚起步阶段，希望能够充分解放思想，畅所欲言。有很多同志希望在研究中形成较系统的看法，希望对整个研究提出有价值的见解并作出贡献。但我想强调一

下，要做到对现实有深刻的内在逻辑的描述，而且有很强的说服力，就一定要在材料的加工和分析上下功夫，真正做到以理服人。这个“理”就是描述现实，同时在逻辑上要有很强的一致性，这是很不容易达到的标准。许多搞研究的同志，过去做了很多工作，是很有意义的；但也有一些人总是把规范理论套用到当前现象之中，这就难以使大家对现实有准确了解。因此，在坚持解放思想的同时，一定要在逻辑分析上下功夫，要继承马克思主义强有力理论分析的传统，使我们对当前现实的分析具有充分的论据和逻辑力量。

94、实证性是这项课题研究的基本方法 根据我们的理解，实证性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具体地说，实证性的研究方法还包括以下含义：

(一)、强调实证性只是意味着不准备过早回答(而并非不准备回答)我国经济运行“应该怎样”这类问题。因为在实事求是地搞清楚我国经济运行到底“是什么”和“为什么”这类问题之前，不可能对“应该怎样”作出准确的判断。而要搞清楚“是什么”和“为什么”的问题，就必须借助实证性的研究方法，通过深入调查研究和充分占有材料，在丰富的感性认识和客观分析基础上，得出实证性的研究结果。实际上，只要能够认真做到这一点，有关“应该怎样”的问题解答也就包含在其中，或者呼之欲出了。

(二)、强调实证性，并不意味着可以排斥规范性或价值判断。实证性和规范性从来就不是截然对立的，两者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一方面，实证性是规范性的基础，实证研究可以促进规范研究的深化；另一方面，在实证研究中也包含一定程度的规范研究。比如说，在对经济运行机制及其演化的历史进程进行实证分析时，必须充分利用前人已有的规范性结论，同时不

断抓住历史进程中带有规律性的主要线索，及时作出必要的价值判断，以指导下一阶段的实证研究，逐步形成基本的理论框架。这就是我们所理解的历史性的实证研究方法，它同单纯的现象罗列式的描述有本质的区别，也可以避免理论联系实际上的庸俗化倾向。

95、在研究中作“病理”分析比开“药方”更有意义 这项课题研究并不是政策性的建议或方案，而仅仅是一种初步的、但却是企图深入进行的分析。如果可以把提出方案的建议比作明确的诊断和开出药方，那么，这项研究只是作了些病理分析，希望从更深的层次，找出病理的机制，从而对现存的各种经济现象，找到一种更加富有内在统一性的病理方面的原因，为正确地诊断和开药方提供些依据。当然，提方案和分析各有各的作用，不可互相取代。现实的改革不可能等待完美无缺的方案提出后才前进，但改革造成了千载难逢的体制动态演变的机会，使一切有志于改革和加快社会主义体制成熟的人，能以前所未有的广泛角度和深入程度进行分析和研究，从而为加快这个历史进程做出努力。这也是我们的愿望，这可能比看到一些弊病就急于开药方更困难些，但也更有意义些。

96、“病理”分析必须透过表象，深入本质 在研究中我们始终认为，当前的体制中存在的种种弊端，在它们种种的表象之下，存在一种深层的结构，不断地再生出或变形地产生出相似的现象。如果不透过现象，抓住这些深层次的线索，将使改革不断遇到越来越大的困难。

正象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从一个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基础上开始的一样，我们的经济体制也是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个不可逾越的阶段中形成和发展的。它本身必然带有落后生产力的色彩，也不可避免地长期处于生产力的迅速发展所

导致的体制摩擦中。从私有制向公有制转变的社会主义革命，并没有结束体制的摩擦、演进，而是在更广阔的领域中，展现出公有制在初级阶段的种种不可避免的矛盾运动，和内在的制度演进的规律。必须认识这种现实的矛盾运动和矛盾转化。体制的弊端作为体制矛盾的表现形式，必然有它发生、发展、消除的历史进程，有它从历史地存在的理由及其向历史的否定转化的质变点。如果不搞清它存在和生成的理由，就不可能清楚它被清除的理由，也就不会搞清楚它被消除的历史原因，历史力量，以及途径和方法。

97、要做一个清醒的改革者 当前改革深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要求我们从习惯于充满理想和热情的改革热潮中，进入冷静的、客观的、历史的思索和分析，做一个坚定的、清醒的、冷静的和科学的改革者。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现代的科学方法，应该成为深刻剖析经济体制的武器，使理论的思索，不但有改革的巨大空间感，而且更具有宏伟的历史感。

改革是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长期任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内在矛盾及其所产生的体制，不但是改革所必须面对的对象，同时也是改革必须面对的环境。只要这个阶段没结束，改革就总会面对初级阶段的公有制，不断再生出新的矛盾，矛盾的长期性决定了改革的长期性。

冷静和客观地对待公有制从不成熟向成熟过渡，并不意味着固守旧有的体制模式不变，更不意味着对公有制的否定，而是要更科学地认识旧体制为新体制取代的历史必然性和历史的长期性，从而更坚定长期改革的信心。有一些好心的同志，充满理想色彩，看到繁运行这样一种现实的描述，感到和理想的运行机制距离较远，感到难以接受。对这些同志，我们只想简单地指出，承认繁运行这种现实，并不意味着企图恢复初创时期幼稚的

实物型产品经济；简单的点式倾斜的产业政策，如以钢为纲等不会再现了，历史不会倒退。整个经济在利益多元化基础上的商品化是不可逆转的；但要冷静地注意到，紧运行走过了它的实物经济阶段，更多地表现为价值、商品、货币的形态，只不过是紧运行的新阶段。盛开商品经济鲜花的大树上，不可避免要继续存在着货币形态的总需求膨胀，在树下仍深深地扎着短线制约的基础根系。它成为整个经济发展的基础支柱。同时，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逐渐发育的由点到面的倾斜的产业政策，推动经济跨越平均利润率有限的倾斜度和盲目性，也成为市场机制成熟的基础支柱。这种形式的紧运行，是我们不得不长期面对的现实，紧运行的矛盾运动，仍然会是改革的环境和对象。

我们衷心希望，这项研究能够引起广泛的讨论，只有在这种深入地分析和讨论之中，改革的理论才能在现实的基础上，大踏步地前进，从而为改革的顺利进行开辟道路。

关于社会主义经济 运行机制研究的思考^①

一、关于紧运行的状态

从供求总量不平衡与供求结构不对称的关系来看，还不能说它们是正交的。总量与结构的关系是我们整个研究在理论上的一个难点，二者的关系到底怎么表述。邓英淘、罗小朋的文章^②中一个突出的观点，就是认为在我们现实的情况下光讲总量不行，但他们把这个问题推到总量毫无意义的角度，把总量的作用完全抹煞了。讲结构这方面他们有新意，但对结构与总量的关系问题没有讲清。结构问题在我们这里有与资本主义经济不同的含义，有它的重要性，这层意思怎么表述？你可以说它是一个骨骼的关系，但很难用几何图形表述。

将紧运行划分为紧运行 A 与紧运行 B，即总需求略大于总供给和总需求过大于总供给两种状态是有利的。总需求略大，过大与总供给，实际还是指静态。从时间上来看，总是保持紧运行状态。实际上，有时刚刚超过有效供给整个经济运行就不太灵了，有时却是有效供给和滞存一块都超出了，即超出了现实供

① 此文写于 1987 年 11 月

② 见于《经济研究》1987 年第 6 期。

给；有效供给与结构关系密切，加滞存就成为总量了。在实际经济生活中，有效供给的直接作用更明显。在现实供给的圈内，是紧运行 A 的区间，超出这个圈即是紧运行 B，进入震荡状态。这是讲总量关系一。总量是从货币可加，货币可加是从时间可加来的。实际上是有效供给控制现实供给。现实供给与有效供给越接近，经济发展的弹性范围就越宽，容限就越大。现实运行中的很多情况是超出有效供给就已经紧了。现在钢库存三千万吨，我们对钢的总需求可能并没超出这个数量，每年进口钢材二千万吨，都是钢板，而现在库存的三千万吨都是钢筋、钢锭。就是说，在有效供给被超出后，它就开始紧了，因为最终形成的供给是有效供给。如果用两个量来说，矢量越重合越好，越拉开、到完全垂直可能是相当难的时候。咱们现在粮食总的说是紧的，即使有点储备，也没什么滞存，没有太大的余地，但确实在一些别的东西上存在刚才说的情况，在结构上够不着的地方，结构的边界就是紧的边界了。

紧运行 A 与紧运行 B 的过渡期可能是关键所在。在有效供给的范围内，与西方经济学是一样的，总量与结构的关系是清楚的、一致的；完全超出可能供给之外，也是清楚的。文章就出在中间这一段，总量与结构有多种可能的组合。过渡期不能说既不是紧运行 A，又不是紧运行 B，而是 A、B 都可能在里头。超过了可能供给那绝对是紧运行 B。紧运行 B 是从超出可能供给开始，还是在这之前就有可能出现？超出可能供给是绝对震荡区，把所有设备开足了还不够。

紧运行状态下的滞存，由于技术上的原因引起的，往往是由体制、机制等方面的原因导致的。实际上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越紧时滞存越多、越厉害，最后被某一个结构上的短线制约，其余都变成长线，都趴下了。我们是从原材料开始，一直向

制成品传导的滞存，由于基础一端的滞存，导致一系列的滞存；资本主义的滞存是从另一端过来的，即由于产品滞存，导致生产能力的滞存。这里有一个制约导向的变化。这种互相制约的关系，说明供给状况与滞存的关系很大。在紧运行B时，滞存是相当大的，比紧运行A时可能扩大。总量与结构是相关的，因此需要给予多维的表示。有效供给取决于结构，同时又构成一个总量，在有效意义上构成总量。对紧运行A如何评价的问题，人们是很敏感的。在张晓光和一些人的分析中，经常作为对比的是西德、日本战后的发展，还有苏联的发展。实际上，这些国家是在打烂了以后再来一次，有些东西在发展中是很清楚的，它不会糊涂，做一些可笑的举动。我们是第一次工业化，过去只有沿海的上海等地有一点底子。俄国从彼得大帝统一后，向外开放、扩张、发展，工业变化是很大的；日本明治维新后，保留并依靠天皇制进行工业化；德国是依靠俾斯麦的统一，铁血政策，创立了一次工业化的环境。现在如果把这个环境贬得一钱不值，认为越分散越好，那就是德国在统一之前和日本明治维新以前的状况。这个过程是个自然的过程。当时的日、德只是感觉到有发展的压力，但究竟怎么发展并不很清楚；那时的产业发展，是带有自发特点的，有政府的支持，如创造统一的环境等，有基本前提的变化。而战后的过程就很不相同了。如德国，1943年艾哈德就在琢磨怎么恢复战后的德国经济，他那时就有相当成熟的一套东西。德国是已有了自己相当的基础，它的整个决策层次，思想界的构成，都已相当成熟了。希特勒只不过是在这个基础上又重新搅活了一次。所以，西德战后实际上是进行二次工业化和现代化，因此是清醒的。日本战后实行民主化，天皇变成了偶像，但在产业发展上继续保持政府对产业的支持，它在选择上也是相当清醒的，一开始就选择了重化工，然后又转到机

械工业，然后是一步跨到当时的先进水平；现在又选择信息业。它这几个选择是相当自觉的，统一的，没有什么自发的东西在里头。它们在选择时，是相当清楚的，理论上有凯恩斯这些人，经济发展上已有相当多的实践。选择不能脱离社会发展阶段，或者说是领导者的成熟程度。日本在战后表现出真正成熟了，不走弯路，不干傻事。德国战后也是这样，这个阶段是成熟的。他们在选择时一个是重视总量，一个是重视结构。离开这些，光是用刘易斯转变点等，很难说明这些问题。为什么德国战后有艾哈德，而在俾斯麦时期不会有这样一个人。因为他这样的人是在一定的环境里才能产生的。西德、日本不是一步登天，不是没有自然发展过程。单就发展来讲，离不开自己的历史，离不开这个国家统治阶级对社会认识的深刻程度，对经济认识和把握的深刻程度。战后的西德、日本在总量、结构上把握得是相当好的。西德与日本追求的目标不一样，它一度追求的不是世界领先的目标；有人说它没有选择信息业是决策失误，但从整个来说它的前沿产业都还是可以的，它的结构足以使它成为相当强的现代化国家。

苏联也有相似的特点。列宁一取得成功，就提出要实现全国电气化。斯大林也知道工业化的作用，知道第一部类要优先发展，在这个阶段上他没犯糊涂。只是到超过了帝国主义的发展水平，需要追求科技进步和产业结构的新方向的时候，就不清醒了，因为超出了历史遗留给他们的遗产。对历史的东西，很难选一个时点，然后在空间上铺开，把不同的国家拿来比，说出谁那个模式最好。因为起点相差太多。在我们这里，从各利益主体的目标到综合目标的形成，就可看出历史和起点的差别。这个过程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是个很痛苦的历史过程。经过一定的发展过程，你这个综合目标才能比较有全局性，符合国家的

利益。否则的话，今天可能是这方面的利益占上风，明天可能是另外的利益占上风，实际上是权力斗争的结果。58年大跃进时是你们说的都不算数，就我一个人说了算；现在是谁说的都算数。这都没有综合到最有效的、全局上最清醒的方向上。西德战后是一片废墟，但这个废墟是过去很繁荣的经济打烂后的废墟，那些人的脑瓜还在，知道什么叫做现代工业。我们是在自然经济的荒地上，封建王朝的废墟上，留下来的都是秦砖汉瓦。秦砖汉瓦是盖不起大楼的，要有钢筋、水泥、茶色玻璃、铝合金门窗才行。起点不一样，它那个废墟里有钢铁。日本现在是全面为取得世界霸权、与美鼎立而努力，它所有的事情都是为这个做打算的；它为什么能一下就看到下一步往哪走，赶超哪一点，就因为有过去的基础。不论是吉田茂，还是池田，他总是在前人的基础上，不是凭空出现的，没有这个人也会有别的人，总要有人出来把这些思想理得清楚一些。战后从绝对落后发展起来的也有，如台湾、南朝鲜、新加坡等，但典型意义不大。台湾是把大陆上过去有的那一些资本家、工程技术人员和资本、技术信息渠道都弄去了，到台湾去再造了一批产业；另外，还有特殊环境，美国输血等，它很快进入了国际市场。关键是国际市场和先进的东西都在资本主义一边，我们这边很少。南朝鲜、巴西是另外一种情况。对巴西等南美国家，美国一方面是榨取，同时又都是资本主义国家，欠债就欠着吧。

紧运行 A 的弊端应该说明，也要说明在一定时期是不可避免的，是利大于弊的。实际上，从更大范围来看，在紧运行 A 状态下投入产出最合理，是有效果或很有成效的，从宏观目标实现的角度来看是有成效的，效果是比较好的。但能否说成是有效率的？效率多数人还是用在微观上，宏观上资源的充分利用，不等于有效率的利用。是从效率入手，还是从整个目标来概括这

些什么？稳定不能概括成效率，稳定是最基础的，避免大的波动。这一点大家都承认：经济稳定是个单独的目标，又是相当重要的、基本的目标，增长只能在稳定的限度之内。微观的问题不能回避，但我们要说明的是微观的问题只能在这个总的环境下解决，这个环境不能变；微观里有很多文章可做，但不能跳出这个环境。经济不稳定造成微观没法有效率。环境好了微观也有没效率的，北京手表厂环境挺好的，它早该转产、开发新产品了，但它不会，结果趴下了。这个问题不能完全归结为紧运行。紧运行下一是微观有很大文章可做，二是基本资源分配、流向不能跳出这个框子。所有的环节都是买方市场这个很难实现，但在既有买方，又有卖方的环境下，并不是效率问题就无所作为，就必然效率很低。效率低是与我们起点低、素质低相联系的，不能完全归结为紧运行。很多人都是这么认识的，即每个人有效率，整个社会就是有效率的。现在美国人也是这么看，看每个人是不是都在玩命干。这两个有联系，但不能等同。每一个细胞都能无限膨胀、无限增殖，那就是癌了；给一错误的遗传信息，它拼命地长，超出一切约束。癌的最终原因就是失去平衡，最后导致崩溃。

需求中有一部分可能是既可用货币度量，但又不完全用货币度量。如平价材料，从财政来说，这个项目要的我全保了，你如拿到了材料，需求就能全部实现；但如果拿不到，就要再想别的办法。因此，在价值上很难完全反映它的需求。

紧运行与波动、周期有密切关系。我们要从农业国变为工业国，但如果农产品这么涨价，过不了几年就回去了。有的人认为周期是正常的。如现在这个时期，大家都承认要紧缩，但还是增长得挺快，日子还过得去。还有一种意见认为，周期就挺好，周期不可避免；那最简单的结论就是现在的就是好的。从国外

来看，战后不能说完全没有周期，但所有的政策都是反周期的，要“熨平”。

二、关于紧运行的成因

从大的流向看，一个是从制度特征，一个是从生产力状况，然后到需求、供给，这样做分析还是需要的。但对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分析还缺少一个条件。判断特定生产力水平上的制度特征，不对称性只是需求膨胀的可能性，从这一点还难以导出需求膨胀状态。

从对生产关系、生产力做上下对称的分析来看，上面是现实经济运行发展过程中的利益摩擦；下面是产业结构变动轨迹，产业政策，还有赶超压力、生产力的总水平等，至少中间要有个环节，即资源配置，是利益摩擦最后控制了资源配置。

把不对称性引入到对生产方式的分析当中，这比过去往前推了一步，深化了一步。我们讲紧运行，或者讲初级阶段，或者说我们现实的社会主义经济，总之对社会主义社会生产方式中的矛盾可以讲出来了。关键就是存在着利益矛盾，由于利益边界不清导致的矛盾和问题。

在现在这种生产力水平下，资源配置有很大的困难。中国的起点很低，很多现代化的东西不是重新配置的问题，而是没有，另一方面就是利益的格局、生产关系的格局导致的配置的困难。这两个困难，导致资源的高效组合是相当难的。你要是只与很低的社会目标比，这种配置可能已经够了；但你要按赶超的目标发展，资源的配置会非常困难。对于利益配置结构，合理是指赶超目标，不合理是指现存利益结构关系不清导致多个均衡点，而不是唯一均衡点。这种不合理状态本身虽然有多个均衡

点，但其中可能只有一个均衡点是对需求总体效益有较高约束的，偏离这一点，不论是怎样配置、均衡，似乎都是趋于需求扩张的，或者说是具有盲目性的。资本主义经济好象是在一个凹形的半球体里运动，转来转去是趋向底部的均衡点；社会主义经济是在一个凸起的球上运动，很容易偏离顶部的最佳均衡点，而在其它点上，总是要比这个均衡点上的需求更大，导致很容易偏离这个均衡点的是利益关系。因为这个均衡点不是建立在生产力高水平上。它必须建立在人们的一定认识上才行，如前面提到的日本、西德战后的发展，它们之所以能够找到那个合理的均衡点，不是自然摩擦的结果，而是一种主动的、有效的指导的结果。利益的均衡在我们现阶段还缺少与资源配置的一致性。因为咱们现在生产力水平是很低的，又在赶超发展，它本身是动态变化的；你要让利益变动跟上这个动态变化，在每一点上都是合理的，这是不太可能的。利益配置一定是要相对稳定的，至少它的方式、规范是要相对稳定的。又要稳定，又要求均衡点追随生产力的发展过程，均衡点又要跟着走，这是很难的。这个过程似乎是这条逻辑线比较深层的，能够把它串起来的内在关系。

与西方相比，我们从利益配置导致资源配置的合理有更大的困难。我们的利益主体在产业中是高度结构化的。在产业结构里形成的利益主体，在行业间还是不可替代的；有生产初级产品的企业，有生产石油的，有生产机床、汽车的，在这一点上是不可替代的。但资本家可以一下从这个行业把资金转移到另一个行业，从这一点来说，它又是同质的，流动性是很强的。我们现在的利益主体的流动性是很差的。边界不清楚，导致各利益主体在资源配置中争夺资源，这是紧运行下资源配置的基本流动方式。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源的流动方式是另一种，而我们这基本上是靠几个利益主体争夺资源，最后实现利益配置。当然

预，不完全是资源争夺性质的，但从产业部往下，大体上带有争

结构均衡，经济稳定，这是相当困难的。只要你不是把利益调节到满足这些点的话，最后准要出底漏，因为这点资源稍有配置不好，必然形成无效供给，有时会形成相当多的无效供给。“大跃进”时，那么多的粮食资源吃光了，人力资源用在炼废铁上；搞小高炉，资源配置一下就导致很大程度上的不合理。在这种条件下形成紧运行状态，造成经济震荡是非常容易的。多数情况下，我们往往不是均衡在合适的那一点上。相对来看，我们现在还处在一个自然发展过程；看起来好象总是有相当明确的目标，但如果您的目标对资源配置的指导作用不合理，这种目标本身最终并不表现为历史的、综合的力量，仍然表现为一种自发的、分散的力量。从这样的角度看，不论是初级阶段的成熟，还是讲发达的社会主义的实现，转变点似乎在于供给与需求的一致，真正消除了原有的低水平上的矛盾。从运行层次来看，转变点应以这一点作为社会成熟的标志。

低层次生产力水平上，动力机制与财产关系很密切；这在农业上表现得很清楚，一包就行了。财产关系一清，动力机制就清楚了，资源配置也合理了。但在高层次上好象不是这样。有人最近从日本回来也讲，现在股东对企业经营根本不关心，不行就把股票抛出卖了，股东的作用在经营过程中没什么体现。动力机制在高层次上与财产关系不那么直接联系，中间有很多环节。现在有人主张成立资产部，资产部对谁都膨胀这一点，多少可以说句话，但这并不说明财产关系是清楚的，达不到资本主义条件下的那种清楚。财产关系的清，对于社会化程度高，生产力水平高，资源组合复杂程度高，对这种层次上的产业的资源配置到底有多大作用？似乎也在弱化。由于弱化，也会导致一些边界不清的东西。是不是可以说，边界不清是社会化程度高的大产业的一种特征，平均利润率的作用范围会越来越小。

不同的社会，都能形成一系列运行主体，但对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其含义是很不同的。社会主义运行主体的独立追求，特别以财力为目标，本身立足于不同质的社会结构的位置当中，但又追求同一个东西，所以总量膨胀就从这种追求中出现了；如果是从不同层次上追求不同的东西，好象可以有不同的结果。我们的利益与资本主义很不同，这个利益很难动，每一个主体实际上都是承担一定的社会职能的位置，这样它的质就不同，立足点就不同，追求的目标就不同。原来老说不清，其实不清也是一种清，是一种状态；科尔内的思路是要硬化，清了就硬化了。问题在于，在什么层次上清，可以更好地带动资源配置，什么层次上清没有太大的实际意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社会分工被产品化了，这个生产环节和下一个生产环节，最终是通过商品链条连起来的，相互之间的社会联系是没有一个代表者，没有一个人格化的东西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有了代表者，有个条条在那里分配物资，管这个行业的发展，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清，它是以社会产业结构不清，在财产关系中没有生产力的资源配置的结构相联系的，股票资金的投向完全取决于利润，它是一个自然的均衡过程，它的社会结构是不清的。我们这些主体，是在社会结构中的人格化代表，承担了社会结构的职能。但是你如果把它深入到很低层次的水平上，这种结构化就没有必要了，就变成障碍了；而在高层次上，产业发展水平很高，在科研、生产、新产品开发很多都要一体化的时候，你说怎么个清法？结构的东西越来越成为社会发展的共性的东西，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克服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无政府状态是对什么而言？就是对结构来说的。对内在的一种产业结构来说，资本主义是无政府的，它的清不考虑结构这一面。这里也有对偶的关系，它是一切都淹没在总量里，而我们的好多东西，都是从结构

化这个角度才能够看得清、说得清的。你在那个位置上，你的利益是什么，你为什么在这个位置上又去追求别的利益？这是怎么回事？镶嵌的说法就很形象地说明了不清，一下摆在那里了，先不说是谁的，反正产出在国民经济的流通中起作用了。贵州建个铝厂，你说应该归省还是归地市，还是归中央，这好象是次要问题。只要产品在全国能平衡下，这点资源最后都能进入生产过程，成为一种投入，而且是很合理的投入就行了，别的好象都无所谓。要不为什么收了放，放了收，能来回变？就是因为多个均衡点都能均衡住。从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这两条逻辑线出来，中间有很多作用点。要说明在低层次上的高结构化，会出现什么弊端。高层次上的低结构化，那就是资本主义的弊端；低层次上的高结构化，就是我们的僵化弊端了。作用点有很多，从这样一个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最后推向运行的运动，似乎轮廓就显都比较清楚了。

公有制在不同的生产力水平下含义完全不同，作用和含义是非常不同的。离开了生产力水平谈公有制是非常困难的。这样，就和过去那种简单地用公有制的概念来解释现实的方法划开了。随着社会的发展，现在有人回头说我们不如清的好；但资本主义也有人说不清也挺好。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各利益主体重合的部分会更多，生产力结构和利益结构的一致点会更多一些；虽然都是高结构化的，边界不清的，但它的作用范围慢慢会一致起来。现在的利益结构与资源配置的结构，范围差得太远了，所以配置的结果总是不好的。从现实的发展看，要求好象是双向的，有一部分是需要清楚一些，有一部分不必那么清楚。但不清楚的那一部分，与现有生产力、资源配置的结构也不一定是那么合适的；都是不清，还可能有这个不清比那个不清好一些，其判别应该用生产力的标准。而生产力的标准是在一定

的社会环境里，从一定的社会格局里判断。

低层次生产力水平下的需求的形成，是向高的那头看齐，是那边移植过来的。这里面很多东西如只是延用马克思分析生产力、生产关系的方法，好象工具不太够。资本主义除了股票之间的利益，还有一种利益，就是我这个生产石油、生产钢铁的企业如果停了，全社会都得趴下；这种利益是谁承担谁占有，是脱离财产关系的利益，是根据运行中的位置取得的。这种利益在资本主义也是有的，但不象财产关系那么清楚。说有不清，好象就是指这部分。就财产关系来说，确实它一直是清的。以财产来实现它们新源的最优配置，是不是还有多大意义？到这点上已经觉得意义不是太大了。所以，西方也有人说我是为社会服务的，也把这种利益拿来做标签。

讲利益问题，要搞清利益依附于什么，是从哪里来的利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利益主体、利益的含义很不相同，利益的来源、支撑点、含义、内容很不一样。利益边界不清的问题，从结构化这一点来说，只要符合生产力要求，应该说就是清楚的，你生产钢板，我生产汽车，从这一点看咱们俩的关系应该说是清楚的；但你是全民所有制，我也是全民所有制，这可能又是不清楚的。但在低层次上就不同了，你种麦子，我也是种麦子，这地要归我，我就好好种；没有一个在社会化经济中的占位问题。利益问题如果不与社会化经济中的占位问题联系起来，就很难说清楚，很难讲它的清与不清的判别标准。你要是总拿所有制关系来说，那不清的怎么也有发展快的？清的也有快有慢，资本主义也有不行的。判别标准不能仅用财产关系的标准。现在人们广泛说的利益，是占有社会财富的利益，而不是在社会化经济中功能的、占位的利益。现在有这种趋势，在低层次上的利益主体，它把在社会经济结构中的占位拿来谋私了，谋取更大范围的东

西；这种倾向是比较清楚的，这导致了很多问题。它依据社会占位的条件，不仅把占位作为生存的条件，而且把占位作为谋取更大利益的手段和出发点，谋取一种泛化的利益，谋取更多的财力和对社会财富的支配权。现在看来，凡是各利益主体扩张自己的需求，都是追求一种收入，追求占有更多的社会财富，但它们的原生点都不是从这一点来的，是从它们的功能点来的。它有独立的追求，是它生存的必要条件，但它还要把更多的东西、可流动性比较强的那一部分纳入到它的利益范围里。

农业这几年的发展，主要是靠价格的作用和生产组织的改变。农业投入是这几年才下降的，在 78 年以前一直是增加得比较快的；除了以农田水利形式的投入，主要是化肥起了作用，还有一部分农机起了作用。有一段时间，人们认为一是国家提价，一是还原为家庭承包，这两条就可以不用化肥，不用机械，可以不要实现产业的升级；华国锋提出 1980 年实现农业机械化，后来大家都当成笑话了。所以，政策的威力现在在人们的心目中仍然是非常强大的，认为可以解决相当多的问题，可以解决农业投入，可以解决下一步的问题。真正认识到农业投入减少的问题，似乎是从 1985 年才开始。1984 年是农业最好的一年，当时矛盾集中在卖粮难，卖猪难；要搞粮食转化，粮食多得不行了；应多吃肉，增加粮食转化，退耕还林，减少粮食种植面积，等等。还林、还牧、还果这个口子一开，现在耕地占用得相当厉害；一是淡水养殖和经济作物，一是盖房子，搞乡镇企业；不但原有的土地资源减少了，而且农民有了新的选择方向，马上釜底抽薪，积极性迅速转移。这个来得之快是人们没想到的，农村的迅速城市化，造成了对农产品需求的急剧增加，而同时它的产出能力又急剧下降。从 1985 年到 87 年，这个过程是非常快的。凡是乡镇企业、经济作物发展快，收入水平、住房改善快的地方，也是只有

工业品、副食品、果品等经济作物，但没有基本农产品的地方。国家的粮食储备在急剧下降，已经到了最低限。现在一年进口粮食 1500 万吨，这还不算各省自进的，都算上，可能有 1700 万吨。从农村来看，在二元经济转化的过程中，需求膨胀是非常容易的，但供给的增加是非常困难的，现在粮食只有增加进口一条路。每年世界市场上约 8 千万吨粮食，如果中国买 1500 万吨，苏联买 1500 万吨，世界市场的价格就会波动。粮食光靠进口显然不行，你有多少外汇？国家把农业变成集约化看来是非常困难的，只能在一些富的地方，人口已经过剩，资金也不缺的地方，其它地方做不到。乡镇企业产值增长很快，但劳动生产率多数很低；现在乡镇企业基本上是靠农贷过日子，靠农贷建立，靠农贷发展，赚了钱自己分光；投入农业、农田的不多。实际上是以这个致富，养农民。不是作为产业环节，而是作为发财手段和财源。乡镇企业应该与农村的种植业、养殖业，与整个农村的产业城市化过程衔接起来，但现在是直接作为获得货币的手段，获得后用于消费。农民现在最大的支出就是盖房子，买耐用消费品也就是彩电、冰箱、洗衣机、收录机等。乡镇企业是在利润导向下，根据产品利润和所需资源的争夺确定产品、安排生产。一个看产出，一个看投入成本。这个投入成本不是钱的成本，而是依靠上级支持，农贷，靠省、市、县在电力、钢材上去帮它划拉，直接把块块这一层的给它；它并不和原有的产业结构做什么衔接，也不和全国的产业衔接。在开始阶段还没有影响大格局，还起到一个补充、竞争的作用，但一旦影响到大格局，明显就没有好处，除了给农民钱以外，没有什么好处。国家从乡镇企业收税是很低的。从这个过程也能看出来，转化中需求增长是非常快的，资源配置是非常难的，这种利益格局对组织资源配置是很不灵的，很不合理的，但对于扩张需求很有效。

三、关于对紧运行的分析和研究

整个研究，从基本的层次来讲，应该是从实证性分析，然后到理论层分析，再到对策性构想的过程。如果说中间加一个趋势预测，可分为四部分；也可以把后边预测和对策两部分合一，这不是现在最困难的。紧迫的还是前面的两部分，即实证性描述、分析，然后达到一定的理论层次的规范，建立逻辑体系并做出验证。这里有这么一个问题，如果从理论映射回来，利益格局和资源配置在各个层次上是个什么关系，或者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结合到底在哪几个点上，怎么表述出来。我总感到如果在实证描述中能够把这个逻辑串进去，那么在实证和逻辑两个方面就都能站住脚了，在实证和理论两个层次都能站住了。这里有这么一个基本的入手点。如果能够从前面说到过的那些点，从一定的理论角度，从实证和理论层次的结合部这点深入进去，可能就能把实证和理论串起来；同时从这个点再推，就能把理论搞得更清楚。现在最缺乏的是象资本论二、三卷那样展开的说明；前面我们已经有了非常抽象的、逻辑上很严密的东西。我们现在应该做的先是从具体到一般。这个具体不是具体到随便抓一点材料就说明一点东西，而是把我们已经形成的理论支撑点深入到实证当中去，从这样一个角度去把握。如果让大家感到这种实证是有很强的说服力的，除了需要一定的内在逻辑体系之外，使得它对一些有理论深度的人有说服力，更重要的是要对整个经济的运行有足够的覆盖面，这样也会有很强的说服力。这个覆盖面，一个是时间上的覆盖，对不同历史时期，对我们经济运转的流程做比较生动的分析；把我们前面已形成的概念都推进去；在每一个描述开始和结束的时候，都要在理论的一

些基本点上有一些呼应；这样形成一个实证性分析，一个一个循环；还有对整个经济空间上的覆盖。如果对时空都能有足够的覆盖面，大家就会觉得说得清楚了。概念要说清楚，又取决于我们对实证材料串起来的过程。如果能够真正把实际运行过程，把人们感受最深的一些点，都用这些概念串起来，而且在每一点上这些概念都经得起推敲的话，那么这个概念看来就推敲清楚了。概念的深入和完整，只能靠实证分析的进一步深入。

还有一个是方法问题。这个问题看来比较困难。我们借助于图表、数字，或形象比喻，单用哪一个都很难把握最全面的情况。你看马克思后来也不是单独依靠一种工具就能描述清楚，好象也是各种工具都用。在研究当中，对于不同概念，在概念发展和形成当中，在它还处于一个变动和实际验证的过程中时，需要注意两个方面：一是善于从现实角度，善于从哲学角度，概括出一些它变动的本质特征，概括出它变动的矛盾运动的特征来，以此作为我们深化概念的一些分析线索；另一方面，对概念本身的完善，似乎不能搞成这种非此即彼的东西，概念的完善，在基本的质弄清楚这一点上，可以是非此即彼的，除此之外，这些概念之间的相互关系一定是要在动态当中经得起检验的；在完善概念的过程中，需要做很多这种理论上的修饰。马克思实际上是从后往前思考的。他是先在《共产党宣言》中，对整个资本主义的状况已有了看法；再把经济学的历史看过之后，对经济运行也有看法了；然后回过头来用大量时间提炼他的概念。提炼出来之后，他把概念放到资本论的第一部分。放到第一部分对人们理解有好处，人们是从概念，从一般到具体，符合理论的体系。实际上他的工作过程是从后往前，二、三卷的内容考虑得是比较紧的，但后来用很长时间琢磨第一卷，二、三卷长期停留在手稿上，他是这么一个过程。我们看来也得有这么个过程，先把实证

这一部分说得更象、更清晰，覆盖面更宽一些，让很多在现实工作中对宏观问题朦胧的人，一看也能觉得提高了，让大多数人找到一个入手点，能够顺着这个点去考虑。科尔内之所以比前面的奥塔·锡克等影响大一些，在于他说得特别象，所以他影响面就宽。因此，描述实证还是我们的重点。可以从我们已有的概念入手，但对运行的各个方面的覆盖面还应宽一些，有行为主体的循环，利益主体再生产的循环，最后落到紧运行再生产的循环，矛盾过程再生产的循环。这一系列问题，实际是从理论角度分析，但又能够把现实中的各方面都覆盖过来。在讨论中，对紧运行状态描述这一部分大家似乎没什么争论，但我觉得这部分正是我们需要继续下功夫的。下一步还得对运行状况做更多的描述，对现实的运行状况做一些理论的分析、思索，然后再把我们的概念进一步深化、完善。这个工作做扎实了，理论和实证这两方面就都有了。对今后趋势的把握，我们也不是没有入手点，展开是可以比较快的；展开成熟的程度现在不敢说，反正在内容上这部分展开还是比较容易的。现在要做的这一步走完之后，对将来的趋势把握再做出一个纲要式的东西，再把重心移到那上头去，就会好一些。总之，第一步是把前面的内容丰满起来，特别是要把现实运行中的东西尽量多地加进去，使它逐渐丰满起来。这是当前的重点。原来提到的几个理论难点和理论重点，在这里边都有了。这些理论点，现在要把它推到整个实证分析的各个环节上，在每个环节上都反映出来。在验证中，每一部分都要有理论的呼应，在不同部分得出一些比较具体的理论判断，说明这个阶段大体是个什么状况。现在如果先把一般问题写成文字，由于其中很多关节点并没有推敲透，一进入阶段分析就联不过去了。所以，还是要在实证研究中把理论问题再理一遍，然后再看看前面的怎么样。

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特征和改革问题^①

十三大文件的一个理论基本点，是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样一个观点。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点，十三大报告当中作了很多的描述；但其中还有一个理论难点，是大家都觉得需要认真加以探讨的，就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社会主义制度或者说社会主义经济（这是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最基本的内在矛盾是什么？这个问题过去已讨论了很长时间。一九五三年斯大林在《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里就提出与这个问题有关的看法；到一九五六年我们党的“八大”，谈了“先进的生产关系与落后的生产力的问题”，后来，党的十二大又提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这样一个矛盾。最近，看到上海理论界对这个问题又进行了讨论。有的同志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矛盾，是生产社会化的低水平和我们现在公有制的发展程度之间的矛盾，即公有制的发展程度超过了我们社会生产、经济社会化实际达到的水平。这个提法和党的“八大”的提法有些接近的地方，有些实际的现实内容。据此提出一

① 本文写于 1987 年 12 月。

个对策，认为我们在生产方式上要改变过去那种简单集中、高度统一的公有制的形式，形成多元化公有制的形式。这样一个新的理论概括和提法，是有新意的，也是可以进一步讨论的。换个角度可以回到一些基本理论出发点上，结合现实来看这个问题。从马克思最早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来看，他是把资本主义制度生产方式分解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方面，综合成对生产方式的分析。这样一种分析思路，一种基本方法是值得借鉴的。从我国将近四十年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现实状况来看，都是在这样一个框架当中前进的。在这个前进过程当中却呈现两种不同发展状态。很明显，我们是和资本主义制度不同的，对这些明显差别这些年已经讨论得相当多了。另一方面，在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在五十年代初期，波兰的学者对社会主义制度下新的经济模式进行了讨论，这个问题四十年代就开始提出来了，到“布拉格之春”之后理论上又活跃了一段，奥塔·西克等人谈出一些新想法。在1970年前后，出现了对于整个社会主义经济的现实描述，匈牙利的科尔内作了短缺经济学的分析。科尔内的分析现在引起了人们的很大兴趣，同时也引起了广泛的争论。我们也曾经感到他这篇著作里对现实的生动描述是非常吸引人的，但是又感觉他的理论分析层次还很不够，他的后期理论倾向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身如何进一步完善，而是倾向于用私有制的一种方式解决公有制下这个矛盾。大家觉得这种思路并不是很清楚，并不很可取。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与一些同志交换了意见，觉得可以考虑从生产力、生产方式这个基本出发点，把前面各种讨论做一个重新的回顾。

我们可以回顾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的程度。大家知道，我们现在处在一种可以概括为“二元经济”的发展阶段，就广大农村地区来看，仍处在一种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的低水平商品经

济程度上；低水平商品经济并不等于它不是商品经济；这也是有很悠久历史的。另一方面，我们已经建立了一个现代化、社会化、有相当规模的现代经济体系。从原材料生产加工工业，到出口，到它的金融体系，整个是一个现代化的结构。这样两种经济结构并存、两种经济环境并存是我们当前的一个基本现实。在这一点上，“二元”实际上是两种具有不同质的规定性的经济层次。这种状况下的发展方式必然要经历一种转换，这个转换过程中有非常多的困难。我们第一个要求是在三十几年经济发展当中，有一个在自然经济基础上，适当集中的一定资源，以支持现代化经济发展。现代化经济本身会创造出很多财富并越来越成为整个国民经济主要组成部份。但是它仍然需要不断的再发展，需要积累，不能停滞。这是我们国家落后、我们在下个世纪中叶要赶上中等发达国家这样一个总的战略目标所决定的。同时我们又不能破坏不同生产力水平上的生产本身的运行机制，谁要破坏了它，谁要不尊重农村经济的低水平的商品经济发展特点，就要吃大苦头。过去搞得没有粮食吃，没有副食吃。现在，虽然也有意见，但现在是高层次，性质不同，比过去生产水平高多了。所以在这样既存在两种不同性质的经济结构，同时又存在一个经济结构不断向前延伸和推移发展的过程中，我们的所有生产要素是处在不断变更过程中的，生产的基本性质、产业的结构是在不断变化的。我们发展生产的基本要素也在不断地变动。首先我们的劳动力不断从农业当中释放出来。释放太慢，我们整个现代化经济没有劳动力来源；释放太快，现代化经济又吸收不了这么多劳动力，会造成新的问题。我们现在乡镇企业的发展为这个问题指出了一条有中国特点的道路。我们的能源、交通、初级产品和基础设施，再加上我们相应的一些其它的要素，包括资金及其它固定资产，它们的组合就必须适应这样

一个迅速变动和向前推移变化的环境。这个变化带来一个很大困难，很难实现马克思当时所说的在高度发展的社会化经济中，依靠准确实现的计划就可以实现经济完全合理的、高效率的运转。我们现在，在各个方面都是处在不断的向前推移，不断的滚动，不断演化过程中。资源的有效组合，做到“有效”非常困难，因为有效的标准不同。在低层次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及在城市当中对小型商业服务业搞租赁，就是适应于资源优化组合的；但在高层次的现代化工业当中，显然是应该有另外一种组合，这种组合当然不是一种简单的行政经济，而应该是在运行主体利益逐渐地经济化、商品化的基础之上，实现有计划的、协调一致的优化组合。这样一种不同层次的资源组合方式，造成了大量社会的以及生产内部本身客观存在的摩擦；摩擦本身就是大量消耗资源，摩擦还可能造成一种新的波动，这就是整个经济的运行中可能出现新的起伏，这个起伏可能造成经济的周期性震荡，起码是波动；这将会对经济造成更大困难。我们经济发展当中经历几次大的波动都是这种经济上的起伏引起的。

在我们这样一个落后的国家，同时又有一定的现代化的经济，并且又有着在下世纪中赶上中等发达程度国家这样一个长远目标，又是在公有制条件下运用经济的、社会的、法律的、行政的各种方式对资源进行组合，这就造成了很大困难。我们现在深受资源组合困难的困扰。从生产力发展这一方面来看，我们的供给能力的增加受到很大限制。这里又可分为几个层次：一种是基本上不可避免的，比如说我们国家耕地有限、人口多，农产品不可能做到象世界农业发达国家那样，人均两千斤、三千斤粮食。另外，还缺少一些资源，比如说北方缺水，北京就缺水。这些都是我们资源有效组合不可超越的物质条件。还有一些是由于人们对于社会主义制度的误解。这很难归罪于哪一个人非

要把社会主义搞成一个不好的制度。比如说大家现在都批评斯大林当初的一些僵化的作法，但他有他所处的历史条件。在资本主义包围下，他必须首先把国家的国防力量、基础重工业建设起来，才能保存住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是历史。当然他后来基于这一点，没有理解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内在的更大的潜力和活力。

由于人们的认识往往落后于经济发展的现实，又造成了一些人为的困难，造成了在资源组合上新的困难，如：条块分割，部门所有，大锅饭，预算约束软化，以及其它方面的约束软化，消费约束软化，金融约束软化，便产生一系列的矛盾和问题。这些都是由于我们在体制上还不适应于这样一个迅速变化着的经济的要求。十三大提出要把发展生产力作为唯一的标准，这对于我们考虑各方面的问题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出发点。比如北京，曾经把各种各样的小商小贩统统搞掉了，最极端的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商业网点搞得非常少，近几年，商业网点增加得很快，现在北京的餐馆已接近一万，其中属于国营的大点也就是一千多，不到两千；绝大部分是集体的或个体的餐馆，这说明它有强大的生命力，说明资源组合在这个层次上就是以这种方式最合适。“客观”是检验我们各种工作的最好标准。我们既有很大程度上处在原始积累发展过程这样一个特征；又有一些向着高层次的产业发展的特征。十三大报告把教育、科学技术的发展摆在十分重要的地位。我们作为一个向着小康水平发展、同时又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国，不可能离开先进的科学技术，我们除了有卫星上天，有“两弹”爆炸之外，还要在产业当中，在社会发展当中，充分地把科学技术的能量、把人才的作用释放出来，成为整个产业发展的后备支柱。这些方面的要求都造成我们资源组合的广泛性和多样化，它的目标和模式都不可能是一样的，它必

须是在不同的场合、时间、地点和不同的行业、不同的阶段，都有不同的含义和特定的内容。由于我们对这个特点和性质在认识上有落后的方面，也造成了我们资源优化组合的困难。我们很多企业效益低，也反映了我们资源组合能力不强。

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生产力发展方面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说在广谱的生产力的不同层次上，我们还没有学会以一种广谱的高效率的方式把要素组合起来；或者说我们的生产力本身还没有形成一个能够自己顺利发展的机制，这种机制正在出现，但还并没有最终形成，构成它的良性循环。这在各个方面都可以看到：我们有大量的财政补贴，我们出口商品结构中，初级产品、低加工产品占绝大部分，进口又是高技术的散件和我们短缺的资源，发展中国家所具有的不良循环在我国都有。我们对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找到一种优化组合方式，怎样使得它能够形成一种运转机制这个问题还在探索之中。

从生产方式方面看，我们可以发现社会主义制度下经常形成需求的迅速膨胀。在公有制条件下，所有的部门、所有的地区、所有的行业、所有的企业，都认为“我”是公有制，什么都有我一份，你有的我也得有。实际上在我们现实的生产力水平上，“公有”只是一种间接的形式，并不能每个人都做到这点；我们生产的社会化水平还没有为这种直接占有提供它客观的物质条件。这种直接占有和对整个经济生活的直接干预，在高水平的经济发展当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一些了。比如说在高度信息化、社会化的经济当中，每一个生产环节或者社会生活环节当中的人，他对整个社会都是处在一种不可缺少的地位上；他们之间的独立性大大的被削弱，相互的依存性大大增强。这种社会化分工的高层次水平在我们这儿还没有普遍达到，但是确有一部分产业、特别是大城市的经济当中，已经相当发达；我们一会儿

是乘车难，一会儿买东西难，各种难不断出现，反映了整个城市运行的高度结构化和它的有机构成的高水平，它是依赖于相当大量的物质条件，而不是简单依赖于每个人的主观意愿。我们现在是在一个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水平向社会主义发展的过程当中，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形成了多样化的主体。这种利益主体的多样化是我们当前的一个基本格局。我们企业、行业和地区的发展，都是有它自己的独立追求的，这是不可否认的，是我们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存在的基本前提条件。如果每个人没有自己的追求的话，那就没有商品经济可言了。因为商品经济经过交换实现的是各自的利益，我们在发展中不能跳越这个阶段。在这种利益主体多样化的现实环境中，商品经济是一种必然的选择。这种情况下会出现另一种趋势，就是在这种生产关系的格局下本身包含了我们已经有的一些成熟的方式和不成熟的方式。但是总的倾向是在公有制条件下，所有的利益主体，从消费者到企业到部门到地区到行业，大家都提出发展自己，提出自己的更高的要求。而这些要求，由于我们的起点低，由于我们存在着与国外的巨大反差而造成一种攀比效应。由于我们在下世纪还有一个赶超，达到中等发达程度的目标，所以大家都希望自己的生活水平、自己部门的经济、自己地区的经济、自己企业的发展能够有更快的变化；而对于客观的约束条件感受并不深。这种状况造成了我们的需求增长往往超过了供给增长。

所以从初级阶段基本的生产方式出发，我们可以沿着两个方向作进一步的深入探索，一个是前面谈到的生产力发展过程及其特点。一个是它的生产关系方面、它怎么样通过各个利益主体之间运动摩擦和它们的相互作用，实现社会再生产的均衡。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完全是靠利润均衡；全社会的再生产、市场平衡是价格平衡，全社会的平衡是平均利润率的平衡。在我们

当前的条件下，均衡有它的特殊内容，即往往是一种利益摩擦的均衡。在这种均衡下，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会对我们的资源组合产生不利的效应，而对需求的迅速扩张、叠加、互相攀比形成一个同向的增长趋势。从初级阶段我们所处的现实状况来讲，都存在这样两方面的特点，这两个方面的特点可以，也应该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分析方法出发，找到它发展的线索。从生产力、生产关系这样一种基本的出发点，结合我们当前的现实，可以进一步对社会主义社会和当前社会主义经济当中所存在的现实矛盾，作出一些比较实事求是的分析和判断。从对初级阶段的认识来说，这个问题是一个很值得我们深入考虑的问题，这关系到我们今后如何深化改革，我们沿着什么方向发展，我们应着重解决什么问题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社会主义国家都在改革，苏联把提高劳动生产力、科技进步作为改革原来体制弊端的一个出发点。我们是把克服大锅饭，调动职工积极性，进一步释放广大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做为出发点；这确实是我国的国情所决定的，我们不可能跳越这个阶段。但是也应该考虑，对于我们的经济发展来说，也将会遇到一些新的问题。对于初级阶段的认识，主要应该从我们国家的实际而不是更多的去比其他国家的一些特点，更不要去比一些发达国家的特点。

关于经济体制改革，也应从我们的现实出发，要考虑到我们现在经济运行中的一些问题和现实状况。当前的经济体制改革中，有很多大家关心的问题，“双轨制”问题是很有特点的一个问题。东欧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到中国考察，都认为中国“双轨制”是失败的，而且都认为是不可理解的、不可设想的。怎么能又有市场信号，又有另一个行政信号？你的红绿灯到底是红灯亮还是绿灯亮？企业接受什么信号？他们认为这是不可理解的。但是，在我们中国现实的条件下，双轨制又是很生动、很现实的。

举个简单的例子，现在还不能取消粮票；人均只有八百斤粮食，取消粮票不行。在我国现实状态下，“双轨制”是互相补充的，而且是互相支持的，是在当前经济发展中不可避免的并有积极作用的，是利大于弊的。我们现在为了保证一些基本工业的发展，采取对一些工业原材料用压低价格和部分调拨办法，这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为我们一些大企业提供一些钢铁、有色金属、化工、塑料等产品。现在企业一方面要求在成品销售上进入价格放开的一轨，但是对于原料的购入又要求是计划调拨的一轨，这反映企业在双轨制当中有他自己明显的偏好，这种行为偏好，是建立在一种客观现实的基础上。当前“双轨制”两个轨都是不可避免的，而且都是起了积极的作用的。我们不能让群众吃不上饭，穿不上衣，保持不了基本的生活水平，这是我们社会主义制度所决定的。保证人们基本的生活条件，这是我们增加生产力诸要素当中最基本的要素。这个搞过头了，就变成了大锅饭；但是如果说基本东西一点都没有了，那就会引起相当多的社会矛盾，会使我们整个社会格局、经济格局出现更大的动荡。同时，我们现在又必须在“双轨制”中计划的这一轨上，把商品经济的等价交换的内容充实进去，把它作为一个基本的内容加以贯彻。在经济结构中所谓上游工业有的不只是工业，实际上有的是产业，农产品可以说是上游的，工业原料也可以说是上游的工业，这些一涨价，下游就要跟着涨，它没有太多的余地。这种状况本身就决定我们“双轨制”当中基本的原材料要以企业能够维持再生产和国家财力所能负担得起的扩大再生产为限度的水平，进行定向流动。这样一轨并不等于简单的都是国家干预，我们要开放生产资料市场，同时又要保证资源向必要的产业流动，是把两个产业方面结合起来。这是我们“双轨制”当中实现定向流动这一轨的基本考虑。但在放开这一轨上，我们是有很多产品的，

这一方面促进了大量的加工工业和一部分农副产品迅速增长发展，比如水产品、水果，这几年有迅速的发展。它基本上依靠了供求价格和价格对资源的调动，效果非常明显。广大人民应该说也是比较满意的。从北京的西瓜来看，群众得到了一定的实惠；虽然价格比以前高一些，也还是能消费得起的。但是，这一轨同样存在一个不能超出我们整个社会承受限度的问题。就是说，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在价格上的协调是有它一定的限度和平衡点的，过分超出这一点，一方面会自动调节，另一方面会带来很大的社会波动。所以“双轨制”本身每一轨都有它自己的矛盾，也都有它自己的发展特点，而它们的相互关系，应该说是既对立，又统一，在相当长的时期，将会成为经济发展的基本格局。这不仅因为它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因为它是有促进作用的。在这个问题上，一些同志看得不够全面，只是一点论，只看到价格调节的充分作用，没有看到在当前我们赶超阶段和落后生产水平下，必须采用一些使生产要素定向流动的办法，以保持我们整个经济、整个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有效发展。举个例子，洗衣机等家用电器大量使用钢板，而我们国家没有那么多的钢板，依靠大量进口；进口了钢板，在国内销售，是采取什么办法呢？是采取国家财政补贴的办法。如果国家不补贴，我们的钢板价格迅速上涨的话，那家用电器和日用工业品价格就会迅速增长。比较活跃的轻工品市场，就会迅速变化，广大人民群众就会无法购买。从而使得人民群众的消费品购买能力下降，市场萎缩，影响生产。因此，“双轨制”本身又是我们商品生产的一个基本支柱。我们希望尽量减少一些盲目或者说是缺乏科学化的、单纯依靠长官意志的行政干预，但是建立在一定科学基础上，特别是对市场的分析预测，在总体规划需要上的一定的政府干预，政府对市场的调控，特别是对于基础的初级资源的调控，是当前我们

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进一步活跃的基本物质条件和社会环境。很难设想，粮食都涨了七、八毛、一块多一斤的时候，大家还能够安心生产？实际上很多发展中国家，还有战后的西德、日本在经济恢复时期，也都很大程度上采取了一定的双轨制办法。日本到现在大米仍然是双轨制，欧洲现在对农产品仍然实行大量补贴，当然和我们的性质不同。我们现在是在资源不足的情况下，保证人民生活最基本的需要和整个经济发展的最基本的需要；他们是为了保持在市场上的竞争格局和维持社会稳定。比如说日本的大米，它为什么要保持日本农民种稻子的最基本收入？因为它也怕世界粮食价格出现大的波动时，国内没有大米生产，造成对国家的政治稳定的影响。欧洲共同体把农业作为整个欧洲共同体财政补贴的最大头，也是出于同样的考虑。他们是为稳定在过剩条件下的生产能力，我们是为了稳定在供给不足条件下的生产，但同样说明了双轨制本身就是商品经济问题中应有之意。商品经济并不就是简单的完全价格平衡的经济，从整个社会讲，它应该是包含了各方面相应的内容。

关于经济体制改革规范化和非规范的问题。在我国情况下只能从现在的基础出发，逐步向规范化发展。而最重要的一点，我们不能把国外的企业运行方式作为我们的运行规范。实际上，我们现在从承包制入手，逐渐向着一些新的经营责任制，如资产责任制、企业经营者招标、企业之间的互相联合等，朝着这样一个多种形式的方向发展，本身就是朝着我们商品经济多元化的规范来发展的。不能用一种东西把所有东西都概括进去，才称之为规范化。多元化的现状决定了我们规范化的内容，必然是多元化的。我们经济体制改革是要同时解决社会主义经济中存在的一些普遍问题，第一个就是总量平衡问题。总量问题将会导致经济的大波动，总量的平衡量是经济发展成熟程度的

一个基本标志。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应该有利于促进我们的企业改革在两个方面深化，一个是有动力，一个是有约束，使得我们能够在总量上调控，企业能被调控。现在有的企业不被调控，也没有手段对它调控，这应该说是不够规范化的。第二个是经济结构的问题。在我国，结构是比较广谱的，不像发达国家。在那里，结构就是科技进步。我们既有科技进步问题，又有经济转化问题，还有地区经济均衡问题，还有各种各样的其它问题。我们这么个国家，结构问题是非常广谱和复杂的。在我们这样一个环境下，在相当多的资源处在短缺的状况下，结构问题和总量问题是紧密相联的。很明显，一些行业的膨胀，比如加工工业、基本建设的投资膨胀，本身就是在结构上的一种失衡。在我们的经济状况下，结构和总量的密切关系比资本主义国家更强，因为我们没有大量社会剩余产品供给结构调整。我们每一个产业结构变化都直接影响到总量，所以更增加了总量平衡的困难。

第三是科技进步的问题。我们从初级产品、农业到现代化的工业都存在科技进步的问题，实际上是结构的另一方面。没有科技进步，就没有明天新的产业结构。不能满足于现在的铺摊子、建厂房、扩大外延，以为这就是产业的合理化；我们必须有相当的财力、物力用在下一代的结构开发和跟踪国际先进水平上，现在这是远远没有做到的。从北京来看，这方面就非常需要加强，因为我们有后劲的产品，有后劲的项目，有后劲的产业支柱都还没有一定的轮廓和规模，这很令人担忧。第四是效益问题。效益问题是我们所有企业当中都存在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动力问题。企业的动力，劳动者的动力，管理者的动力，都是和其它的方面密切关联的。这都关系到我们资源的组合，关系到利益主体的相互关系，它是一个两方面都覆盖的领域。这几个问题应该成为我们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把发展战略和改革相结合的基

本对象。我们是处在一个迅速变动的经济环境当中，国内经济在迅速增长，结构在迅速变化，国际经济环境也在迅速变动。在这样一个多层次、多变化的环境当中，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只能在实践当中一方面摸索经验，一方面从理论上概括提高，加以认识，只能是这样走。社会主义经济建立只有七十多年，资本主义经济已几百年，而它们承认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一种破坏，是很晚才承认的，他们对一些问题的认识是很晚的。马克思写《共产党宣言》把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揭露出来时，资本主义已经经过了很长一段发展历史了；而资本主义的一些决策者们认识这些问题，是到了本世纪三十年代凯恩斯主义产生的时候，到那时才正面承认他们存在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我们只有七十年的历史，而且是在很落后的基础上，在社会迅速变化的环境当中，不能过份要求我们在理论上一定要超前。马克思主义本身是在工业革命导致资本主义发展之后，对资本主义矛盾进行概括；他也是从现实当中认识的。不可能有一种先知先觉的认识，一下子把理论问题都解决了。我们在理论上只能是逐步前进，逐步概括，逐步加深，它本身是在实践当中发展的。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常说：“摸着石头过河”，这个“石头”就是实践，也可以说是基本经验教训。人们加深认识往往是从碰钉子、遇到矛盾和挫折的时候，才会在理论上有更深刻的反思、启发；不可能在事情发生之前，把今后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事情都预测出来。当前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在理论上、实践上的深化，都应该继续沿着“两点论”，而不是“一点论”，沿着注重实际、从现实出发而不是从概念出发，这样一条认识路线。把概念同现实反复作对比，看看这个概念它产生的历史背景是什么样的社会环境，这种概念用在中国，它又有什么特定内容。要做这种艰苦细致的工作。在实际工作者当中，要艰苦细致地坚韧不拔地对改革的方式进行顽强

探索。同时坚持我们当前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不断交流对话。也希望理论工作者更多地到第一线，到工厂、农村、商店、企业当中去，深入考虑，这样才能使我们的经济改革不断发展下去。在理论上做出新的概括是一个长处，但是也应该看到理论还要经过检验，不是说提出来就一定是对的。事先做出一种分析，事后再对它进行检验，符合毛主席《实践论》提出的反复认识的规律，符合辩证唯物主义的要求。在改革当中应该沿着这样 的要求做努力。关于政体改革，当前提的较多的是“党政分开”，“公务员制度”、“干部分类管理”，实行民主协商、社会生活的民主化等，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在政治体制改革当中加快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民主法制建设，特别是社会主义制度下民主的发展。这样民主发展首先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要求；应该说它作为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一个组成部分，首先应该围绕解决社会主义经济基本矛盾发挥作用。在体制转换时期，要形成能够在一种更广泛集中人民群众和广大基层干部智慧的基础上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状态。同时更重要的是对于我们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当中存在的不对称性，即我们的生产力要素组合的有效供给不足和有效需求过强，围绕解决这个矛盾，真正依靠人民群众意志，依靠民主和法制的作用。通过民主促进资源的优化组合，广泛调动人民积极性，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企业内部的管理水平。当前的经理负责制使得企业的管理相对集中，这个相对集中的必要性前提，就是企业的民主管理要有相应的发展；如果没有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的进一步发挥，还是很可能走上瞎指挥道路的。同时，民主化还要有利于制约超出我们国力限制的一些盲目的铺摊子的膨胀。用法律的、用人民群众的、用新闻媒介或其它各样的民主化的方式使我们的经济生活更加公开化，决策才能更加民主。具体地说，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应该对于政府的预算、重大的项目的决策实行更密切的监督，这样才能保证有效益。民主化的监督、党内监督、社会监督是我们搞好经济工作、搞好经济上的重大项目决策的基本前提。我们总说，我们预算约束软化，花钱不受约束，银行票子越发越多，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缺少全国人民的以至全国人民的最高权力机构的有效约束。美国的预算是每年要有政府报告的，而且重大项目要在国会讨论；当然它是为了资本家之间利益的平衡，是你的财团接受这个项目，还是别的财团接受。我们现在是全国人民的共同财富，每年国家两仟亿的财政收入（地方预算外还有一千亿，国家财政集中一千亿），这些钱怎么才能够花得更好？真正的出路就是要让广大的人民群众，让社会各界，让从事理论工作、新闻宣传、文艺工作的同志了解实际情况，这是社会主义民主化的实实在在的内容。让大家知道我们创造的财富到哪里去了。美国人老说，纳税人的义务，纳税人的利益怎么样，我们也可以广人民群众，每个人创造的财富，最后用到哪了？是不是为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用在最合适的地方？是不是用在促进社会主义事业资源的最有效的组合和发展上？在这样的基础上，各种各样的经济手段、法律手段、行政手段，按照民主化的要求结合起来，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一定能够发展得更好更快，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也一定能收到明显的效果。把调控社会矛盾做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真正解决我们在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当中现存的问题，应该是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基本的对象和内容。

紧运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运行的基本特征^①

在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经济中，不论是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建设还是近些年的改革，伴随现实经济运行和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宏观经济关系中经常出现的总需求超过总供给的状况。我国经济当前面临的种种挑战和矛盾无一不与这一特点相联系，在改革和发展方面作出的决策和选择也无一不受到它的影响和制约。紧运行构成了现阶段我国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现实的对象以及阶段的限界，使我们只能在紧运行的格局下，针对紧运行中的矛盾实现发展模式和体制模式的转换。对紧运行中的矛盾如能给予正确认识将会避免改革方面的盲目性，加快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本文着重从我国宏观经济的层次，对紧运行的状态及阶段特征、机理、紧运行深层中的利益主体，紧运行的成因等方面进行讨论，试图为认识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制及其内在规律提供理论线索。

① 本文写于1987年7月。

一、紧运行的基本状态及阶段性特征

1956年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改造的胜利完成，标志着我国经济已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带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性质的我国经济系统，在其几十年的经济发展中必然会影响到支配这一过程的诸多规律的作用，而形成某种特定的经济运行的基本状态。这种状态就是紧运行。

我国现实经济紧运行状态的基本含义是：在现阶段社会主义条件下，为最大限度地利用有限的经济资源，以满足社会成员日益增长的各类需要，而形成的需求超前增长并受到资源约束的经济运行。

社会主义经济中超前增长的总需求，是一个包含相当丰富内涵、并需要重新说明的经济学概念。我们知道，在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中的总需求或“有效需求”，是指购买者在一定价格的条件下对商品、劳务需求的总和，由于这种需求完全是用货币及价格形式反映的，因此也表现为对商品及劳务的总需求价格。很明显，被西方经济学定义过的上述社会总需求概念，是无法直接套用到分析社会主义现实经济运行的。

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中，总需求从其形成到最终实现由于受到各种社会经济条件及社会经济货币化程度的制约，并不仅限于有货币支付能力的需求；就其主要的内容和形式而言，可以划分为有货币支付能力的需求(D_1)，非货币化需求(D_2)，及潜在的现实需求(D_3)等三种基本形态。广义的社会总需求通常是由这三种形态的需求共同组合而成的，即： $\sum D = D_1 + D_2 + D_3$ ，而狭义的社会总需求主要包括 $D_1 + D_2$ 。

现有的宏观经济文献中，对于有货币支付能力的需求已讨论很多了。问题在于，非货币化的需求和潜在的现实需求，只为

人们所隐约地感觉到，有人甚至不承认其存在；同时，截止目前还很难用现有的分析和统计工具给出明确的计量，因而常常有意无意地被忽略。要研究我国社会主义现实经济运行中的总需求，最为关键的，就在于揭示出包含在社会总需求之中的非货币化需求和潜在现实需求，因为这两种形态的需求，构成了运行的重要特点之一。

从现实的考察中，我们发现，非货币化需求(D_n)和潜在的现实需求(D_s)，本质上并不等于经济学中的“一般需要”或“理想需求”。后者只是停留在人们观念之中的某种无法实现的需求欲望，因为它不能影响资源配置，因而并不会直接作用于经济运行和发展。非货币化需求，实际上是总需求中不借助货币来表现而和货币化需求同时存在的需求。在我国经济中，诸种经济指标往往作为这类需求独立存在的外化形式。例如，宏观生产计划和投资计划中形成的某些对短线产品、资源的需求；微观领域中，家庭单位的住房、医疗保险等方面的需求；凡货币不可取代的短线实物和超过个人工资支付能力的福利中的非货币部分，都属于这类需求。潜在的现实需求，它是指包含在总需求中先于货币和价格变动而形成的需求。它可以同时向货币及非货币两种形式转化而实现自身。具体地说，在我国经济中这种需求向货币及非货币需求转化是靠各种攀比，主要是投资攀比和个人收入攀比这种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导向而实现的。这类需求在其转化之前，虽然是由各利益主体生成的，但由于它存在的前提和转化的客观条件，都为现实经济运行所具备，并不断地在国民经济的运转中转化为现实形态，同时由于它最终的调动资源以实现其自身的完整功能，因此它是有别于前述“理想需求”的一种现实需求。这类需求经常地深藏于现实经济运行的幕后，不易被人察觉，而当其释放出来之后，又往往只被宏观经济

操作者们直接地感知。例如，在攀比中形成的对工资、奖金及各项福利的企业和个人需求就是如此。企业福利和职工个人收入需求受市场机制的约束是很弱的，相反，在攀比机制的作用下，使大量潜在的企业及职工的收入需求，先于货币发行、价格变动而存在，甚至可以说，在一定时期内，货币发行、指标分配只是这种攀比中形成的潜在现实需求的作用结果。

构成总需求中的上述三个组成部分之间，存在着一种十分复杂的相互作用、相互转化的关系。在转化的不同阶段，三者之间有不同的关系。借助一个商品化的紧运行的再生产过程的简述，来一步分析这种相互作用及转化的过程，会有助于从动态中更全面地把握总需求概念的丰富内容。对于这种再生产的充分描述，将在本文第二部分进行。在国民经济高涨的启动阶段，或者说投资现象大量发生时，短线的实物缺口往往成为投资的动因。这时潜在的现实需求(D_3)先向(D_2)转化，非货币需求(D_2)处于主导地位。这种非货币需求往往是由潜在的现实需求(D_3)，如攀比冲动直接转化而来的。这种转化带来的巨大压力，会进一步形成和扩大不以价格形式所反映的物资缺口。例如，对短线产品的非货币化需求规模通常是大于对其有货币支付能力的需求即企业自有资金或贷款额度的约束的。以此形成投资高潮所必需的基本物资条件。况且，面对低价的短线产品供给，人们还很容易产生一种类似“货币幻觉”的在投资立项中的扩张冲动，以为能够立很多项，投很多资，搞很多基建活动。但是，实际上，这时形成的总需求规模已超过总供给能力了。在第二阶段，即国民经济高涨的实际运转期间，各类需求在其实现过程中，使货币化需求(D_1)和非货币化需求(D_2)统统地展开。同时，由于短线超负荷使用的短期的聚焦作用，经济开始全面高涨。经济的商品化循环启动之后，就推动非货币化需求(D_2)也

逐渐开始向有货币支付能力的需求转化，从而投资品市场和消费品市场全面活跃。其中长线产品和一系列非短线物资的供求都具有较完整的货币形式，而那些生产短线产品的行业和企业的投入品需求，以及对短线产品本身的购买需求，但非货币化需求，如短线物资的串换和非价格流转，仍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着它特有的功能，与有货币支付能力的需求同步兑现，但范围大大缩小了。其次，经济高涨中工资福利必定要以货币的形式加以显现。总的来说，在这个阶段，非货币化需求 (D_n) 逐步转化为有货币支付能力的需求，社会总需求更多地在货币及价格运动中显露出它本来的面目。在这一进程中，随着社会供给能力的扩大以及各类市场商品可供量的增加，社会总供给在奋力追赶着已形成的超前增长的需求，并可能在一定时点上达到总量的均衡状态。但是，这是一种不能持久的货币均衡。这种基本货币化了的总供求均衡背后，仍保留有大量未被货币化的短线供求关系，甚至可以说，是被这种非货币化的短线所支撑着的。短线资源的过量集中使用，是难以维继的。这种过热的平衡，很快就会消失。那些已被货币化了的商品及劳务的需求，因会以固有的膨胀系数或乘数的方式作用于整个经济，并最终反射到短线上来，构成对短线的巨大压力。因此，其结果是使短线的供求关系进一步变形，绷得越来越紧，以至于支撑不住按照一定比例系数膨胀起来的需求总规模。这种迅速膨胀起来的经济不可能长期地运转下去。这样，整个宏观经济就自然地从“过热”惯性地走向降温和紧缩。于是，依照短线及其它指标实行社会总需求的压缩和各种比例关系的调整就开始了。第三阶段，即宏观经济高涨后的收缩式调整时期，仿佛象给已膨胀过度的气球放气一样，但这个气球已不是计划和项目书构成的，而是以货币形式构成的了。一切后果都基本货币化了，释放出来的货币化需求

在各类市场上“游荡”，深入到经济的每个环节中去。针对总需求与总供给在总量与结构上的这种不对称状况，在调整结构的同时，首先要缓解和消除已膨胀起来并在“游荡”的需求及其对经济的危害。需求的总量压缩时，非货币化需求因失去了短线的支撑而干枯了，转回到潜在的现实需求的隐形中去了，例如项目的推迟等；而后果基本上转化为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当然也有相反的情况）。因此，就要尽可能地将一部分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推迟到下一轮经济循环之中，如国家债券等形式。在这里，我们清楚地看到，大量非货币需求以及相当一部分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又重新转到其最基本的状态，即潜在的现实需求上去了。这种收缩后的状态，往往出现在总量重新实现均衡的时候。这是一种稳定但却同样不能持久的均衡，而大量潜在的待转化的现实需求的存在，又会成为一个新的经济循环的起始点。

借助这一描述，我们可以看到，现阶段我国经济运行中的社会总需求，是存在一系列特有的质的规定性和表现形式的，并不仅指那种真正货币意义上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尽管也包含了这一含义。当然，要准确地全面度量包括前述 D_1 、 D_2 及 D_3 的社会总量需求，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这种被潜在的现实需求所根本制约的既包括货币形态又包括非货币形态的需求，我们姑且称之为“现实需求”。

这种“现实需求”与西方的“有效需求”不同。西方经济学中的“有效需求”实际上是指预期可以给资本家带来丰厚利润的需求，换句话说，这里的“有效”是对资本家利润的“有效”。因此这种需求是利润导向的。在那里是必须能带来利润的需求才是现实有效的需求。而在我们，需求并不以利润所根本决定，而由利益主体的利益导向所决定。不能带来利润的需求也会发挥现实的作用，而不会被遏制。因此，这种总需求与西方的总需求有本

质区别。

当然，我们所使用的供给概念也与西方的不同。我们的供给同样不是完全利润导向，并且用货币形态度量的总供给也不完整。然而供给毕竟是一种物质存在，不象需求还有一部分由非物质的欲望所组成，因而只要将其物的指标辅之以价值指标就比较好度量一些。

总量概念的内容区别于西方经济学，是我们讨论的基本出发点。

显而易见，紧运行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之一，因而它也是以社会化大生产为主体的现代经济运行的基本形式之一。与之相对应的，是现代以资本主义需求约束为特征的经济运行方式。

萌发于社会主义经济初始阶段并持续再生的紧运行，其形成和发展，既不取决于人们的主观愿望而可以随意选择，也并非与现阶段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规定及需要相悖。紧运行是一个纯客观的描述性范畴或经济学概念，它反映并概括的是现阶段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总体状态或常态。因此，紧运行的一般特征，需要在经济运行中的总量关系和结构关系，以及宏观与微观经济的协调方式等三个基本领域中加以描述和分析。

紧运行的第一个基本特征，是经济运行和发展中的社会总量需求始终大于总量供给。换言之，现阶段社会主义经济只能在总供给小于总需求的条件或环境下运行。追溯一下历史就可以发现，从本世纪初出现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以来，经济总量范围的需求超前增长就象影子一样追随着经济的发展；统计数字也表明，自 1952 年以来我国经济生活中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的现象只是个别历史间断点上的偶然特例，任何能唤起的记忆都对这种以总需求大于总供给为基本特征的紧运行并不陌生。

社会总需求以其超过社会总供给的程度，可以形成两种不同的类型：一是总需求略大于总供给。由于它发生在社会经济动态均衡的限度之内，故可视为基本平衡，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紧平衡”。另一种是总需求过度高于总供给，即出现通称的总需求膨胀。上述两种情况在我国历史和现实经济生活中，都曾循环往复地再现，并在一定的条件下相互转化，尽管产生的原因和社会经济效应不同，但都共存于紧运行这一概念的概括之中。

在理论上区分这两种程度不同的总需求超前增长具有重要的意义。社会总需求略超过社会总供给是一个长期存在而无法选择的现实。在这种紧平衡状态下，社会经济运行和发展是具有相当的总体效率和社会效益的。而由总需求过度膨胀导致的宏观总需失衡，对社会经济运行和发展的影响总的说是弊大于利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国民经济的超载运转，会使有形或无形的社会边际成本急剧上升，经济运行效率和发展速度急剧下降，运行主体之间的关系日益紊乱，摩擦加剧，“资源耗竭型”的经济震荡就接踵而至。

紧运行的第二个基本特征，是总需求超前增长条件下的结构性倾斜。宏观供求关系协调的标志是总量及结构的动态均衡。但值得提及的是，在不同的经济制度内，由于作用于总量和结构变动的因素不同，总量与结构的联结方式也不尽相同。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总量变动与结构变动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完全直接联系的，这是因为，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众多的企业、行业在没有社会统一运行目标的前提下完全独立决策，社会总供给（包括供给能力）始终超越总需求的现实压力，导致大量的宏观未配置的资源处于非结构化的过剩状态，也就是说，资源配置重组及经济结构变动，经常是在资源和供给能力过剩的条件下实现的。社会主义经济运行和发展的状态恰恰相反。统一的经

济发展目标，加上超前增长的需求压力，消除了那种宏观未配置资源非结构化的过剩状态，重要的产业、行业及产品结构的变动（特别是重大的结构比例变化）直接或间接地引起总量变动，可以说结构的变动经常的是以总量变动为前提的。紧运行中的结构倾斜主要是就国民经济中各产业、重要产品的供求关系的非均衡而言的。引起结构倾斜的主要原因，是由社会利益主体决定的需求结构和由资源配置决定的供给结构之间存在着难以正常调节的结构偏差。在这种偏差结构中存在着短缺和滞存的系列，无论从基础设施、原燃材料、中间产品到最终产品，还是就同一市场不同品种和质量的产品供求关系，各分量之间总会在不断的磨合中保持一种结构性倾斜的稳态。结构倾斜中的长线，往往是短线集聚或滞存的结果。短线的存在是总量和结构失衡的更根本的原因所在。

需求超前的程度对结构的变动有很大影响。需求超前程度过大时，原来的“长线”受到新的需求压力也会变成“短线”，而另一些大量滞存的长线则会变得更长；由于对短线产品的需求将凭借结构性拉力而增加，因而短线产品将更短。如果总量关系稳定在前述总需求略大于总供给的紧平衡条件下，“长、短线”也会相对稳定，这时，国民经济的重大比例结构比较平衡。

总量与结构之间，也由于短线的有效供给程度不同而相关程度不同。短线的有效供给能力较强时，结构协调好些，对总量偏差的容纳能力强些。反之，短线有效供给能力极差时，总量大体均衡，也会由于无效供给造成局部或全局的震荡。

紧运行的第三个主要特征，是社会经济资源配置过程中宏观层次的紧配置。现代经济运行的资源配置，通常是在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协调中实现的。在西方国家经济中，微观经济单位在资源配置中的计划度和自控能力，明显地高于全社会范

围的组织程度和协调能力,但在平衡利润率规律的作用下,社会资源配置的最终结果则是经常的有效需求不足。相形之下,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状态下的资源配置,却会形成这样一种格局,在宏观领域中,除去必要的社会储备,几乎不存在任何不被分配的闲置资源,而在微观层次上,却时常出现资源和生产能力的紧利用或非紧利用即滞存及有效供给不足,并在总体上使社会总需求大于总供给。这是因为,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机理和基础构造与资本主义经济根本不同。紧运行的深层结构是各行为主体的利益协调和利益配置,各个利益主体往往是通过各种形式的讨价还价达到利益均衡,利益均衡过程中的各种矛盾的摩擦最终会以不同的方式汇集到宏观层次,这个社会化的均衡过程不象资本主义在对抗性利益摩擦中一再地弱化和减少需求,而是协调一致地使需求增长到资源短线的极限,从而造成宏观的紧资源配置。有人总以微观实际生产水平未达到或低于潜在生产能力,来说明社会总需求可能是不足的。实际上,潜在生产能力及无效、低效供给的形成和不断再生,正是这种利益均衡过程的必然产物,所以它的存在恰恰反映了总需求超前增长的现实,是紧运行的微观表现之一。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前后两个阶段中紧运行的具体形式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下述几个方面:

(一) 紧运行的载体不同。在以往的经济系统中,由于产品经济占主导地位,紧运行主要是借助实物运动和实物系统的平衡来实现。改革以后,紧运行摆脱了它初始的实物形态,更多地具有了价值的形态和内容。经济体制改革带动的经济的货币化,本质上是社会利益主体关系的货币化,因而首先是需求的货币化。经济货币化程度的提高,必然导致紧运行载体的双重化,即实物运动与价值运动绝大部分重合,并且在不同的领域中各

自的作用程度又明显不同。既然借助货币才能形成有效需求，同时也必须借助货币的“第一推动力”的作用才能启动整个经济运行，因此，需求超前增长，往往首先反映在对货币本身的追逐，并使之大于流通中必要的交换媒介总量。对货币本身的需求与实物供给规模对交换媒介的客观需要在本质上是不相同的。前后体现着各层次需求主体的原生购买动机和行为的变化程度，它是带有盲目性的引致总供求关系不稳定的内在因素，经常地拉动现实需求并使其超越总供给之上。因而，宏观上看实物系统和价值系统的平衡会经常地处于不对称的状态。

(二) 紧运行的市场表现不同。在改革前期，总量的失衡并不直接表现为价格的升降。已呈现失衡的宏观总量结构也很少能借助价格加以调整，相反，却表现为商品和物资的短缺，而通货膨胀只是以潜在的形式存在。改革以来，由于大量引入市场机制，相当比重的消费品和生产要素的价格已经放开，使紧运行经济网开一面，商品和物资的短缺正逐渐向价格方向转变，准确地说，赤裸裸的实物短缺正逐渐地被难以捉摸的价格波动部分地替代。因此，改革期间的总量失衡，一方面继续以短缺形式出现，另一方面也不断地表现为物价水平的上涨。在我国近 8 年的经济改革中，价格结构变动引起价格总水平上涨的现象几经出现。在一定意义上，它所反映的事实，正是紧运行市场表现形式的转换。

(三) 需求超前增长的范围正在泛化。改革前 30 年，超前增长的需求主要是投资领域的需求超前带动社会总量需求的过度增长，并将短缺效应从要素市场扩散到消费品市场。改革以来，需求的超前增长则表现为投资、消费、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的全面膨胀。其中最明显的是需求超前往往以消费基金增长过快为直接导因，消费需求膨胀成为带动企业短期投资膨胀的直接动

因。

(四)推动需求超前增长的利益主体正在发生变化。社会经济中的各个利益主体及其利益机制，是决定供求关系从而需求超前的最根本的经济力量。改革以前的所有制关系(包括结构和形式)和高度集权的经济管理体制、决定了需求超前增长的主要创造者是中央政府，辅之于地方政府和中央产业部门；体制变动后，原有的主体的功能作用发生了变化，长期隐含、潜在的利益主体以其特有的身份登上经济舞台，企业、个人等都在扮演着重要角色，在创造新的供给能力的同时，创造并推动着宏观总量需求的超前增长。

(五)紧运行的国际环境发生变化。过去我国经济运行基本发生在半封闭的状态下。经济改革结束了原有的封闭状态，带来了国外先进生产力和消费方式的巨大示范作用，推动进出口贸易的规模越来越大，已成为经济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紧运行的国内经济对国外技术、设备和资源的巨大需求，只能通过有限的出口供给能力和国外的过剩市场对接，使紧运行的流程变得更宽、更长。宏观流程的变化，使紧运行条件下的宏观平衡目标也随之变动，也就是国内经济的紧运行正逐步地与国际经济加深相互作用。

(六)紧运行中的经济发展轨迹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里谈的轨迹是广义的，包括产业结构的演变和经济波动的类型。对比双重模式转变前后两个时期，紧运行在经济发展领域具有下述两大特点，1. 由于我国经济始终是二元经济结构，二元经济的转化就成为刻画经济产业结构变动的标志。若以1979年为界，在双重模式转换以前，我国初期工业化的实现是以约束农村经济整体发展和个人消费为条件的，因而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明显地落后于重工业的发展；而改革以来，产业结构的变动又

明显地呈现出后倾化的趋向。第一产业(农业,包括乡办企业)、消费品的加工工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明显加快,第二产业中基础部分增长速度相对降低。这表明以往发展领域的紧运行通过传递主要表现在消费品市场的供不应求上;现今的紧运行又集中反映在基础工业的滞后发展方面。2. 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特征也在变化。双重模式转换前期,我国国民经济在增长中的起伏,主要取决于宏观积累和消费比例、积累和投资的规模效益,以及农业经济的发展状况;变革以来,除上述诸因素仍起作用外,投资和消费的双重膨胀及一定比重的出口,使投资结构、重点投资规模、对外汇市场的依赖等因素的作用进一步提高。经济波动中的“震荡”及冲击波的耗散形式,也由原先狭小的领域扩展到更多的领域;“软着陆”的措施虽改变了缓解的方式,但仍无法根除紧运行中的波动和震荡。

客观的实证性描述超前增长为主要特征的紧运行,纵贯于我国经济的各个发展时期,成为现阶段我国经济运行的常态。它并非象通常议论的那样,只是初期工业化阶段和传统体制下才存在的。因此,紧运行象一根主线使我们可以借此勾划出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全貌,廓清经济变革的现实基础和内在逻辑。

二、紧运行的动态机理

为了深入地把握紧运行,还要从横剖面的角度进行分析。也就是说要考察紧运行的每一个环节是如何联系的,并且紧运行的状态是如何周而复始产生的。

短线制导是紧运行横断面的出发点。我们知道,在我国国民经济中总存在着一些短线。这些短线既可以是产品,也可以

是部门。短线意味着对它的需求大于供给。在完全的市场经济中，这些产品或劳务就会涨价，直到供求平衡为止。而在我们这里，有各种原因使得难以单靠涨价来大幅度地抑制对一些最基础的短线的需求，因为这些需求本身往往是先于价格形成而存在的。这其中涉及到许多重要的考虑，如基本原材料、设施及消费品的价格稳定，企业素质，工业体系的从无到有等等。同样重要的是，更深刻的宏观和微观结构的问题，导致了短线产品在短期内不会因为涨价而马上使供给增加到满足市场需求的程度。当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短线与价格运动的关系也不大相同。在传统体制中，价格对短线来说只有账面的意义。近年来，计划、物资、价格、金融等体制的改革，经济货币化程度的迅速提高，短线产品与价格运动有了更密切的联系。双轨制的价格对短线起了调节作用，特别是对企业地方更为明显，但总的说这种作用并不对称。

首先，货币和价格的需求约束作用虽然大大增加了，但和它作为需求表现的作用相比，在方向上和程度上都显得力量不足。从宏观角度来看，对短线的总量调节作用的直接实物形式越来越多地让位于价格和变形的价格形式（如价格双轨或价格外附加的补偿性投资、贷款等），但短线制导仍保持着其隐蔽的、强有力的核心的支撑作用。

其次，短线的日益货币化强化了其制导作用的范围和能力。这种货币化对短线供给增加的作用虽有改善，但仍比较有限。价格越多地反映需求，就越明显地受有限供给的短线制约，难以形成同步增长的有效供给。

最后，这种明显的不对称性，最关键是因为，劳动者并不是人格化的商品，利益主体带有不可侵犯性和稳固性，制约了价格的有效性。即便是在微观层次，价格对短线存量的调节也远不

够充分。短线产品难以依靠涨价来解决，因而，求大于供这种压力就始终存在。

既然单凭市场价格机制难以调节国民经济中的总量和主要结构关系，那么，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在现实中靠什么来实现呢？短缺就成为一种信号。^①短缺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拉动价格；而在日益商品化的经济中，短缺信号越来越多地采取了价格和货币的形式为自己服务。它表明人们的物质需要在什么方面的强度最大，需要作出投资安排。另外，短缺还往往成为技术创新的导向（虽然，当前这种作用还不大）。如所周知，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创新的动力来自微观层次。而在初级阶段的公有制经济中，微观层次的创新机能尚不健全，宏观创新的动力往往大于微观层次。宏观层次（在相当大程度上也包括微观层次）创新的冲动是与短缺相联系的。往往是由于短缺压力过大，迫使人们创新，重视技术进步。最后，短缺还是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落脚点。在定各系统经济计划的盘子时，以什么为基准呢？财政、信贷、外汇、物资平衡在什么地方呢？当然是短线和由短线引起的一组短缺现象。因为它们本身在约束经济的总规模，在约束着长线的发展，而它们本身的弹性在一定的时点上是较小的，而价值平衡是在这个基础上建立的。

短线的短缺强度难以简单地靠涨价来消除，这一方面是指难以用涨价来压抑需要，另一方面也难以靠涨价来增大供给。那么短线对国民经济的制约如何运动和转化呢？在实践中，我们可以看到，短线，从而短缺的缓解主要靠吸纳。吸纳包括对短线资源和财力的双重吸纳，当然对基础的短线原料是实物形式，对长线产品和整个经济就是以财力形式的吸纳。所谓吸纳，就

^① 与短线相联系的是短缺。短缺是一个比短线更为广泛的概念，短线的集合和运动构成短缺。

是需求的直接扩张和表现，就是不仅通过市场价格机制，而且使用非市场的办法来增大投入要素，从而增加供给，而供给的增加却依资源的有效配置度不同而不同，并不和吸纳程度成比例。在运行中每一个利益主体都有其吸纳的特定方式。除直接的财力吸纳外，一种是政治性动员，使各种要素自愿地投入到短线中来。一种是实物形式为主的财政投资，使要素直接流入到短线中去。一种是降低或压住短线产品所需的要素投入的价格，人为地不使短线产品的帐面成本上升。通过这样一些方式增大供给，中央可以使短缺得到一定的缓解，从而使短缺的制约有所松动。但中央一级的吸纳是有限度的。超过限度，它就要将短缺传导给地方，也就是要块块去背负一定的短缺压力。

块块也有其吸纳的形式。由于它面对市场，它尽可能地从中央和企业吸纳财力和短线资源，以扩大自己的财力，它还可以用行政的办法将生产要素很快组合起来。块块可以用涨价及行政办法（限量配给）压住过大的需求，用货币及非货币的办法增大供给，对市场作出反应；但由于单纯的利润导向会导致资源的无效配置，供给的增加不如需求的吸纳作用大。但在一定程度上也缓解了短缺。

企业也尽可能地以货币形式吸纳资源（投资、贷款）和自己需要的短线物资。由于货币形式并不一定都能实现企业的有效供给，所以它还要采取政治动员和行政命令的方法。除此之外，企业主要靠向职工提供稳定的就业，包括子女的安置，提供各种福利，包括非货币形态的实物、住房等等，从而调动职工的积极性，增大产出。另外，企业在短缺面前还会采取各种形式的产品、技术的替代，来缓解短缺造成的影响。企业所作的所有努力，多数不一定能构成社会性的充分的有效供给，但它作出的吸纳努力却对社会总需求增长起到更大的影响。

通过吸纳，短缺从结构到总量都会有所缓解，从而使受短线制约的经济也得到发展。但吸纳一旦超出各个利益主体的区间和界定，就会引起强烈的社会摩擦，从而导致社会问题。因而当短线制导引起的吸纳达到一定限度时，便将短缺的压力传导给其他的利益主体。所谓传导，就是需求的转移。例如，中央直接背负着自然资源的约束，财政上的困难，生活物资的匮乏，这些压力要传导到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一方面吸纳，缓解一部分压力，同时还要将短缺的压力继续传导。这种传导分为两个方向：一是横向，向其他块块攀比，将吸纳造成摩擦系数拉平；一是纵向，用行政的办法将短缺的压力层层传递，最终将短缺传导给企业和家庭。

企业的短缺传递也是双方向的，一是向家庭，也就是向消费者，这通常的形式是涨价及产品脱销、品种不全、质量不高等等。另一方向是企业之间，通常形式是卖方市场，价外加价，囤积倾向，产品强制替代等等。

条条由于吸纳功能是弱的，所以在运行中它们只起将短缺的压力传导给中央的作用。

短缺经过复杂的传导，整个经济趋于一种特殊的均衡，即各经济单元的吸纳摩擦系数的均衡，即各经济单元的吸纳摩擦系数的均衡。摩擦系数的均衡过程，实际上也是利益与资源的双重配置过程。这即是稳态意义上的紧平衡。摩擦系数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个社会学的问题，其实它的背后是各利益主体的均衡。各利益主体在相互关系中加进了更多的价值因素，但由于这种价值因素远不能反映和调节它们之间的根本利益关系，因而这些价值因素也要转化为摩擦系数来发挥资源配置作用。例如信贷本来是一种价值运动，但决定信贷运动格局的，首先不是利率，而是信贷分配额度，同时利率的影响和范围也逐渐增大。从

更根本的角度来看，是各利益主体在物质生产中资源配置的均衡。如果不均衡，某些利益主体的摩擦系数过高，就说明在物质生产中该主体得到的资源已使其再生产的过程发生困难。这与资本主义的利润的均衡化是相对应的。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源配置是通过利润的平均化来实现，在利益配置的同时，资源也得到一种过剩性配置。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条件下，由于价格本身尚不是完全的经济信号，那么当然也就说不上完全的平均利润导向了。

在改革后，这种吸纳、传导及均衡化的过程进一步货币化了。首先，它强化了吸纳的范围，短线物资为核心的货币形式的财力吸纳越来越具有独立的形态，吸纳作用越来越强。长线产品的市场竞争也被货币形式的财力吸纳所控制。其次，在财力吸纳的利益边界上，吸纳以货币形式转化为财力传导，层层“摊派”和“截流”就是新的货币化的传导的表现。同样在传导中，短线保持了它的制约作用。最后，均衡化的过程也货币化了，摩擦系数也具有相当完整的货币形态，即货币形式的财力的均衡而非平均利润率的均衡，以至人们甚至认为短线在其中看不见了，但实际上，短线仍隐蔽地起着支撑作用，使利益的均衡化过程被短线所左右。

所以，认为在紧运行的平衡过程中完全是实物平衡，而无价格运动，或者说价格运动是无意义和消极的，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当前，货币和价值运动是最积极活跃的，而同时又是一种受制约的活跃，它只是活跃的一端。实物平衡虽然逐步缩小，但没有失去其根本的基础作用，实物平衡从来不可能覆盖国民经济的所有领域。在所有的经济关系中价格是起着信号作用的。但是由于存在短线的非价格摩擦式平衡，因此价值平衡体系就被需求的扩张扭偏到另一方向上去，造成价值平衡的离散、被实物

平衡割断的状态。随着改革的深入及商品中短线的减少和转移，实物平衡逐步退出原有的领域，在最基础的资源和产品中仍保持其基础和支点的作用。社会需求越来越采取价值的表现形式，同时又在相当程度上受到短线的制约。因此，利用价值形式实现总量平衡的作用越来越大，并且日益成为总需求超前增长的力量和表现。但是，总量的价值平衡并不是完全按照平均利润率进行的。因而这是一种不对称的价值运动，价格对需求的约束虽大大强化，但仍小于其对需求的推动作用。一般来说，基础短线产品的交换，是按成本价值和社会承受能力及资源允许的扩大再生产的规模为限进行的（如行业的投入产出包干）。

实践证明，凡是短线资源平衡了，价值形态的平衡是可以达到的，反过来，基础性的短线不平衡了，价值形态是不可能真正平衡的。物资的短缺会扩大生长成为价值形态总需求膨胀。在这种情况下，往往会出现大量的长线提供不了有效供给，而短线却又上不去的并存局面。价值和货币化没有改变紧运行状态本身，而只是改变了紧运行的形式。

由于货币化的吸纳、传导、均衡过程都是不对称的，是需求扩张带动的，而同时形成的有效供给则明显不足，所以短缺的平衡并不是短线彻底、完全的消失，而是短缺常态的恢复，新一轮短线制导又开始了。

紧运行的再生产过程不是简单的重复，而存在短缺的产业传导。资本主义过剩有一个产业自上而下的扩散过程，过剩从消费市场到耐用消费品、机械产品、大型设备、到基础设施。这个传导的中介是价格和金融。而我们的短缺也有一个产业升级的传导过程，但这一过程正好是相反的，是自下而上的，是以短线资源及其货币形式为主的。短缺现象从基础设施到原材料到制成品以及科技及人才等等。这种传导也成为短线带动的价值

和金融形式的产业间的定向传导并且随着短缺的升级，滞存与短缺同时存在于部门、甚至同类产品的现象普遍起来。当前的企业的资金拖欠，就是滞存和短缺的金融表现的新形式。

以上我们描述的是紧运行的常态，即紧平衡状态，在实践中还会出现总需求过度膨胀，以致将某些重要的短线资源耗竭，使社会再生产不能正常进行，而被迫进行调整。这即是紧运行中的失衡状态。我们称之为“资源耗竭型经济震荡”。这种震荡与经济政策是有关联的。当我们宏观层次的建设盘子定的过大，当我们对中观(块块)和微观的投资饥渴、消费饥渴过分迁就，即财力和短线资源的吸纳超出本身稳定的极限时，当我们在价值平衡与实物平衡的关系上过于注重价值平衡对总量的调节时，非价格运行的短线就可能被强制性挤压，这种竭泽而渔的作法会使本来就很短的某类战略物资结构性失调，增长骤然下降。我们在粮食、能源、外汇等物资上都出现过这类事情。跟在这种震荡之后的是宏观上的紧缩和结构调整。

三、紧运行中深层的利益主体

考察我国的经济运行机制，在分析紧运行的机理时，我们已谈到存在着不同的利益主体。这些利益主体的发育、生成既是紧运行的结果，又反过来构成紧运行的成因。社会主义经济运行也可以说就是这些利益主体之间关系的动态表现，或者说，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是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深层结构。

目前，在众多的讨论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文章中很少涉及利益主体问题，不少人喜欢将运行问题脱离开经济制度的本质，而简单化地当作技术和操作问题来处理，只谈论供给与需求，生产与实现。这是不够的。要想将运行的研究引向深入，就必然

涉及到运行中的利益主体问题。

所谓主体是相对于经济运行中的无生命、无人格的客体而言的。主体是有其人格力量的。在我国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还存在着利益主体，即不同利益的人格化代表。我们现在的公有制仍然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公有制，还不是经典作家笔下理想状态的公有制。马克思曾专门论述过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之间的区别。所有权与占有权常常会发生分离，而社会生产力水平比较低的情况下，这种分离会造成很大的利益差别。当存在着三大差别，旧式分工时，人们在劳动方式上的差别很大。而且由于交通、地域的限制，沟通又很困难，尽管公有制可以涵盖很广的面积和人口，但却不能消除人们由于生产力所限而造成巨大的利益差异。

这种公有制中所有与占有之间差别所造成利益差异是我国经济运行中不同利益主体的形成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利益差异还有许多的演化形态。从哲学角度看，每个个体之间都可能存在利益差异，但从国民经济运行的角度看，有许多差异都是可以抽象掉的，真正有意义的是从运行角度执行不同功能的占有群体所形成的利益差异，这是不能、也不应该抽象掉的，而恰恰应当是我们重点研究的对象。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我国国民经济运行中的利益主体。

我们的利益主体与资本主义的不同。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利益主体之间的不同表现在所有权上，不同的所有者当然是不同的利益主体。在那里，利益差别主要采取不相容的对抗形式。我们这里的不同利益主体从根本上来讲利益是一致的，只是在共同所有的基础上的不同利益主体。这样，表现出来的是利益的重合和交叉。例如，国家和居民，地方政府和企业在很多方面的利益完全是交织在一起的。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在我国的国

民经济运行中确实有着不同功能的实体，它们有着自己独立的追求。对于研究运行来说，更为重要的是要描述和揭示这种独立的追求，描述各主体的利益。以往我们更多地谈论社会主义条件下利益的一致性，而较少研究利益差异。现在，只有考察这种不同利益主体的独立追求，才能从动态的角度把握国民经济的运行。

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还很年轻，其中的诸利益主体的发育，生成有一个过程。有的主体的生成，更多地是基于原有生产力和社会环境。在生产力的进步中，现有的主体会不断地失去和重新寻找自己生存的物质和社会条件。这种演变是一种历史的过程，它目前仍在继续。这就要求我们首先要采取实证的方法，将现实中交织着的利益主体进行拨离。所谓拨离即是将诸利益主体的互不重合的部分，或者说其独立的追求从它们的重合部分中区分开来，很清晰地描述出各利益主体的利益边界。

经过研究，我们认为在我国的国民经济运行中可以拨离出5个最有影响的利益主体。这5个利益主体分别是：国家、家庭（居民）、企业、块块（地方政府）和条条（中央产业部）。

这5个利益主体并不是平列的，它们可以分为两类，其中一类为原生主体，另一类为次生主体。原生主体，是指先于或与制度同时产生的，并决定着其它主体的生成和发育的主体。

家庭，更确切地说，居民是第一个原生主体。它是先于社会主义运行机制而存在的。在现实中它是最终消费者和劳动的提供者。在我们的经济运行中，国家是另一个原生主体。这与资本主义不同。我们的国家不是外在于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社会主义的经济运行恰恰是靠它来构造成的。公有制给劳动者和居民以天生的平等地位，而平等导致的攀比是消费需求在宏观和微观上同步增长的基本原因，同时宏观和微观的一系列物质

和社会的制约使劳动者的有效供给能力不足。国家考虑各方的长远利益，受到发展的全方位压力，是一切需求的最后集中者，赶超即是集中的结果。国家只能调节而不能消灭现存的利益配置。国家和家庭这两个利益主体在运行中发挥着不同的功能，而且是不可替代的。国家更多地代表着长远利益，家庭更多地代表着近期利益；国家体现着物化劳动的力量，家庭体现着活劳动的力量。二者相反相成，互为补充。

在我们这样一个拥有巨大人口的落后的大国中，要推进现代化经济的迅速发展，原生主体就会现实地外化成一系列次生主体，作为和谐运转的中介。

地方政府是一个重要的次生主体。它之所以生成是有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首先，由于国家重点赶超，工业进程中许多自然过程，或者说与军、重工业关系不密的民用工业的发展，中央政府无力顾及。第二，我们的军重工业并不是从我国自然经济的母体中成长起来的，而是用人为的力量嵌入到自然经济中去的。我们可将此称为“镶嵌型经济”。先进的产品经济不均匀地分布在 960 万平方公里的自然经济的土地上，在其结合部需要具体的社会管理。第三，中央政府不可能完全替地方政府解决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缓冲就业压力。因此，地方政府就必然作为一个经济主体来参与运行。地方政府背负着巨大的社会发展压力，就使它更多地成为中国巨大人口和分散的地域经济的人格化表现。它更多地表现为社会历史和现实的结合。因此，地方政府就表现出它特殊的追求。由于它面对区域经济中社会化商品循环的市场，所以与中央相比，它表现出对价值形态更大的关心，往往对创办尽管产出长线产品然而利大的企业有更大的热情，同时它对与城市化、工业就业相联系的工业化过程有很大的积极性。为此它就要向国家要投资、要项目等等。发展的压

力转化为地区间攀比的压力，最终把向上和向下扩张的需求转化为财力和短线的吸纳。而这些资源却不一定能形成同步的有效供给。求大于供的情况普遍存在。

· 条条；或者说中央产业部是运行中的又一个次生主体，中央政府把重点赶超中的高技术战略物资的生产功能交给产业部，并使其人格化。它更多地是先进的物质生产力和现实的结合。这种条条也有自己独特的追求。与块块相比，由于肩负的社会经济责任的不同，它们一般对价值形态的剩余冲动不大，而是追求该部门产品的数量、质量、技术况态，为此它也要争投资，争该部门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而这种追求，却并不和它的供给能力对称，往往供给能力是小的。

企业是运行的另一次生主体。运行中必须有一个环节，将劳动恰当地组织起来，进行生产，这就是企业。尽管我国的企业也行政化，但不等同于行政机关。我国的企业是行政、社会、经济的综合体，并且不是单纯的相加，而是一种有机的混生体，从而完成各级政府交给它的任务。企业要与自然界进行物质交换这一特殊本质，使得企业产生了自己独特的追求，即使是在最传统的条件下，企业也并不真象表现上看起来那样是一个算盘珠。关于企业如何与上级讨价还价，如何使预算来约束软化，国内外的文献已做了大量的充分的描述。目前，企业作为一个独立的主体，有几个追求是很突出的。首先，它追求行政升级，这样会使企业各方面都得到改善。其次，它追求获得各种宽松的工作条件，如争投资、信贷、原料、外汇等等。最后，它还追求职工们的福利、收入的提高。总之，它追求最小的社会、政治、经济的投入、换取最大的综合的成果。它对消费和投资的追求，仍远远超出它所能对社会提供的有效供给。

这 5 个利益主体并不是一下子形成的，而是有一个历史过

程。条条、块块开始都不过是国家(中央)的一部分职能的分解，演变使它们有了自己的独立追求。这5个主体之间的利益差异是相对固定的，不容易互相换位的。与此相反的是，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利益主体即人格化的资本是随时准备吃掉别人或可能被人吃掉的。例如，地方政府之间的占有差异是不容易互换的，条条和块块的差异也是很难转变的，这就使它们各自更加不可替代。当然目前这些主体还都未能最后定型，还在不断变化。但有一点是确定的，它们都以最低的利益损耗来形成更多的需求扩张。在不断创造供给的同时，创造出更大的需求，这就必然导致宏观总体上的需求攀比式的经济增长。

这5个主体构成我国国民经济运行的最主要的部分。它们有着不同的利益追求，这些利益追求恰恰是它们各自不可替代的功能的表现。而运行机制就是由它们之间的差异与统一组成的。利益的差异是运行的动力所在，而利益一致是运行的和谐的基础。

四、紧运行的社会历史成因。

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紧运行的状态取决于很多原因。正因为如此，运用不同的方法从不同的角度解释形成需求超前增长的原因，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有的观点认为，社会主义经济中的需求超前增长，主要是主观原因造成的，特别是长期存在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左”的指导思想导致的。战略方针、经济政策和宏观决策等方面的失误，都会出现不能量力而使经济过热增长的局面，只要端正了指导思想就可以扭转这种局面，消除紧运行。也有的同志，借用科尔奈《短缺经济学》的逻辑，将紧运行与社会主义传统模式联

系起来考察，认为传统经济体制是导致紧运行的根本原因，只要坚持改革，克服传统体制的一系列弊端，就能从根本上克服紧运行，并创造出总供给略大于总需求的环境。还有的意见，试图将紧运行所反映的经济现象同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属性直接联系在一起，认定紧运行不过就是低效率和经济浪费的代名词，要改变社会主义经济中的紧运行状态，唯一的选择就是改变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根基——公有制，否则只能任其存在、滋生和蔓延。对这些观点我们是很难苟同的。

前两种意见虽然触摸到了导致紧运行诸多原因中的个别因素，但是这些因素并不是决定现阶段社会主义经济中持久存在着紧运行的根本原因。同时，我们还应看到，指导思想和决策的失误，是有着深刻的、制度性原因的，甚至实际就是制度原因在主观层次的表现。在公有制下的利益主体的宏观格局中，任何个人的主观偶然性都会被利益人格化的必然性所统一和同化，它们是一个统一体的两面，是表象和本质的关系。因此，正如前面比较分析中论证的，经济体制模式的转换以及避免“左”的思想干扰，只能有助于缓解紧运行的程度，使紧运行的正常状态（总需求略大于总供给的紧平衡）不至于经常地向其非常态（需求膨胀）转化；但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社会主义经济中存在的并保持在一定程度上的紧运行状态。

至于第三种意见，也是很难成立的。它并未注意到紧运行并不是现阶段社会主义经济的污点，而只是一种经济现象，是现实经济运行的一种方式。这种议论在方法论上也存在着缺陷，主要是没有区分现阶段社会主义制度的特殊本质与社会主义经济的一般本质。如此推论，社会主义经济社会象资本主义经济一样在无休止的震荡中自行崩溃。这显然已经违反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逻辑，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站不住脚的。

紧运行作为现阶段我国经济运行的基本特征，只有立足于我国的历史与现实，才能全面而准确地揭示其产生的基本原因。我们认为，从根本上说，紧运行是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历史特征决定的，是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运动规律的必然结果。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是我国的基本国情。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在一定生产方式发展的不同阶段上，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同，生产关系和支配生产关系的规律也就不同。因此，揭示和论证紧运行的社会历史成因，必须从两个相互作用和相互联系的因果链，即社会主义现阶段的制度因素和经济发展阶段因素的结合中进行。从这一基本方法出发，我们认为，作为紧运行充分条件或直接前提的，是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及其具体形式；作为紧运行客观物质基础或必要条件的，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相对落后。

现阶段我国经济的紧运行，是与资本主义中的资源不能充分利用，经济运行经常受到有效需求不足相对应的。因此，也正象资本主义经济运行受到需求的约束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制度一样，解释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中资源的宏观利用总处于高度紧张的紧运行状态，也必须从社会主义公有制自身的发展水平和完善程度，是导致经济紧运行的充分条件和直接前提出发。

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是一大创举。它破天荒地第一次将人民群众从私有制下解放出来，从而使人民群众的消费第一次突破了所有制的限度，使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直接变成了社会经济目标，而不需要剩余价值规律插手其中。公有制对广大社会劳动者的这种解放，必然大大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那种把牛奶倒进海里的用抑制大众需求来实现经济增长的办法不见了。被资本主义压抑良久的人民群众的消费需求骤然

被释放出来，形成一股极大的经济推动力，支撑着年轻的新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另外，由于人民群众基本消费需求得到满足而焕发出来的劳动热情，也成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

但是我国的公有制仍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公有制，是一种尚待完善的公有制。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科学构想中的理想状态的公有制相比，它有很大的不同。首先，它并不是建立在崭新的现代化的大工业的基础上的。新中国建立时我国基本上还是一个农业国，工业总产值还不到国民生产总值的 10%，工业人口还只占总人口的 1.5% 左右。其次，我国的社会主义公有制还达不到单一的全民所有制，而是全民所有、集体所有等多种所有制并存。在生产力落后的大国中建立的公有制，就会演化生长成一系列的利益主体。第三，我国的公有制采取的国家所有制的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作家都论述过，公有制的高级形式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当然这种自由人的联合体是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和三大差别消灭的基础上的。在我们的现阶段，劳动者在生产力和其他方面都还达不到这种自由，公有制的具体体现形式只能是无产阶级的国家作为全体劳动者的正式代表来行使最高所有者的职能。第四，在各种形式的公有制中，也仍然有着所有权与使用权的不一致，以及由于这种不一致而产生的广泛的利益差别。最后，由于上述种种，我国经济绝不是一种纯然的产品经济，而是一种在各利益主体之间有商品货币关系和其他社会关系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在这样一种年轻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中，有一些机制尚待进一步完善。突出的一点就是需求与供给的平衡机制。

任何一种经济制度都存在扩张需求与抑制需求的两种力量。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需求的扩张，曾经是依赖殖民地和战争，而现在主要是靠科技进步、生产力进步本身来推动，而制度在这

里主要是起抑制需求的作用。广大社会成员相当一部分需求欲望在现实收入的事实面前被压抑了，因为其收入是受雇佣劳动制度下剩余价值规律和工资规律的限制，这些规律决定了收入的增长追不上社会总财富的增长。尽管战后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大量干预，但资本主义的需求抑制力总是大于其需求的扩张力量。

在我们这里恰恰相反。社会主义在解放人民群众的需求方面是以往任何的私有制社会不可比拟的。但在需求的抑制方面力量要弱得多。形成了解放需求与促进供给的不对称状况。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满足需求和增加供给之间缺乏高生产力水平和社会化联系的基础，有一种相对的自然分离。这就是需求可能超前或滞后的物质和社会的条件，需求和供给之间内在的联系，只能随着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随之而来的公有制的完善而生长。在经典作家笔下的公有制社会里解放需求的力量比现阶段还大，但那时的需求与现阶段却有很大的不同。在高度发达的公有制社会中人的基本需求的满足已不成问题，劳动不再是谋生手段，需求的满足向更高的层次发展，而高层次的需求本身就是在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基础上产生的，它和增加社会供给能力紧密相联，本身就会产生供给，这是因为人的自我实现最终要在社会劳动中体现出来。需求层次越高，如尊严感、荣誉等与社会劳动就越有直接联系。象我们这样一个落后的国家，劳动者受物质条件、教育程度和社会关系所限，增加供给的能力也有限。人民群众的需求层次、需求水平都很低，需求和供给之间的自然联系很弱。科技进步，生产力的发展，无疑也推动着需求的增长。而制度推动的需求增长，往往不是完全基于生产力水平，是带有盲目性的。这种盲目性表现在几个方面，首先是需求产生的非物质性。经济的很多资源约束对微观、中

观甚至某些宏观方面并不具有社会化感受。其次紧运行的各利益主体对需求的传导和汇集同资源的有效配置能力不对称。最后，资源在利益主体之间摩擦式的均衡配置中，有一部分低效和无效组合而进一步减少有效供给。综合来说，在现阶段我国经济制度内对需求的抑制力是弱的，特别是在微观层次更是缺乏抑制需求的机制，微观层次的需求单向增长的倾向，使得宏观层次倍感需求增长的强大压力，而宏观层次如何能用科学的方法抑制各种盲目增长的需求，将需求很有效地转化为经济动力，从而保证国民经济的正常协调运行，至今仍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上述分析的结论是：虽然不同的发展阶段上，都可能建立公有制经济，但发展阶段越低，公有制及其具体形式的发展和完善的任务就越重。而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还未达到其自身高度发展的时期，社会性供求平衡机制，各经济主体在生产消费方面的自我激励和自我约束机制也就不可能十分健全，这就造成社会解放需求与供给的不对称性越发严重，需求释放的盲目性强，有效供给同步增长的摩擦和困难越大，从而使社会总需求超前增长难以抑制，紧运行也就成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题中应有之义了。公有制的不断完善有赖于物质技术基础的充分发展。只有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进步，才能使社会主义公有制及其全部社会经济关系（包括经济体制和各种社会制度），达到一个崭新的水平和形态，使全社会范围的总需求与总供给在新的物质水平上和相应的社会关系水平上和谐地一致起来，在更高的层次上实现社会资源最优配置和社会成长福利的最大满足。

据此，我们认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发展的社会特征，构成了紧运行的充分条件和社会前提，忽略公有制自身发展

规律对经济运动状态的制约作用，显然是不对的。

但是，若将分析仅停留在这个层次，而忽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物质基础对紧运行的决定性作用，就不会得出完整的科学的认识。

因此，要进一步分析紧运行的客观物质基础或必要条件。这里，我们要明确紧运行最终取决于现阶段社会生产力基础，这个生产力基础并不是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的绝对发展水平，而是它在整个世界经济中的相对水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即是这种动态的生产力的巨大相对反差的理论表述。

众所周知，1949年以前的中国，由于在近代史上的落伍，逐步沦为落后于世界经济潮流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改变了它的历史发展方向。但由于我们进入社会主义不是脱胎于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面对旧社会遗留给我们的贫穷落后状况，能否尽快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赶上并超过发达国家，就成为与民族存亡命运攸关的核心问题。处于不发达状态下的我国经济，象其它一切发展中国家以及后起的经济大国一样，都会使经济发展带有“赶超经济”的基本特征。二次大战后的发展中大国巴西、印度、墨西哥，亚洲的“四条小龙”，以至于被称为战后世界经济奇迹的日本，都曾先后步入这种经济发展的轨道之中，尽管因经济制度不同，具体的经济赶超的性质上有着本质的区别。

“赶超型经济”的形式因所依据的条件可以有所不同，但面临的主要矛盾又是共同的，其中包括如何得到足够的资金，调动国内外的各种资源，用比较先进的技术和设备武装工业部门，带动二元经济的转化，开发人力资源，克服现有的贫困，实现广泛的就业等等。在我国经济基础形成的初始阶段，我们处在非常复杂、奇特的国际和国内环境之中，当时我们面临的国际背景的

特点是：(1)发达的西方世界对我们充满了敌意，不仅不会给予适当的帮助，反而利用各种手段实行经济封锁；(2)由于我们在经济建设上缺乏物质条件和管理经验，只能依靠苏联的经济支持，在引进必要的物资、设备、技术的同时，也只能有条件地接受其产品经济管理方式。就国内的经济条件而论，我国的基本国情是“人口多，家底薄，发展很不平衡”。巨大的人口压力是我们区别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独特困难，走上公有制道路的10亿人口要求发展经济和致富的压力，使我们倍感基础的薄弱，人均资源水平的有限，科技的落后，就业的困难。这不仅决定了我国国民财富积累不足，而且也必然影响到整个宏观的资本产出效率。发展的巨大压力和投资的较低效率，构成了制约宏观总量和结构关系的因素之一。同时，初步奠定的公有制为基础的经济关系，决定了我们根本无法利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方式，以牺牲社会广大人民的利益来换取经济结构的转变和高速增长。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经济要尽情发展，就造成了客观上已经存在的，而当时却以政策形式出现的投资需求和随之而来的消费需求始终保持在最大限度的规模上的状况；这就不可避免地使社会总需求的规模超过总供给的规模；另一方面，由于那些制约经济发展基础产业或瓶颈产业几乎都是空白，在原有薄弱的经济基础上几乎无法短期内利用市场机制集中全国资源，填补空白，并大幅度增加供给，只能采取大幅度倾斜的产业政策，坚持国家集中资源和国家组织投资，才能迅速填补空白，奠定基础；因而来不及也不可能在宏观范围内通过价格机制漫长而缓慢的平衡功能，将总量需求超前而形成的短缺，转变成需求约束，而只能借助一种非市场的加速生长的大倾斜角的产业政策的办法将短缺转换成资源约束，并且只有这样，才能快步跨过漫长的市场发育，迅速达到资源的规模效率和生产能力的最大限度的利用，实

现初步的工业化，驱动经济尽可能地发展。因此，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奠基时期，带有市场发育差特征的紧运行是不可避免的。

然而，随着产业结构逐步完整和二元经济的转变，在经济中形成可以商品化的产业循环，经济的货币化就破壳而出，迅速发展起来。但在结构变动的前沿和重要的短线资源上，倾斜的产业政策仍是经济运转和发展的基本支柱。这些支柱，把经济推向巨大的规模和现代水平支撑着经济跨短线资源的漫长的市场阶段，迅速在高层次上日益货币化，形成一种紧运行的支持条件下的赶超型的商品经济。这是一种不以平均利润率为主的社会性摩擦方式均衡利益和配置资源的商品经济。它是社会化和大规模的而不是原始的商品经济。原始商品经济是没有社会化的总量均衡和资源配置问题的。这是它区别于资本主义和前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一个现实运行特征。

因此，不能说“赶超型经济”的特征只是过去的事情，因而紧运行只是在发展模式转换以前才具有客观基础。实际上，这是对“赶超型经济”本身存在着误解引起的。前面已经讲到，一国经济只要仍未摆脱其落后于发达国家的状况。在国际和国内各种因素的作用下，就必然呈现出经济赶超的特点。时至今日，虽然我国经济较之奠基阶段已不可同日而语，但使中国经济由落后的二元结构变为先进的现代化工业大国，进而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改造整个国民经济的任务，仍远未完成。我们党制订的在本世纪末使我国经济达到小康水平，并在下个世纪前半叶接近中度发达程度的宏伟战略，都标志着我国经济仍未跨过赶超阶段。

不能不看到，现在我们面临的压力甚至大于以往。在当代世界经济交往中我们仍处于发展中国家的不利地位，特别是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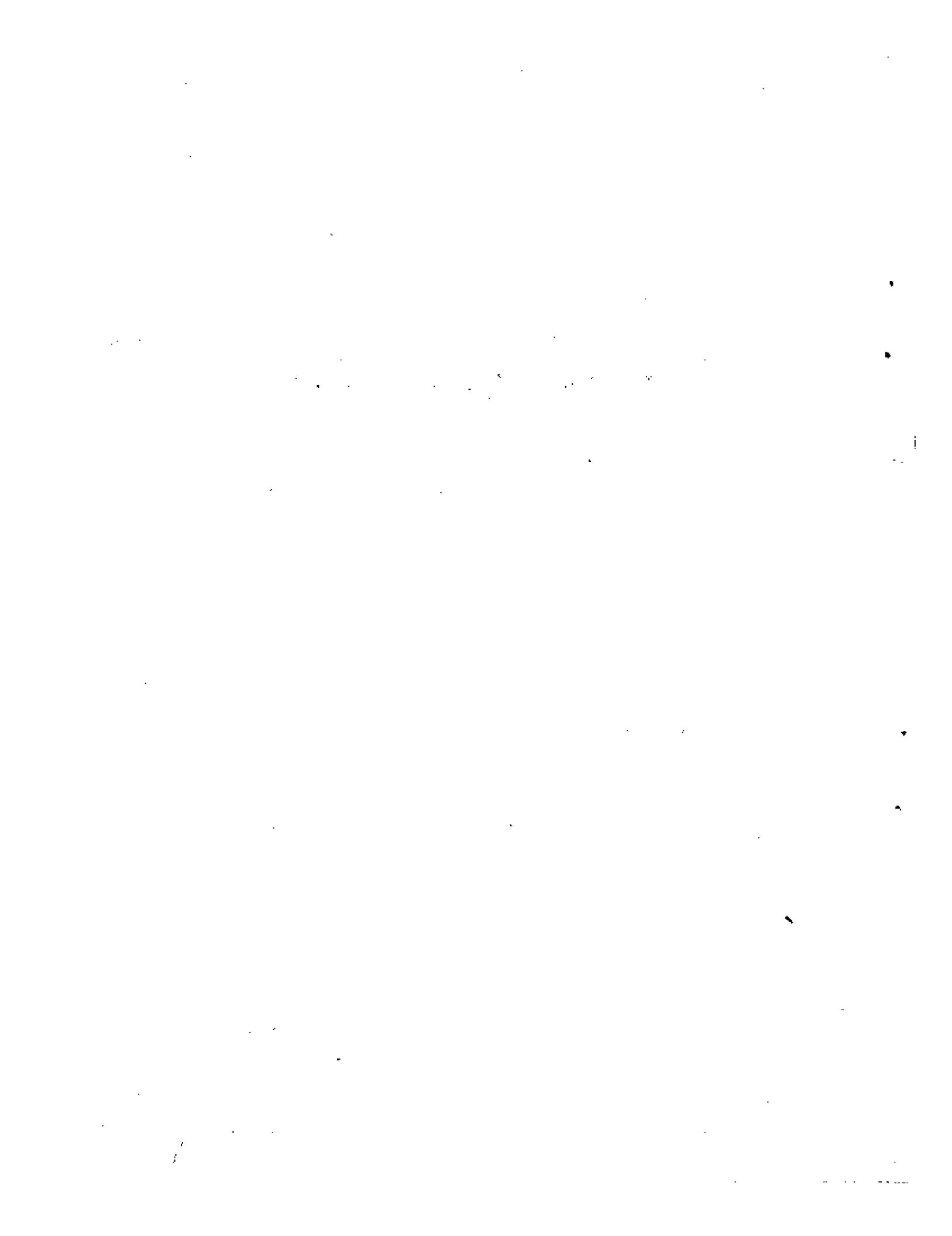
潮般的新科技革命的挑战，更迫使我们加速发展。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怎样依托于已初具规模的工业体系，加快我国二元经济的迅速转化，怎样抓住机会，大量发展科学技术，推动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优化，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主要矛盾，二元经济转化过程中，会释放大量待就业人口；虽然短线资源的产业中开始出现利润导向的成份，如小窑煤、小水泥、小型建筑钢材、小电站等，但产业结构变动中，一方面，“瓶颈”产业的压力会进一步加重，如原燃材料、建筑材料和交通运输部门仍然需要长期有效的倾斜政策追加较多的投资，才能逐步缓解主要关键产品的短缺状况，支撑商品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已出现的消费需求层次的变化，又会拉长现有的生产链条和产业链条。技术创新对发展中国家尤其关键。已有的经验表明，现代发达国家经济波动中的回升和失衡，取决于对新技术革命的适应能力；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增长，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掌握现代科技的能力。我国建国以来，在当时条件下，主要引进和采用的是“中性技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配套设备、生产工艺、管理方式，都有待进一步的发展。这种支柱式的商品经济会有一个紧运行的产业链条的历史传导和转移过程，而不可能短时期内消失。从更长的历史角度看，紧运行的焦点和瓶颈正逐步从初级农产品、消费品转向基础的工业原料和设施，将来会进一步转向技术进步领域和外汇及国际金融领域。所有这一切都会使我国经济在相当长的时期，使需求超前增长，继续保持紧运行的基本态势。同时，原始阶段的单一的产业政策（如以粮为纲，以钢为纲）也由于它造成有效供给能力增长缓慢和低效的消费而被抛弃，代之以均衡的（按比例）和日益货币化的产业政策。

改革造成了千载难逢的体制动态演变的机会，使一切有志于改革和加快社会主义体制成熟的人，能以前所未有的广泛的

角度和深入的程度进行分析和研究。公有制的建立，并没有结束体制的摩擦、演进，而是在更广阔的领域中，展现出公有制在初级阶段的矛盾运动和内在的制度演进的规律。有一些好心的同志，看到紧运行这样一种现实的描述，感到和理想的运行机制距离较远，感到难以接受。我们想指出，紧运行被承认，并不意味着初创时期幼稚的实物型产品经济的恢复，简单的点式倾斜的产业政策如以钢为纲等，不会再出现了，历史不会倒退。紧运行走过了它的实物经济的阶段。表现为价值、商品、货币的形态，只不过是紧运行的新阶段。盛开商品经济鲜花的大树上，仍存在着货币形态的总需求膨胀，而在地下仍深深地扎着短线制约的基础根系，它成为整个经济发展的基础支柱。同时，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逐渐发育的由点到面的倾斜的产业政策推动经济跨越平均利润率有限的倾斜度和盲目性，也成为市场机制成熟的基础支柱。

本文是我们阶段性研究成果的反映，还有很多问题将在今后继续深化。我们衷心地希望，这项研究能引起广泛的讨论。只有在深入的分析和讨论之中，改革的理论，才能在现实的基础上大踏步地前进，为改革的顺利进行开辟道路。

金融改革辑



金融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作用^①

一、应该汲取长期不重视金融业发展的历史教训

应该怎样理解资金融通的作用呢？我认为，应该从我们自己的经验和过去的历史来认识。过去我们的金融系统虽然一直在运转过程中，但是它的作用却发挥得不够。现在我们又重新考虑发挥金融的作用，也就是要增强资金融通的功能，这个功能主要是靠金融机构——银行来承担。很多同志觉得我们过去的金融系统之所以没有发挥作用，是由于受到一种观念模式的影响，在过去的旧观念模式下，金融只是起出纳的作用。就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来说，这种观念模式反映了我们国家过去比较落后，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的一种现实状况。除了历史的原因外，金融机构之所以没有发挥强有力的作用，应该说还有更基本的一些原因。解放后经济的迅速发展，市场的迅速扩大，经济规模的增长，造成了一个巨大的市场。这个市场的最大特点，是在多数情况下大于我们总供给的限度。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市场就变成相对短缺的市场，而不是一个过剩的市场。在过剩的市

① 这是陈元同志 1986 年 12 月在北京市金融体制改革研讨会上的发言。

场上，金融的作用就象神经和大脑的作用，可以指挥一切，调动一切；而在短缺的市场上，有限的资源要办足够多的事情，那么金融的作用就无形中被弱化了。所以，我们现在的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是在过强的市场需求情况下形成的一种结构化，也就是说是一种短缺下的结构化。这种结构化的致命弱点，是把我们经济的一些真正社会化发展的和能够对经济发展起促进作用的种种社会化职能都给逐渐地抹煞了，或者是扼杀了。由于过去长期的经济格局，短缺的结构化减弱了金融的作用，同时反过来又加剧了短缺。因为越是行政化管理，企业对于国家的关系就越简单。厂长找经理，经理找局长，局长找市长，有困难就伸手，有问题就向上推。这种严重的预算约束软化和信贷约束软化，造成我们的金融业发挥不出作用，我们应该吸取这个教训。

列宁曾经很强调金融的作用，它把金融比作是资本主义经济中最精巧的机器，认为能给社会主义经济发挥巨大的作用。可惜这个机器在很多情况下被我们打碎了。并不是有意去打碎，而是逐渐撤掉机器运转的内在动力。这样，这架机器慢慢地就不起作用了。这里面有其内在的原因，当然也有在这种客观现实下形成的一些主观的观念的原因。比如，认为社会主义经济不需要商品，金融只要当出纳，不需要发挥更多的作用，等等。

事实上，金融历来对经济都起很大的作用。不管是实行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国家，还是实行私有制的资本主义国家，金融作为商品生产的必然产物，都有着不可取代的全局性的巨大作用。首先，金融是社会总量和结构的一个综合反映。不同产业的关系，在金融上有鲜明的表现；国民生产和再生产的关系，也是通过金融表现的。如果我们仅仅按照斯大林同志曾经说过的那样，把价值、货币、金融当成一种结算工具，显然是远远不够的，因为金融反映了整个经济的一些根本性问题。其次，到目前为

止，我们衡量社会财富，还没有离开马克思当初分析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所采用的方法，即用时间来度量价值，度量劳动量，从而以交换价值来实现社会商品流通。社会生产的运转，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所共有的，是社会化生产的共同特征。但长期以来，在我们的经济生活当中，金融即便是按斯大林同志所讲的作为社会核算的手段、工具，这一功能也被在很大程度上减弱了，我们没有一个集中统一的、社会化的、面向全社会的、运转灵活的清算中心。银行的很多业务实际上是清算业务。这些业务不管是在什么制度的国家都一样。只要你有足够的生产规模，有足够的生产社会化程度，就必然要有大量的信息量流动，有众多的经济利益关系要表现。但是过去我们没有让这些业务发展起来。从更高一个层次说，金融对于整个社会生产的调节作用也是非常薄弱的。

所以，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过去由于种种的历史原因，我们的金融业过份地不发达，或者说是过份地被压制了。这种局面远远不能适应我们当前经济发展的新形势和发展规模的要求。如果说我们在体制上不适应，使金融的作用发挥不出来，那么所谓生产的社会化也就变成一句空话。因为单纯依靠行政的垂直系统，只是在上个世纪或者更早一点的社会中可以实行。对这个问题论述得比较多的，是马克思论述法国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形成的著作《拿破仑第三政变记》。当然，在中国的历史上，这一套比法国就更多些。这样的东西本质上不是内在的社会化，而是一种外在的社会化。我们长时间以来，包括苏联实行社会主义革命以后，是把公有制形式单一化称为社会化，我认为这已经脱离了马克思的本意。马克思的本意是指生产内在的那种关系。所以，我们金融的不发达是当前经济发展的严重障碍，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一定要使金融在经济生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用。

二、金融对社会主义经济的调节作用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主要应从经济的结构化这个角度来认识。长期以来，由于我们的经济发展被纳入一种紧运行的轨道，现有产业的规模和结构以及现有的生产系统的再生产过程中，所有的生产要素都是绷得非常紧的。我们的生产和经济的变化，显然脱离了经济本身或者说产业本身发展的内在需要。因为，产业是随着科技进步以及需求的变化而在迅速调整它们之间的关系的。整个社会经济不同产业部门之间是有着内在的比例关系的，而这个比例又是在科技进步的过程中处在无休止的调整和变化当中的。可是我们现在的经济变化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只是限于增量的调整，即每年新增国民收入的投资方向是什么，可以用于什么产业、什么项目，搞些什么建设，只限于这些。而产业内部，由于一个巨大的短缺市场的存在，多数企业总是处在过强的市场引力当中，这种市场引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形成一种市场黑洞，就是无论什么产品掉下去都不会带有回音，没有信息反馈，什么东西都能卖得出去。当然，现在的情况与过去相比已有了很大改善。很强的市场引力场使得许多工厂处在一种不图技术进步、不求质量进步的状况下从事生产经营活动，而且也没有力量去从事技术进步和质量进步。它的全部力量都用在生产增长上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经济就变成一种缺乏内在的、根本性活力和生命力的经济。生产力的进步，从本质上说是科技的进步，生产社会化的结构变化，事实上也是在科技进步的推动下发生的。但是，我们给企业创造的外部环境，却是使企业对科技进步非常不敏感，对市场的需求变化非常不敏感。

在这样一种市场条件下，企业之间除非大家都到了长线的地步，互相之间才会有竞争的关系，如果大家都处在短线的环节上，各自都很容易在市场上取得应有的份额，便可以生存下去，那他根本就不会追求进步。因此，在对待总量调节和增量调节的关系上，应该大胆研究和探索，通过在金融体制改革和在企业股份化上的推进，来促进企业和产业之间的重新组合，促使总量调节的进行。应该说，这种总量调节在原则上并没有什么根本性的困难。

除了市场引力的作用外，如果能够更好地打破现有企业之间的行政关系，更多地把他们之间变成一种金融关系、经济关系，而且使这种经济关系约束不断硬化的话，那么，产业结构的调整、科技进步的发展，将会处在一个良好的环境当中，也就有可能灵活地调动社会的资源，使金融发挥出更大的作用。我认为，利用金融调节产业结构，通过金融市场疏导和融通社会资源，更好地组合资源，以解决经济生活中在总量上是短缺、在局部又是浪费的、低效的，亦即微观上的低效和总量上的短缺同时存在的问题，将有助于微观效率的提高和产业结构的进一步调整。

现在，一个新的产业的产生、发展、壮大，往往不是取决于它对社会发展的客观作用和地位，而是取决于我们领导人是不是认识这个产业。光下面认识还不行，还必须主管的领导认识，向这个产业投资，这个产业才能够发展。至于各种经济之间、产业部门之间，则不能灵活地把资源作最大可能的调整，把现有的资源充分利用起来，也不能在现有的产业结构中，适当地把我们原来的苦乐不均朝着有利的方向加以吸引。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大量的企业铺了摊子以后，厂房闲置，设备闲置，大量的原材料闲置，技术力量闲置，这些都反映了经济的运行结构一旦脱离技

术进步的方向之后所显示出来的僵化的特点。我们应该通过金融市场，通过金融和股份制的作用，使整个宏观经济结构进一步合理化，具有一种能够不断调整的、内在的、灵活的机制。现在的宏观结构大体上可以叫作无法调整。因为大型企业已经建成，即使其设备已经很陈旧，但多数企业总是能够在现有的巨大市场上生存下去的，这样就使得现有的宏观经济结构很难调整。我们总说企业掉头能力不强，产业结构调整不快，是由于企业领导人缺乏商品生产观念。其实，一条重要的原因，就是在巨大的市场引力下，过时的生产结构还会强化旧的机制。对这种机制的打破，需要多方面的努力。

现在我们讨论要建立的金融市场、股票市场、科技市场等一系列市场，都有助于产业要素、生产要素的最合理的重组，有助于解决产业内部的不合理的低效率和浪费现象。从金融本身的发展来看，过去金融部门在很大程度上不是一个产业部门，现在也没有做到完全产业化。过去金融机构对经济的管理，往往是从总量上考虑的多，从产业结构上考虑的较少。这主要是由于金融应该发挥的作用从来就没有实现过。我们是在一个经济落后的社会里建立现代化经济的。这样，就出现一个矛盾：产业本身要求高度的结构化，以适应日新月异的新的变化；而金融的管理却是单一的层次。这也是多年来金融发挥不出作用的重要原因之一。金融机构的功能过于简化，而且没有一个能按照产业发展的方向灵活有效运转的、分层次的、结构化的金融体系。例如，正在建立的城市信用社，它的客户主要是城市的集体经济，特别是商业企业。这些企业虽然用钱不多，但从银行借钱确实非常困难。这说明我们的银行没有发挥真正的作用，甚至没能象解放前的小钱庄那样发挥作用。所以这层经济的运转总是磕磕绊绊的，发展不起来。另一方面，一些重大的产业部门也缺乏

相应的银行机构为其服务。现在一些投资公司，多数是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它起的作用是从国外融通一些资金，国内再切给他一些外汇，使它能办一些地方的事情。其实，应当使银行更多地与产业发展结合起来。

我认为，把金融的发达程度与金融的功能单纯归结为帝国主义的特征，而不看其中是否有合理的成份，是片面的。因为在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中，金融的垄断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和产业结构融为一体，特别是在不同的产业发展方向上，在它们看准的目标上，它们肯于投资。比如，日本的银行界在五十年代曾把机电工业和重化工业作为投资方向，现在又把信息产业和高技术作为投资方向，这里包含有金融与产业结构的高度一致。对这一点，社会主义是不是不要呢？我看，对这一点，社会主义非常需要。因为越是在新兴的领域里，产业越面临着一种自己的资金调度不那么灵活有效的问题，即使国家投资给它，它也只能用来解决建立产业的骨架问题，至于相当大量的协作配套以及与其他产业部门、工业部门之间的联系，则没有渠道来解决。如果围绕这个产业相应地建立起金融市场，为这个产业服务，同时也为其它产业由于技术进步而出现的一些新的企业、新的工厂服务，那就可以支持它们的发展。因此，通过金融业的进一步发展及其与产业结构进一步结合，我们就能够开辟一条解决生产要素重新组合的灵活有效的机制，走出一条新路。

在当前经济发展中，金融应该围绕国民经济的增量调整和总量调整更加合理的运转，以及增强金融对于产业结构合理化的促进作用来进行改革。金融要围绕生产的社会化和结构化发挥它的更大作用，就需要建立社会主义的资金市场，建立一个新的金融结构。这次中央关于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定中所提出的以建设为主的方针，对于当前的经济体制改革来说是非

常适用的。因为当前我们更多的是缺少相应的功能和机制，这就需要建立，而不是仅仅破除原来的观念。单纯破除原有观念中那些不符合经济进步和社会发展需要的东西，并不能自然而然地产生出相应的社会化机构。我们必须着眼于建设，才能使我们的金融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多年来银行的同志们提出要让金融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发挥更大作用的设想，是符合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的。

三、首都金融产业的发展方向

首都金融产业的发展，应该是围绕首都面临的主要问题和矛盾。首先是城市建设。现在的城市建设是光有投入没有产出，金融与它挂不上钩。要使金融发挥更大的作用，应该考虑在首都城市建设当中进行开放房地产业的研究和探索。我认为，这样一个市场的建立，有助于解决城市建设的一系列矛盾。一个是城市迅速膨胀与基础设施过于落后的矛盾；另一个是卫星城镇没有吸引力与城市人口高度集中的矛盾。如果我们能够使房地产业在市场上通过有价的形式出现，就有可能做到约束首都已经过分膨胀的部分，使他们能够朝卫星城更多地扩散；同时也能够扭转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缺乏资金的局面。通过发挥房地产业和金融市场的作，为资金的合理流向创造一定的条件。现在首都的建设资金一年要完成 80 亿，可是这么多的钱，其流向非常不合理，大部分投资是增加了城市基础设施的负荷，换句话说，就是增加了对于城市基础设施的需求，而不是增加供给。我们盖了几十万平方米的房子，但没有水，没有气，有的没有电，这是一种极不合理的现象。能不能通过开放房地产市场的办法，逐步把这一关系理顺，真正使整个城市建设从结构上合理起来，

形成一个基础设施先行、城市建设是在基础设施建设的基础上再发展起来这样一个合理的结构。这样，也就能够使将来的整个城市建设走上良性循环的轨道。现在，城市病不是缓解了，而是恶化了。虽然我们每年用于城市基础设施的投资在增加，但是比例数却在减少。也就是说，从投资结构来看，是继续恶化了。因此，结构的调整应该作为北京的首要问题。当然，这个问题不是光靠几家银行就能够解决的，应该是由各部门共同考虑。我看，若不从这一方面找出路，恐怕我们的被动局面现在难以解决，今后也仍然难以扭转。

北京只能发展适合首都特点的产业，这些产业的发展也同样是金融部门的对象。金融部门应围绕这些产业，通过股份化、短期资金拆借以及长期信托投资等方式，使北京需要建设的产业能够迅速发展起来，成为北京的经济支柱。当然，北京的经济来源今后如果要求单纯依靠北京市的产业，也不符合现实。现在北京市的财政收入一年是六十多个亿，一年用在北京的城市投资主要是中央的投资多一些，约七、八十个亿；这主要是指增量调整部分。这样，北京产业的重新调整和发展就面临一个怎样发展的问题。只有产业调整和发展合理，才能真正增强首都城市的活力，北京的产业即使不能完全支撑北京的建设，也能更多地承担起相应的任务。我们不能希望太高，但是如果北京产业不发展，我们情况的恶化就会更厉害。在当前的情况下，只能是中央和地方共同努力建设北京城，单纯依靠中央财政，显然不现实，而单纯依靠北京，现在已经证明很难维持下去。我们应该更多地促进北京地区产业的合理发展，特别是新的产业的建立，使得他们能够对于整个城市发挥出更大的活力。同时，也使北京能在全国经济当中由于先进产业、高技术产业的发展，而产生出更大的辐射作用。要使这个辐射作用能够产生经济效益，也

要靠金融上的发展和股份制的发展。将来科技进步的有偿转让和商品化之后，北京的科技优势才能在经济上发挥真正的作用。应该说，所有这些北京优势的发挥，北京产业的发展，北京城市建设的发展，以及首都面临的主要矛盾和问题的解决，都应该而且也可以从金融体制改革中寻找出路，找出一条能够更好地转入良性循环机制的出路。

四、关于金融知识的普及和教育问题

当前加速整个社会对于金融知识的了解和加强关于金融在经济建设中强大作用的宣传是十分必要的。如果没有经济部门的广大干部和广大企业干部对于金融知识的了解，我们要建立金融市场、股票市场，实行企业股份化，是非常困难的，应该说，过去我们在这方面的知识太少了。不管叫股票市场也好，金融市场也好，人们总是把它同投机倒把联系起来，把它看成是一种罪恶，而不认为它是与经济发展相联系的一种必然的产业结构层次。金融知识的普及是当务之急。我们从事金融工作、教育工作以及理论工作的同志，都要来宣传，都要来做这项工作。只有金融知识普及之后，才能够更好地建立起我们的金融体系。现在的金融体系，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和强化，使它更具有经济的调节作用。完备的金融体系的建立，才能使经济具备进一步大发展的条件。所以，观念的更新是一个方面，建设也是一个方面，这两个方面都是空白。现在，人们对金融知道得很少，金融的文盲还很多。整个经济的金融化和人们观念的不断变化，是一个互相促进的过程。没有观念的变化和新知识的注入，经济的金融化就会遇到很大困难，也不可能实现。而没有经济生活的金融化，则观念的更新和充实提高，以及金融知识的普及，也

就变成了无源之水。因为现实生活中没有这种金融作用，又如何让人们树立这种观念呢？所以，这两方面应该是互相促进，共同发展。随着我们整个金融事业的大发展，人们的观念形态要有一个巨大变化，同时还要增加大量新知识、新信息，这也是一個增量调整和总量调整的问题。一方面要注入新知识，另一方面要更新旧东西，这两方面都应该放在重要的地位上。

建立金融市场，深化金融改革^①

关于建立金融市场问题，现在议论很多。金融市场的建立要依赖一定的条件。金融市场的完善和发展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达到了最高峰。在社会主义经济中，金融迄今为止还没有达到资本主义那样发达的程度，这其中有一定的内在原因，也有我们工作上的问题。但从总的趋势来看，金融市场将充分发展，它作为整个经济运行的中枢和导向的基本工具的作用越来越显著。前不久曾同德意志银行就中国金融体制改革问题进行了座谈。他们认为，金融市场的建立不是一个短期的事情，从他们的经验看，经历了上百年的发展历史，要经过很长时间，一步步地建立。

我们向西德银行家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西德金融业如何解决产业转向、生产要素的重组问题。如鲁尔区，过去依赖当地的煤炭资源形成了以煤炭、钢铁产业为主的工业区，而现在要转向电子和机电工业，转向劳务产业，是如何转过来的？第二，对城市建设，金融发挥什么作用？西德银行专家讲，鲁尔区的工业化程度在减退，投资量在下降。在鲁尔区到处是上个世纪留下来的巨大的但已废弃的钢铁厂房，钢铁这个产业已经在那

^① 这是陈元同志在北京市金融研究课题开题会上的发言。本文写于 1986 年 12 月。

消失了。在鲁尔区改造问题上，西德在金融上的作法是，对许多夕阳甚至没落行业的转向是不惜一切代价给予支持的，即有些用于这类行业企业转向的贷款是根本不收回的，实质上是政府拨款，但又不同于我国过去的固定资产投资由国家拨款的方式。他们这样做，有两个意义，一是资本主义经济有个充分就业的目标。他们不能看着鲁尔区，这个西德的经济支柱在高技术产业高度发展中被国外的企业挤垮、打倒而衰落下去。二是整个资本主义国家在二次大战后都采用赤字财政，他们把过剩的资本引向老产业区的改造，用于“转业”。鲁尔区过去发展成没有城乡界限、人口高度密集的工业区，现在煤炭资源已经枯竭，他们的办法就是企业转向。西德的银行可以不收回贷款，说明他们的银行（当然是大银行）对整个经济结构的发展变化有决定性的作用。

在城市建设上，西德专家介绍说，德意志银行不做这件事，主要是由地方银行，抵押银行来搞。在西德几千家银行中，真正起作用的只有几家，抵押银行是西德起主要作用的几家银行之一。抵押银行的业务主要是房地产，是在房地产市场中活动的金融机构。

看了资本主义的金融机构，再看社会主义的金融，感到象金融这样一个灵活有效的调动资源的机构和机制，曾被列宁称之为“精巧的机器”，在我们这里却运转得很不灵巧，作用很不精巧。金融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发展得很充分，但我们没能很好地借用过来，主要是中国经济不发达。民主德国可能金融上要发达得多，因为两个德国之间的联系密切。西德的一位厂长说，在社会主义国家是工程技术人员吃得开，而在西德是银行家吃得开。这也反映了在金融的发达程度上的差异。

在原有金融很不发达的条件下，建立金融市场，困难是较多

的，而社会主义经济所面临的问题与凯恩斯所解决的问题是根本不同的。当前西方宏观经济调节的两大学派，一是凯恩斯的财政政策，一是货币政策。货币政策在美国流行了三、五年了，只讲货币总量、增长率，认为市场能够自发平衡。在这一点上，他们不如凯恩斯清醒。凯恩斯学派毕竟承认了资本主义是有效需求不足、市场供给过剩这样一个本质特征。货币学派认为利率对经济的影响大，而凯恩斯认为消费对经济的影响大。凯恩斯用边际消费倾向说清了消费不足的倾向，用边际投资效益说清了在追求最大利润下，投资需求不足的倾向。虽然他的这两个函数分析没有多少道理，主要是结论与现实一致。

我国现在的条件同资本主义不一样，难以从它们的政策中找到良方。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人能够说清楚，为什么社会主义经济的需求能增长那么快，并在数量上作出一定的分析，把社会主义经济中需求大于供给的倾向在总量和结构上给予说明，这是在经济运行上要认真解决的问题。

我国的金融改革，金融市场的建立和发挥作用，是要解决社会主义经济所面临的基本矛盾和基本问题。给德意志银行提出的两个问题，既是北京，也是全国金融改革要解决的问题。金融市场是否有助于需求的重新导向和对需求总量的非私有制的约束，这是可以判断的，但目前还看不到这种前景。南斯拉夫的信贷严重约束软化，是它需求膨胀的金融表现，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在这方面找到一个很好的办法。这是一个基本的问题，如果在这个问题上找不到出路的话，金融改革成功是困难的。金融改革首先要研究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但困难也正是由问题引起。在需求过旺的情况下，供给生产和资源的短线太小了，而金融要充分发挥作用，是要以基本消除短线为条件的，基本消除短线才能发挥金融调动资源的作用。短线太多，金融的作用就被限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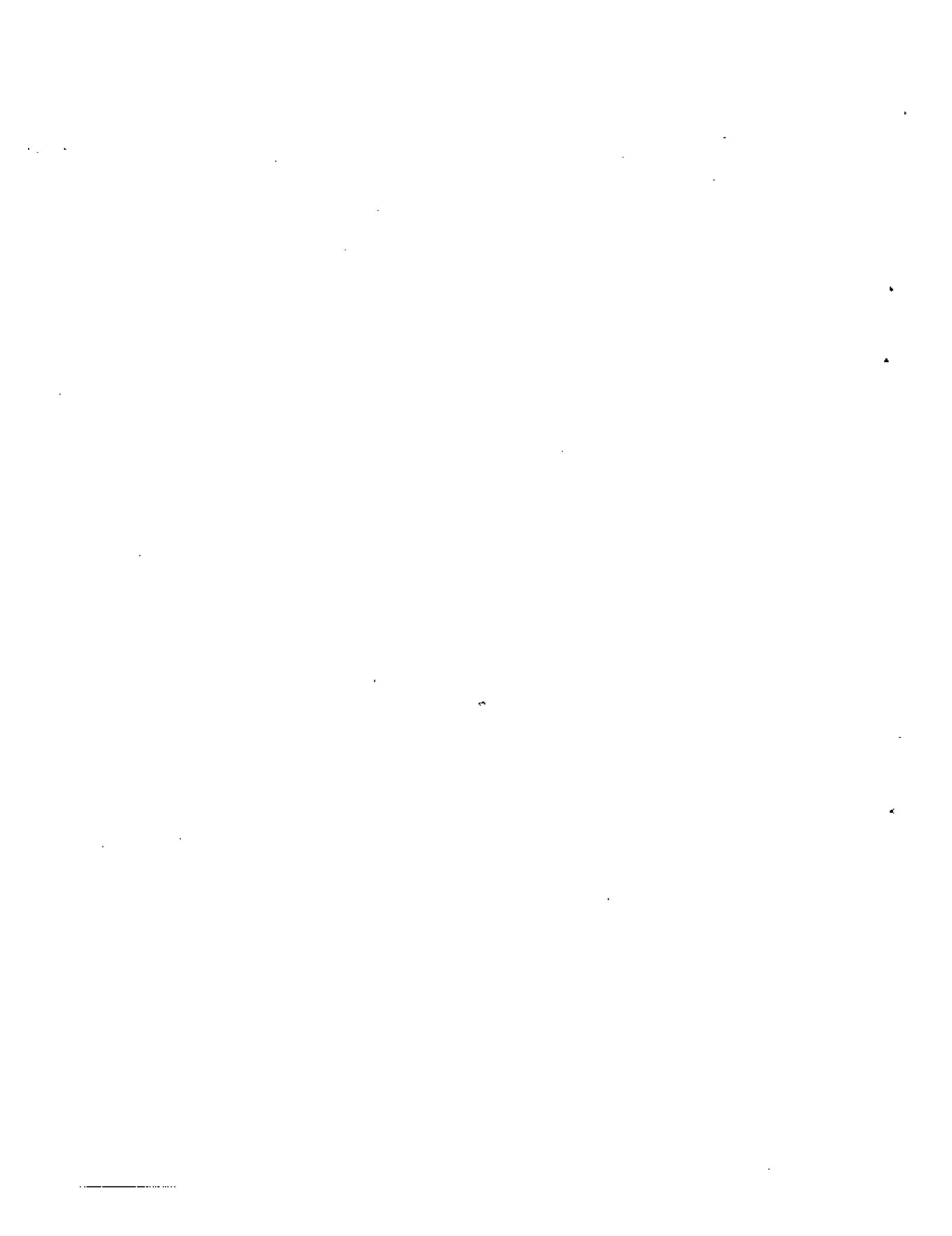
住了。社会主义经济，有的说是短缺经济，我说也可以叫“紧运行”经济，“短线”主导型经济，这都是一些探索的说法，总之是想描述需求超前增长条件下的经济。在这种条件下，金融的作用恐怕首先是解决约束需求、资源分配和企业重组问题。通过金融市场的融资，商业信用票据的发展和国外市场的发展，以及相应的民间资金拆借活动，通过股票、债券市场的建立，能够有助于总量控制，也会有助于解决微观的低效问题。换言之，资源配置的问题，有可能通过金融市场的建立，逐步找出克服总量低效运行的办法来。

社会主义经济还没有象凯恩斯那样比较成熟的宏观经济调节理论，这是我们所面临和要解决的问题。比较起来看，我们在微观产业政策上可以做的事情更多一点，在总量上的事情也可做一些。实际上，银行每天都在做。大家总说国家宏观控制政策造成了 85 年底 86 年初的经济发展速度过低，这是本来难免的。那时的金融控制办法是社会资源的过度使用，使得许多短线不能再维持下去的反映。这里有一个缺点，在于我们金融的控制办法过于行政化，过于笼统，没有分清轻重结构，在这方面可以借鉴西方供应学派的观点，货币学派的政策、方法。当前改革中要避免一些盲目性，要看清，不能认为建立这种市场，进行这些改革就可以超越社会主义经济运行发展的基本规律、基本矛盾和根本特征，金融改革、金融市场只是可以完善这些运行机制。

这个研究很有意义，有助于认清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问题和解决基本问题的基本方法，对我们进一步解决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面临的重大问题和企业搞活都很有意义。如果能做到较高程度解决好生产要素的重组和转向，一旦实现了总量的相对合理，那么整个经济的运行，将会有个更稳定更好的条件。

如果我们在微观的机制方面不积极探索，那么宏观的问题也是不能解决好的。从经济学思想发展看，也是从微观发展到宏观的。亚当·斯密的经济思想基本上是微观的，他的宏观思想是微观思想的简单推论。宏观问题凯恩斯抓住了实质，他说清了资本主义宏观稳定在需求不足经济状态中。社会主义市场一开始就表现出短线制约。短线主导这种状态，恐怕我们也要更多地从微观入手，然后走向宏观。从亚当·斯密到凯恩斯经历了一个世纪，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大概不需要这么久，不过到现在也已经七十年了，还没说清楚，搞不好也要一个世纪，希望我们这个课题的研究，有助于这个问题的解决。

首都发展战略辑



关于计划体制改革的几点想法

关于北京市计划工作的改革，我想提五点看法。第一，要统一认识。我们的计划工作是要加强还是可以削弱？我们说是要加强，但这并不是简单地重复过去的单纯依靠行政手段，而是要用科学的方法，运用经济杠杆的办法来加强它。第二，要简政放权。当前计划工作的改革，是要逐步减少指令性计划，适当扩大指导性计划的范围。从总体来说，我们要改变单纯依靠行政手段管理经济的办法，但一时还难以做到计划工作信息化、科学化。从系统科学的角度看，信息与决策分不开。我们没有足够的信息而要作出大量的决策，这怎么行呢？在这种情况下，办法只能是把决策权下放一部分，因为基层的同志了解情况，有信息，把一些微观平衡问题交到基层企业和区县去解决。综合经济部门要重点抓好宏观综合平衡，把大的方面管住管好，与此同时，要更好地直接为各企业、各产业部门、各区县的社会经济建设服务，这样才能使计划体制逐步趋向合理。第三，项目审批要科学化。比如发展第三产业，我们是不是需要把每一个网点建设的决策权都集中到市里来呢？没有必要。今后我们只是在总体规划的范围内，在市政条件允许的范围内，在市场需要的范围内，有什么问题需要平衡和解决的，提出规划和任务。这样就引起计划方法的改革：一是信息工作要系统化、科学化，一是项目

的审批工作要专业化、科学化。现在审批的项目全市每年有好几千,如果单纯依靠几个人,就不能实现科学化。对项目的分析论证也要逐步向科学化转变。我们要吸收国外在项目建设、综合平衡、规划各方面的成功经验和科学方法,逐步从行政方法转到科学方法的轨道上来。第四,要加强经济杠杆的作用。是不是一提重视经济杠杆的作用就不要搞综合平衡了呢?不是,要正确处理两者的关系。当前强调经济杠杆的作用、政策的作用,正是为了更好地进行综合平衡。因为利用经济杠杆和政策,我们可以把人、财、物力调动到更需要的产业部门中去。过去我们有些计划确定后之所以完成不了,是因为单靠行政办法,不能实现综合平衡;现在强调运用经济杠杆,恰恰是综合平衡的一大进步,不能把两者对立起来。第五,计划部门包括区县、各局(总公司)和企业的计划部门都要更好地同财政金融部门、审计部门等结合起来。各个综合部门的目标是一致的,都要自觉地为宏观计划的实现服务。每个综合部门不要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具体的条条主管单位,而要把自己提到全局的高度上来。计划部门要和它们密切结合。各部门要提高自己为全局服务的自觉性,成为促进计划实现的一个有效的自觉的助手,这是今后体制改革的一个方向。审计部门帮助做好审计分析、效益分析、提供咨询服务,金融部门怎样更好地为重点项目、重点建设筹措资金,物资部门如何更好地集中物力,都是下一步经济体制改革工作要考虑的问题。

关于计划部门的建设和发展问题。它与当前的改革直接相关,同时又关系到今后国家和北京市的建设。第一,计划部门首先应成为信息中心。要掌握国内外经济技术动态,国内市场动态和需求情况,数据的收集处理和分析要逐步科学化,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提供指导、服务。不要认为指导性计划就比指令性

递、处理要逐步向电脑化发展。方法现代化，就是要逐步摸索运用国外先进的经济数学方法、运筹学方法，把它与中国的实际情况、北京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第四，加强计划工作人才的培养。在计划工作改革中，有些东西可以开展有偿咨询，以推动人才开发和培养。今后大专院校、专业部门要向计划部门输送一些高质量的人才，以适应计划工作的需要。

关于发展北京市第三产业的问题

第三产业是相对于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而言的。通常把农牧渔林业和采矿业称为第一产业，工业和建筑业称为第二产业，其余所有部门称为第三产业。最初，第三产业被称为“劳务部门”，因为第三产业的各部门主要从事服务，而不从事“生产”。现在看，用“劳务”来界定第三产业有些过于狭窄。第三产业中有一些是“劳务”性行业，但也有一些是“生产”性行业。如在现代社会中，信息生产同样是一种创造价值的生产。

一、第三产业的发展及其在首都的作用

第三产业的蓬勃发展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全球性的经济发展趋势。事实上，随着商品经济形态在资本主义社会占据主导地位并得到迅速发展，第三产业就不断在发展。最初的商品资本统治，后来的金融资本统治都表明第三产业中的一些部门如金融部门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可以说，第三产业是商品经济发展过程中，从社会经济中分化出来的一个产业。社会经济越发展，从第一、第二产业和人民生活中分化出来的第三产业部门就越多。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各国的第三产业都有迅速发展。

许多新兴部门，从第一、第二产业和人民生活中分化出来。这是由于：1、为避免 1929 年那样的经济危机，资本主义国家在统计上将第一、第二产业之外的经济活动纳入进来，作为国家干预金融的手段。投入产出方法和最终产品概念逐渐被许多国家所接受，第三产业的概念和发展受到了重视。2、科技的发展，老殖民主义体系解体和世界性战争的结束，使经济发展的先导因素转到第三产业，转变到信息、科研、流通等部门。后来由于新技术革命而出现的新兴行业和人才培养，也被纳入产业发展。3、随着生产的高度社会化，生产过程中各个环节的能力普遍受到重视，有了极大的提高。于是，产前、产后环节的工作量大增，大批就业人员向第三产业转移。4、社会生活和消费的社会化，例如旅游业的发展等等，也加速了第三产业的发展。

我国目前也接受了第三产业的概念，并且提出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国家统计局已经决定，从明年开始建立国民生产总值指标体系，即修改原总产值指标，添加第三产业指标。

我国目前对三个产业的划分是：第一产业为农、林、渔各业；第二产业为工业、采掘、自来水、电力、蒸汽、热力、煤气和建筑等业；第三产业可分成流通部门和服务部门两大部分。按各自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不同作用又可分成：①流通部分（包括交通运输、邮电通讯、商业、公共饮食业、物资供销和仓储业等部门）；②为生产和生活服务的部门（包括金融、保险、地质普查、房地产管理、公用事业、居民服务、旅游、咨询信息和各类技术服务等部门）；③为提高科学文化水平和居民素质服务的部门（包括教育、文化艺术、广播、电视事业、科学研究事业、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事业等部门）；④为社会公共需要服务的部门（包括国家机关、政党机关、社会团体、军队、警察等部门）。

我们平时所讲的第三产业，主要是指为人民生活服务的各

个部门。

从历史上看，第一产业曾促进了广大乡村的发展，它的特点是分散。第二产业促进了城市的发展，它本身就是空间集中型的生产方式。第三产业是社会经济活动在空间集中后的产物，这种集中表现为人口的集中、商品的集中、资金的集中、技术的集中和信息的集中。第三产业是这五大类资源、财富的集散地。因此，城市创造出了第三产业，第三产业集中表现出城市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作用。

中央领导同志不久前视察武汉时，曾经提出大城市要增强辐射力。对大城市作用的考核，主要不是看它的产值，而是看它的辐射作用。能起这种辐射作用的是第三产业。现在许多城市已经不再把单纯以第一、第二产业发展的指标作为城市经济发展的目标而采取考虑第三产业作用的综合指标。

对于北京市来说，发展第三产业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因为：①北京作为首都，要为中央服务，为全国服务。它的这种服务功能集中体现在第三产业上。②北京是全国的窗口、国际交流的中心，它的作用也主要体现在第三产业上。③北京拥有对全国经济发展有重要作用的人才、信息资源，发展第三产业是利用好这些资源，扩大城市辐射力的重要途径。④北京是一个有近千万人口的特大城市，要为这个特大城市的居民服务，使他们工作、生活方便，发展第三产业有非常重要的作用。⑤从地理位置上看，北京又是一个中心城市，是华北、东北、西北、内蒙等地物资的集散地，这对发展第三产业提出了迫切要求。⑥我国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正在全面展开，经济体制改革形势也要求加快发展第三产业。

这几年来，北京市已经越来越认识到发展第三产业的重要性，并且决心下力量抓好，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目前第三产业的

状况与城市需要相比较还有很大差距。

二、北京第三产业的发展状况

发展北京为人民生活服务的第三产业，要考虑以下一些因素：首先，北京是一个城市，自然资源相对短缺，同时，是一个已经基本上建满了的老城市。这些，不能不在原料和场地上影响第三产业。其次，北京是一个特大城市。北京市的生活服务对象，除本市常住人口 933 万人（其中非农业人口 547 万人）外，还有在京部队，外国驻京机构工作人员 7,500 人，外省、市驻京机构的工作人员 5,000 人，流动和暂住人口约 65 万人。因此，北京又是一个对于第三产业有特大需求的大市场。再次，在首都，全国性的重大政治活动多，对第三产业的各方面要求都比较高。

我们必须正视这些情况，采取有力措施，发展第三产业。那么，北京市为人民生活服务的第三产业目前发展状况怎么样呢？

现在，全市居民的消费资料从商品结构上可以分成副食（肉、禽、蛋、水产）、蔬菜、水果、食品（糖、烟、酒、茶、糕点）、百货、五金交电、化工、服装、钟表眼镜、医药、日杂、煤炭等几十大类。从渠道上，分为二级批发、三级批发和零售、供销社系统采购、厂商直挂等多种方式。布局上有三个市级商业中心，几十个地区性商业中心和几万个方便人民生活的小商店。

从网点情况看，1955 年，全市共有商业、饮食、服务业网点 59,625 个。由于历史的原因，1979 年只剩下 14,421 个。（当然，网点的规模扩大了，如东安市场改为东风市场后，几百个点合为一个。）以后发展较快，到 1984 年底，共有网点 53,486 个。今年 1—5 月份，又增加了 11,973 个，使总数达到了 65,459 个。这只是国营、集体和个体商店的数字，估计城近郊区目前至少还

有 2 万多个个体流动摊商，其中卖副食品、果品和蔬菜的约占一半。在以上 6 万多个网点中，个体网点约占一半。而在 1978 年，全市个体网点只有 260 户。去年计划新增饭馆 150 个，实际建成 597 个；计划改造升级饭馆 50 个，实际完成 52 个；引进外地风味饭馆 13 个；计划新增自选市场 25 个，实际新建 26 个；建立各种贸易中心 39 个；新建农贸市场 14 个，其中，农产品批发市场 5 个；新建中低档旅馆 28 个，增床位 14,000 张。今年年初计划增网点 10,520 个，为去年实际数的 2.5 倍，到 5 月份已超额完成。到 5 月底，已新增饭馆 621 个，改造 33 个，新开快餐生产、销售店 9 个，日产快餐 38,600 份。晨光街饮食街、厂甸饮食街、前门前楼东、西两侧饮食商业街的各项工作正在照计划进行。

此外，到 5 月底，新增洗衣厂 7 家，年洗衣能力（包括干洗、湿洗）从 98 万件增加到 174 万件，交活时间从 45 天缩短到 15 天，到今年年底洗衣能力将达到 500 万件。今年前 5 个月，新增饭店、旅馆、招待所 700 多家，60,000 多张床位。全市旅店现共拥有床位近 33 万张，比 1983 年增加了 3 倍。目前北京“住店难”的问题已经有所缓解。

到 5 月份，已经基本建立并开业的大小商业街共十条，下半年还会有一些商业街建成。

虽然商业、饮食业、服务业网点近两年增加得很多，但与需要相比还差得很远。与上海、天津相比，北京市的网点虽然规模较大，但数量较少，方便程度仍不及两市。

如果同国外的发达城市，如日本的东京相比，差距就更大。为了增加可比性，我们试把北京城近郊八个区同东京都地区相比较。北京城郊的面积和人口约为东京都的一半，其第三产业发展的状况是：1983 年东京共有各类旅馆 4,045 家，其中大型

的 228 家，中、小型的 2,702 家，简易的 1,030 家。北京城近郊区共有旅馆 490 家，大型的 36 家，中、小型 440 多家，还有内部招待所 450 家。算上招待所，东京是北京城近郊区的 8 倍。东京有各种饮食店 175,000 多家，其中大旅馆的餐馆 3,580 多家，一般饮食店 12 万家，各种风味馆和小酒馆 4 万多家。北京城近郊区各类餐馆 2,020 家，可接待外宾的近百家，一般饮食店 1,195 家，街头饮食商亭 800 多个，机关和企业内部食堂 8,500 个。算上内部食堂，东京饮食店是北京的 16 倍。

东京有各类肉食品商店 12,600 家，水产品商店 12,000 家，北京城郊有副食店（包括卖肉、禽、蛋、水产、菜、糕点、冷饮、调料等等，副食店的范围比单纯的肉食品、水产品商店要大得多，同水平下，数量也应大一些）5,000 个，自选商店 30 多个，专营水产品商店 16 个，农贸市场 50 多个。东京是北京的 4 倍。

点心店、食品店东京有 63,000 家，北京有 8,000 多家。此外，东京有理发馆 11,000 家，美容院 15,000 家，洗衣房 13,000 家，澡堂 3,500 家，共 43,000 家。北京有理发馆 1,200 多家，洗染店 250 多家，浴池 70 多家。共 1,500 多家。当然，还有大批的内部理发馆、浴池和洗染店。就社会上网点比较，东京是北京的 28 倍。

东京有电影院 258 家，体育馆场 36 座，游泳池 2,800 个。北京有专业影剧院 40 家、兼营影院 63 家，内部礼堂 1,300 多座，大小体育馆、场 20 座，游泳池 118 座。东京约比北京多 1 倍。

东京商业、饮食业、服务业、修理业网点的总数为 31 万个，而北京仅为 53,000 个，是东京的六分之一。上述四个行业从业人员东京为 195 万人，北京则为 38 万多人，相当于东京的五分之一。东京的网点规模较小，10 人以下的商店约占全部网点的

88.8%，生活上比北京要方便得多。

因此，大力增加为人民生活服务的第三产业网点，是北京当前发展第三产业的一项十分重要，而且十分迫切的任务。

要解决好这个问题，困难是有的。前面所说的自然资源的相对短缺和原来老城市建设布局的不合理，更加重了北京市发展第三产业的任务。北京城郊居民每天要消费450—600万斤菜，100万斤猪肉，14万斤牛羊肉，40万斤蛋，25,000斤禽，650万斤粮食，48万斤油，100万斤水果以及大批的工业品、日用商品。这样的一个特大市场和大的物流量，如果货源出了问题，或流通出了问题，都立刻会影响到人民的生活。而且，我们不仅要大力发展为人民生活服务的第三产业，随着搞活经济、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发展为生产服务的第三产业的任务，也已经紧迫地提上日程了。面对着繁重的任务和各种困难，我们只有首先依靠正确的政策，坚持从实际出发，进行各项必要的改革，才能把工作做好。

三、北京市发展第三产业的方针和政策

北京市委今年年初提出的努力发展第三产业的有关政策和措施，主要是：

1. 执行国家、集体、个体一起上的方针，大力发展战略所有制，多种形式的商业、服务业以及为人民生活服务的其他行业，尤其要着重兴办集体和个体所有制的便利店、连家铺，小饮食店等小型分散的网点。

2. 鼓励各行各业以本业为主，多种经营，支持上下左右，内外联合兴办为生活服务的第三产业。当前要特别强调加强企业和企业之间的横向联系、广泛发展多种形式的联合和协作，跨地

区、跨行业、跨城乡、跨所有制的都应该提倡。以骨干企业为龙头的专业化协作和联合，很有生命力，应广泛推广。这是解决发展第三产业的资金、场地、人才等问题的关键。

3、积极努力，逐步地开辟各种市场。如：生产资料市场、技术市场、劳务市场等等，使第三产业的各行业尽快地走上社会化、商品化的道路。市政府的各主管部门要迅速适应这一转变，改变条块分割的工作方式。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步子要稳妥，要考虑社会承受能力。

4、国营企业在第三产业发展中要发挥领导作用，提供信息，供给货源，保证市场，平抑物价。不能不负责任，不能让一些收益较低，但人民生活需要的商业、饮食业、服务行业网点转业。

5、制定规划，统筹安排。第三产业的发展要符合首都总体规划的要求，同时，在城市规划城市建设中也要充分考虑第三产业的发展。因此，制定第三产业的发展规划十分重要，制定好规划，是宏观指导的前提。最近，北京市也在进行发展战略的研究，其中有一项重要内容，就是第三产业的发展战略。市里初步设想，第三产业的发展，大体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用三年左右时间，以解决人民生活“几难”为重点，大力发展网点。第二阶段，在发展网点的同时，以调整行业结构、合理布局、规模配套、形成网络为重点，既有批发、分货、储运、加工系统，又有分级店、专业店、综合店配套的网络系统。商业、饮食服务行业的网点，及其他行业的网点，如：生产资料的网点、信息、咨询各业的网点，要布局合理，大、中、小配套。到九十年代，全市基本建成五个大型商品区，四十个中型商业区。第三阶段，以发展金融、外贸、法律、咨询、科技服务为重点，服务首都，辐射全国。

由于今年1—5月份的第三产业的发展很快，形势很好，市政府准备将今年商业、饮食业、服务业网点发展计划修订为确保

15,000个，争取2万个。下半年，将把工作重点放在解决“吃饭难”、“住店难”、“洗澡难”上。在抓高档饭店的同时，抓好新建和改造大众化、中小型旅馆的工作。注意研究，及时调整有关政策和管理办法。

6、认真搞好物价改革，是促进第三产业社会化、商品化的重要措施。物价改革今年还只是开始，要有5年或者10年的时间，才能将物价理顺，才能使第三产业处于一个商品化的发展状态中。

物价改革是一件非常复杂的工作。每项物价的调整影响到千家万户的生活，影响到千家万户企业的利益，影响到国家利益，影响到经济结构、需求变化，影响到经过改革形成的一系列核算考核指标的参数。因此，必须持慎重态度。

7、近期内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建立合理的适应新经济体制的商品流通渠道，尤其是农村产品的流通渠道。要在最少环节，最大经济效益前提下，使郊区和外省市农副产品及时进城，又使市场信息及时出城，到生产者手中。

发展北京市的第三产业，还有许多问题要研究和解决。如国营批发企业如何在商业行业中发挥保证供应、平抑物价的作用？怎样建立合理组织物流、方便群众、减少流通费用的优化的商业流通体系？如何建立咨询、信息等新兴产业市场？如何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建立一个既为人民生活服务，又为生产服务，并且将两方面结合起来的大商业系统？等等。总之，第三产业的发展是一个新课题，我们要不断研究新情况、新问题，采取正确的政策和办法，边实践边总结，促使第三产业很好地发展，从而为我们的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人民生活服务得更好。

从实际出发研究首都发展战略

在确定了正确的发展目标之后，实事求是地分析客观条件，充分地估计实现目标与困难，全面地研究克服困难的对策，正确地选择发展战略，则是实现目标的重要措施。北京已经确立了它的发展目标，它正处在为实现目标而全面发展的时候。因此，目前需要认真研究发展战略。

北京的发展目标是由它作为首都和一个特大城市的性质决定的。中央对北京建设方针的四项指示是对北京发展目标的精辟论述。我们从北京作为全国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这一城市发展总目标出发，便可以确定各方面的发展目标。

由于北京是政治中心，它必然成为我国对外交往的中心，成为发挥对外开放作用的最大中心城市之一，成为环太平洋地区的“国际交往中心”。北京必须具有与这种地位相适应的国际交通运输能力、通讯能力和接待、服务能力。作为政治中心，北京要为中央和各省、市、自治区提供第一流的服务。它要成为全国交通和通讯的中枢，要有现代化的城市基础设施，要创造出良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形成清洁、整齐、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市容，还要有门类齐全、行业配套、服务周到、繁荣发达的第三产业。

作为全国的文化中心，北京要形成现代化的文化教育体系，为首都以及其它地区输送大批高质量的各种人才。北京要成为

我国社会主义文化最重要的“生产基地”，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发挥重大作用，并且使首都人民保持良好的社会风气和道德风尚。北京是全国科学技术人才集中的地方。因此，要建立起能够很好地为科学技术人员服务，充分发挥他们巨大作用的社会结构体制和服务系统。还要发展与生产紧密联系的高技术产业，使北京成为全国在科学技术和生产技术方面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先驱城市。北京要为全国各地来京工作、学习、参观、游览和生活的人们以及为全市近千万人口创造良好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使首都人民的生活方式集中反映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风貌。

为了承载起政治、文化中心的功能和一千万人口的巨大经济负担，北京也需要巨大的经济实力和自我发展的力量。北京要充分利用各种经济资源优势，挖掘已有产业的潜力，利用北京交通运输便利、金融机构众多、通讯比较畅通、人才聚集、市场庞大、信息集中，与世界及全国各地联系密切的特点，发挥中心城市的强大经济辐射作用，为全国服务，也为北京的建设积累资金，为首都市场提供商品。因此，要继续发展有北京特色的工业、农业，尤其是第三产业。要在适当规模的基础上，上水平、上技术、上效率、上质量、上特色、上品种，走在全国同行业的前列。

根据这一系列的发展目标，我们要为北京的未来描绘出一幅宏伟的发展蓝图。实现了这些目标，北京作为首都，将在政治文化、科技和经济等方面对全国以至世界发挥应有的作用。

但是，要在今后 15 年的时间里，实现上述目标，任务是十分艰巨的。我们应该通过认真地研究发展战略，使我们的建设少走弯路，能在特定的客观条件下，以较少的投入、较快的速度去实现目标。

研究和确定北京的发展战略是一件复杂的工作。因为一方

面，中央给北京确定了较高的发展目标；另一方面，北京的现状与目标的差距很大。北京面临的客观条件对实现目标制约是很大的。北京是一个特大城市，它缺少相应的城市基础设施和城市经济运行所必需的一些自然资源和物资原料。它缺水、缺能、缺少能保证供一千万人口一年四季所必需的食品和副食品的生产基地。要解决上述困难，要发展教育、文化、卫生、科技等各项事业，要繁荣市场、活跃经济，需要大量投资。而北京能够投入的资金与需求相比是缺少的。

北京有近千万居民和近百万流动人口。这样多的人生活在较为狭小的空间和落后的基础设施上，形成了北京发展中巨大的人口负担。为使这些人口能够生活好，北京要组织规模宏大的社会经济服务活动，组织巨大的商品流、能源流、物资流、客流、信息流，以至城市垃圾流，组织对商品、能源、物资、信息和城市垃圾的加工处理及为客流的所有社会服务，建设大批的住宅及附属生活设施。

北京是在一个文明古城的基础上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它过去三十六年的建设中，由于种种原因，遗留下一些急待解决的问题：城市产业结构和布局随着城市建设的高速发展需要做较大调整；城市的基础设施严重不适应建设发展的需要；缺少一个使各行各业在按照首都功能和发展目标、在充分考虑客观条件的基础上制定的相互协调的发展规划。

这些就是我们在实现北京发展目标过程中的主要客观约束条件。我们在实现北京发展目标的过程中，必须具有资源和条件制约的观念。我们只能在有限的空间、时间、物资等因素所规定的客观环境中，选择我们的建设步骤，安排工作。因此，北京发展战略的研究既困难，又重要，有十分明显的现实意义。

北京发展战略研究的目的，就是要在种种客观条件的约束

下,找出较快地全面实现北京发展目标的途径。因此,必须在对客观条件正确认识的基础上,科学地预测社会和经济发展,科学地预测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科学地分析各种政策、各项措施、各个项目、各种工作计划在微观和宏观方面的作用,从而制定出不同的城市发展战略和对重大问题的对策,并使之优化。

北京发展战略的研究有其显著的方法特征。1. 由于它所研究的对象是一个复杂的大系统,因此,它自身必须是系统性的。2. 它所确立的社会经济发展指标体系必须是全面的、科学的、正确的。3. 它选择的对策必须是科学的、合理的,尊重客观,实事求是,微观上灵活、有效,宏观上协调、连续。4. 由于北京的城市功能是辐射性的,所以,研究本身必须是开放性的,北京发展战略研究,必须结合其它地区的发展战略研究以及全国的发展战略研究、各行业发展战略研究一起来进行。

通过发展战略研究,北京将协调同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以及全国其它地区共同发展的关系。北京完全可以与其它地区在发挥各自优势的基础上相互合作,共同发展。

通过发展战略的研究,将确定北京社会经济结构和各行业的发展规模。要按照客观规律和客观条件确定各阶段、各社会经济部门的发展比例和规模,使目前不够适应北京城市发展目标的经济社会结构逐步得到调整。

发展战略的研究,使我们有一个今后建设的纲要。在这个基础上,我们编制各种计划,安排建设项目,分配资源和资金,制定政策,就能够使中央对首都建设的各项指示化为一幅宏伟而详尽的蓝图和现实可行的实施部署,就能够保证一步步地实现北京建设的宏伟目标。

首都发展战略研究中 现代决策方法探索^①

领导科学、决策科学是随着整个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发展的，现在已经成为一门比较完整的科学，并且通过领导者们的掌握和运用，发挥出它的重大作用。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就是运用决策科学领导革命走向胜利的。象毛泽东主席在战争年代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著作就是那个时代决策科学的光辉代表作。在今天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我们面临一个日益复杂和迅速变化的客观世界，我们的主观世界也在迅速改变着。每个领导者，不论是近几年走上领导岗位的年轻同志，还是在领导岗位上多年的中、老年同志，都有如何掌握决策科学，在每天大量的文件、会议和事务性工作的海洋中把握全局和方向的问题；都有如何提高自己决策的科学水平，用现代决策来代替过去手工业式的决策，通过决策过程，更好地统一思想、团结干部、动员群众、发扬民主的问题；也都有科学地进行决策分析，做出正确决策的问题。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有过这方面的沉痛教训。过去王明路线的错误决策，葬送了土地革命的成果；文化革命时期，党内不正常的生活，决策的主观臆断，造成了“十年浩劫”。

① 本立写于1986年7月。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决策科学又是一条无声的战线，一条无形的战线。不少领导者在这条战线上和领域内还不够清醒，还自觉不自觉地眷恋着传统的手工业的决策方式，沉浸在个人说了算的权力享受之中。一个无形的分界划分出老的决策方式和现代决策方式的区别、划分出封建传统的方式和社会主义民主化科学化方式的区别。应该说，我们正处在一个过渡时代，两种决策方式都在发挥作用，同时也在无声地摩擦着。我们应该自觉地积极地推动科学民主决策方式的普及和运用，这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新形势的要求。

1985年3月北京市委市政府决定开展首都发展战略研究，成立了由市委市政府十几个部委办主要领导组成的领导小组。从85年3月至9月，是开展研究的准备阶段，成立了首都发展战略总体研究部，调查和学习了各兄弟省市开展发展战略研究的情况和经验，制订了研究的课题体系和研究计划。从85年9月到86年9月是认识市情、分析现状、找出矛盾的阶段。举办了各区县局、总公司领导干部参加的战略研究培训班，开展了十五个分战略的研究，并发动了大批研究单位、学会、专家学者和中央在京的几十个部委以及全国和市的人民团体参加研究，形成了对北京市情和发展中主要矛盾的一个初步认识。在首都发展战略研究第一次讨论会前，以书面征询意见表的形式征询了中央、地方1000多名干部、工程技术人员对北京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和首都建设面临的主要选择等方面的意见。在这样一系列调查研究的基础上，86年4月底召开了第一次讨论会。之后，又邀请了中央在京单位、各学术团体、人民团体等各方面领导同志参加了各种形式和专题的座谈会、讨论会40次，参加代表人数达1300人次。此外，全市各区、县、局、总公司的领导干部也都召开了讨论会，形成了几十份对首都发展情况认识和矛

盾分析的报告。首都发展战略研究第一次讨论会，范围之大，参加人数之多，讨论的程度之深是首都建设史上少有的。

通过这样较长时间、较大范围对市情分析和矛盾研究，使中央和市属各部門的同志对问题有了比较系统的了解，为下一阶段对策研究打好基础。

进行首都发展战略研究的过程中，我们注意运用现代决策科学方式，积极探索，有了几点认识和体会。

一、在众多的工作决策中， 领导者首先要抓好战略 性和全局性的决策

北京的工作具有各省工作的一般特点，也有各城市工作的一般特点，还有首都工作的特殊内容。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事无巨细，都非常重要。五十年代，周恩来总理曾讲，首都无小事，不管什么事情，都会产生很大的政治影响。在北京的工作当中，具体事情往往看起来很急迫，有些是中央领导同志交办的；有些是人民群众意见很大，要求解决的；有些是基层急待解决的。面对这些大量的具体工作，有一个如何掌握全局工作主动的问题。要掌握主动，关键在于能否及时地抓好对于方针、政策、方向问题的研究和决策。北京这次开展发展战略研究可以说是在这个问题上开始有了比过去更高一些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开展发展战略研究的迫切性表现在几个方面：

1. 各个基层单位的工作积极性，随着经济体制改革有了很大的提高，这些单位的工作自主权都大大增加。一些企业提出了各自发展战略。企业有发展战略，行业必须有；行业要有，全

市则必须有。这样就提出了全市开展这项工作的迫切要求。

在各基层单位(包括各区、县、局、总公司)的决策权逐步扩大的情况下,要使各单位的工作仍然紧密地围绕市里的全局工作和中心工作来进行,更好地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避免盲目性,成为一个互相协调的有机的整体,必须要有一个明确的、长期的工作指导方针。决策的分层化和分散化后的协调性,以方向和方针方面的统一决策为前提。战略问题决策的统一性和具体工作决策的分层化、分散化是相互依存的。否则,各项事业之间的内部联系就可能由于决策的自然分散和局限性而破坏。

2. 从全市各项建设事业面临的种种互相交叉、互相制约的矛盾和困难来看,也要求有一个统一的,能够给人们指出方向,振奋精神的发展战略。

北京市的工作千头万绪,相当部分是处于被动的“救火”状态中。这种状况有日益严重的趋势。许多领导自觉不自觉地被这些“救火”事件牵着走,为解决这些问题,就不断地增加临时机构,增加各种会议,增加各种调查组。各种就事论事的文件也大量增加。具体工作牵扯了各级领导的大量精力,仍然顾东顾不了西,掌握不了工作主动。这种忙于“救火”的工作方式,越来越难以维持下去,非从科学的预测出发,争取工作主动不可。

3. 全国各地开展的发展战略研究工作是对首都发展战略研究的有力促进。

4. 领导班子需要通过对重大建设方针和战略研究来全面地认识市情,统一思想。同全国各地一样,北京近几年来,各级领导班子的变化是比较大的。领导班子组成之后,是在各自分工负责的工作领域埋头苦干,待遇到具体问题和年度工作计划时再碰头,就事论事地研究呢?还是主动地、自觉地研究一下我们面对的城市,从更高的层次认清市情,统一思想,制定方向、方

针，相互协调、有计划地配合起来努力工作呢？无疑，应该选择第二种方式。

从以上四个方面看我们感到非进行发展战略研究不可。在前一个时期，实际工作中出现了一种怪现象，就是基层研究战略，领导研究战术。因为各基层单位希望能找到本单位发展的捷径，所以重视战略问题。而领导干部则过多地陷于事务性工作中。基层研究战略往往是从本单位发展出发的，局限性较大，不能代替总体战略的研究。而领导如果只抓事务性工作，忙于救火，就会变成客观事物发展的尾巴，甚至变成基层工作的尾巴。这是一种造成工作盲目性而又比较普遍的现象。领导决策的科学化首要的是要使决策分层化，下放决策权，让领导从具体的事务堆中走出来，研究和解决宏观的、高层次的问题。

二、以科学化、民主化、社会化方式进行决策分析，是决策科学重大的进步

随着决策内容的复杂化，首先是决策空间范围的扩大，时间跨度的增加，紧迫感和系统性的增强，决策分析过程同决策过程便可以并且应该适当分离，变成两个相对独立而又相互联系的领域。决策分析因此社会化地分工出来，不仅形成为一个专门的学科，专门的产业——直接为科学决策服务的信息咨询业，而且形成了一批专门从事决策分析的专家队伍。决策的社会化带来了社会产业结构一系列深刻的变化。手工业的决策方式仅仅靠个人调查和分析，往往避免不了主观的作用；更严重的情况是拍脑瓜，个人说了算。在这种方式中，这种主观臆断是很难区分正确与错的。拍脑瓜拍对了，事情就办好了；拍错了，就付学费。

显然，依靠这种凭个人经验和个人智慧的个体劳动方式的决策办法来解决当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问题是难免不失误的。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决策技术的发展，决策方式已经从单纯依靠个人思维的手工业方式发展成为客观的、物质的、系统的工程性方式。这时，决策分析过程和决策过程便开始分离。现代科学技术终于深入到领导决策这个手工业方式最后的世袭领地。而这个领地的最后瓦解便从根本上瓦解了领导方式官僚化和封建残余的基础。手工业决策方式所创造出来的那种所谓明察秋毫、洞察一切（信息搜集的神话）和所谓高瞻远瞩、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决策分析和决策的神话）的“神人”也就成为历史的产物。

在决策分析过程中，充分体现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社会化，听取社会各方面的各种意见，进行各种论证和预测，是我们在首都发展战略研究中特别注意采用的方法。我们纠正了急于提出各种决策方案的倾向，坚持全面、深刻地了解和认识客观情况，分析矛盾。我们通过三个途径做好决策分析的社会化和民主化。

1. 坚持领导干部直接参加分析研究，而不仅仅是指导分析研究。领导干部一般工作较多，往往对具体事情可以从调查、了解、分析到决策，一个人进行到底，但对大的问题则难以参与决策分析。为防止这种偏向，我们坚持领导干部都亲自参加研究。领导小组召开了七次讨论会，全面、详细地研究了全市各方面的重大问题，发表各种意见，交换了思想，开阔了思路。很多领导干部觉得多年从事领导工作，但是总陷于具体工作，这样系统地研究全局性问题，收获很大。这种领导干部之间的重大问题讨论会是给过去垂直化领导渠道增加了一个领导干部之间横向沟通的渠道。

2. 发挥科研单位的作用。科研单位的专业研究和综合研究的能力较强，研究思路比较开阔，发挥它们的作用会使研究有创造性进展。我们还把研究划分为十五个分战略，组织有关部门进行超前研究，使得在最终对全市进行总体研究之前，就已经有了各方面的初步设想。

3. 充分征求中央各部门的意见，争取这些部门参加研究分析。

三、必须坚持把决策建立在 对客观的全面、正确地 认识上

大部分同志从各自的具体工作出发，对北京市的情况有所了解，但并不全面和深刻。而人们往往认为自己已经了解情况了，一开始就急于进行对策研究。我们注意纠正这种偏向，坚持把把握和综合分析市情、找出主要矛盾放在首要的、不可逾越的阶段位置上，用了近一年的时间来完成。通过这样的分析，终于全面地把握了市情，找到了人口、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水和土地等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城市基础设施、产业结构、人才、资金和经济体制等九大方面的困难，提出了首都发展基本矛盾是政治文化中心、城市发展和经济建设等各方面日益增长的需求超过了首都有限资源的矛盾。这些对市情的客观分析和认识已经被人们接受。重视并且认真进行对客观现状的认识，是克服决策分析的主观性，实事求是地把握客观，作出正确决策的首要条件。

四、积极采用现代化方法和 手段进行决策分析

现代科学的发展为决策分析科学化提供了条件，也为摆脱决策分析主观化提供了可能。首都发展战略研究从一开始就十分注意采用现代化的分析方法，如：对环境、能源、水资源等方面采用各种数学模型分析，积极利用了航空遥感的新成果，着手编制北京地区的价值型和实物型投入产出表，以便逐年分析比较北京的产业结构和进行宏观经济运行预测。

五、把长远决策和近期工作 决策结合起来

有了对长远建设的认识，便对当前具体工作的一些问题有了更深入的认识。我们防止发展战略研究成为纯学术性的，而将研究成果束之高阁；努力将它同当前的工作研究和政策研究结合起来。这次研究形成的对首都建设的新认识，很多已经被各级领导同志用以指导具体工作，在北京市“七五”计划中也得到了体现。还同水电部联合召开了水资源紧缺对策讨论会，为解决北京水源紧缺问题作了决策。

首都发展战略研究过程中对决策科学的探索还只是初步的，但对参加研究的领导干部的工作方式改进，促进领导干部决策的逐步科学化、民主化、社会化发挥了作用。领导干部决策方式的转变确实是一件长期而又十分重要的工作。它的实现，有赖于领导干部素质的提高。它是政治体制改革中的重要内容之

一。而只有实现了这种转变，真正掌握了这门“软科学”，而不只是挂在口头上，领导方法上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才能克服，决策上的重大失误才可能避免，实事求是的原则也才能在领导中体现出来。

关于首都发展战略研究的几个问题

首都的发展战略是个很复杂的问题。北京这个城市既具有首都的特性，又具有一般大城市的共性。它既是全国政治、文化中心，又在全国和区域经济当中起很大作用，既担负着建设首都的繁重任务，又要为全国建设提供资金，提供物质和技术，提供各种服务和信息。怎样把这些问题统一起来，发挥首都在全国的积极作用，是需要研究的重要问题。

（一）要研究首都的战略地位和作用。

北京的城市性质，中央已经作了明确的规定，是全国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在这个问题上，中央认真总结了北京城市的特点，集中强调了北京城市的本质特征，坚持了主要功能与多功能的统一性。现在我们要做的工作是，在深入理解“四项指示”和“十条批复”的基础上，要全面科学地确定城市功能。研究首都的功能、地位和作用，应着重解决三个问题：一是如何看待北京目前所处的战略态势，二是在城市功能问题上争论的核心问题是什么，三是如何全面科学地理解“四项指示”和“十条批复”。

最近，有些同志比较系统地回顾了三十五年来北京建设方针的演变历史。前三十年即从解放初期到一九八〇年基本上执

① 本文写于1986年2月。

行了一条在服务中央的前提下，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把北京建设成为现代化工业基地的方针。一九八〇年以来，各方面对中央的四项指示和十条批复都是拥护的。但是，怎样把建设的重点转到政治文化中心轨道上来，认识并非十分一致，有些方面还有较大分歧。

对于首都功能的认识，争论的核心是如何理解政治文化中心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或者说首都功能与北京城市经济功能的关系问题。有的同志主张，既是政治文化中心，就要限制经济的发展。但多数同志不同意这种观点。认为首都各项事业，特别是经济建设的发展必须服从、体现、服务于政治文化中心的建设。但是如何服务、服从、体现又有分歧。一种意见认为，北京的功能主要是服务中央，服务全国。因此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原来以发展工农业为重点的产业结构和以工业部门安排就业为主的就业结构，实行以第三产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和以第三产业部门安排就业为主的就业政策。要从根本上改变那种单纯强调第三产业为第一、第二产业服务的片面观点，强调第一、第二产业为第三产业服务。另一种意见认为，经济发展是政治文化中心建设的基础。特别是第二产业还是北京的支柱产业。政治文化中心的建设必须从北京现有的经济状况、财力情况、资源情况以及人民生活状况的实际出发，来调整产业结构，使之能在自己内部均衡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就是服从服务于政治文化中心的建设了。另外一种观点认为，科技是北京最大的优势，北京的振兴发展应以科技为先导，带动生产发展，形成首都科技——生产联合体，搞新技术、新产品的开发试制，以此带动首都的全面发展。还有一种认识，认为必须对首都的功能全面理解。北京既具有首都的特性，又具有一般大城市的共性。三十几年来，它一方面发挥了政治文化中心的作用，另一方面在全国和区域经济中也

确实发挥了很大作用，对全国的经济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这两个方面的客观事实我们都不能忽视。首都要想完成这样双重的任务必须进行重大的结构与技术调整。

这些观点反映了我们的认识还很不统一，虽然各有道理，但也都存在片面性。政治文化中心的含义包括什么，怎样认识北京城市的经济功能，如何在实践中创造性地贯彻“四项指示”和“十条批复”，正确处理政治文化中心建设同经济发展关系，需要进一步讨论，并作出明确回答。同时，更深入地讲，在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和相对集中管理的体制下，社会主义首都应具有那些功能，如何结合我国国情，从北京的实际出发，建设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符合北京特点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首都，这些本质性的问题也要展开讨论。

在开展讨论中，必须更加深入地理解中央书记处关于首都建设方针的四项指示的实质。把首都的各种功能、作用统一协调起来。使首都的精神文明建设与物质文明建设协调发展，使首都的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调发展，使政治文化中心的建设同经济建设、城市建设协调发展以及使城市基础设施同整个城市建设协调发展。

研究首都的城市功能与地位作用，还应该把眼光放得更开阔更远一点。从全国城市建设发展的方向看，随着我国经济建设、商品经济的大发展，我国的城市，特别是大、中城市都在由单一功能逐步转向开放型多功能的方向上去，在组织领导城乡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这符合现代经济，现代城市发展的规律。我们也应把握全国城市这种变化的趋势，研究我们的战略对策。

另外，从世界局势的发展来看，由于新技术革命的发展，世界的多极化发展成为一种明显的趋势。未来一、二十年中，太平

洋沿岸和亚太地区的经济社会有可能得到较为迅猛的发展。作为世界大国的首都，作为太平洋沿岸的特大城市之一，我们也必须有自己的战略对策。

总之，我们只有对我们自己目前的态势有一个清醒的估计，对首都的主要功能与其它功能的关系，尤其是政治文化中心与经济功能的关系有一个正确的摆法，对全国和世界局势的发展有一个明确的认识，对首都的功能、作用、地位有一个正确的评价，才有可能正确地确立首都发展战略的基本指导思想。

(二)要吃透市情，抓住主要矛盾，把握首都发展的有利条件和制约因素。

科学地制定首都发展战略，必须从我市的市情出发，从解决我市面临的主要矛盾出发。在对市情作深入透彻分析的基础上，确定我们的城市功能，确立长远发展的总体目标以及制定具体的政策。因此，认识北京，应该成为首都发展战略研究必须把握的一个基本因素。

分析首都的基本特征，我们会看到，优势与矛盾常常联系在一起。

市情的第一个特点，就是北京是全国的首都，是我国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是党中央、中央军委、国务院以及中央各部委等党政军领导机关所在地。背靠中央是北京最大的优势，是北京兴旺发达、繁荣昌盛的最主要原因。三十几年来，北京的建设发展受到了中央高度的重视，得到了中央最直接的关怀与指导。但是，由于管理体制上的矛盾，北京也确实存在着多头管理，重复建设，事权不清的问题。市情的这个特点，既是我们发展的动力，又是我们面临的矛盾，研究首都发展战略不能不重视这个问题。

市情的第二个特点是，北京建城三千年，建都八百年，祖先为我们留下了一份极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使这座城市具有深

厚的历史基础。到了现代，科教文卫事业高度集中于北京，使这个文化古城焕发了青春，增添了新的文化内容，在北京地区形成了极丰富的智力资源。“人杰地灵”，“文化荟萃”。科学教育实力居全国之冠。目前北京地区各种研究机构四、五百个，高等院校七十多所，研究人员五、六十万。科研人员占全国总量近百分之二十，分别是上海的二倍，天津的五点六倍。其中高级研究人员占全国同类人员的百分之三十五左右，分别是上海的三点八倍，天津的十四点五倍。而且，北京的研究人员也是全国素质最好，水平最高的，这是北京的财富，是优势。但是，这种优势目前并没有充分发挥出来，没有对生产力的发展起到应有的推动作用。还只是一种理论的或潜在的优势。一方面我们拥有科研人才实力，这是优势，另一方面又存在怎样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与生产力发展结合起来的问题。这也是我们面临的矛盾。

第三，北京工业具有雄厚的基础。三十几年来，我们努力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基地，工业得到了较快发展。门类齐全，综合生产能力较强，具有较高的经营管理水平和经济效益，有些产品和技术在全国乃至世界上都占有重要地位。这是我们建设世界一流首都，向四化进军，发挥北京更大作用的物质技术基础。但是，由于工业的发展，我们也确实面临着城市规模日益膨胀，交通拥挤，通讯紧张，水、能、原材料等资源不足，以及环境污染生态恶化的问题。

第四，北京是一个开放型的城市。三十几年来大批各类优秀人才流入北京，形成北京高智力结构，使北京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但是，城市人口机械增长过快。据初步测算，到二〇〇〇年，北京城市人口的规模，有可能为：城区六百万，加上流动人口可能达到七百万，郊区城镇人口二百五十万，农业人口二百六十万。城市化水平大大提高，超出了城市总体规划方案规定的市

区人口规模。城市可能过分膨胀拥挤。另外，北京还存在人口老化的问题。近年来，由于出生率一直保持在低水平状态，人口结构老化的趋势有了发展。据初步预测，到二〇〇〇年，北京的老龄程度按国际标准可能达到百分之十左右。即六十五岁以上的老年人口达到一百零七万人。进入了按国际标准规定的老龄社会。到二〇三〇年六十五岁以上的老人将达到二百三十七万，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一点四。人口老化的现象远远高于当今世界上人口老化现象最严重的瑞典（百分之十六）。与此相适应的是，劳动力老化现象也十分严重，二〇一五年北京五十岁以上的劳动者所占比重将由目前的百分之十点五，提高到百分之二十一点九，到二〇〇〇年，北京将面临劳动力不足的局面，三次产业的发展都要受到一定的制约。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北京人口老化的特点同世界相比，是起步晚，发展快，来势猛，绝对数大。国外是经济发达了，人口老化了。我们是人口老化了，经济还不够发达。人口老化对北京经济社会发展将会产生深刻的影响。

一方面，由于人口的增长，特别是机械增长，造成了城市规模的膨胀，产生一系列城市矛盾。另一方面，人口的文化结构，年龄结构，有可能要靠人口的机械增长来调整，很可能在控制人口机械增长的问题上，使我们左右为难。

第五，北京的自然环境同华北其它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相比，具有突出的优势。辽金以来，择此建都，除了政治、军事因素之外，适宜的自然条件也是重要因素之一。但是，北京这块土地承载相对规模较小的京都是适宜的。承载目前这样规模的现代化大城市就显得不足了。水、土地等不可替代的自然资源严重短缺。

据有关方面的预测，二〇〇〇年以前，在没有外流域调水的

情况下，北京可利用的水资源总量只有四十六亿立方米。从目前情况看，平水年，四十六亿立方米的水刚刚够用。但一遇偏枯年或枯水年，北京水资源紧缺的矛盾就十分尖锐。如果考虑到未来城市的发展，工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四十六亿立方米水就根本不够用。北京地区现有可开发的水利资源所剩无几，外流域调水，二〇〇〇年前难于实现。二〇〇〇年以前，我们不得不对各行业各部门包括人民生活用水在内，实行限量供应。城市用水必须增加一部分，所增部分又要靠工农业生产节水。首都各行各业都要在限水、节水的条件下发展。这一点，我们无法与世界上的一些大城市相比。这不能不妨碍城市现代化水平和综合服务能力的提高。因此，我们必须在这种困难的局面下找出我们的出路。

城市土地问题，是我们面临的又一大矛盾。解放以来，北京五次扩大市界规模，总土地面积达到一万六千八百零八平方公里。其中规划市区面积为七百五十平方公里，建成区面积控制在四百四十平方公里（人均用地一百一十平方米）。一九八一年城市用地三百五十一平方公里，城市人口人均占有用地八十一点三平方米。一九八四年建成区面积用地达三百六十五点九平方公里，人均占有用地七十九平方米。目前，规划城市用地的范围，所剩无几。而且七百五十平方公里范围内保留的农田，绿化隔离带多处被城市占用。乡村企业占地更多，而且缺乏统一规划。如果我们没有长远的对策，没有果断的措施，不仅市区规模无法控制，就是城市布局也将遭到严重破坏。一方面城市的建成区规模，特别是市区建成区规模要控制，另一方面，城市各行各业都要有一个大的发展，这是一对尖锐的矛盾。究竟是以“摊大饼”的方式，继续向外扩展，还是沿重要交通线搞带状发展，还是搞什么其它方案，我们应有明确的回答。

另外，城市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状况也十分严重。大气污染常年超标，其超标程度大大高于东京、巴黎、莫斯科等大城市八十年代初的水平。河流污染有的超标达几十倍，上百倍甚至几百倍。地下水污染的程度也有缓慢上升的趋势。同时，由于城市规模过大，北京已成为城市强热岛地区。特别要提出的是，据有关部门的预测，到二〇〇〇年，城市生态环境质量的变化很不乐观。一九九〇年反映污染程度综合状况的污染指数为一九八〇年的一点二到一点七倍，二〇〇〇年比一九八〇年更为严重。环境的治理是需要大量投资的。国外发达国家，为了治理污染投入大量资金。我们是不发达国家，北京的资金也十分紧缺。对待环境问题我们也必须有自己明确的方针。

第六，北京地处三北要冲，历史上就是交通枢纽。经过三十几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北京已成为四通八达的交通中心。通讯事业、城市基础设施与全国城市相比，也是最发达的，这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有利因素。但是，解放以来，机动车增加了八十八倍，非机动车增加了三十倍，货运量增加了二十倍，公共客运量增加一百倍，但道路建设只增加十二倍。城区道路用地率仅占百分之九，大大低于西方发达国家的首都（伦敦百分之二十三，巴黎百分之二十四，纽约百分之三十五，华盛顿百分之四十三）。人均道路面积更低，仅为三平方米。而且百分之八十以上的道路无法分快慢道，并且路网稀，卡口、堵头多，环路少、立交少，贯通全城的干道更少，严重制约首都的发展。同时交通结构也十分不合理。缺少快速、大容量轨道交通等现代化手段。据有关部门的预测，到二〇〇〇年，全市道路年货运量将比一九八三年增长百分之一百一十七，公共交通客运量年将达到五十二亿次，比八三年增长百分之七十八以上。各种机动车将成倍增长。自行车将从目前的四百三十万辆增长到七百万

辆，增长百分之六十三。对外交通的矛盾也更加突出，铁路、飞机等也远不能适应首都发展的需要。交通运输紧张已成为制约城市发展的重要因素。

第七，北京是全国首都，全国对北京的建设给予了巨大的支援。这也是我们的有利条件。但是，在目前和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首都的现代化建设既不能全靠中央资金，也不能无偿占有各省市的援助，必须依靠我们自己的经济力量，一方面建设好首都，另一方面支援全国的四化建设。这样，资金严重不足，也是我们面临的矛盾之一。

(三)要研究首都的经济结构。调整首都经济结构，是解决首都矛盾的关键。应从较高的层次和更宽的范围来看待首都经济结构的变化。至少应注意以下四个方面，一是首都产业结构的研究，二是技术结构的研究，三是产品结构的研究，四是城市综合服务结构的研究。

首先应研究产业结构，这是首都经济结构合理的主要基础。研究产业结构要注意一、二、三产业之间的关系。同时也要研究各产业内部的比例关系，使首都产业结构的变化真正能够体现出政治文化中心的特点，适应水源能源等资源短缺的情况，体现首都经济结构的合理性、先进性，能创造出高效率的工作条件，高水平的服务设施，高质量的生活环境，使城市从单一的生产型转为开放式、多功能的经营型，使社会主义祖国的首都生气勃勃，富有特色。

从目前产业结构的状况看，第三产业很不适应，三个产业之间比例不够协调。三产业的规模、数量、服务质量等远远不能适应首都功能和工农业生产发展以及人民生活的需要。解决产业结构不协调的问题，不能只是简单强调发展三产业，必须联系一、二产业综合考虑。

在各产业内部也存在着结构不合理的问题。各产业内部各行业也都面临着依据首都的功能进行调整的局面。面临着选择哪些行业作为重点发展行业的问题。

农业，在北京仍然是个很重要的部门，在城市现代化建设中担负着重要作用。目前，对北京农业的功能有些争论，核心是郊区农业如何在服务城市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一种意见认为要成为副食品基地，另一种意见，还要建立起吸收城市扩散工业，为城市工业配套的工业结构，同时，在保护城市生态环境，增强城市环境自净能力方面起更大的作用。这些争论涉及北京农业发展的方向。应讨论清楚。从长远看，郊区农业与城市经济发展一体化的趋势日益明显，郊区应更多地承担城市发展的任务。郊区的农业结构是要起变化的。我们要结合目前北京市区与郊区的实际状况把这个问题讨论清楚。

郊区的另一个矛盾，是北京市场大，郊区小，远远不能适应北京城市发展的需要。因此农业应从多方面想办法。首先应对二〇〇〇年人民消费水平的增长有一个清醒的估计，据以预测人民对农产品的需求量，然后从我们的实际生产能力上找出矛盾，提出实际的对策。

北京农业发展的方向应是先进的大农业方向，包括农林牧副渔，农工商运建等综合发展。每个行业的发展方针是什么，具体措施是什么，以及技术改造，地区政策，农副产品的补贴政策等等都应进行综合研究。特别应强调加强农村科研对策的研究，建立起先进的生态型农业，对全国的农业发展起示范作用。

北京地区农业合作经济的模式应成为重点题目。北京郊区是全国最富裕的地区之一，同时兼有城乡两方面的优势，未来很可能是一块发展最快、最有前途的地区。它的社会生产的组织形式也应对全国产生积极影响。

北京地区工业的问题比较复杂，研究起来困难大一些。但是有一条应明确，北京是首都，是全国大城市之一，我们建设的目标不但要使这座城市充满生机和活力，更要使这座城市具有坚强雄厚的实力，使它立足于世界首都之林。这一点不容置疑。问题的关键是我们的工业到底搞些什么，方向是什么？这是我们必须深入研究反复论证的根本性问题。其实中央书记处的“四条指示”和“十条批复”已经作了最本质的回答，就是要发展适合首都特点、代表新生产力发展方向的工业。这里四个比例关系，即轻重工业的比例，这是工业结构合理化的基础；新兴工业与传统工业的比例，不应忽视现实的基础，更不能忘记我们是北方新技术革命的基地；加工工业与原材料工业的比例，最后是各行业内部的比例关系。

对于第三产业的发展应用现代化的观念去理解。也应把三产分为传统三产和新兴三产两块。传统三产主要是个政策问题，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去办三产。同时把国家同消费者之间的关系变成生产者同消费者之间的关系，消费者同消费者之间的关系。传统三产有个现代化的问题，这要依靠现代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传统三产的规模也要受到工农业生产、人民消费水平以及流动人口增减的影响。

新兴三产应是我们努力发展的重点。过去我们忽视产前产后的服务，忽视综合服务功能的发挥，使三产的发展十分落后。今后应大大加快这部分发展的速度。我强调三点：一是智力产业，这在北京具有深厚的优势。现在这个产业刚刚出现，应研究它的规律。二是金融产业。“七五”期间，金融政策会出现较大的变化，金融业会很快地活起来，金融组织经济活动的作用会越来越明显。而且金融业投资少、利润高，是我们的优势产业，应有对策。三是公共市政的服务业，包括公用事业，房地产等等，

这也是我们研究的重点。三产范围很宽，我们应抓住重点，以高水平的三产业服务辐射全国。北京的三产全市关心，全国关心，中央关心，我们应把它办得很有特色。

经济结构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技术结构与产品结构。要实现首都经济结构的合理化，必须有这两方面的内容相配合。所谓技术结构，主要是指不同先进程度的技术手段之间的相互联系和数量比例。它反映劳动者技术装备的程度，反映技术现代化的水平，也反映我们社会化的程度和生产文明化的程度。因此我们必须重视技术结构和产品结构的研究。这里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处理好新兴技术与传统技术之间的关系。在这方面我们的方针和对策是什么，必须有一个明确的回答。

从城市特点出发，为了强调首都的服务功能，我们在经济结构中加入了一个城市综合服务结构。它的内容应包括，城市的基础设施结构，第三产业结构以及各种综合服务结构。这方面的研究是否也应大大加强。

(四)要研究首都的社会结构。社会结构是一个很广泛的概念。经济结构也是社会结构的一部分。我们这里讲的是社会的小概念。但就是这个小概念的内容，我也不能讲全，只能强调三点：

第一，要重视科技的作用。科学技术是北京的最大优势。北京的全面发展应强调科技对各行各业的改造与带动作用。同时还应强调北京科技对全国的辐射作用与影响。应该看到，北京既是代表中华民族文化的历史名城，同时也是我国现代科学技术的重要基地之一。这里汇集着我国水平最高，素质最好，物质技术基础最雄厚的几十万科研队伍和几百个研究机构，北京是智力资源的密集区。现在的问题是潜在的优势并没有变成现实的优势。症结何在？如何实现北京地区的科研联合，科研与

生产联合，科研为发展服务？这些应成为战略研究的重点。

第二，要重视教育的作用。北京也是全国教育的重要基地之一。出人才是中央对北京的希望，也是北京服务全国的重要方面。是否应抓住教育结构，中小学师资的训练，在职干部培训，以及人民群众文化水平的提高和教育投资等几个问题，在重点上有所突破。

第三，关于北京的社会问题。是否能抓住社会风气、社会风尚、道德水平和城乡关系、地区差别、人的收入差别引起的社会问题以及北京的老年人问题进行研究。

(五)要研究城乡布局。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的合理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区布局的合理化。调整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很大程度上是要调整城乡布局结构，因此地区布局问题也是很重要的研究内容。

这里是否重点解决这么几个问题：一是功能分区。主要是城区、近郊、远郊、山区的不同功能的研究，按照城乡一体化的原则考虑好全市的整体布局，二是要把北京市放到区域即华北地区的范围内去考虑，从首都圈的大范围来考虑城乡、工农业生产等各方面的布局。华北区域内的城市，特别是承德、张家口、廊坊等地怎么联合发展，与天津怎么联合的问题也要考虑。三是要考虑地区差别问题。还要从时间顺序上安排好各地区的发展，四是各区县的各自优势与全市优势如何结合的问题。五是要着重研究城市的土地资源价值及开发利用问题。

(六)要研究城市运转的机制。主要强调三点：一是投资体制、方向、规模结构问题。二是市场机制与对外开放，这是一个大问题。三是整个城市的经济管理体制问题。此外，关于目标和指标体系问题，关于建立一些数学模型问题，关于建立外向型经济问题等等，也要研究。

首都发展战略研究报告^①

1、建国以来，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央各部门的领导关怀下，在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力支援下，首都的建设与发展取得了重大的历史性成就，同时也经历了多次波折，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从八十年代起，到下个世纪前五十年，是我国全面走向世界，实现民族振兴、国家昌盛、人民富裕、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历史时期。同时，也是世界各国尤其是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各国，在世界新技术革命和改革两大潮流中，激烈角逐，奋力获取经济和技术新发展的时期。国内外发展变化着的新形势，特别是改革、开放带来的新的机遇和新的挑战，迫切要求社会主义中国的首都北京，根据国家总体发展战略要求和自身的条件，不失时机地作出正确的抉择，以争取长远发展上的全局性主动权。为此，中共北京市委和北京市人民政府作出了开展首都发展战略研究的决定。

2、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确立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总方针，是首都发展战略研究的根本指导方针。1980年4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首都建设方针的“四项指示”和

① 本文作于1987年11月。

1983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对《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十条批复”的基本精神，是首都发展战略研究的指导原则。根据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战略任务，必须把发展社会生产力，加快科技进步，提高劳动生产率，摆脱贫穷、落后和不发达状态，作为战略研究的基础，并进一步深入到城市发展的各个方面。从而使北京在推动全国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促进城市社会生产力在高水平上的发展。这样，才能按照“四项指示”和“十条批复”的基本精神，实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首都的各项要求。

3、取得社会主义制度优越于资本主义制度的胜利，进一步实现人民不断提高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愿望，决定因素是生产力的发展。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必须坚持生产力为基础的标准。首都发展战略研究，力求贯彻和体现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并且力求同国家的发展战略相衔接，同北京的实际情况与特殊地位相结合，寻求适合国情，又适合首都特点的战略发展思路，和基本的战略对策构想。

第一部分 北京的战略地位和发展方向战略地位

4、北京是当代社会主义中国的首都，是世界著名的文明古都和现代文化名城，也是重要的综合产业城市。这是北京目前乃至今后较长时期，在国际和国内经济社会发展格局中所处的战略地位。北京目前所形成的政治功能、文化功能和经济功能融为一体的城市特征，市特征，是其地理、民族经济、文化、军事等诸多因素相互作用和长期演化的结果。它的形成，不仅表现

出社会主义国家首都政治、经济、文化集中统一的一般规律，而且表现了处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大城市的基本特征。北京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是城市繁荣兴盛诸因素中的主导因素，它决定着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方向和基本格局。北京的各项事业都要在有利于加强和完善政治文化中心功能的前提下发展，各项工作都要服从、服务和体现城市性质的根本要求，并在与之协调统一中确立发展的立足点和动力。

5、北京作为我国的政治中心和行政管理中心，是全党全国的神经中枢，是示范全国现代化建设的“首善之区”。对国际来说，北京是全面展示当代中国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最主要窗口，是国际和国内在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等方面相互联结的桥梁与纽带。同时，北京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指挥部所在地，对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实践紧密结合，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并将产生深远的国际影响。

6、北京是世界著名的文明古都和现代文化名城。在世界 76 个国都和历史名城中，北京的建城史居第 4 位，建都史居第 13 位。北京拥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4 项，占全国总数的 9.6%。在近代新文化运动兴起过程中，著名的“五四”运动和“一二·九”爱国救亡运动，为北京的历史增添了新的光彩，我国一大批伟大的革命家、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都在这里创造了光辉的业绩。建国以来，随着经济建设和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城市环境不断美化，人口素质不断提高，各类专门人才大量涌现和云集，艺术团体日益增多，使北京成为国内科学、文化、艺术、道德水准较高的地区，成为世界当代重要的文化名城之一。北京丰厚的历史遗迹、革命遗存与现代科学文化教育事业的辉煌成就相融合，构成了北京特有的城市文化体系。它不

仅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粹，同时也是当代社会主义中国新文化的代表和现代化建设重要的精神产品生产基地。北京城市文化巨大的内在推动力量，将持久地强化着首都政治中心的凝聚力和辐射力，并成为北京城市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社会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北京作为中国和东方文化的代表，正以她独特完整的文化体系，影响着当代世界文明的进程。

7、北京是我国科学技术和人才高度密集的地区。北京作为全国重要的教学和科学技术研究开发基地，拥有国家一流的实验设备和手段，具有国内其它地区所不及的智力优势。北京地区拥有的各类科研机构占全国总数的 5.7%；重点高等院校占全国的 1/4；科研人员占全国科研人员总数的 18.4%。特别是中关村地区，集中了国家级科研机构 40 多所，高等院校 27 所，科技人员达 4.5 万人，智力密集程度和结构系统程度为世界罕见。北京已成为我国在科学技术上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先导城市之一。

8、北京是重要的综合产业城市。经过 38 年建设，北京已成为我国具有相当生产规模，基础比较雄厚，门类比较齐全的现代化工业基地。这个基地不仅成为首都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建设的强大经济依托，而且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占有重要地位。1986 年北京工业产值为 322 亿元（不包括村办工业），国内生产总值为 284.8 亿元。随着产业结构向高度化发展，航天、信息、微电子、新型材料、生物工程等新兴的高技术产业在北京已具雏形或开始出现。以提供全面、优质和高效率服务为目标的第三产业，开始进入新的发展阶段。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北京同世界各国的经济技术文化合作和贸易规模正在迅速扩大，到 1986 年底，国外驻京商社已达 924 家，中外合资、合作企业和外商独资企业已有 189 家，协议金额 21.6 亿美元。北京已经成为

我国最大的多功能中心城市和对外开放城市之一。

9、北京是我国的交通和通讯枢纽，是集散人流、物流、信息流的中心。北京地处我国三北要冲，自古以来就是南北贸易互致，民族文化相互融合的交汇点。经过解放以来38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已拥有较大的交通集散能力，担负着繁重的客货运输任务。现有国内铁路干线7条，成为联结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铁路总枢纽。北京是我国最大的民航运输口岸，目前拥有国际航线23条，国内航线34条。北京还是华北地区公路网的联结点，拥有对外放射性干线9条。目前，北京的现代化通讯设施，可与30个国家和地区建立直达线路，通过接转可与世界各国和地区通话；同30多个国家与地区相互开办了国际特快邮递业务；国内可与29个省市、130多个城市迅速通话。北京设有各类全国性的管理中枢，每天产生、收集、处理和发布大量信息，已成为我国层次最高、容量最大、内容最广泛的信息生产源和集散中心。

历史使命和发展方向

10、解放后的前30年里，在全国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北京的建设与发展基本实行了一条变消费性城市为生产性城市，建设全国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以及现代化工业基地的方针。这条方针对于加快城市发展，发挥政治文化中心功能，完成全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基阶段的基本任务，起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缺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城市的经验证，对城市化发展的客观规律和首都建设的特殊性缺乏深刻认识，许多工作是探索进行的，加上受到有限自然资源等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因而在城市发展，同各国工业化过程一样，也相继出现了日益尖锐的城市问题。八十年代初，在首都面临向新阶段过渡的关头，中央书记处

总结了北京发展的历史经验，从北京在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地位、作用出发，做出了关于首都建设方针的“四项指示”；尔后，党中央、国务院对《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做了“十条批复”，从此，首都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11、当代中国以其强大的政治实力，巨大的经济潜力，和历久不衰的文化吸引力，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影响着国际政治格局，成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进步的基本力量之一。北京作为当代社会主义中国的首都和亚洲及环太平洋地区的大城市之一，担负着国内和国际赋予的重要历史使命。它的兴盛与发展，对于中国和世界的未来，蕴含着深远的历史性影响。

12、从世界城市化进程的一般规律观察，北京的城市化大体处于从初期向中期过渡的阶段。即：产业及人口大规模“向心”聚集的过程已经接近完成，聚集的速度开始减缓；产业结构开始发生重大转变，以增强城市服务功能为主的新兴第三产业已具雏形；城市郊区的开发建设已经起步。预计，城市中心区持续膨胀的势头将在下个世纪初达到顶峰，以后随着我国生产力的发展，工业化向新阶段的迈进，北京将出现市区科学技术、产业和事业单位以及人口较大规模的扩散，并逐步在更大区域范围形成以首都为核心的联合城镇群体。

13、考察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进程，按现有的经济发展水平衡量，北京大体上比全国平均水平超前 10 至 15 年达到小康生活水平。但是，由于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从总体上看，北京仍是一座发展中的城市。城市建设、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的大城市；城市的承载能力与交往能力都与大国首都所应担当的国内外事务相距甚远；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道德观念，社会主义的民主观念和法制观念还有待大大加强；适应现代化首都所要求的高效运转的城市机制，还有

待经过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的改革逐步建立和完善。总之，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低下，管理体制的不完善，以及自然条件的制约，严重影响着政治、文化中心功能的进一步加强。这是目前北京发展所处阶段的基本特征，也是选择北京长远发展战略目标的基本出发点。

14. 加强与完善政治文化中心的功能，是指导首都各项事业发展的总方针，是实现城市有序运行的主导因素，对此应当坚定不移。同时，马克思主义还告诉我们，政治、文化功能从来不是空中楼阁，它的形成和完善，要取决于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经济实力的增强。北京作为政治、文化中心，对于经济功能并不具有必然的内在排斥力，只是对经济发展的内容、方式和规模作出了更高的质的规定。党和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首都的发展与建设必须服从于这个根本任务，这样才能正确处理好政治文化中心建设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北京的发展才有旺盛的生命力，政治文化中心的主导功能才能更加突出；也只有抓住这个中心，才能动员全市人民为实现首都的各项发展目标而共同奋斗。

15. 基于以上判断，由北京的战略地位和经济不发达的基本国情所规定，北京的长远发展方向和目标是：建成具有发达的政治、文化、国际交往中心功能和较高经济社会综合效益，充满活力和发展生机，高度民主和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首都。

北京未来的发展目标由以下主要部分构成：

第一，长久地保持城乡的繁荣与发展。实现首都广阔地域空间组织的均衡化和城市有限资源的合理配置，实现城市管理科学化，形成良好的生态环境和发展环境，是北京保持繁荣发展的基本前提条件，也是强化首都功能的基本要求。要通过合理布局，大规模发展与城市性质相适应的各项经济事业和高技术

产业，全面实现城市基础设施的现代化，全面促进各项文化事业的发展，为这座历久不衰的文明古城注入旺盛的生机和新的活力，以求长久地保持国家首都的强大功能和地位。

第二，创造崭新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文明。北京有形和无形的深厚民族传统文化基础，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仍将是民族社会心理和价值观念统一的基础，是国家凝聚力量的重要构成因素。同时，它也将成为促进城市蓬勃发展的内在动力之一。要通过大力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充分运用现代化科学技术成果，广泛地吸收融合世界进步文化，不断创造出与国家和时代发展相适应的现代化北京文明，促进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和世界文化的繁荣。与此同时，造就一代又一代具有崭新社会主义精神风貌和高尚道德情操的北京人。

第三，加强首都城市的主导作用。北京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最高指挥部所在地，它在全国的城乡建设、产业发展、技术进步、人才培养、道德风貌等方面，具有极强的示范和影响作用，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城市的发展方向上居于不可替代的主导地位。随着改革、开放的全面发展和现代化水平的全面提高，北京将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诸方面，与其它中心城市协同起来，推动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第四，建成国际交往中心。北京负有全面沟通中国与世界联系的重任。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提高，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城市现代化水准的提高，在未来的全球战略中，北京将与华盛顿、纽约、莫斯科、伦敦、巴黎、东京等城市一道，共同成为国际间政治、经济、外交、文化、民族等事务交往的中心城市，这是国际社会赋予北京的重要使命，也是社会主义大国首都和世界文化名城所应担负的责任。为担当这一重任，应从现在起，在国力和财力允许的条件下，尽可能地按照国际标准，逐步把北京建设成为

世界级的国际交往中心，促进国际社会的协调和稳步发展，推动人类的进步与和平。

第二部分 北京发展面临的基本矛盾

16、北京肩负着光荣而艰巨的历史使命。然而，面对跨世纪的发展问题，在主观方面和客观方面都程度不同地受到若干因素的制约，前进中仍面临着许多困难，发展中还潜伏着某些危机，这是无法回避的现实。为了有步骤地实现战略目标，首先需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全面揭示北京发展面临的基本矛盾，深刻剖析基本矛盾的内在经济关系，准确判断矛盾各个方面质的规定性，充分估计未来可能遇到的各种困难。只有从这个基本点入手，才有可能站在战略高度，依据北京发展的客观规律，有针对性地选择实现战略目标的基本途径，科学地划分战略发展阶段，确定战略重点，并相应制定逐步实现战略目标的基本对策。

17、城市化趋势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在城市化过程中，也带来了人口急剧膨胀、交通拥挤、住房紧张、环境质量恶化等问题，这是国内外大城市在发展过程中曾经或正在经历的阶段。北京从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濒于衰落的城市，转变为社会主义中国的首都，继而迅速发展为具有千万人口和相当规模工业基础的特大城市，从而使城市各种功能之间形成极为复杂的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在社会生产力不发达和城市功能迅速转变的特定发展阶段，北京不可避免地既有世界大城市发展的一般矛盾，又具有不同于国内外其它城市的特殊矛盾，主要表现为：在有限的地域空间内，由于受到自然资源、产业结构以及分割体制的制约，

经济发展直接为城市建设提供的供给能力十分有限，而政治文化中心建设和为强化城市功能不可缺少的经济建设、城市各种设施建设等，都持续扩张着需求，造成总需求急剧膨胀，超过了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的供给限度。这种状况长期存在，必然导致城市系统总体呈现“紧运行”状态，供需之间结构性失衡异常突出，供不应求所引起的局部“超紧运行”状态十分明显。北京的特殊地位，为北京增加供给的社会制约性和需求膨胀的无约束性提供了特殊的条件，形成了特殊的不对称的供求机制。

基本矛盾的显著特征

18、北京发展面临的基本矛盾，首先表现为政治文化中心建设和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受到有限资源的强烈约束，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明显超出基本动态均衡的限界。

人口规模急剧增长，导致需求持续膨胀。截止 1986 年底，北京常住人口达到 971.2 万人，比 1949 年底的 203.1 万人，扩大、增加了 768.1 万人。特别是人口迁移增长规模和速度，在国内其它大城市中是最高的。尽管从五十年代末期开始控制人口迁入，七十年代开始普遍推行计划生育，但是人口增长的势头仍然没有得到有效的缓解。1980 年到 1986 年，全市常住人口净增长 101.5 万人，平均每年 14.5 万人。近年来，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北京市的流动人口急剧增加到日平均 110 万人左右。北京实际负担人口总数已经超过 1100 万人。人口的急剧增加，带来城市对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的需求成倍增长，资源的人均占有水平大大下降。

城市建设规模过大，超过了现有自然和社会资源供给的承载限度。北京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大，基本建设战线过长，是导致城市总需求膨胀的又一重要原因，也是首都建设难以治愈的

“顽症”。自第四个五年计划以来，全市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平均每五年翻一番，在建总规模逐年增加。广大的建设规模和急剧增长的建设需求，大大超过了目前北京的建设能力和资源承载能力，超越了现阶段国情国力允许的限度。因而，不仅使在建项目的建设周期延长，投资效益普遍下降，而且给物资、财政、信贷的平衡，以及自然和社会资源的配置造成极大困难。

水、土地等不可替代的自然资源严重短缺，城市发展受到有限资源和空间的严重制约。北京是个严重缺水的城市，目前每年可供分配使用的水资源，平水年一般为 40—42 亿立方米，枯水年只有 33—35 亿立方米；人均占有量为 400 立方米左右，为全国人均占有量的 1/6，世界人均占有量的 1/25。近年来，城乡用水总量已接近水资源的可供量，供需矛盾十分尖锐。更为严重的是，城市中心区和新建区地下水开采量已超过可供量，从七十年代以来，每年平均超采 1 亿立方米左右，累计超采 18 亿立方米水位普遍下降，漏斗中心水位下降 30 米左右，形成了近千平方公里的地下水集中开采下降区。在现有用水结构不做重大调整的情况下，2000 年的需水总量可能达到 55—60 亿立方米，而可供量却难以增加，供需矛盾将进一步呈现“超紧”状态。北京人口、产业和党政机构在空间范围高度向心集中，以及随之而来的高度聚合开发，使市区有限的建设用地日益匮乏。目前，规划市区 440 平方公里的城市建设用地已基本占满和划拨完毕，规划保留的农田和绿化隔离带，也不断被挤占蚕食。城市中心区地域空间的有限性，严重制约着城市未来的发展。

基础设施建设落后于城市建设，城市载体长期处于超负荷运转状态，环境质量不断恶化。长期以来，北京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速度大大落后于城市主体设施的建设速度。据有关方面计算，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应占城市固定资产投资的 35%，而 37 年

来北京只占 20.8%，导致基础设施的负荷能力难以承载城市建设规模的增长，长期处于严重的超负荷运转状态。其主要表现是，给排水设施欠帐太多，日供水能力只有 168.5 万吨，用水高峰期间日缺水 15—20 万吨；下水道普及率只有 27%，污水处理率只有 9%，与实际需要差距悬殊；热力、煤气、电力供应全面紧张；对内对外交通拥挤堵塞，城市道路年增长率仅为客运增长量的 20%；邮政电信落后，市区电话普及率只有 8.1%，电话拨打接通率仅为 50.8%，邮件处理能力严重不足；城市环境质量进一步恶化，废物总排出量已逼近环境容量的可能性边界；防灾设施严重不足，抵御灾害的综合能力低下，等等。

资金供给远远满足不了首都建设对资金的迫切需求。北京是全国的对内对外窗口，实现党中央和国务院对首都建设的要求，标准高、时效性强，需要较多的建设资金作为保证。但是，在现行财政体制下，一方面，一些体现首都优势的高利税产业（如金融、中央直属企业等）实行税收代理制，北京难以留用这部分资金；另一方面，市属企业收入由于实行大半上缴的分成制，使地方财政只有吃饭的钱，没有建设的钱，难以较快地扭转产业结构不合理，基础设施落后和自然资源紧张的被动局面。

19、北京发展面临的基本矛盾更尖锐地反映在供需之间严重的结构性失衡。

人口年龄结构日趋老化，各方面专门人才严重短缺。人口老龄化是北京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1990 年，北京 60 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将增加到 110.3 万人，占总人口的 10.6%，开始进入按国际标准规定的老龄化社会；到 2000 年，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将为 14.7%，成为老年型城市；2000 年以后，老年人口增长趋势更为迅速，2030 年将增加到 314.1 万人，全市每 3.5 人中就有一个 60 岁以上的老人。这种人口老化先于经济发达

并且“超高速”到来的趋势，必然使劳动力资源的供求出现结构性短缺，劳动力人口负担过重，并对未来的消费结构、经济结构，以及社会保险、医疗保健和各种服务设施，提出许多新的要求。北京与国内一些城市相比，教育基础比较好，智力相对集中。但从北京是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的特殊地位看，人口素质亟需极大提高。据 1982 年人口普查统计，北京 6 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7.8 年。六岁以上人口中，初中文化程度占 31.7%，小学文化程度占 28.5%，文盲、半文盲占 15.3%，共占 75.5%，低文化素质人口的绝对量很大。目前，北京市各类专门人才只占全市职工总数的 11.1%，人才的严重短缺，将成为首都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

产业和人口的空间布局不合理，城市资源的分配在地域间极不均衡。北京城市总需求的急剧增长，从空间布局上看，主要集中在城市中心区和新建区。规划市区面积只占全市的 4.5%，却集中了 87% 的市区人口，100% 的中央、市级机关，90% 的科研单位和高等院校，80% 的中央、市属工业企业。城市中心区每平方公里的人口密度为 2.7 万人，而近郊和远郊区的人口密度各依次下降一个数量级。1986 年，规划市区常住人口达 520 万人，已远远超出 450 万人的控制目标，加上流动人口，实际负担人口已达 640 万人。由于城市人口和企事业单位过分集中于城市中心区和新建区，城市生产和生活活动的总需求，必将超过现有土地、水源、环境和基础设施的实际负担能力。目前占全市土地面积 87.3% 的远郊区，十四个城镇的人口仅有 57.6 万人，资源和环境的开发潜力很大。但由于交通不便，基础设施和生活服务设施不完善，教育与文化事业不发达，难以起到疏散城市中心区产业和人口的作用。

产业结构不合理，产业空间的高度集聚和外延式发展与政

治文化中心建设争夺有限资源的矛盾十分尖锐。北京工业规模过大，三次产业的比例关系极不协调。1985年国内生产总值中，第一产业占6.9%，第二产业占59.8%，第三产业占33.3%；从业人员，第一产业占18%，第二产业占45.9%，第三产业占36.1%。在工业内部结构中，机械、冶金、化学三大资源消耗型的传统工业部门又占较大比重，其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59.4%，水耗占43%，能耗占70.1%，所需基本原材料大部分靠外地调运。近几年虽经努力调整，但变化不明显。产业结构不合理，必然导致在有限空间内的生产活动规模挤压行政公务活动和人民生活活动规模，从而进一步加剧了城市可供资源的紧张状况。近年来，为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发展了一批新兴耐用消费品工业，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外汇支撑，成为新的“资源约束型”产业，使北京工业发展在受到水、土地、能源等约束的同时，又出现外汇资金短缺的新问题。

建设投资比例严重失调，城市建设与发展后劲明显不足。长期以来，北京地区的各项投资主要由“条条”下达，各单位有钱建设自己的项目，地方政府无钱建设为之服务的公共项目，各单位的投资越多，公共项目欠帐越多。建国以来，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中，中央单位项目占50.9%，地方项目仅占49.1%，而为主体建设配套的市政基础设施投资主要靠地方解决。以北京市微薄的财力，跟在千家万户基本建设膨胀的后面堵窟窿，必然导致城市运行的资源供给能力不断降低。“四五”时期，北京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26.3%，欠帐已经十分明显；到了“六五”期间，这一比例下降到16.8%，形成旧帐未还，又欠新帐。此外，由于财政支出中用于补贴的份额逐年增长，使得生产性建设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的财政支出比重被迫减少。1978年各项补贴为2.16亿元，1986年激增至19.6亿元，当年地方财

政用于生产性建设的投资仅有1亿多元。这种状况如不改变，北京发展面临“无米之炊”的窘困局面将进一步恶化。

基本矛盾形成的主要原因

20、北京发展面临的矛盾，其形成原因，既有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变化的影响，和一定历史条件下某些方针、政策的制约，也有宏观管理在探索尝试中难免付出的“代价”。但最主要的原因，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不发达，生产社会化程度低，以及制度和体制上的不成熟、不完善。

城市是社会化商品经济和文化发展的产物，现代城市有较高程度的社会化分工。集约的城市空间构造和基础设施结构形成了现代化城市运转的物质基础。在这个基础之上，形成集约人口、集约经济和集约的科学文化，使社会运转具有集镇和农村不可比拟的高效率。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城市的高效率是资本形成的必要环境，它吸引着资本向城市集聚，获得高于社会的平均利润率，表现为资本的城市化。这是资本主义城市化达到一定水平之后，城市内部总需求加速膨胀的根本原因。资本主义国家抑制城市需求膨胀和增加城市供给总水平的主要办法，是采取高物价、高税收等政策，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平衡城市资源的供求，并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完成城市现代化的各项建设任务。

在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公有制还不完善的条件下，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诸多利益主体。多元化的利益主体及其利益机制，驱使全社会各个部门、单位及个人，把平等地使用较为完备的生活服务设施和各项基础设施，平等地享受优厚的福利待遇，作为本部门、本单位或个人的基本权利，以及寻求发展的重要目标，在争夺城市资源上没有什么自我约束。他们往往是以最低的利

益损耗，形成实际的更多的需求扩张，或者虽然创造了一定的供给，却同时产生出更大的需求。所以，尽管城市与乡村、大城市与中小城市相比较，在发展和建设资金上占有明显的优势，投资总量相对来说是较多的。但是，不同的利益主体决定了各自的投资偏好，有限的资金并不能有效地组合并提高城市的供给能力，而相反地不断生成新的需求。这种利益主体关系造成的供求不对称（向需求倾斜）长期存在，必然导致供求总量及结构性严重失衡。在以往的城市宏观管理中，利益协调机制和创新机制都很不完善，物价、税收等经济杠杆的调节作用极其微弱，在兼顾条块各方利益的管理体制之下，行政调节的强度也十分有限。因此，地方政府对城市总需求膨胀既不能进行有效的社会约束，更无条件建立不断增加资源供给能力的发展体系，从而造成各种“城市问题”日益尖锐化。

北京是中央党政军领导机关所在地。在传统体制下，各方面、各部门、各单位凭借各自特有的条件，实现各自的追求，争相使用或占用城市资源，不断扩张着实际的需求。与国内其它大城市相比，北京地区的需求膨胀来得更直接、更迅速、更加难以抑制，尤其是在现行财政体制下，地方政府的财力根本无法满足建设全国首都的资金需求。这是北京城市呈现“紧运行”状态的根本原因。

21、必须看到，在目前我国从旧体制向新体制转换时期，在社会生产力需要较长时期才会逐渐提高起来的历史条件下，北京城市供需总量失衡和结构性矛盾，将是一个此消彼长，相互作用的较长过程。这种错综复杂的相互交织作用，既包括供需总量失衡而制约结构调整的规模和进程，结构失衡反过来又加剧总量失衡的程度；又包括顾及眼前矛盾，而影响长期目标的实现，和追求长期目标又往往受到现实矛盾约束的“两难”问题。

根据预测，在严格控制的前提下，2000年全市常住人口将接近1200万人，流动人口将突破200万人，实际负担人口可能达到1400万人；规划市区常住人口将达到650万人，超出规划指标200万人，实际负担人口将达到850万人左右。2020年以后，常住人口的增长可能出现缓慢回降的趋势，但总规模也将突破1400万人。到2000的15年间，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可能达到1500亿至1700亿元，房屋竣工总量累计将达到1.2亿至1.5亿平方米，相当于再建一个目前规模的北京城。在这个过程中，人口结构、投资结构都将产生一系列极其复杂的变化，因而将对城市的“紧运行”状态产生很强的惯性作用。面对未来城市总需求不可逆转的膨胀趋势，和城市总供给能力需要通过艰苦努力才有可能稳步提高的现实，实现首都发展的战略目标，必须在新的历史时期，通过全面改革，把改革与发展结合起来，大胆地寻求新的出路。

第三部分 北京发展的基本途径和战略阶段

22、实现北京发展的战略目标，克服前进中的矛盾与障碍，必须根本扭转放松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倾向，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正确处理政治文化中心建设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努力增强资金、资源、技术实力，为政治文化中心建设提供强大的物质保证。同时，摒弃传统封闭的发展模式和狭隘观念，从解决北京发展面临的基本矛盾入手，选择既符合当前实际情况，又充分估计改革、开放前景的正确发展途径，进而确定不同发展阶段的主要任务和基本对策。

基本途径

23. 逐步完成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的转换，为城市正常运行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建国后的前30年里，随着我国工业化的起步和发展，北京政治文化中心功能和城市其它各项功能处于形成发展时期。这一时期，在全国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客观环境里，北京基本上走的是一条外延和不够平衡的发展道路。为了实现首都发展的战略目标，从现在起，要不失时机地实行发展模式的战略转换。

即：变急于求成、盲目铺摊子、以外延扩大为主的城市发展方式，为以提高城市土地、环境、设施建设的聚集效益为主的内涵发展方式；

变分散投资和追求产值、数量的粗放型经营，为集中投资，追求效益、讲求质量的集约型经营；

变以本地区配套自求平衡为目标的封闭式发展，为面向国际国内市场，以国际市场引导国内市场，在更大的系统中求平衡的开放式发展。

为此，必须从现实的国情国力出发，加强对城市发展规模总量的控制，把提高城市经济、社会、环境的综合效益作为首都发展的主要考核指标；以城市短线资源确定适度的经济社会发展速度和建设规模，并以此为基础组织好人财物的综合平衡，组织好财政、信贷、外汇收支的综合平衡；必须大大加强城市资源配置的调控能力，改革现行的管理体制，调整并完善对城市发展有重大影响的法规和经济政策，强化依法治都的手段和措施；必须从城市发展的总目标出发，依据不同发展阶段的实际情况，调整投资结构，采用经济、行政和立法等综合措施，不断突破制约全局发展的薄弱环节和主要问题，使城市发展始终能够保持在总

需求略大于总供给的相对平衡水平上。

24、开拓城市发展的新空间，长久保持城市的繁荣与发展。解决城市“紧运行”的矛盾，实现城市的长远发展目标，不仅需要逐步完成发展模式的转换，还必须打破就北京论北京的观念，改变产业、行政机构、科研机构和人口高度集中于城市中心区的极度不均衡布局状态，在更大的开放系统中寻求新的发展空间。城市发展模式的转换，主要是实现城市经济社会内部系统的均衡发展，开拓新空间则是为了求得更大地域空间利用上的优化组合，从而为城市发展提供更为良好的条件。世界大城市发展的历史表明，由于受有限地域空间和城市环境的限制，城市的集聚效益，并不随集聚规模的不断扩大而无限地相应增长。为了解决超过适度规模引起的边际效益递减，解决城市发展与土地、设施结构性失衡的尖锐矛盾，求得地域空间利用上的优化组合，当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在城市中心区高度集约化的经济、科技、信息辐射作用下，必然逐步形成以大城市为中心，中等城市、小城镇有机分布的城镇群体，这是城市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因此，缓解北京城市资源在总量与结构上的失衡状况，永久地保持城市的繁荣与发展，必须合理分散城市中心区已经形成的过于混杂的功能，使中心区更为集中地体现城市的主要功能。凡是不适宜在中心区的经济事业和相当一部分经济管理及文化科研机构，必须坚决扩散到城市新建区和郊区的次中心或分中心，以实现城乡和产业的相对均衡布局。与此同时，必须打破现行行政区划界限，从京、津、冀更大的地域空间范围，为城市发展做多方位选择，逐步形成环首都的联合城镇体系和城乡发展新格局。

25、调整城乡经济结构，充分释放文化智力潜能，增强城市的综合辐射能力。北京城市建设和社会经济的长远发展，必须

服从和体现全国政治文化中心这一城市性质的基本要求，充分发挥服务中央、服务全国的多功能作用。但是，目前北京经济社会结构距离功能目标的要求相差甚远，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潜在能量由于管理体制的分割，未能完全释放，亟待大力挖掘和充分发挥。因此，必须在战略上做出规划，以约束总需求、增加总供给为基本出发点，有步骤地调整城市总体结构，下决心根本扭转目前产业结构不合理的状况，坚定不移地以增强资金、资源、技术三大实力为目标，重组和改造传统工业，大力发展战略深加工产业、高技术产业和第三产业，从而逐步形成适合首都特点的高技术、高质量、高效益、低耗水、低耗能、低污染、少运量、少占地的新兴产业群体。必须改革科技、教育体制，充分释放北京巨大的文化智力潜能，促进城市新资源的开发和短线资源的替代，把科技人才优势更多地转化为首都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社会资源。在产业、科技、教育结构调整过程中，北京的人口和劳动力结构也必须适时地做出调整，以优化的结构满足各项事业发展的需要。

26、深化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调整社会组织的利益关系，形成新的城市运行机制。建国 38 年来，改革前后两个阶段的历史充分证明，实现北京长远发展战略目标的根本出路，是继续深化城市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建立与首都功能相适应的、有权威和有较高效率的行政管理体制。从长远看，一方面必须通过政治体制和城乡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形成适合首都建设特点的宏观调控机制，从经济、行政、立法等方面，强化对各级行政部门以及企事业单位扩张动机的约束，调整社会组织的利益结构，抑制总需求的无计划增长和盲目膨胀。另一方面，必须从产品经济的束缚下彻底解放出来，使城市的经济活动走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轨道，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抑

制需求，增加供给。同时，要继续深化企业改革，以及改革价格体系、完善市场体系和城市税费体系，促进资源和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和充分利用，不断增强城市自我发展、自我积累、自我改造的能力。

战略阶段和近中期目标

27. 根据多种方案预测，2020年前后北京的常住人口总量将出现缓缓回降的趋势；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国民收入水平将有较大的提高，经济实力会有较大的增强。由这两方面的基本因素决定，实现首都发展的战略目标，大体需要经历三个递进的阶段。

第一阶段，从1986年—2000年，为全面改革调整阶段。主要任务是深入进行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科学、教育、文化体制的全面改革，调整政策，理顺关系，实现城市发展模式的转换。通过改革，增强宏观综合调控能力，大力发展战略生产力，初步突破制约城市发展的主要障碍，缓解供需失衡的矛盾，使政治文化中心建设、经济建设和城市建设进入稳定协调发展的轨道。

第二阶段，从2000年——2020年，为巩固提高，稳步发展的阶段。主要任务是巩固、发展改革成果，完善新的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宏观调控能力和城市的综合效益；基本完成城乡经济社会结构的全局性调整，形成新的城市运行机制；确保人口和城市规模转变点的实现，初步形成首都圈产业、人口和城镇体系的综合再布局，为经济社会长期稳定协调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第三阶段，2020年——2050年，为战略目标的实现阶段。主要任务是全面发展，奋力赶超，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飞跃，发挥强大辐射能力，把北京建设成为高度文明的现代化首都和国际中心城市，为推动世界和平与社会进步做出贡献。

28. 从现在起到本世纪末，切实完成全面改革调整阶段的各项任务，对北京的全局和长远发展有着决定性意义。必须下决心，经过十几年的努力，使首都的发展达到下述目标：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走在全国前列，经济、科技和社会的综合发展水平（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先进水平；适合北京特点，以高技术产业为先导的现代产业结构初步形成，传统产业在新的技术基础上得到改造，若干新兴产业接近和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城市综合服务功能进一步增强，城乡建设的现代化居全国领先地位；常住人口增长得到有效控制，市区人口向郊区扩散取得进展；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基本得到控制，市区的环境质量有明显改善；城乡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有显著的提高；科技、教育、文化事业得到较大发展，人民群众的思想道德观念和精神面貌发生较大变化。

第四部分 北京发展的战略重点及对策

29. 实现北京发展战略目标，将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需要几代人坚持不懈的努力。为了顺利完成各战略阶段的任务，并最终向战略总目标逼近，必须紧紧抓住影响全局成败的关键环节，以解决基本矛盾为核心，集中主要力量，采取重点突破的方法，不断推进城市建设、经济、社会的发展。经过多种方案比较论证，北京发展的战略重点是：严格控制人口规模，积极疏导城市人口；调整城乡布局，缓解城市中心区供需矛盾的尖锐程度，开发和建设首都圈；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改造的步伐，积极促成新的经济发展格局；把基础设施建设放在重要位置，努力提高城市综合服务功能和现代化水平；充分释放智力潜能，发挥科学技术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先导作用；加强文化建设，提高精神

文明，培育起新一代人的“北京精神”；大力推进城市改革，依靠民主和法制，加强城市的综合管理。上述方面取得显著成效，对于获得北京未来发展的全局性主动权，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严格控制人口规模，积极疏导城市人口

30. 严格控制和合理调节人口的流量和分布，是关系北京建设和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性问题。从根本上缓解北京的人口压力，必须遵循人口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必然趋势，将人口问题与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密切联系起来考虑。在大规模向外疏散人口的条件没有成熟以前，到本世纪末，常住人口总量要坚决控制在1200万人以内，规划市区控制在650万人以内。

31. 人口迁移增长过快是北京发展中最突出的问题之一，必须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加以解决。基本方针应该是：严格控制，积极疏导；城乡兼顾，合理布局；量出为人，全国统筹。近中期应以控制城市人口为重点，采取以下必要政策措施：

（一）编制人口迁移的年度计划和五年计划，纳入北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通过指令性计划指标，严格控制常住人口增长。

（二）坚决执行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严格控制在北京新建和扩建企业、事业单位”的规定，今后不再批准人口成批、成机构、成建制地迁入或转业到北京。

（三）改革现行户籍制度，对常住人口迁入采取分层控制办法。

（四）对于按统一管理计划指标新增的迁入人口，按人征收城市建设增容费。

（五）制订鼓励人口迁往郊区卫星城、县城、集镇的特殊政

策，形成城市人口分布的次中心和分中心。

(六) 授权首都规划建设委员会，使之成为人口控制的权威机构。条件成熟时，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人口管理法》。

32. 必须长期坚持计划生育、优生优育的政策。由于常住人口总量已经具有一千万人的规模，尽管自然增长率有了明显下降，但是人口出生的绝对数量仍然很大。因此，2000年以前，必须继续抓紧抓好计划生育工作，稳定现行的各项人口生育政策，决不可掉以轻心。2000年以后，考虑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等因素，再酌情适当调整有关生育政策，以满足下个世纪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33. 流动人口规模迅速增加，结构发生变化，在给北京发展带来新的活力的同时，对交通、住宿、供水等方面的需求也明显加剧。北京是全国的首都，有义务接待好四方来客，但是，北京的接待能力不可能无限度增长。因此，解决北京流动人口的基本方针，应该是积极疏导分流，加强控制，严格管理。基本政策应该更多地运用经济办法，区别不同对象，实行有效的调控。

调整城乡布局，建设首都圈

34. 2020年以前北京总人口增长的趋势不可逆转，即使顺利越过人口增长的转变点，人口总量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大幅度下降，为了逐步缓解人口膨胀引起城市中心区供求矛盾的激化程度，不断提高城乡现代化建设的综合水平，必须下决心改变产业、行政机关、事业单位和人口高度集中在城市中心区的不均衡布局状况，在北京市行政辖区内和市辖区周围更大的空间范围，对产业、人口、城镇功能和生态环境等，进行综合性宏观调整

和再布局，从根本上扭转城市中心区有限空间容量对北京发展的全局性制约。调整后的北京城乡布局，分为城市中心区、城市新建区、城市郊区和首都圈四个层次，在每一层次内包含若干次中心和分中心，形成以城市中心区为核心的圈层分布格局，使地域空间组合实现均衡化和合理化。

35. 几年来的实践证明，《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和1983年党中央、国务院的批复，是北京城市建设与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基本精神是完全正确的。但是，由于形势的发展和各种因素的影响，《批复》中提出的一些根本性措施，没有得到有力的贯彻执行，城市规模膨胀的速度大大超过原来的规划设想。基于这个基本事实，需要从已经变化了的客观实际出发，考虑修改《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使之成为同首都发展战略相衔接，适应改革开放新形势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城市建设发展规划。

36. 二环路以内及二环路两侧的城市中心区，应集中体现政治中心功能，保持历史文化名城的风貌。为此，必须积极疏导这一区域内的常住人口，精简各种行政性机构，搬迁工业企业，加强环境建设。今后，城市中心区的投资，应主要用于基础设施的建设，商业、饮食业、服务业的综合开发，重要古建筑的保护修缮，以及现有办公用房和生活住房的改造等。居住区的改造应严格控制密度，一般不应再新建居住密度高的住宅小区，以降低人口密度。经过若干年的努力，使城市中心区真正成为容纳党政军首脑机关的政治中心，和国际国内交往的中心。人口密度由现在的每平方公里2.7万人降到2万人以下。

为疏导城市中心区人口和改善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确保城市中心区功能的实现，城市建设的投资重点要逐步转向三环路周围及以外地区。城市新建区要按照分散集团式布局，建成

若干有园林和绿化带相隔离的，城市基础设施和生活服务设施比较完备的工作区和生活小区。这些工作区和生活小区内的人口密度，由现在的每平方公里 6900 人逐步增长到 1 万至 1.5 万人左右。这个区域内现有工厂企业需要进一步改造搬迁，文化科研单位也不宜大规模兴建或扩建。

37. 郊区是北京的农副产品生产基地，和城市的生态保护带及旅游休养基地，也是未来工业、贸易、科技、教育等事业发展的重要基地。城市郊区圈层的开发与建设要放宽政策，多方面吸引资金、人才和技术，加快轨道交通和通信建设。以建成几个优于城市中心区基础设施和生活服务设施的区域中心为基础，通过产品扩散、横向联合和企业搬迁等多种形式，逐步建成十来个容纳 10 万—15 万人口的分中心区、吸引城市疏散人口，截留农村过剩人口；把房山、通州、昌平、顺义、黄村按市辖区管理，以安置从城市中心区、新建区疏散出来的工业企业，教育科研分支机构和中央部门的下属单位；要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建成相当一批容纳 3 万至 5 万人口的集镇，使大批脱离土地的农民“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

38. 综合分析各方面因素，着眼于下个世纪国内外环境的变化，有必要考虑选择适当位置建设“副都”。“副都”主要是分担目前城市中心区过于庞杂的部分功能，在城市中心区与周围地区的分中心之间起桥梁作用。在目前生产力水平还不太高的情况下，集中有限财力、物力建设“副都”，可以较快见到成效。“副都”的建设应有全面优惠的特殊政策，建设水平要有一个较高的起点，总规模以 80 万至 100 万人口为宜，地点可在顺义、昌平一线，涿州或廊坊市三个地区做可行性论证，选择比较最优方案。

39. 为了适应城市化发展趋势的要求，同时借鉴国外一些

首都建设的成功经验，必须从更大空间范围考虑北京的发展，逐步形成朝东向海为主的环首都联合城镇体系，这个城镇体系可简称首都圈。首都圈的功能在于，实现区域内生产力的合理布局，充分利用有限的资源，通过区域内的经济联合、企业集团、合资经营等方式，增强这一地区内的经济实力，减少和避免重复建设的严重浪费现象，为这一地区内的城乡发展提供更多更好的物质条件。首都圈的范围包括京、津、唐、秦和它们之间的一批中小城市、集镇和相互连结的广大地区。特别是在京、津、唐、秦、和京、津南北两线，开辟建设一个三角形的大、中、小城市相联接的城市带，形成首都朝东向海的大陆走廊，构成首都圈的基本框架。这项工作必须在中央统一领导下，京、津、冀及有关城市参加，组成有权威的领导机构，制订区域性长远发展规划，通过地区间经济、社会、科技、文化等方面的广泛联系，以及制定互惠互利的经济、社会政策，达到相互支援、共同发展的目的。

建设首都圈，要特别重视秦皇岛作为我国“夏都”和北京出海口的战略地位。在推进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建立与发展北京与秦皇岛之间长期稳定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采取积极措施，加快秦皇岛的开发和京秦之间的交通通讯建设，使秦皇岛地区逐步成为首都对外开放的出海大门之一，并能起到吸引北京人口的“反磁中心”作用。

调整和改造产业结构，形成经济发展新格局

40. 根据北京的城市性质和国民经济及城市发展的内在规律，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改造，是解决城市发展基本矛盾，转换发展模式，实现北京长远发展目标的重要途径和基本保证。

北京产业结构调整与改造的方向，是按照我国经济发展战

略的总要求，从北京的战略地位和现实基础出发，坚定不移地走技术进步和集约化发展的道路，加快发展适合首都特点的高技术产业，改造传统产业，促进智力资源的开发和一些短线资源的替代，调整地区布局，形成开放式、多层次、网络型的首都经济区，使北京的产业结构在新的更高层次上带动和支撑城市现代化建设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争取在下个世纪初，形成以高技术产业为先导，以出口导向和深加工产业为重点，以第三产业为主体，以突出综合服务功能为宗旨的高水平、集约化的经济发展新格局。

41. 为此，必须制订强有力的产业政策，将产业调整的宏观指导深入到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用行政、经济和立法手段，对产业结构变化进行定向干预，促使产业结构和产业组织向预期目标推进。

北京产业政策的核心，是要有利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充分挖掘现有潜力，实现生产力要素的最佳配置，迅速增强资金实力，资源实力和技术实力。增强资金实力，就是通过发展投入少、产出多、效益高的产业部门，积累和集聚资金，扩大财源，增强城市的自我发展能力。增强资源实力，就是通过改造提高材料工业的加工深度，合理利用和节约有形资源，大力开发无形资源。通过掌握更多的资源，增强对经济和企业的调控能力，大大增加在产业发展中的回旋余地。促进加工程度高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有效提高资源供给能力。增强技术实力，就是通过依靠技术进步，改造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推动产业结构向高层次、高水平转换，为首都现代化建设奠定雄厚的技术基础，以高水平、高质量的产品占领国内市场，扩大出口。增强三个实力综合起来，就是要达到迅速发展社会生产力和有效提高城乡整体效益的目的。

42. 北京产业政策的基本指向，要从实际出发，正确选择和优先发展适合首都特点的支柱产业，积极推进六个方面的转变：

(1) 第三产业从以传统行业为中心的发展，向以新兴行业为中心的发展转变。根据北京的城市性质和特殊战略地位，尽快摆脱第三产业在传统观念、传统体制、旧的经营方式等方面的束缚，大力推动旅游、房地产、金融、信息等新兴第三产业的发展；使无形产品行业成为筹集资金、开发技术、发挥人才优势的主体产业。

(2) 郊区农业的生产技术从主要服务于北京，逐步向服务于全国市场和国际市场转变。在调整城乡产业布局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城乡结合的种植、林果、畜牧、淡水养殖、食品加工、农业技术开发及其它多种经营的生产体系，使北京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和科研成果进入全国和国际市场。

(3) 工业从满足内需为主的内向型发展，向外向引导型发展转变。努力增加出口、开拓国际市场，使出口导向的工业部门在国民经济中占居重要地位，使以粗加工和初级产品为主的出口结构转变为以深加工和高技术产品为主的出口结构。以此带动全市各产业部门协同起来，积极地参与国际竞争，追赶国际先进水平，以符合国际标准的生产技术和优质产品占领国内市场。

(4) 科研和生产从自我封闭的体制，向多方位开放的科研、开发、应用、推广一体化转变。依靠科学技术进步推动经济发展上层次、上水平、增效益。

(5) 结构调整方式从注重追加投资的增量调整，向注重现有生产要素的重组与更新的存量调整转变。一些消耗高、污染大、效益差的企业，要在调整过程中转产、关并，使原有生产要素向新兴产业、高附加价值产业、高收入产业转移。

(6) 政府干预方式从行政性直接管理，向有计划商品经济条

件下的间接调控与必要的行政干预相结合转变，通过完善企业经营管理机制，加速发育市场体系，建立与北京城市性质相适应的宏观调控政策体系，实现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

43. 在产业结构调整起步阶段，需要努力抓好以下几点：

(1) 最大限度地掌握初级资源，充分发挥现有短线资源的作用，积极开发无形资源，引导产业结构调整尽快入轨。为此，在一定时期内要进一步强化基础产业，结合技术改造，在严格控制污染、严格节水、节能的前提下，深化燕化、首钢的配套能力，在全国范围内，有步骤地建立起稳定的、有相当规模的有色冶金、化工、建材、食品加工等初级原料生产基地，以增加有形资源的实力。同时，要大力加强无形资源的开发，特别是要尽快把北京“四宝”——房地产、金融、科技、信息，转化为资源实力和资金实力，从这两方面抓起，为全面调整准备条件。

(2) 以行业集约化、推动科技进步、加速开发新产品和引进产品、设备的国产化为目标，积极推进企业重组，提高产业集中程度。建立企业集团是提高企业规模的一种重要形式，一方面可以把分散的有关企业联合起来，最大限度地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另一方面可以发挥大企业财力、物力、技术力量雄厚的辐射作用，使应该关、停、并、转的企业，能够较为顺利地纳入产业政策的轨道。企业集团还可以在较高层次上统筹安排企业的发展，减少盲目性。根据北京的现实情况和战略发展要求，要在深化改革的过程中，通过产品扩散、在外地投产建厂、与外省市联合经营等多种方式，逐步在毛纺、化工、电力、汽车、建材、电子、机电、高档消费品等生产领域，建立若干个规模不等的跨部门、跨地区的企业集团，形成“一条龙”式的配套发展，使之在全国同行业中具有较强的竞争能力，成为北京工业的重要支柱。与此相适应，要以利益兼顾、互相补充、共同发展为原则，建立产业及

企业间的协调机制，以促进生产要素在产业和企业间合理通畅地流动。

(3) 以利润为导向，发展高技术产业，尽快完成产业奠基。高技术产业是知识技术密集、经济效益高的产业，初始发展阶段，需要大量资金投入。因此，要积极创造条件，一方面通过扩大商品出口增加外汇收入，一方面最大限度地吸引国外的科技、人才与资本，率先实行商品化生产与经营。在一定时期内，国家要适当加大这一方面的投资，并采取大力扶植的政策。

(4) 以加强管理、提高效益与质量为中心，改造市区工业，发展郊区工业。要努力提高企业素质，使劳动生产率和产品质量达到全国先进水平。利用市场机制，合理调节资源的分配与流向，把有限资源集中用于投入少、产出高的优势行业和拳头产品，把不宜在市区发展的企业或产品，结合技术改造，采取多种形式，逐步扩散到郊区企业，使市区大中型企业逐步成为新产品开发、经营服务和信息咨询中心。

(5) 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为中心，建立和完善城乡一体化的农村经济结构，大力发展农业生产。调整农村经济结构，要十分注意同北京城乡布局和产业布局合理化的要求相统一，实现经济、社会、环境三个效益协调一致。在这个前提下，把农业生产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要逐步把粮食生产纳入现代食品生产体系，在保证农民口粮基本自给的基础上，开发本地资源，建立现代化的、稳定的副食品生产和加工基地。要从多方面采取措施，加快先进技术的推广和应用，大力提高劳动生产率，努力降低成本。要充分发挥京郊农业的优势，以禽蛋、牛奶工业化生产为前导，逐步建立养猪、养鱼、蔬菜栽培、良种选育等工业化生产，同时进一步加强和提高饲料工业化生产水平，在农业发展的更多领域向规模经济过渡。

坚定不移地加快基础设施建设

44、采取有力措施，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对于缓解城市供求结构性失衡的矛盾，增强城市载体荷载能力，把北京建设成为现代化的国际性城市，具有决定意义。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必须采取统一规划、合理布局、综合配套、突出重点的指导方针。在这一方针指导下，基础设施建设的近中期目标是，基本解决城市运行中突出的薄弱环节，增加基础设施短线的综合供给能力，使城市供求逐步向相对平衡过渡；远期目标是，根据现代化国际城市标准，建成高效率的信息和交通系统，高质量的工作和生活环境，高水平的公用服务设施，从而使城市获得高度统一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

45、北京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必须突出抓好以下工作：

第一，解决供水紧张问题，努力实现水资源供求的基本平衡。必须把解决水资源短缺问题放在北京基础设施建设的首位，实行以节水求生存，以节水求发展的战略方针。为此，必须改革水资源管理体制，加强水资源使用的全面计划管理，严格控制用水总量；采取行政、经济、立法等手段，制定严格的节水措施；要积极采用世界最先进的节水技术，首先解决用水大户的节水，大力推广污水资源化，尽早把北京建设成节水型城市。同时，要在中央和有关省市的支持下，积极创造条件，尽快实现外流域调水进京。

第二，加快交通与通信建设。交通与通讯设施是城市运行的动脉与神经，也是城市发展制约全局的短线。必须把近期措施与远期规划结合起来，把改善城市布局和管理，与加快设施建设结合起来。从长远看，解决北京交通拥挤的根本措施，在于完

善路网系统和改善交通结构，建设以地铁和现代化有轨交通为核心的高效率快速轨道交通系统。自行车的使用和发展必须加以限制，公共客运交通需要有一个较大的发展。在通讯、邮电建设方面，要改革现行管理体制，在国家增加建设投资的同时，发动社会各方面集资建设。要重点扩大市内电话容量，增加国际电话线路，增强邮运能力，提高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

第三，改善能源结构，实行民用能源优质化。北京城市能源特别是民用能源消费结构不合理，二次能源十分短缺。解决这个矛盾，一方面要继续做好节能工作，杜绝各方面的浪费，大大降低耗能指标，提高一、二次能源的利用率。另一方面要在中央有关部门的支持和兄弟省市的帮助下，尽早实现“气化北京”的方案，根本改变目前能源结构以煤为主的状况。近期应重点调整民用能源结构，尽快实现民用能源优质化。与此同时，还要进一步加快电源和电网建设，以缓解首都电力供应紧张的状况。

第四，搞好环境建设，改善环境质量。北京的环境质量已经恶化到了十分严重的程度，必须从战略上给予高度重视。为此，要在社会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的基础上，广泛汲取世界各国保护环境、治理污染的成功经验，逐步加大环境建设的投资比重。今后，城市建设、发展经济的各项工作，都要把防止污染、改善环境质量作为制订规划和计划的重要内容之一，做到建设与保护环境同步规划、同步实施、同步发展。近期的重点工作，是开展区域性综合治理，对工业及部分生活污染实行总量控制；加速园林绿化建设，使重点保护目标和局部地区的环境质量尽快有所改善。中期的任务，是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在2000年至2010年期间，使环境质量由下降转为上升。远期目标，是把北京建设成为清洁、美丽的城市，在环境质量上达到世界大城市的先进水平。

46、加快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突出困难是资金短缺。为此，今后在城市固定资产投资计划中，应确定合理的基础设施投资比例，五年计划不应低于 25% 的水平，并力求达到 30%。在进一步深化改革过程中，要逐步改变市政公用设施的管理办法，尽可能采取企业化经营；要区别不同情况，对部分市政公用设施实行有偿使用，合理收费，要坚持以行政和立法相结合的形式，全面收取基础设施配套费或综合开发费，扩大城市公用事业的附加收入。此外，还要发行基础设施建设债券，广泛筹集社会闲散资金，等等。通过这些途径，逐步建立起稳定的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渠道。为了解决产业发展与政治文化中心建设争夺基础设施的矛盾，今后对新兴产业的发展，应实行与基础设施挂钩的政策，即：新兴产业在创办初期自收自支，形成规模、稳定生产以后，将所创造利润的一部分，专项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充分发挥科学技术和教育的先导作用

47、北京是显示国家水平的科技智力高度密集的地区。迎接世界新技术革命挑战，充分释放科学技术和智力的潜能，将是北京未来经济、社会全面振兴的主要推动力量。北京科学技术的发展，要坚持面向经济建设、面向城市现代化建设和管理，为改善人民生活服务，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方向。基本途径是走中央与地方联合研究开发的道路，运用高智力与产业嫁接，逐步增强技术实力，形成系统、配套的改造传统产业的科技能力。要有重点有选择地发展一批有相当规模的技术密集型产业，以推动城市现代化和国际化进程，为我国全面赶超世界水平做出贡献。

48、充分释放北京科技和智力潜能，必须打破条块分割的局

面，积极发展中央科研单位与地方科研力量多种形式的联合，集中力量开展科研攻关，争取在新技术领域研究开发中，在短期内取得较大成果。要继续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迎接世界新技术革命挑战，充分释放科学技术和智力的潜能，将是北京贯彻中央关于“放活科研机构，放活科研人员”的方针，积极探索科研机构与企业结合的新形式，力求较快地形成不同层次、不同类别的科研生产联合体，解决好经济和城市建设中最迫切的关键性课题，强化大中型企业的技术开发和创新能力。要大力支持和积极扶持民间科技机构，使这种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的新形式，不断深化和完善。要继续加强技术引进工作，制订统一的技术引进计划和政策，把技术引进和提高消化、吸收、创新能力，作为推动北京科技进步的重要战略措施之一。

49、为了充分发挥北京地区的科技优势，使之成为全国科技进步的主导力量，要积极创办两三个科学技术开发区。在开发区内，集中一批航天、超导、微电子、生物工程、激光等方面的科研机构和高级专门人才，组织若干个具有较强实力的科技攻坚群体和若干个高水平、高效益的科研生产联合体。要为开发区的建设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全面实行人才、技术、资金、税收、外汇，外贸等方面对内对外开放政策。目前，中关村地区的科技开发已经在改革中形成一定规模，初步显示了这方面的潜力，需要总结经验，做好长远发展规划，争取在近中期内取得更大的发展。其他尚未确定的科技开发区，要结合调整城乡布局和各项改革，及早选定、尽快起步。

50、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努力为现代化建设培养合格人才。当代科学技术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北京城乡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两个文明建设水平的大提高，都取决于全体劳动者思想、文化和身体素质的全面提高。北京既要为自身的现

代化建设培养合格人才，又担负着为全国现代化建设输送合格人才的繁重任务。因此，必须提早做好人才总量和结构的需求预测，制订长远发展规划，从多方面采取重大措施，经过几个五年计划的不懈努力，奠定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智力基础，培养出一批批高质量的合格人才。

51、要坚持执行“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方针，扎实抓好基础教育，积极发展幼儿教育，大力提高中小学教育水平。在教育质量稳步提高的前提下，在适当时候考虑延长普及义务教育的年限。同时，要改变传统的教育观念，更新教学内容，发现并推广新的教育和教学方式。要正确处理普通教育与高等教育、基础教育与专业教育、职业教育与在职教育的关系。高等教育要通过现有学校扩建挖潜，扶植重点学科建设和扩大国内外交流等方式，使教学和科研逐步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要调动全社会各方面力量，发挥各级、各部门的积极性，大力开展职业技术教育，加快成人高等教育和中等专业教育，加强和扩大在职职工的技术培训。力争到本世纪末，全市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全面提高和进一步扩大高等学校教育，初步形成适合首都现代化建设要求的终身教育体系。

52、为了实现北京教育事业发展的战略目标，必须十分重视师范教育，全面提高师资素质和教学水平。师范教育是教育事业总体发展的“母机”，决定着全民教育的总水平，是教育事业发展的关键环节。要努力通过改善办学条件、较大幅度提高教师工资待遇和社会地位等有效措施，使师范院校的学生来源、教育教学的设施设备、师范毕业生的素质等，能够稳步地逐年有所提高。

53、要继续深入进行教育改革。积极推进教育、生产、科研三结合。进一步深化各级教育部门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进一

步完善新的教师任用制度、招生和分配制度。在办学方向和教学方式上，要积极创造条件，进一步密切教育与北京城乡发展、与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关系，逐步建立起有利于全面提高教育质量、造就一代新人的、充满活力的教育体制。

加强文化建设 提高精神文明

54、随着改革深入和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必将伴随着文化建设高潮的兴起和社会观念的深刻变革。作为我国对内对外窗口的北京，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状态和高尚的道德情操，人民科学、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等，都将在这里得到全面的展示。因此，大力加强北京的文化建设，努力提高精神文明水平，对于实现发展战略总目标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对于鼓舞人民建设四化、振兴中华，也将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55、北京文化建设的根本任务和战略目标，是永葆北京文化经久不衰，充分发挥精神产品在国内外的强大凝聚力与辐射力。具体说，是要适应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需要，培育体现时代风貌的“北京精神”，造就出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与此同时，逐步建成能够全面代表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精粹，对于世界文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当代世界文化名城。

56、北京文化建设的主要内容是：

第一，培育“首都意识”和“北京精神”，造就“四有”新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形成的“延安精神”，曾经激励全党全民族团结一致，夺取了全国胜利，并鼓舞获得解放不久的人民取得了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辉煌成就。当前，在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国内外迅速发展着的形势，都迫切要求北京带头形成良好的党风，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道德风尚、社会治安和社会秩序，

形成反映优秀民族文化传统的民风民俗，和科学、文明、健康的社会主义现代生活方式。当代的北京人，必须以高度的责任感、荣誉感和历史感，继承和发扬当年的“延安精神”，勇于创造出代表新时代风貌的“北京精神”，不辜负党、国家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愿望。为此，要大力加强政治思想建设，在全市人民中大力普及理想教育、道德教育、文化教育、法制教育，进行深入系统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在全体市民中牢固树立起以“高标准、严要求、创一流、做表率”为基本内容的“首都意识”。要通过各种形式的教育活动和文化活动，提高全体人民的思想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逐步形成体现新时期革命性、科学性和创造性要求的，以具有开拓创新的勇气，奋力进取的品格，实事求是的作风，遵纪守法的观念，谦虚谨慎的态度，勤俭朴素的传统为核心内容的“北京精神”。要从青少年开始，把“四有”教育，作为一条主线贯穿于各种教育的始终，坚持德、智、体、劳、美全面发展的方针，培育起新一代具有强烈“首都意识”和“北京精神”的“四有”新人。

第二，形成具有北京地方特色的文化体系，源源不断地创造出大量高质的精神产品。北京拥有全国各地所不及的文化遗产，地方文化的历史源远流长，特别是经过新中国 38 年的丰富、发展和提高，已具有建成当代世界文化名城的基本条件。为了完成这一历史重任，从现在起，北京的文化建设要重点选择自身具有优势、能够影响全国发展、代表国家形象的文化系列。目前，初步筛选的文化系列，由以下基本内容组成：历史文化、革命文化、思想文化、科教文化、艺术文化、社区文化、环境文化、饮食文化、家庭文化等等。同时，充分发挥体育、卫生、新闻、出版、信息、博物博览馆等其它各项文化事业的作用，重视影视、声像等现代化技术手段和大众传播媒介的作用，不断创造出崭新的文

化种类和艺术形式，努力生产出大批反映时代风貌、鼓舞人民斗志、振奋民族精神、艺术精湛的社会主义精神产品。

第三，逐步兴建与世界文化名城地位相适应的先进设施，创造良好的文化环境。作为全国文化中心，无论是发掘和继承传统文化，还是交流与创造现代文化，都要依靠必要的技术设备和先进设施。同时，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闲暇时间的增多，人民群众文化享受的需求在深度和广度上也将大幅度增加。因此，从现在起，应根据财力和物力的可能，着手规划、设计并建设拥有现代先进技术装备的，适合国内外文化交流需要的国家级文化设施；同时，制定有关政策，拨发专项资金，动员各级政府和群众团体，按照城市功能分区的要求，兴建各种专业或综合的博物馆、图书馆、展览馆、娱乐厅、俱乐部等等。要鼓励区、县、乡、村、街道自建体现社区传统文化精华的博物馆，以及群众活动便利、内容健康的文化活动站（室）。历史上所形成的北京独特城市风貌和文化环境，既是中华祖先遗留给当代北京人的不可多得的珍宝，又是北京立足国际发达城市之林，成为当代世界文化名城的基本条件。在城市建设，特别是在旧城区内兴建文化设施时，尤其要格外注意和原有建筑风貌和文化环境多方面的协调，避免造成“建设性破坏”。

57. 实现北京文化建设目标的基本途径是：

(1) 依靠发展社会生产力和教育科学技术进步，普遍提高全体市民的文化素养。生产力诸要素，特别是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是提高民族文化素养，更新传统观念，创造新的生活方式的基本决定因素，因而也是社会文化发生和发展最基本推动力量。北京要充分利用科技和教育比较发达的优势，提高对外文化交流的能力，要通过发展形式多样的各类教育事业，使科学技术成果和文化知识普及化。要注意培养人们的观察能力、研究

能力和发明创造能力，使新一代北京人具有现代观念和良好的创造能力。

(2) 依靠广大市民的创造精神和建设热情，培植新思想、新观念的生长点。近几年来，人民创造了“五讲、四美、三热爱”、“文明共建”等众多精神文明建设的好形式，在北京当代的文化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后，要进一步动员全体市民，更广泛的依靠群众，积极培育和扶植那些内容健康、形式新颖的文化生长点，不断丰富和发展北京的古老文化，产生和形成当代的新文化。

(3) 依靠国家对外开放政策提供的机遇和条件，通过国际间的交流，巩固和发展北京的文化体系。任何民族的优秀文化都不可能在封闭状态下发展完善，北京作为中国文化的代表之一，要在继承发扬传统优秀文化的同时，勇于吸收融合世界进步文化和各民族艺术。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为人民服务方向的前提下，善于借助外来文化的冲击力量，割除传统文化中封建主义和落后保守的固疾，不断创造出充满活力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

58、实现北京文化建设的宏传目标，需要根据国家和首都发展战略的总体安排，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集中各方面力量，完成文化建设高潮到来前的各项准备工作，主要方面是：

(1) 确立文化产业的战略地位，并制定相应的发展政策。北京的文化遗产和现代文化事业具有雄厚的基础，与有限的自然资源相比，这是北京的优势所在。要充分认识文化遗产和文化事业蕴藏的巨大经济潜能，并把它列为北京长远发展的战略性资源和战略产业。通过改革和发展，逐步加大文化产业在国民经济总体结构中的比重。近中期内，应通过发展国际旅游、艺术表演和展览、服饰设计、民间工艺纪念品制作、美食加工、美容美

发、广告信息、装璜设计，以及出版、印刷等行业，率先构成北京文化产业雏形。要鼓励区、县、乡、镇各级政府、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集体和个人，积极兴办各类文化事业，并在财政、贷款、原材料供应、价格、税收等方面给予优惠。

(2)培养造就各类优秀人才，形成规模宏大、素质良好、结构合理的思想、文化、艺术大军。北京历史上就是文星璀璨、大师辈出之地。在未来的发展中，北京更要负起这一历史使命。除了完善教育、培训考核等常规性的人才选拔制度外，特别要在改革、开发和迎接新技术革命挑战的过程中，发掘、发现、扶植、考察、锻炼各类优秀人才，使他们能够脱颖而出，进取不已。从首都政治、文化和国际交往的任务要求出发，第一，要造就一支精通国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队伍，成为坚持与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骨干力量。第二，要培养出一大批具有国家和世界一流水平的科技、管理、文学、艺术、卫生、体育等方面的高级专家和专业工作者。使他们成为继承传统优秀文化、发展现代文化、促进内外文化交流、提高城市文化水平的基本力量。第三，要形成一支群众性文化骨干和积极分子队伍，依靠这支队伍，把普及和提高全市人民群众文化水平的工作广泛开展起来。

(3)在改革中建立充满活力的文化体制。这种新体制要有利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有利于培育文化新人和艺术新苗，有利于广泛开展国内外文化交流。在管理体制上，要变现行的单一行政手段管理，为经济、法律、行政三种手段综合使用；在经营方式上，变现行的事业单位“大锅饭”为企业化经营；在文化发展形式上，变现在基本上单一的国家渠道为国家、集体、个人、企业、社会团体、民间多种形式、多层次的全民化发展。在改革和开放的过程中，逐步形成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型文化体制。

深化城市改革 完善民主制度,加强法制建设

59、北京发展战略的实施与全面调整,正是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历史时期。必须看到,北京城市发展模式的转换,以及控制和疏导人口,调整城乡布局,调整产业结构,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发挥科学技术优势,加强文化建设等等战略重点的实施,无一例外地需要通过改革旧的体制、制度,改变传统的观念、习惯,以获得发展所需要的新的活力和巨大的动力。因此,进一步深化城乡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是实现发展战略目标的关键。

60、针对北京发展面临的基本矛盾,进一步深化改革,就是要按照党中央已经确定的方针、政策,逐步建立起能够有效抑制城市需求膨胀,积极推进城市经济科技集约化发展的城市运行机制。主要内容包括政企分开,尽快搞活大中型企业,建立以房地产市场和金融市场为重要支点的城市市场体系;形成以间接控制为主的、有高度权威的宏观调控体系等。

61、要坚定不移地简政放权,实行政企分开。城市政府一般只制订法规制度和进行必要的监督检查,不具体干预企业的经营和管理。工业、商业、建筑、市政、乡镇企业等等,在自主经营、自主管理的原则下,要十分注意提高参与国际国内经济活动的竞争能力,正确处理国家、企业职工的关系,为北京的发展提供更多的资金,更多更好的产品。

62、必须在深化企业改革的基础上,积极有步骤地建立和完善适合首都特点的市场体系,利用市场机制约束需求膨胀,增加供给能力,合理调节和配置有限的资源。

开放和建立房地产市场。充分利用城市不同地区已经形成、并会继续发展的房地产差价,组织和发展房地产市场,对于

调节城市有限资源的供求关系，抑制城市中心区的需求膨胀，推动旧城改造与城乡再布局，改善投资环境和增强城市自我发展能力，具有重要意义，大有文章可作。因此，要有步骤地促进城市房地产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尽早开征土地使用税(费)，加快住宅商品化的步伐，设立房地产权管理机构，组建房地产经营公司，逐步开放房地产交易市场。建立房地产市场的工作十分复杂，在实施步骤上应先易后难，循序渐进。近期主要从城市建设综合开发的改革入手，尽快在城市新建区实行建设用地开发费和商品房价格级差基价制，统一征地拆迁，统一建设，建成后有计划地出售或出租。在此基础上，结合旧城改造，制订城市中心区的级差地租标准和收费办法，以获得城市土地，利用的高效益。

建立和发展金融市场。充分利用北京经济信息方面的特有优势，建立和发展功能健全的金融市场，可以从多渠道筹集城市建设资金，促进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与配置，加快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调整，推动横向联合的发展。因此，要以大力发展横向的资金金融通为先导，在积极建设短期资金市场的同时，探索建立起一批长期资金市场。要打破资金管理“大锅饭”，推进专业银行的企业化，拓展金融机构之间的拆借市场，逐步把各类金融机构和工商机构业引入资金市场。要发展大额定期存单和商业票据承兑与贴现业务，建立外汇调剂市场，有组织有步骤地开放股票、债券市场，等等。

除去有重点地抓好房地产和金融两大市场以外，还要有步骤地发展体现城市功能要求、为长远发展目标服务、具有北京特色的消费品市场、生产资料市场、技术市场、信息市场、劳务市场，形成完整统一的与国际国内市场相沟通的市场体系。

建立和完善市场体系，必须改革北京的价格管理体制，实行

特殊的物价政策。北京的物价必须明显高于全国其它大城市，充分利用价格杠杆，合理调节城市与地区之间商品和人口的流向，理顺城市商品和资源供求之间的关系。随着物价的调整，北京的工资水平和税收标准也要相应提高。

63、深化企业改革，建立和完善市场体系，都要求改变地方政府建设和管理城市的方式。政府的职能要尽快从分物资、分投资、下达指令性计划指标的传统方式，转到研究制定城市规划、城市政策，产业政策、行业规划等方面，综合运用财政、税收、金融、价格等经济手段调节供求，为企业提供各种信息和服务。

由于目前国家行政管理体制和市场机制尚不健全，近期内合理平衡北京城市资源和供求关系的难度极大。为了顺利完成全面调整阶段的战略任务，建议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直接领导下，成立国家级管理机构，对北京的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对城市有限资源的使用与分配，进行统筹决策。

按照现行财政体制，北京地方财政难以承担建设全国首都的重任。为了适应北京的特殊地位、特殊功能，以及由此决定的特殊财政收支规律，建立“首都财政”是重要措施之一。“首都财政”，可以采取在中央财政预算科目内增设“首都建设专项补助基金”的办法，也可在地方财政收入分成中增加“首都建设专项分成”的内容。同时应从北京的实际情况出发，逐步增设新的地方税种和收费项目，标准高于其它城市；应适当扩大北京外汇留存比例和外汇使用额度，适当扩大利用外资和引进技术的权限，对北京实行沿海开放城市的优惠政策。

64、建设现代化首都城市，必须在政治体制改革中，完善民主制度，加强法制建设。要从北京的实际情况出发，认真总结历史经验，制订可行方案，重新调整现行政区划。目前城市各区、街道管辖范围过大，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距离较远，管理过

于粗糙，需要通过调整行政区划改变这种状况。要进一步明确市、区(县)街(乡)政府的行政职能，加强基层居民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的建设，以便使城市管理职责明确，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要经常开展社会协商对话活动，及时、准确地做到下情上达，彼此沟通、互相理解。有关首都建设发展的重大问题，都要在全市人民中广泛讨论，使人民群众真正当家作主，以主人翁身份关心，支持和参与城市管理。

65、首都发展战略的实施，周期性长，涉及的因素错综复杂。因此，必须依靠法制，保障发展和改革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良好秩序。要依据首都发展战略的基本任务和每一发展阶段的主要工作，逐步建立起完备的地方法规体系，实行全面的“依法治都”。法制要为城市发展和改革提供重要依据，并且使每一阶段发展与改革的成果得到巩固。为了确保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凡涉及全局性的发展规划、发展途径、战略重点的调整和更改，均需履行一定的法律程序，以根本杜绝超越法律的行为或现象发生。从发展看，在保证中央、国务院集中统一领导的前提下，应进一步加强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政府的职权，在城市建设管理方面，由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行使地方立法权、监督权和重大项目的审议决定权。

结 束 语

66、这份研究报告主要是对首都的长远发展提出基本判断，探求基本对策思路。鉴于未来事物发展的多种可能性和复杂性，首都发展战略研究工作，将通过长期跟踪，随着客观情况的发展，不断进行修改、补充和调整，滚动式地拓展前进。

67、总体战略构想和战略对策基本确立以后，尚需组织力量进一步研究各部门的发展战略，分阶段制定战略实施规划，并通

过编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计划组织落实。

68、首都发展战略研究工作，得到中央各部门、北京市各级领导机关、各民主党派、各社会团体和各方面专家、学者，以及广大群众的热情支持与帮助。《研究报告》广泛吸收了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这是决策研究工作民主化、社会化的一次有益尝试。要继续发扬走群众路线的工作作风与工作方法，依靠广大干部和群众，集中全市人民的智慧与力量，把战略研究工作进一步推向深入，把组织实施工作切实落到实处。

